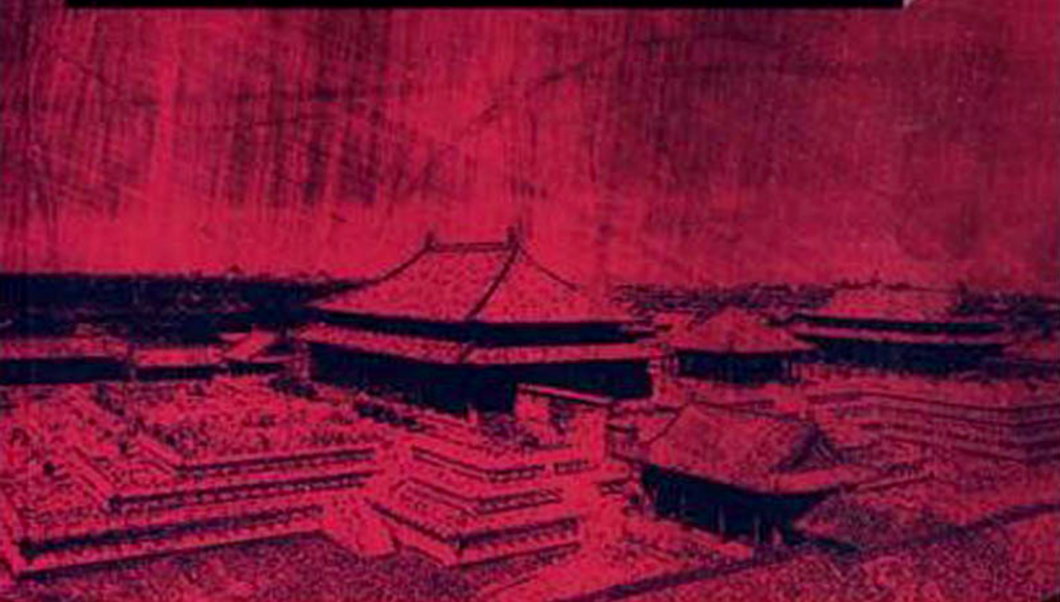
从紫禁城到楼兰

——斯文·赫定最后一次沙漠探险

[瑞典]斯文·赫定 著　王鸣野 译



Across the Gobi Desert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从紫禁城到楼兰

——斯文·赫定最后一次沙漠探险

[瑞典]斯文·赫定 著　王鸣野 译



Across the Gobi Desert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译序

本书原名《穿越戈壁》（Across the Gobi Desert），著者为瑞典著名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是20世纪最著名的探险家之一，他在中国西部的探险与考察横跨时间长达40余年。他屡次深入中国的新疆、西藏、内蒙古各地，搜集了大量有关地理、地质、人文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被后人誉为“西域探险之父”。

本书是斯文·赫定撰写的一部有关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的纪实游记。

曾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这次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无论在新疆探险史上，还是在中外合作探险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中国学者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的探险考察中有了自己的地位，并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中外合作的多学科的大型科学考察。

1926年冬天，已经61岁的斯文·赫定来到中国，他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准备对中国西北进行新的地理考察。但考察队还在筹备中，就遭到以北京大学的学者们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的普遍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学者们的意见而与外方做出交涉。经过近6个月的谈判，达成了如下协议：本次考察由中瑞双方共同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双方团长，团员有中方人员10人，欧洲人员17人（瑞典5人，丹麦1人，德国11人）。考察内容包括地质学、地磁学、气象学、天文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考察团采集和挖掘的所有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质样品等都是中国的财产。

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出发，经包头、百灵庙至额尔济纳河流域，于1928年2月到达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实地考察持续至1933年。考察期间，中外学者在内蒙古和新疆发现了多处石器时代遗址，中国学者还在考察中加深了对中国西北历史和地理状况的认识。

考察结束后的1937年，考察团以《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瑞典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各省科学考察的报告》为总标题，在斯德哥尔摩陆续出版考察报告达50余种。本书最早于1931年以德文出版，后于1968年由佛斯特格林伍德出版公司以英文出版，译者为H.J.CANT。

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将艰苦枯燥的地理探险活动以轻松风趣的笔调展现给读者，它既记述了探险的成绩，又以大量的笔墨描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的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同时还毫不避讳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军阀混战对探险队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当探险队接近新疆时，当时的新疆统治者杨增新草木皆兵的恐惧心态跃然纸上。在该书的附录部分，斯文·赫定不无自豪地宣称自己通过对新疆的考察不仅发现了罗布泊南北摆动的规律，而且还极其罕见地亲眼目睹了这一规律的现实发生。同时，作者在本书中还不厌其烦地呈献给读者许多逸闻趣事，读来引人入胜。

总之，本书生动活泼，记事精彩，融通俗性、趣味性、猎奇性于一体，同时又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是一本具有较高可读性的探险游记著作。

第一章　终于离开了

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躁动不安的过渡时期，这就是我面对的特殊时代。在北京的静谧的公使馆里，我远距离注视着汉口、上海和南京的变乱，那些将军们之间纷争纠结的混乱场景一幕幕在我脑海闪过。此时的我也一直身陷于一个小型风暴的中心，攻击直指探险队——我的计划有被破坏的危险。

终于，我离开的日子到了。眼下只有探险队的医生戴维·胡莫博士跟随着我，我不知道我们俩谁在5月8日那天干活更多。除了一起打包外，我还来来往往忙碌着把我的名片送到各公使馆去。在冬季和春天的那些日子里，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和挪威人都对我非常慷慨，我向V·K.亭博士、W·H.翁博士和格拉堡博士辞行，这最后一位朋友许诺关照我在北京的事情。最后我与著名的蒙古探险家罗依·查普曼·安德鲁斯在一起待了一个多小时的美好时光，从他那里我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帮助，当然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卖给了我65匹训练有素的骆驼——他已不再需要这些牲畜了，由于局势不稳定，他已决定不再在即将到来的夏天去蒙古进行发现之旅了。

胡莫博士和我与瑞典大臣奥斯卡·艾威罗夫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晚上。艾威罗夫精力充沛、善解人意且机智多谋，从一开始，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他都会说服中国政府许可我在动荡的年代进行一次伟大的探险。在最后的几周里，他的练达和忠诚帮助探险队绕过了一系列可能使探险搁浅的暗礁。现在，我们清除了所有的障碍。

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9日早晨探险队的行李被放在德斯瓦根斯—里茨旅馆前面的人行道上。这些行李要装在银行的汽车上，银行的汽车将会带来我们在旅途中使用的大部分装银两的箱子。火车在中午11时50分出发，汽车来迟了，因而我们只剩下45分钟了。汽车停好后行李被放了上去，行李太重，一根弹簧被压断了，于是我们打电

话要了别的车。我提前驰往西直门附近的车站，这里有一群中国人，他们是准备参加这次和平跨越亚洲活动的5名学者和5名学生，他们大部分是国立大学的教授、董事会的成员以及一个作为我们的协助者的委员会的成员——在调研过程中该委员会承担的是保护者的角色。

接下来的30分钟令人激动。火车进站了，拨给我们使用的车厢中满是中国人和他们的行李。已经是中午12时30分了，站长解释说他只能再等10分钟。运送银两和旅行包的车还未到达——我不能将所有的钱就交给胡莫一个人去管，我必须留在这儿。让火车走吧，虽然我很不情愿这样做，北京的报纸将会说在最后一刻不可逾越的障碍横在了我的道路上。好在一些送行的朋友许诺说他们会担保将银子送来，所以我同意离开。

忽然，站前的广场上卷起一片尘土，三四辆汽车疾驰而来。“是胡莫！”瑞典大臣奥斯卡·艾威罗夫大叫一声。真是载着银两和行李的车来了，能干的医生胡莫救了我们。一群苦力上前帮忙将沉重的箱子拖进了车厢，一切安顿就绪后，我们向艾威罗夫和其他朋友挥手作别，火车也随之向前移动。

“真是谢天谢地。”我想，“现在终于开始了横越亚洲大地的旅行了。”

北京逐渐消失在我身后，南口如一道天然门廊通向群山。早先的色彩单调的灰蓝色群山，现在却变得色彩鲜明起来。铁路在右手通往明陵，在空洞的地下，永乐大帝已在他那令人敬畏的陵墓中安睡了五百多年。铁路两边是宽阔的冲积平原，村庄、茅屋，还有灰色的院墙点缀其上。杨柳初长，荫翳渐成。田野已现绿意，耕地成灰褐色的小块状。

突然，一阵尘暴席卷谷地，周围的一切都被包裹在一层厚厚的雾气之中。顺着山势蜿蜒而去的古老城墙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车厢中的东西全都遍覆黄尘。但这并未破坏我们的“假日”心情，不仅是那些中国人，其他人也都很高兴能够离开。当局拨给我们使用的车厢原来是用来拉牛的，在车厢的中央和两边安置了窄窄的长凳，四边的墙

上则开了一些长方形的窗口。在欧洲或美洲，从来没有一节车厢如这般肮脏，不过这又算得了什么？尘土充塞的所在对我更有吸引力。胡莫和我坐在前面，我们可以在那儿煮茶、做早饭。紧挨着我们的是3位考古学家，他们很快就会显示出寻找史前村落的高超本领。

另外一组的徐炳昶教授一直在与两个同事谈话。学生们打开旅行包拿出吃的东西。另一边，年轻的摄影师匡则试图将狭窄的南口谷地的一段保存完好的长城摄入相机，但他没有成功。

离我们不远处坐着李教授，他身穿西服，面容酷似欧洲人。他是一个地理学教授，他要求乘坐我们的专用车厢和他的5个学生一起旅行到包头，我们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李教授友善合群，向他的学生和我们介绍谷地的地理状况。徐教授是探险队中的中方工作人员的领队，他和李教授都是我们早餐和午餐桌上受欢迎的客人。

现在经过的地方我以前也来过。

第二天，火车到达了绥远地区的首府归化城，火车在此停留了20分钟，我们很高兴在此地见到地理学家艾里克·诺林博士，他正在这里为旅队的中方工作人员购买补给。火车接着又开动了，一个又一个小时慢慢过去了。单一而枯燥的平原伸向远方，在那里，巨大的黄河在两道河湾处闪闪发光。果园里万花竞放，为两边的灰色村庄增添了秀色和妩媚。极目远眺，北边低矮的阴山一直向西蜿蜒而去。

太阳通过窗口把温暖的光线送了进来，中国人有的沉沉入睡，有的吞云吐雾，有的则不停地喝着他们带来的茶叶。置身于这17个中国人之中，我们两个瑞典人则讨论着模糊的、无法预料的将来和我们的伟大计划。

夕阳西下，远处出现了包头的影子。傍晚7时30分火车停下了，我的8位德籍工作人员已在车站等候，他们当中有我提名做工作人员首领的赫姆波尔少校和主管天文观测及无线接收设备的霍德博士，还有瑞典考古学家夫克·伯格曼以及翻译H·苏——他与一个德国人结婚，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

两名警察前来查验证件。胡莫和另外几个人护送着一辆装着银两的牛车前往去冬租住的一处农舍，其余的人则骑上俊美的骆驼先行向城里进发。只一刻钟我们便抵达南城门，入得城门，又得走同样远的路程才能到达下榻的农庄。时已薄暮，商业街上远近各处的商肆都点亮了灯笼。布满尘土的街上人声喧哗，到处都可看到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派到这里的驻屯兵士。

拉尔森站在农庄的入口处，双腿叉开作指挥状，我们受到他的热烈欢迎，他首先祝贺我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我先问候了我的蒙古族和汉人仆役，然后在拉尔森和巴龙·冯·玛森巴希的引导下察看了我的中亚之行的第一个大本营。中国学生住在一间较大的房子中，这间房子的隔壁是厨房，在这两间房子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在左面通向一个小庭院。这个庭院中有3间房，较小的一间留给我使用，剩下的两大间分别用作俱乐部和餐厅。拉尔森在庭院里竖起了自己的帐篷，帐篷前面的柱子上飘扬着一面瑞典国旗。

另外一个较大的庭院里的房舍中住着其他人，在这个庭院里，装满补给品的箱子堆得像座小山似的。用两辆运货卡车将这一堆行李运到包头算不了什么，可一想到这些成吨的东西将要由骆驼驮载着越过沙漠地带，并且要每天卸下和装上的时候，我的心中不禁犯起了嘀咕。

越过一座小山便是第三座庭院，我们所购买的骆驼都圈养在此。霍德博士在两个庭院之间建起了他的天文站，为了应付天气和风的变化，他带着许多精密的仪器。

正在我视察的当儿，装载银两的牛车由远而近，慢腾腾地走进了院子。

直到晚上10点，厨房的男孩才摇着手铃满院子跑着招呼用餐，于是大家就进入餐厅坐下来——我们坐了两桌。晚餐有汤、禽肉和米饭，虽然没有酒，但大家心情都很愉快，精神振奋。对那些自3月24日起就一直在这里等待我和胡莫博士的人来说，时光该是多么难熬啊！

一些人至今还未赶上来。以其在中国腹地和西部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旅行而闻名的诺林还在归化城，沃尔兹少校、巴龙·冯·玛斯考尔·毕艾伯斯坦因将在那里与他会合。他用60匹骆驼将新购的给养运到内蒙古百灵庙附近约定的地点。探险队的另外两名成员也将在那里与大队人马会合，他们一个是丹麦人哈斯伦德·克里斯腾森，他曾在北京为我服务过，现在准备做拉尔森的助手，另外一个人是我们的德籍影片拍摄师里艾伯润兹，他们两人接到指示前往张家口之北160公里处的哈伦—乌苏瑞典使团驻地接收我从安德鲁斯那儿购买的65匹骆驼。

然而，餐桌上有足够的陪客，李教授是我们的贵客，可惜他不能陪我们考察。喝完咖啡后我顿了一下杯子用英语发表了讲话，主要是感谢中国人的好意，我还讲到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讲到了在内战和骚动不安的局势中我们准备趋向中国遥远的内陆省份，而与此同时其他的欧洲人却正在向海边撤退。北京的所有白人朋友都以怀疑和不安的眼光注视着我与中国学者的合作，我们将证明白种人和黄种人能够很好地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因为知识会超越政治的藩篱和种族的偏见，我从不打算理会令人不安的纷扰和短视的民族主义。旅行队的人都将成为朋友，中国人将享有与欧洲人一样的权利。而且，中国人是在自己的国家，他们是主人，而我们则是客人。因而，我期望每个人都能恪尽职守，因为，如果探险队的所有成员都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那我们的成果将会真正有利于人类的福祉。最后，我表达了对所有在场人员的欢迎之情，并希望我们的旅行是愉快的和成功的。

随后站起来讲话的是徐炳昶教授，他代表旅行队的中国人致辞，其意思与我的讲话大致相同。然后我们又在一起坐了好长时间。

我上床时午夜已过，陷入沉思的我久久不能入睡，难道我真的成了对地球上最大的陆地的中心进行考察的一支科学队伍的领导了吗？

我们还得在包头待9天，这是一个约有6万居民的城市，这个处在黄河北岸的小城同时还是一个约3万士兵的驻扎地。1897年2月，在铁路修通以前，我就在这里与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传教士赫莱伯格一家度过了难忘的几天。和其他许多的瑞典传教士一样，他也在后来的义

和团起义中被杀害了。

在北京的谈判有满意的结果以前，我还不能让拉尔森购买所需要的250匹骆驼，可是只有购买了这些骆驼我们才会有足够的畜力。然而，这些待购的骆驼还在距包头有4天路程的山坡上放牧着，在5月18日以前还不能役使它们。因此我们必须安下心来耐心等待。

不过，事情还很多，日子显得也不是很长。作为一个由60人和300多匹骆驼组成的旅行队的首领，我必须处理各种报告、请求和抱怨——成千上万的事情需要讨论和解决，以便百事顺遂，从而使这个移动的“小镇”能够形成一个有机而和谐的整体。什么事情都不能忘记，我必须检查我们的工资主管赫尔·穆伦温格呈上来的所有数据，他保管着现金和账目。现在我已看出钱有点紧张，须在北京弄点钱并要委托在包头的斯文森传教士转给我。传教士的儿子索得鲍姆取代了翻译H·苏的位置，因而我们不再需要他了。索得鲍姆出生在这里，他不仅会说蒙古语，而且汉语也讲得与瑞典语一样流利。

给养需重新打包，这样，当大队伍再次宿营时，我们就能在专门的箱子中找到所有所需的物品，因而省得打开更多的箱子。旅行队的成员们也将自己的私人财物归整一番。齐莫曼少校自那年秋天以来就是我的西伯利亚和东北之行的副官，也是我此次旅行的主要帮手，他知道该去哪儿找到所需要的东西。

从宽大的庭院到小小的房间，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工作，不时出现的一些小事情给我们带来一些刺激。有一次，从房顶上大家看到约莫有20个士兵围住邻居的房子进行搜查，他们抓住一名小偷捆了起来。

从这里的房顶上可以看到黄河，它流经甘肃和北部数省，绕着鄂尔多斯沙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弯形，我曾在那片沙漠中差点冻死。

一天，庭院中的工作都停了下来，原因是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大雨转眼间就变成了冰雹。甚至在开阔地上的骆驼也受到惊吓。冰雹大如榛子，半是圆锥形半是球形。天气顿时冷如冰冻，而刚才的温度还是28摄氏度。恶劣的天气过去以后，庭院已被白雪覆盖。探险

队的几个年轻人打起了雪球仗，他们投射练习的靶子是同伴的窗户，那些窗户都是糊着纸的木头框子。屋内传来愤怒的喊叫和骂声，而扔雪球的人和旁观者则乐得哈哈大笑。然而那还是我们的房子，打破了几个纸窗格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想赶快离开这个农舍，在这么长时间里，它对大部分人来说实际上是一座监狱，谁也不会想它，更不会去想那些寄居其内的嗜血的臭虫。

庭院中充塞着箱子、袋子、水容器、帐篷、行李以及其他物件，要在这么小的地方为几百匹骆驼上装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在西北城门前面租了一家客店，5月16日开始向那里转移400只箱子和其他所有设备，5月18日，220匹骆驼到了，租用它们共花去我1650块钱。同一天的最后一个物件，也就是最后一个沉重的银两箱子留在了客店。与此同时，在医生胡莫的陪同下，我向传教士斯文森一家道别——他们一直都很友好，时刻准备给予我帮助。黄昏时我们回到客店，客店的院子里已支起帐篷准备过夜。

次日，阳光炙热，所有的行李上都拴上了双条绳子。然后，为了保护驮鞍上的箱子，只好将两根木棒穿过两个绳环固定起来。院子里挤满了人畜，大家又激动又不安。穿着黑制服的警察、一身灰蓝色装束的士兵、衣衫褴褛的孩童徜徉在汉人、蒙古人仆役以及旅行队的人们中间。“账房先生”赫尔·穆伦温格最后一次发放工钱。还有人给亲人写信。帐篷被拆下来像睡袋似的卷成一卷。骆驼们被带去饮水。我们准备等到天气稍凉便立即上路。下午3点吃饭的铃声响起，鸡蛋、猪肉、羊肉、面包和茶纷乱地放在箱子上，我们一堆一堆地坐着吃饭。在我们的“桌子”上，我的举止就好像是身处斯德哥尔摩的泰勒斯剧院之中似的。西北风很猛，尘土在周遭打转。大家找了一小块阴凉处束手等待，结果发现还是不得不在这里再待一宿。

5月20日早晨5点，拉尔森叫醒了我。我走出房门一看，刚刚露脸的太阳下呈现出一幅令人振奋的画面。为了便于快速上装，骆驼被5个或10个一组地拴在一字摆开的长长的货捆上，然后就被带到客店东面的开阔地上，大队人马正在那里集合。一匹身驮准备在中亚建立永久观测点的仪器设备的骆驼将这些贵重的东西摔到了客店门口，所幸

没有损坏什么东西。在门外等待的是30名武装士兵，他们在包头的指挥官派他们作旅队的护卫。他们左臂套着红白色臂章，佩带步枪，骑着长毛小马。对他们来说，这次特殊的任务是愉快和受欢迎的，他们不停地说笑和唱歌，看来非常幽默。

骆驼的上装工作一直未停，它们一群一群地被带了出去，除了一两匹黑色的以外，大部分牲畜都呈褐色。它们现在正在脱毛，毛一片片、一束束地挂在头上、肚子上、脖子上和腿上，风一吹，一条条地都飞了起来。这种“春装”自然是不好看，但情况很快就会得到改善，天气变热以后，它们的冬毛就全脱光了。

现在瑞典人和德国人骑着骆驼排着长队走了出来，来复枪盒子、望远镜和照相设备装在皮箱之中，黄皮鞍带中装着热水瓶、笔记本、手枪、弹药及其他物品，它们与墨西哥皮鞍碰撞发出叮当之声。阳光在这些皮鞍上形成明亮的反光，使它们显得坚实而壮观。

身处不断变化的纵队之间，我想既然一切已经就绪，于是就转身回到旅店，却又在那儿发现许多趣事。大腹便便的黑猪在箱子之间游荡、拱地，店主的妻子一跛一跛地转悠，周遭是一群往筐子中拣骆驼粪的唧唧喳喳的半裸孩子。先是那8个沉重的装银两的箱子刚刚被装到4匹强壮的骆驼背上，然后便是38只氢气筒，为防止它们在热天爆炸，这些设备都被裹在毛毡和草垫当中。

很难说我们是一支旅行队。那是由5个或10个一组的骆驼肩并肩组成的一个旅行队，在亚洲的岁月里我曾见过无数旅行队——前往甘肃和蒙古的阿拉伯和美索不达米亚商队，埃尔布鲁兹的波斯人的朝拜圣墓的旅队，长城脚下的来自约迪亚山脉和西奈沙漠之间的土耳其和巴伐利亚的单峰驼旅队。然而，我的这支旅队是我所见到的最令人自豪的一支，它看上去确实壮观，如一支军队在行进，充满了色彩、勇气和力量，与此同时，太阳也升上了山顶，更使这壮观的场景增色不少，但阴影依然很长，不规则地投射到渐显绿意的地面上。

拉尔森报告说庭院已经搬空，所有骆驼都已负重集合到外面的平地上，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我们上马，旅队开始行进。中国学者们不

用马鞍，而是坐在口袋上，如同盘踞在王座上似的。我本人则要不停地摆弄罗盘、望远镜、画板和笔记本，于是像以前一样，我的骆驼则要以特殊的方式收拾一番，这样我就能舒舒服服地旅行了。骆驼的侧面挂着我的卷起来的帐篷和床具，在这些东西和驼背毯之间铺开的是布和毛皮，我就坐在这个鸟巢似的小窝里，并能随意改变位置和伸展双腿，为了不使我的工作受到骆驼步态的些微影响，我让那位蒙古人门托领着它——门托骑着一匹高大的骆驼，人很可靠。

卫队的30名士兵骑着马在我的周围狂奔，卷起阵阵尘土。骆驼队则无声地迈着缓缓的步伐排着望不到头的长队向第一个进入北方山脉的山口挺进。第一队的头驼身上绑着一面瑞典国旗，包头慢慢地从我们的后面消失了。

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们终于踏上了去往中亚的道路，那里的沙漠之区如同一条宽大的干河床一样横贯整个中亚腹地。我们将面临伟大的任务和进行神秘的冒险。

第二章　土匪出没的地方

的确，我们真的上路了，旅队开始了第一天穿越亚洲大陆的漫长征程。我已进行了第一次观测，并将结果记入第一张图表，还有数不清的图表要制作。标出这望不到尽头的路线的所有拐弯、起伏、山脉、溪流、峡谷和宿营地，通过天文计算，它们的位置将会出现在地图上。为了测量我的骆驼走过的距离，我们设下了第二道150米长的基线，通过这种办法我得到了所走过的距离的长度，不会有更准确的测距仪了，我的优秀的骆驼当然不明白在制作行进路线图中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0批共150只骆驼越过我直趋第一座山口，我与门托则跟在它们后面。在单调枯黄的地貌上，时不时显出一丝绿色，那是草原上孤寂的夏日的小草的影子，但经常的情况则是看不到一点生命的痕迹。与此同时，长长的、逶迤向前的旅队却呈现出一派壮观而鲜明的景象，如同一串漂亮的黑珠子。最前面的骆驼在远处几乎看不见，那些紧随在后的骆驼迈着稳健的步伐负重前行，队伍两边是骑着马、又嚷又唱的士兵。回头看去，只见整个地平线上都是人和马，旅队的后尾几乎看不到。听不到骆驼的声响，它们那像猫一样轻盈的步伐在松软、多尘的土地上没有一丝声音，唯一的声音是木箱子摩擦驮鞍柱子的咯吱声，铁皮包护的提环和箱子锁刺耳地敲打箱子的叮当作响之声，逃脱的骆驼的尖叫声以及士兵、蒙古人、各工作人员以及首领的谈话声，最后是北风的怒吼声。没有旅队的铃声，也许是在土匪出没的地方尽量不出声地行走更安全一点吧。但一旦我们有了自己的骆驼，那么它们的铜铃将会奏出响彻沙漠的、既古老而又清新的旋律。

一次观测接着一次观测，图表上走过的路在慢慢地变长，我们的右方和前面是低矮的山，旅队循着往帕斯布伦和五原的道路向西北方向前进，“基督将军”冯玉祥曾坐着汽车走过这条路。在我们到达这些地方之前，一直用电报线与他人保持联络。看到最后一根电报杆消失

在身后时，我第一次有了真切的孤独感。

我们不时地经过一个个惨兮兮的村庄，村里的泥巴小屋破旧不堪，墙壁摇摇欲坠，有些屋子似乎无人居住，因为可怜的主人已被土匪和士兵赶走了。在其他房子中我们看到居民和他们的孩子衣不蔽体，我们还经常看到农民驾着马或牛拉的铁犁耕地的情形。

旋风如阴郁的幽灵掠过平地，它们旋转着前进，卷起尘土扶摇直上，与此同时，一些小的气旋则缓慢地向前移动。

中午12点，大队通过衮胡斗克村，村民站在小屋前注视着这不曾见过的景象。村子的中央“躺”着两个遇难飞机的发动机，它们是冯玉祥将军的征战的无言见证人。飞机看上去很古怪，骆驼受到惊吓，几乎控制不住。傣特曼的骆驼疯狂地向前一跃，将他头冲地摔了下来，他背部受了严重的碰撞。黑德使出浑身力气才将自己的骆驼控制住。他们抓笼头的双手被撕开流着血，但是胡莫博士打开他的专用包，很快给受伤者包好了伤口。

旅队正在接近西北方向的一列山脉，在左边远一点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灌溉渠，渠两边柳树成行，那是洪水浇灌的结果。在西面，昆都伦苏莫庙正面的白色墙壁依稀可辨，宛如沙漠中仙女的城堡，此刻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喇嘛住在里面，其他人都去北方的游牧人中间去布道了。

在一个由长方形的泥墙构成的旅店的门前，卫队的士兵们停下来拴住了马，他们称这是1号宿营地，并嘱咐我们把银钱放在墙内安全的地方，但我们宁可将帐篷支在外面的开阔地上，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旅队的杂物用品。

中国仆役们确实能干，他们三下五除二就给自己的骆驼卸了装备，旅队的骆驼被一组一组地领过来躺在地上，它们背上的两根杆子从绳环中拨出。很快，两只箱子就放到了地上，明天早上只要简单地动一下手，这些箱子又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仅半个小时，所有的232匹骆驼就被卸了负重，箱子被堆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空间里，在帐篷前

面形成了一个由箱子和“街道”构成的“小城镇”，帐篷则是由各旅行队的主管搭建的，蒙古人门托和马特给我建起了舒适的住所，里面是我每天都要用到的箱子和袋子，还有地毯和床。旅队的每个成员都有折叠铁床，但我本人则放弃了这种物件。在亚洲的岁月里我只有一次使用过有顶篷的木床，而且几天以后就用它作了营火木材，也许只有老“亚洲”才觉得与亚洲的土地进行亲密接触是一种特惠。“蒙古公爵”拉尔森就这么想，他最喜欢躺在地上睡觉，胡莫博士也学我们的样子，我相信向西再走500里后，将会有一大批床被留在后面。每当什么东西被扔掉或用完时，拉尔森总要说：“现在骆驼能轻松一些了。”

在昆都伦苏莫庙旁边的营地上首次出现了一群醒目的蓝色蒙古帐篷，帐篷上有白色的经幡和螺旋状的装饰品，据说这些东西意味着长生不老和永恒。正如前面所言，有6个人还有待与我们会合。营地已竖起了16顶帐篷，在帐篷行列的中间，用作俱乐部的亮绿色帐篷鹤立鸡群，这个带有英国特色的“房子”有两层，帐篷本身被一个很大的遮阳篷罩住，遮阳篷悬在空中，在前面形成了一个类似阳台的东西，在帐篷里面，是一张用三脚架支起来的桌子，在其周围则是旅行用的折叠凳子。

下午5点时俱乐部用铃声招呼大家去用茶。俱乐部帐篷的入口很独特，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大家认为它值拉尔森所付的200墨西哥元。所有的人都激动欢快。一队中国商旅前来驻扎在旅店的院子中——他们为了安全一直跟在我们的旅队后面。从西方，也许是从乌里雅苏台，第二支旅队正在向我们走来，到现在它还没遇到任何麻烦，此时距包头也只有一天的行程。人们可以想象，在荒野中度过四五个月后接近目的地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突然，西北风卷来了一场风暴，像鞭子似的抽打着营地，我们几乎无法回到自己的帐篷，我的帐篷受风的一面被扯得像个鼓面，其他的帆布带着极强的力量啪嗒作响，我跳起来抓住最前面的一根帐篷柱子，以防绳索突然绷断。出去查看是不可能了，在风暴中是站不稳的，周围什么也看不见，甚至连最近的帐篷也影子全无，空气中满是沙尘，帐篷布砰砰作响，粉尘满屋，暴露在外的东西上很快覆满了尘土，轻一点的物品、纸张、图表

都被我飞快地扔进了箱子，要不它们就会“随风而逝”。伯格曼的太阳帽消失在雾中，拉尔森说它已飞回了包头，但后来却在箱子中间找到了它。几分钟后狂风止息，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总算可以检查一下损失的情况了。16顶帐篷中有4顶被吹倒在地，俱乐部未能幸免，它的外遮阳台被完全撕成碎片，如扯碎的旗帜般在风中啪啪作响，在一片慌乱中当然也有让人开心的事情，这便是那些倒塌了的帐篷中的人的狼狈模样，瞧！仪表不凡的“蒙古公爵”拉尔森从废墟中现身了，他像哲学家一样坐在箱子上，默想着该把帐篷的哪一头先竖起来。其他两个倒塌的帐篷的床上满是沙尘，里面的居住者也在忙乱地收拢四散的东西。

黄昏时分一场轻雨飘然而至，雨停后骆驼被带往各自的行李旁，它们将在夜里躺在这儿消化胃中的食物。骆驼在晚上总要被带进营地，不是怕贼偷，它们不像马，摸黑出去吃草时眼睛看不见。

白天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分配晚上的警戒任务，两个欧洲人和4个卫兵成了哨兵，士兵们请求我们不要离开营地一步，因为这样可能会被抓走，或在回来时遭到射击。于是命令发出了——晚上每个人都必须待在营地的范围以内。

当一个人知道他会在凌晨被再次叫醒的时候，他是不会反对在晚上9点就上床睡觉的。令我吃惊的是，在头一天的长途行军后，我一点都不累，躺着久久不能成眠，而是思考着自己奇特的命运。在经过了19年的间歇后我又开始在亚洲探险了，早先我总是单人独骑地出行，而今我成了28个欧洲人和中国人所组成的团体的领导，这些人要么是学者，要么无论如何也算文化人，他们大多读过我的书，而现在他们却在自己做笔记，而且在将来会有机会证实我的记录是否与实际相符。拉尔森、诺林和袁复礼都有过很多旅行经历，但却没有一个到过亚洲的心脏，而我却在那里度过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这些欧洲人以前大多从未踏上亚洲的土地，而这些中国人也只在中国内地的范围内旅行过。我们都不知道经过嘎顺淖尔和哈密到迪化迪化，即今乌鲁木齐。的路线，我有意选择了我至今还不熟悉的道路和地区——第一天的行军已经预示着将来的日子会是什么样。每一天行军时我们都要

越过无尽的空间向西瞭望，那里不管对我们还是对整个外部世界来说都是一片神秘的所在。因此，在走向2100公里以外的新疆省首府迪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把眼睛睁大，不能遗漏任何重要的发现。

多年来一直飘浮在我眼前的渴望与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我躺在亚洲的土地上，听着哨兵的脚步在帐篷周围回响，夜风在营地上空怒号。这已不再是梦想而是现实，我已开始执行我所计划的最伟大的任务，这一任务前所未有。

次日早晨4点30分我醒了，但我得先揉揉眼睛，仔细看看是否真的又到了古老的亚洲，那整个大陆是否向我和我的同伴敞开了胸怀。这是多么令人自豪的伟大情感呀！晚上挺冷，5点时温度只有8.8摄氏度。我根本未顾及早已预料的劳累，只是背有点僵，但时间一长它就会变得有弹性的。

到处都是招呼声、喊叫声和命令声——有人说瑞典语，有人说汉语，还有人说蒙古语。拉尔森像个陆军元帅似的走来走去，检查着一切。骆驼们愤怒地尖叫，因为它们又得驮着行李上路了。帐篷拆了，床卷了起来，厨房用具收拾起来放入箱子，我们的壮观的旅行大队又开始移动了，目标是前方的山脉。

旅队的路线通往昆都伦古尔谷地，那儿溪水潺潺，我们涉过时水花飞扬，溅到身上感觉很惬意。在顶部覆有浓密植物的幽谷中，黄色的野玫瑰、蓝色的剑旗花和其他野花竞相绽放，香气氤氲。在谷地变宽的地方是杂草，牛车轮子吱哑吱哑的滚动声也不时传来，空气清新，凉气变浓，风吹过来带有寒意，大家都冷得穿上皮外套，徐炳昶教授把自己裹在大衣里——所有中国人都身穿欧洲猎装。有一两个人异常平静地坐在驼背上读书。我们在一个拐弯处停下，让看不到尽头的大队人马从身旁走过去。一名旅队负责人走在最后，负责检查有没有什么东西遗落下。

在萨巴萨村附近停放着许多牛车和两辆漂亮而实用的运输工具，人们称之为北京车——在这儿被用作运输工具。萨巴萨村的前半部分已成废墟无人居住，在村子的正中间，三枚炮弹提醒人们这里曾见证

过冯玉祥的轻型野战炮。通到五原的电报线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络，那条电报线由三根线构成，最低的一条低得我们不得不用棍子将其支起来，以免遭到损坏。两辆被劫掠的汽车的残骸也是冯元帅在此地作战的有力证明，有些村子被完全夷为平地，人迹杳然。尽管如此，到处仍可见到耕地的痕迹——人们还在劳作。看到他们隐藏于柳树和榆树荫中的身影，真让人惊奇。

谷地现在变得很开阔。队伍沿着左边前进，那儿有很大的水池和小溪流，到处铺展着柔软的、散发着芳香的草地——一个理想的宿营地。在烤炙的灰黄色荒野，这里不正是天堂吗？但旅队的前锋正在跨越寸草不生和起伏不定的高地，于是天堂便如同梦中的幽灵一样在身后消失了。

继续前行便到达吴坟子村，我们打算在此过夜，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这里更换护卫。骆驼都被卸了装备，旅队的帐篷“城”很快就在村子前面的一块地里建成了。当伙房冒起烟，厨房设备就被置于工作状态，旅队的大厨冯·考尔在厨房忙活，他把晚饭需要的东西都摆了出来，有黄油、饼干以及英式柑橘酱。村民们身着红色和黑蓝色衣服聚在周围看热闹。

已经西斜的太阳送来红彤彤的光线，30名即将返回包头的士兵站在阳光下合影留念。新卫队有20人，扛着红黄色旗子，左臂佩红黄色布条，正待接受调遣。根据中国人的建议应让两支卫队同时守夜，旧卫队守卫营地，而新卫队则在距我们更远的周围山上警戒。人们十分直率地告诉我应该给红白旗士兵和红黄旗士兵分配不同的任务，以免他们产生冲突和偷拿彼此的武器——如果在我们的营地中发生一场小型内战肯定很令人激动。下岗的士兵都跑进村子，在那儿去度过他们的夜晚。

我与中国人谈了晚上值勤的事情，他们认为自己应该理所当然地承担一份责任，但唯一希望的是能有一位带枪的欧洲人陪伴，这样在必要时可以应对夜晚和黑暗中的不测。4名学生立即要求值夜，于是给他们分配了不同的时间段。这样，在以后的夜晚，中国学者便开始

上岗了，甚至他们的领导徐炳昶教授也要求不被落下。由于年龄的缘故，欧洲人中只有我和拉尔森免值夜勤。由于胡莫博士和霍德博士一整天都忙个不停，我也想免除他们俩的夜间值勤任务，但他们却不想得到高于其他人的任何特权。

夜色四合，黑幕降临大地，骆驼从草地归来，晚上的值勤也开始了。半开的帐篷中透出亲切的光线，到处都是谈笑的声音，一架曼陀林送来轻快的旋律，周围寂静异常，谁会相信我们现在正处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土匪横行的地区呢？谁又能相信我们还处在一个内战随时都可能重新爆发的地区呢？

次日早晨我刚准备穿衣服，就有人告诉我说老卫队正在等待接受我的遣送，士兵们骑马排成横队，站在他们前面的是骑马的指挥官。大部分旅队小组领导都陪在周围，他们个个身带照相机。我走上前去用汉语致辞，感谢他们的忠诚，祝愿他们安全抵家。接受了每人60元的津贴后，这些人就骑在小马上转了一圈，然后飞快地向包头方向奔去。

新的20名卫兵开始“服役”，像前面的卫队一样，他们都穿着鲜亮的蓝灰色制服，但头上却戴的是平常的小丝绸圆帽，而非军帽。其中一个士兵的长枪上带着红黄旗。所有的人都把枪放在鞍头上，枪口冲地。他们的小马虽然不怎么好，但士兵骑在上面飞奔接近营地时械击马嘶，枪和袋子叮当作响，再加上他们嘹亮的歌声以及狂呼乱叫声，把我们的骆驼都快要吓死了。

我们拔营起行，两个士兵走在前面，和他们走在一起的是霍德博士，他自己牵着的平静深沉的骆驼身上驮着两口特别贵重的箱子，一口箱子中是经线仪，另一口箱子中是每日必需的气象观测用具。我为了解闷也跑到队伍前面与拉尔森、胡莫、伯格曼和傣特曼走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有说有笑的团体。我的意思是说别人在谈笑，而我本人则必须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路上和图表上，并将所有的观测记入笔记本。旅队走在一带宽阔的平地上，两侧是低缓的纵向山地。所有的地上都种着燕麦、芥末和鸦片，至少是在不久前种上去的。不久以前这片土

地完全属于蒙古人，但汉族人以微不足道的价钱将其买去，然后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耕植收获。确实还有一些蒙古人住在这里，但他们在与顽强和勤劳的汉人的斗争中一般都处境不妙。汉人熟悉农业，需要土地，而作为游牧者的蒙古人则不断地被赶往北方的南部边境。因此，在人们的注视下，这里不断发生着持续不断地移民活动，这和我在1923年乘车经过蒙古东部时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但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区，由于内战和土匪的破坏，平静的耕作已不可能，土地的生命力已完全被耗尽了。在吴坟子村的田地里，一个孤独的农民跟在黑牛和犁后踽踽前行，透过农舍的废墟我看到的是贫困和压抑，这里看不到一只鸡，也几乎见不到猪，有的只是一些憔悴不堪、饥肠辘辘、衣不遮体的人类。但他们不乞讨，只是惊讶地看着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到这片荒凉的地方。

一路上还有许多这样废弃的小村落，但却透露出真正的生命的迹象。奥尔特涅果村的田地有小运河引来的水浇灌，运河两岸栽植榆树。在榆树的高高的枝头上有喜鹊作窝，看到水和正在吐绿的树木让人不禁精神一振。

临近中午时刮来一场猛烈的北风。在北方的湛蓝色天空，有一块奇特的乳白色云团向我们飘过来，它就像一座拱形桥把整个苍穹从东向西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拱状光束，如同象征性的凯旋拱门，通过这道“门”我们将要进入这片其他欧洲人一无所知的土地。

我们现在骑行在旅队的中央，大家准备在奥尔特涅果村外的休耕地上休息一下，几捆行李从骆驼身上卸了下来。但与我们的希望相反，前队又开始移动了，所有的纵队都跟了上去，此时不断刮着恶劣的北风。旅队两侧是低矮的山丘，无法看到陆地向哪个方向延伸。只有最近的山丘在混浊的空气中兀然而立。我们继续前进了两个小时——这可不是两个小时就能忘却的两个小时。越来越强的风真是一种麻烦，皮囊、遮盖物及其他放在骆驼身上的东西不停地抖动，我要使劲保护着图表、袋子和罗盘，以防它们被风吹跑。我的骆驼现在走在最后，拉尔森和伯格曼步行在侧。草原上尘雾弥漫，阴郁的旅队逶迤前行，色调模糊，最后竟完全消失在旋起的尘土中。最前面的纵队已

没有踪影，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风景依然好看。空气中的幽灵都来对付我们，但旅队还在继续前进。这是一支行进的队伍，一个游离的部落，一群趋向神秘之地的人和动物。风在尖厉地呼号，骆驼和马身上都覆盖着厚厚的尘土，宛如彗星的灰色拖尾。我们似乎正在涉过一条急速上游的沙尘之河，远近各处都可以看到贴地的旋风、沙柱旋转着掠过。我已不记得以前是否被风从骆驼上掀下来过，但眼下我快要掉下来了，因为从西北方迅速刮来一股灰黄色的沙柱，其黑褐色的底部紧缩在一起，如一小股咆哮着的台风或龙卷风。其他沙柱都与我擦肩而过，有的在我的前边，有的在我的后边。但这股沙柱似乎是专门冲着我而来，夹着不可抗拒的力量直奔旅队后尾。

“抓住你的帽子！”拉尔森冲我喊，同时他自己却摔倒在地。

说时迟那时快，旋风忽地掠过我骆驼的前边4匹骆驼，我使出浑身力气转向背风一侧，双手紧握拴行李的绳子。如果我没抓紧的话肯定要被风掀下来。骆驼的行李互相碰撞，眼看就要滑下来，整个袋子和行李都快要掉下来了。骆驼在恐惧中踯躅不前，扭头转向下风处躲避。小石子和沙子如冰雹般打在我的热带头盔和双手上。但一切都在一两秒钟之后过去了。沙柱继续在草原上神秘地旅行，直径大概有15米的样子。真是奇异壮观的景象！但是，只有真切地体会过这种自然的“恶作剧”的人才能感受到它对自己身体的作用，因为除了我，旅队的其他成员什么也没注意到。

在这样的天气中骑行既不好玩也不容易，更别提还要在摇摇晃晃的骆驼背上去画路线、图表了。但当转过下一个山脊时，我们高兴地发现纵队一个接一个地停了下来。他们开始在小村子诺伯迪恩附近扎营。这个小村子的居民数量远不能与我们这个游动的“城镇”相比。我们帐篷刚搭好，几个瑞典人就走进来好好地享用了一顿茶点、黄油和柑橘酱。我们有说有笑，感到非常惬意，而此时帐篷外仍是大风怒号。风速每秒18米，下午6点钟时气温只在冰点以上12摄氏度，太阳看上去就像一个惨淡无光的盘子。

晚饭后，赫姆波尔少校和徐教授前来商量夜里巡逻的事情。中国

人商量好了怎样应付晚上的不测，但由于他们没有武器，因而不能参加战斗，于是有些人就只能钻出帐篷静静地躺在地上，因为土匪肯定会把帐篷作为靶子的。赫姆波尔建议他们放心地待在帐篷中，不要贸然出去，以免在黑暗和混乱中遭到误射。

卫兵们向徐教授抱怨弹药不够，要求把我们的子弹给他们一些。但徐教授认为他们的子弹应该越少越好，于是回复他们说我们的子弹太大，他们的步枪用不上。

4位学生今天又要值勤，随同他们一起的还有6个卫兵，帐篷“城”的四角各有一个固定岗，外加两个游动哨，每两个小时换一次岗。我们还决定让两个德国人也值勤，他们曾参加过战争，警觉性极高，一旦发生突然袭击，他们会比中国人更加精确地确定位置——我们就这样警惕地护卫着旅队的安全。

然而夜晚过去了，在狂号的风暴的多声合唱的伴奏下没有出任何事情。初升的太阳将飞尘染成了红色。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帐篷也没有受到一粒子弹的射击。

第三章　蒙古会师

诺伯迪恩村有自己的煤矿，但出煤很少。我们在5月12日开拔时，村民们匆忙拿着筐子和袋子来收集驼粪和驼毛。他们把驼毛拧成粗线和绳子。

又一次看到营地汇成了壮观强大的旅队。威武的驼群负重站在正在升起的太阳的光辉里，真是一幅壮美的图画。它们的身体朝阳的一面被照得通红，与背阳的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宛如巨大的石雕一般。

旅队长长的行列向西北的山丘行进，进入这些低矮的山丘后，旅队攀入一条又窄又弯的山谷——这是一条夹在石山之间的沙床。这里到处都有水晶似的裂隙和花岗岩。旅队前面的士兵认为这是一个土匪打埋伏的好地方，建议派一些武装人员走在前面。但我们的人不想让人打扰自己的休息——洗衣工躺在驼背上进入梦乡，两个学生也在摇来晃去的驼背上打盹。

天空碧蓝，风中充满寒气。谷地的拐弯处有一眼井，旁边有石槽，牲畜可以饮水。在一个小关口的北面有一堵坍塌的石墙伸出去好远，一直到达路左侧的山丘——这是远古时期的防御工事。在关口的入口处有一堆石头，那是虔诚的旅行者为山神们放置的，他们感谢山神对他们的保佑。我们跨越的第二座山口高1700米，然后山道直通一个叫牛—张—王的小店。“牛肠结”这个名字确实贴切——谷地在此变得更窄，经常有直上直下的巉岩挡在面前，浸蚀而成的台地高达3米。山中不时传来岩鸽的鸣叫和鹧鸪的“低语”。一辆牛车缓缓而来，上装皮革，轮子咯咯作响。

谷地又一次变开阔，乡野平坦辽阔。在最后一道山丘的脚下坐落着哑嘎尔—奇戈或吃—哑嘎林—古尔村。旅队在黄—瓦族—旷—永村附近建立营地。扎营的时间每天都在减少，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

做什么了。

每天早晨4点刚过，拉尔森就扯着嗓门大叫一声：“集合！”于是大家都醒了。中国人虽不知道他说什么，但一听到那“蒙古公爵”的命令便都报以笑声。拉尔森一点也不通融，大家必须立即起身准备用早餐。早饭之后便是一段长长的间歇，因为要拔去帐篷并把所有东西都捆扎好。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找个合适的地方睡一小会儿。但就我本人而言，我敢保证自己时刻都清醒着，因为四周充斥着蒙古人和汉人的喊声以及骆驼的尖叫声。在斯德哥尔摩的家中我每天凌晨4点上床睡觉，而在这里我正好在这个时间起床应酬。但只要你习惯了，什么事情都能过得去，现在我每天晚上9点睡觉。

旅队现在所走的田野略有起伏，但不管起伏是多么小，人们仍然可以从高处一览前方的无尽景色。当然啦，旅队仍是这里的主要景观。我再次骑行在旅队中游，从我的加高的“观察点”看过去，似乎旅队的大部分都在我的前方，然而回头一数，后面仍有8个更长的纵队，还不包括零散的骑者以及护卫在两侧的士兵。

通过了几道更加平坦的起伏地以后，后面的乡野就变得一平如砥了。开耕的迹象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村庄出现。在一个村子的附近有一个简陋的祭坛，上有一尊不足半米高的佛像。另一个村子有圆塔和城垛，类似堡垒。蒙古人称之为哈超，汉人则称之为哈超塘。我们在接近小村巴音布鲁克时才停下，“巴音布鲁克”的意思是“有泉水”的地方，旅队就在这儿的一片漂亮草地上扎营。这里的海拔为1585米。汉人拓荒者来此已有60多年，蒙古人都退往北方去了。

5月25日，我们接近了汉人定居者所在的文明区域的最北缘，另外一边就是一望无垠的蒙古地界。拉尔森和他的蒙古手下对那里魂牵梦绕，其他人也怀着愉快的心情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届时汉人的最后一道犁沟就会消失，大伙面对的将是蛮荒一片和人迹罕至的沙漠边疆，那是游牧者和羚羊的故乡。

现在，地面上犁沟更多。拉尔森以及其他几个人直直地站在前面一座山脊的顶部。北面是一片广阔的平原，远处的边上则是低矮的山

地。“蒙古公爵”拉尔森摘下帽子大喊一声：“我到家了！”的确，他是到家了。

旅队在一条几乎没有水的小水道旁扎营。白天还早，有些人趁着还未开饭的工夫赶紧小睡一会儿。其他人则发现了30多头羚羊——他们可有猎物追逐了！

夜暮时分，我们正要吃饭，骆驼从草地放牧回来了，它们就像带着影子的鬼魂似的无声地走向各自的负载物。伯格曼则坐在一口箱子上，在曼陀林的伴奏下向无边的草原唱出一首古老的瑞典歌曲，也许成吉思汗的金戈铁马当年也曾一路高歌地经过这里。今天晚上胡莫和冯·考尔值班。他们身佩手枪和明亮的电灯笼，电灯笼给卫兵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那是一种魔力在起作用。

次日清早，卫兵们收到了其余的报酬，同时也得到了一份赏钱——我们要分手了。他们骑上马站成一个纵队，我就像遣送第一支卫队那样简单地说：“谢谢，谢谢，一路平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一路平安！”他们敬礼，纵马转一圈后飞奔而去。

拉尔森派马特去为诺林及其旅队作警戒，但他至今未回来。

早晨7点钟时我们拔营而去，走过的地面上满是矮草，感到柔软舒适。走到一个干燥的浸蚀沟时两只狼跑过来，不怀好意地瞟着我们，拉尔森举着枪偷偷地跟在它们后面——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会打中，因为距离太远了。枪响了，一只狼倒了下去，大家一片欢腾，中国人折服了。我们都有些后悔那些卫兵们没有亲眼目睹这次精彩的猎杀。一些人急忙跑过去观看那个四条腿的“劫匪”，它跳起来，龇牙咧嘴地咆哮着。于是，有人用手枪再给其致命一击。拉尔森与狼的距离足有520米，从此以后，由于其精湛的枪法，大家都叫拉尔森为“狼”拉尔森。狼在蒙古很常见，它们是羚羊的最凶恶的敌人，但很少以人类为敌。附近又发现了一只黄鼠狼，地面上经常有黑田鼠打的洞穴。

5月27日早上拔营起寨，骆驼也等着上装。但就在那时有人报告

说一位纵队首领的灰马趁夜色逃走了，所有的中国人都骑着骆驼去追寻。我想起以前我们曾在这里放牧过一群300匹的母马，为的是以后在张家口卖个好价钱，现在那匹灰马可能跑到那儿去了。但我们错了，它不在那儿。时间很快过去了。黑德和胡莫出去打猎，拉尔森射杀了一只勇敢地保护着自己幼仔的狼。一个小时后黑德带着自己的第一只羚羊归来。自那以来，他几乎天天都要射杀一两只这种美丽的、长着长长的细角的奔跑动物。食堂天天有鲜肉，因而大家都厌倦了打猎，渴望着吃烤羊肉。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买不到绵羊，因而黑德的打猎技术对我们很有用。

骆驼再次被放到了草地上，提早动身看来是不可能了，而且，由于拉尔森还打了一只公火鸡，厨房又开始生火了。很显然，当天就要这样过去了，帐篷“城”又在原地搭建起来了。

5月28日我们决定把营地向北迁移到距旧营地只有一小时路程的地方，那里是同一个小水道的上游，旅队昨天和前天就在这条名叫呼图尔图古尔的地方宿营，它的意思是“碱水河”。河水很清，里面有小鱼、青蛙和芦苇。由于有良好的草地和淡水，这里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适合作旅队的大本营。真的，在这个8号营地，我们要待几个星期。

行军途中的长时间间歇就这样愉快地开始了吗？为什么不继续向前再走一点呢？难道我们已感觉到不会受到土匪的突然袭击了吗？

那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购买骆驼。直到现在，旅队乘骑、驮运设备和储备用的骆驼都是租来的。当然，我还不知道北京的谈判会出现什么结果，也没想着买270匹骆驼，以免将来又不得不以亏本的价钱卖掉。但现在必须下决心了，因为这是整个旅队的希望。拉尔森已向各个方向派出了他的可靠的蒙古人，但我们要等到他们带回信息还需要时间，因此要耐心等待。

8号营地仍有吸引人之处，露天水虽在这里并不常见，但骆驼在草地上可以尽情地享用丰美的牧草，这样可以为去嘎顺淖尔途中的艰辛储足能量。

在这个固定营地上的第一顿午饭给大家带来了活跃的心情。我刚要走出帐篷，拉尔森就出现了，他报告说在北方的一个小山脊上有两个欧洲人正在对我们的营地进行拍照，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个蒙古人和4匹骆驼。他们就是哈斯伦德和里艾伯润兹，尽管狂风肆虐，空气混浊，里艾伯润兹还是跑到高处拍照。他俩先是受到我们热情地接待，然后就报告了他们的情况。尽管有各种危险，安德鲁斯的65匹骆驼依然很安全。里艾伯润兹还抓住机会在路上拍了许多美丽的和不多见的照片——蒙古的王子和公主身着盛装在帐篷和蒙古包中的日常生活照。

中午4点，帐篷“街”上传来新的欢呼。“出什么事了？”我问道，回答是“诺林的旅队”。是的，诺林步行走在纵队的最前面，虽然纵队只有51匹骆驼而不是60匹，那景象也够壮观的了。尽管有土匪和盗驼贼的骚扰，他还是在归化城很好地完成了委托给他的任务。他把其他人落下好大一截，长发飘飘，满脸胡子，活似一个野人，但那饱经阳光烤炙的脸庞上还是流露出警觉和欢悦的神情。

很快其他人也跟了上来。沃尔兹充满了活力，冯·玛斯考尔·毕艾伯斯坦因弯着腰骑在骆驼上，他落地后拄着拐杖像老人似的蹒跚而行——有一次他的骆驼失去控制，把他摔到地上，他背部受了重创。分别几天后再次见到他们真让人高兴，更令人兴奋的是他们带来了探险队的新成员赫尔·索得鲍姆，他是归化城的瑞典传教士的儿子，是个语言学家，被任命为旅队的大管家，主要负责厨房和供应工作。

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们的行李在一个专门的地方堆起来，与此同时，6个新成员也吃完了午餐。我们现在有18个欧洲人和10个中国人。新伙伴们坐下来休息时开始讲他们的冒险经历。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我们得到了大量的消息。

帐篷“城”也在变大，为了使新来者的帐篷通风，帐篷“街”上留出了空隙。现在的帐篷数量达到了21个，几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荒野之“城”。诺林随身带了一柄蒙古长矛，矛尖附近还饰有马鬃做的穗子。长矛固定在我的帐篷前的柱子上，上面的瑞典国旗在营地上空迎

风招展。

吃完饭后我们互相访问，几个瑞典人与虽是丹麦人的哈斯伦德很合得来，他们都来到拉尔森的帐篷里。哈斯伦德向我们展示了一面庙幡、一个法轮、一面用人头盖骨做的鼓以及一些别的他弄到手的东西，他把上述东西都交给了探险队。

在我的帐篷里，诺林向我展开了距此以东80多里的百灵庙地区的极好的地图。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将其扩充版最终完成。我也向他展示了我画的路线图，那是从包头到呼图尔图古尔的15幅地图。

我们在灯下吃了晚饭，我现在才发现旅队不仅有了一个新的管家，而且还得到了一位高明的厨师，那便是诺林的仆人。我们以前的厨师，鼻子塌得犹如北京的小哈巴狗，此刻正把自己关在仆役的帐篷中生闷气呢，也许还在咒骂欧洲人呢，因为他已经被新厨师取代了。

大家心情异常轻松快活，我们第一次人马齐全地会聚在帐篷俱乐部里。我们的计划是如此周到，三支分别从哈伦—乌苏、归化城和包头出发的队伍都在同一天到达了目的地！

第四章　合众之城

5月29日是我们在固定营地呼图尔图古尔的第一个休息日，不管喜欢与否，旅队都得在此地逗留近整整两个月。需要总是胜过愿望——买200匹骆驼需要时间。

我们知道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对旅队生活和工作的组织以及帐篷“城”的布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前一天我已与赫姆波尔讨论和解决了营地的组织问题，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解决的。

由于初夏日日刮风，帐篷不能串结起来，这样在上风走动的人扬起的尘土，就会被风刮到下风处。我们决定将所有的帐篷排成一条长长的直线。拉尔森坚持要像蒙古人那样把帐篷门开在南面，他说如果我们将帐篷口开在别处就会受到嘲笑。

在帐篷与帐篷之间放着箱子，有的并排，有的摞在一起。营地很壮观，从南面不远的山上看确实让人印象深刻。那些山中的精灵自古以来就受到膜拜，现在他们的安宁被我们这个移动的“城”以未曾料到的方式搅扰了。

读者也许认为身为一个有18名白种人、10名黄种人和34名仆役的探险队的首领是一件苦差事。我确实也没做过这种事情，因为以前我总是独自旅行。但我发现领导这么一个队伍非常容易，如果所有的参加者都是智慧的学者，又对自己的任务充满热情的话，那么领导他们就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简单的事情。有多少还处在青春年华的青年人渴望参加横越这块巨大陆地的旅行啊！目前这块大陆已经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能够在这个时候亲眼目睹亚洲大陆是再幸运不过和令人羡慕的事情。旅行队不需要用沉闷乏味的军事纪律去管理其成员。想去打猎的人只要骑上从附近的蒙古人那儿租来的马匹就行，晚上归来时带上一两只羚羊。如果人人都尽心尽责，就不需要严格的命令。在别的情形下需要以不断地监督、规定和惩罚维持的纪律

对我们来说是最自然不过和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人想着去违反纪律。

我们现在处在内蒙古一个小地区的中心，汉族人毛明安把此地称为明—干—加萨克。该地区的首领住在距我们约50里的北方。旅队刚一到达，他就派了一个军官和3名士兵前来查看我们是干什么的和需要什么。他们听到了我们的射击声并很高兴我们打死了3只狼。首领的副手说我们想干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在地上挖掘，因为那样会触怒土地神和山神。并且，我们被要求一定不要去攀登顶上有敖包的山脉。次日我派赫尔·沃尔兹和袁复礼博士去回访，那首领是一位和蔼的蒙古族老人，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好像要知道一切似的，最后他还说打算亲自拜访我们。两天后一名资深陆军上校来访，他戴着大大的眼镜，穿着奇异的黑蓝色服装，佩带银质剑袋和武器。他和随同前来的士兵享受了我们的茶和雪茄烟，我们还拍摄了彼此一起坐在帐篷俱乐部入口交谈的情景。

正如前面所言，旅队的固定营地的海拔为1570米，这同西藏的情况相比简直不算什么。但对瑞典也正如对德国一样，1570米已是相当高了。在通过中亚的高原和沙漠地带时，这样的高度也不算什么。不管怎样，这里都是山区气候，虽然时间已是6月中旬，但阴凉处的温度没有高过27摄氏度，有一天晚上的温度竟降至1摄氏度，这令我们大吃一惊，两天之后我们还经历过2摄氏度的霜冻。但有一次白天帐篷中的温度升到了38摄氏度，甚至在露天都可以感受到太阳光的炙烤。不管是白人还是黄人都被晒黑了，当然也有几个中国人是例外，他们带着时尚的红色遮阳伞。气候仍很理想，我们是在一处名副其实的山中疗养地，不会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只有中午11时到下午5时之间有值得一提的、但从未引起烦恼的热意。太阳一下山，天气就变凉了，在密度比较大的低层空气中，太阳的光线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吸收了，但在这里我们却感受到了很强的太阳光的照射。然而，风总是从四面八方不停地吹着，我们已测到的最大风速超过了每秒20米。实际上，在这种新鲜凉爽的风的吹拂下，没必要怕什么热。

一天，当一切都平静下来的时候，明从溪沟里提来一些水泼在我

的帐篷周围，于是产生了一股宜人的凉气。我并不想抱怨天热，在我的一生中有太多差点被冻死的时候。然而，我还是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等待我们的不一定都是好事。

科学家成员中以瑞典人居多，艾里克·诺林博士是地质学家，他现在正忙于用1:50000的比例尺描画营地周围的地图。医生戴维·胡莫博士不仅要治疗旅队中的病人，而且还要为那些行踪不定的蒙古人和汉人治病。然而，营地中的人健康状况非常好，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植物和动物标本收集工作。只要机会允许，他还进行人类学统计工作，这是北京的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斯蒂文森博士交给他和几名德国人的工作。这是一个极好的计划，我们的一些人在他的指导下参加了这项工作。考古学工作委托给了夫克·伯格曼，尽管在北京已作出决定，所有的发现都归中国，但伯格曼还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然而，我还是很有根据地怀抱一种希望，那便是中国人会以一种真正的高姿态让我把复制品带回去，因为这些东西不会使他们变得更穷，同时也不会使我、确切地说是斯德哥尔摩的东亚收藏品更为丰富。我自己则正在画旅队的行军图，而且使用的是我以前在亚洲进行长途旅行时使用的方法。当然，我还记日记，收集反映该图地理和地形特征的资料。

你也应该看看拉尔森，那个来自瑞典瓦斯特曼兰德的蒂尔伯加的57岁的“年轻人”，他在蒙古待了34年，以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在那儿进行的旅行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白人。当他看到我帐篷前面的瑞典国旗时，两眼盈满了激动的泪花。他跨马而来，气定神闲，两手背后，唇边洋溢着友好的微笑，这就是你应该看到的他。这不，说着他就来了，腰杆笔挺还一脸傲气，目光如炬地扫视营地，审视着情况是否正常。

什么都逃不开他的眼睛，他简直无处不在，他洞悉在营地发生的一切。他是一份活报纸，向我报告当天所有的新闻。他把帽子拿在手中踱到我的凉篷下面，总是用那宽厚的瓦斯特曼兰德口音说：“原谅我的打扰。”可他从未打扰我——他总是受我欢迎的左右手，我事无巨细都要和他商量。他坐在我的写字桌右边的箱子上，一边摆弄着手

中的帽子一边向我作汇报。如果没有他我该如何是好？他管理着骆驼和蒙古人，没有他们我们哪里也别想去。

拉尔森从心底里喜欢这次旅行，这使他适得其所。看到他尽显才能，举手投足都透出一股行家的神态时真让人高兴。他尊重自己的工作，认为那是高尚的事情。他说："在蒙古度过的漫长岁月里，我一直梦想着能够参加一次真正的探险，但我从来未敢奢望成为如此壮观的一支探险队的一员。"

我把最多的感谢送给了拉尔森，在北京的艰难日子里他经常帮我渡过难关。在最困难的时刻他总是镇静自若——和我一样。拉尔森不会得意忘形，他不会讲一句不友好的话，他总是心情愉快、友善待人。他什么时候都不会失去自控，因为他深知，控制不了自己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控制别人。他表达意见时的友好和幽默是他赢得所有人尊重和喜欢的秘密。当紧要关头到来时，就是那些曾当过军官的德国人也能心甘情愿地听他调遣。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尤其是在饭桌上。但是，如果谁得罪了拉尔森，或做了什么对骆驼不好的事情，如不必要的出行，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拉尔森绝不会放过他。拉尔森不发怒或大喊大叫，他用最轻柔的声调清晰地表达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他站着的时候总是双腿分开，双手放在裤兜里，帽子高居头顶，脸上挂着友好的笑意。在这位镇静而泰然的首领面前，没人敢说一个"不"字。没有人向他表示异议，一切事情都很顺利。这种事情对他来说简单地就如同让别人按照他的意志做事一样。然而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力量，因为这首先要有自制力，其次需要具备对人的认知力，然后是谦和和正义感。拉尔森具备所有这些素质，有这样优秀的管理人才，谁说世界不能被征服。

哈斯伦德原来受雇于英美烟草公司，现在是拉尔森的得力助手。他是一个特别机灵、能干和热情的青年。把安德鲁斯的骆驼带到大本营一事已经足以证明哈斯伦德的能力。

索得鲍姆只有22岁，他与其他人完全不同，因为他到这里时，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外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床，没有毛皮，除了牙刷以

外也没有其他行李。我对自己说，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聪明人。比起我们带着40000公斤行李上路的做法来，两袖清风地骑着骆驼穿越亚洲大陆该是多么省心啊！当然，索得鲍姆被重新打扮了一番，他得到了一套簇新的服装，看上去就像一位身着周日盛装的庄园仆人。他处事极为冷静，既不怕土匪也不怕恶狼，并且能恰到好处地与我们的自我意识很强的厨子打交道。

在德国人中，首先应提到的是霍德博士，作为旅队的气象学家，他不仅对本学科，而且对相关学科也有透彻的了解。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很棒的伙伴，受到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喜爱。他平时不是在气象台就是在山顶上观测风向，或者一天两次释放试验气球。他的时间都用来计算和做笔记。在他从事的各种工作中他有好几个助手，既有德国人也有中国人——4名中国学生对气象观测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赫尔·傣特曼曾是一个海军军官，他主管天文仪器和天文观测，同时帮助霍德博士进行无线定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老练的业余画家，在不太严肃的场合他又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幽默大师，他的曼陀林弹得也很动人。

赫尔·里艾伯润兹是旅队的影片拍摄员和首席摄影师。一旦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或出现合适的主题，他就带着家伙，像猎鹰扑食似的冲上去拍照。他曾与海克博士去过阿比西尼亚，经历过许多非同寻常的冒险。

退休少校赫尔·黑德是我的参谋长，他在营地负责维持秩序和决定夜间值勤事宜。他还负责传达我的命令、传递消息和报告情况。黑德还是猎人和神枪手。

赫尔·穆伦温格主管资金和账目，他的帐篷里放着装银子的箱子，所有人的工资都由他发放。

赫尔·沃尔兹和赫尔·齐莫曼是霍德博士的长期助手。

巴龙·冯·玛森巴希和巴龙·冯·玛斯考尔·毕艾伯斯坦因看管行李，正如赫尔·穆伦温格一样，他们知道400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因为他们保存着这些箱子里的东西的详细目录。

冯·考尔则什么事情都做。

徐教授是10位中国学者和学生的首领。根据新的政府的要求，不管我喜欢与否，这些人都要参加我的探险队，因而至少从名义上说，这次探险处在中国人的监督之下。

徐是他的姓，炳昶是他的名字，但除此之外，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徐教授还有另外一个“字”，只有他的朋友使用这个“字”。

徐教授于1888年出生于湖南省靠近湖北省边界的一个村庄里。他17岁时离开父母到北京求学，1913年又去巴黎学了6年哲学。他回国以后在河南省首府开封得到一个职位，向学生教授法语和中国文学课。1921年时他成为国立大学的欧洲哲学史教授，起初其薪水为220元，但后来涨到280元。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教授们只得到一半或更少的工资，他们不得不兼职，如在小学上课、作讲座等，这样才能供养得起自己和家庭。由于经常兼职，他们没有剩余时间跟踪学科的发展，学业及个人发展因而受到影响。

徐教授绝不是一位盲目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点也不憎恨外国人。然而他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发现的艺术瑰宝和文物不应该带出境外，而应该交到在中国境内的博物馆和收藏处。

我曾在初冬的一个美丽的日子里去了北京，接着就慢慢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我正在考虑对内陆地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考察。“哼！”那些学术和精神文化界的新时代的领军人物冷冷地说，“这儿又来了一只新的猛禽，它要掠夺我们的地下宝藏”。于是针对我的考察计划腾起了一片反对之声，徐教授就是喊得最凶的人之一。但经过几乎两个月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除了别的问题外，协议规定10名中国学者和学生应该加入我的探险队，而徐教授则被选为他们的领导。我以极大地满足接受了这个条件，因为在长时间的艰苦谈判中我认识

到徐教授是一个特别温和、谦逊和平和的人。如今我们一起旅行，没有受到以前争议的一丁点影响，到处洋溢着和谐的气氛。因此，我除了庆幸自己得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旅伴外还能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他站在本国文明的最高处，精通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学和哲学。更为了得的是，他对欧洲的生活和思想也有深刻的理解。

袁复礼教授于1893年生于北京，他签名时用的是L·袁博士，他的朋友们都叫他“四元”。他曾于美国学习地理学和考古学。他求知欲强，多才多艺，不仅对地理问题和地形测量很感兴趣，而且对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也独具慧眼，他在这些学科领域的修养完全符合所有欧洲标准。袁教授很乐意向我们这些欧洲人展示他的发现，同时还解释他的发现的意义。他与我的瑞典同道诺林和伯格曼相处最友善，没有嫉妒和分工上的争议。他和另外两人的想法都是，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为了欧洲和中国的研究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陪同我考察的第二位考古学家是黄文弼，他33岁，出生于湖北省汉口西面的汉川县，得到博士学位后他就去了汉学研究所。和其同事一样，他也帮助举行过考古展览，因而对考古调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他听说一批中国学者要加入我的考察队时，他就向遴选委员会提出申请，摆出条件要参加考察。

第四位中国学者名叫丁道衡，28岁，他来自长江南部贵州省织金县的一个世家大族。

最后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叫单帆顺，35岁，出生于安徽省南部的婺源县。他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定居于长江北岸的安徽省首府安庆，那里盛产樱桃、杏子、梨和草莓，果园处处水果飘香。另外，那里的“迎江渚”也以其美丽和佛塔而闻名，由于这一原因，善男信女多有来此礼佛者。

由此可看出，4位中国学者和他们的中国学生来自于5个不同的省——即直隶、河南、湖北、贵州、安徽。严格地说他们代表了5个不同的民族，因为就自然、气候、人口和语言而言，中国的省份之间都有很大的不同。

北京的反对派在与我谈判时摆出的首要和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让几名中国学者和5名中国学生加入我们的考察队。然而，在选择参加者时，我们只要了4名学生，把第五个名额让给了一个年轻的摄影师，他主要是在袁复礼和黄文弼的领导下拍摄地理和考古对象。之所以确定4位学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曾解释说我准备在内陆建立4个永久气象站，而中国方面打算在考察终止以后接管它们并配以中国的气象学家，因而决定应向一个气象站派一名中国学生，以便使德国人能对他们进行至少为期一年的气象观测技术培训。这样在4月26日的协议中又加入了一个附件，规定气象站不能交给政府，而是要交给委员会，即在北京代表考察队利益的“董事会”。在没有欧洲人帮助的情况下，中国人对气象站的维护和发展又成为未来的问题，站在开拓者的角度我将就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后面说几句。

因此，“中国科学研究机构协会”给我分派4名学生绝非突发奇想，相反那是一个明智和极具前瞻性的决定。与这些学生们熟悉之后，我有一万条理由感谢这一决定，因为这证明北京的“中国科学研究机构协会”很严肃地代替政府为气象站的将来负责。而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计划越来越清晰而且正在变成现实，虽然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由于形势的需要而作了一些有用的调整。我很快就后悔为什么才带了4名学生而不是8名，因为理想的情况是，在德国气象学者撤走以后，每个气象站的中国负责人应有一个助手和一名备用人选，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缺。

北京的国立大学有自己的期刊，在该刊和别的机构与神学院的出版物上刊出了我的考察计划的简短说明，并通告数学和物理科的学生——尤其是气象科学生——可以自由报名，同时也要考察他们的英语和法语知识。

30名数学和物理科的学生提出了申请，其中竟有一个女生。在接受她报名以前，我们先询问了她的父母是否同意她与我们进行孤独的内陆之行。他们的回复我不得而知，或者是不同意，或者是那女生未通过测试，总之，她没能与我们同去。

测试者是我们的朋友袁教授和数学科的李教授。30名年轻人先接受了语言测试，然后袁教授又对他们进行了数学和物理测试。每个人要做8道题，袁教授发现有8名受试者通过了考试。通过了医生和身体检查后，这8名学生又接受了李教授的考试。在8位学生中只有一位姓马的学生起初体检未通过——他的脉搏太快，但当德国医院的迪波博士宣布他身体健康时，他被允许参加了最后的、决定性的考试。4个最优秀的学生从8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就是姓马的学生。其余3位分别是刘、崔和李。

4位学生中有3位来自直隶，一位来自山东。

10位中国人中现在没提到的只有匡元闯，他是一位摄影师。匡现在与徐炳昶教授住在一起。

4名学生住在一间漂亮的大帐篷里，行李都放在帐篷周边，中间放的箱子当桌子，里面装满了书籍和衣服。我不时过去与他们攀谈一会儿。他们总显得愉快、友好，一个小小的掌故或不值一提的笑话都能将他们逗得捧腹大笑。学生们把帐篷收拾的舒适整齐。在临时桌子上放着蜡烛和灯笼，香烟和零碎的东西塞在一堆一堆的书和笔记本之间。气象手册总是放在他们手边，显然它们经常被用到。

学生们给人的确切印象是，通过考试以后他们决心钻研科学并决心以此为自己的国家争得荣誉。

人们能想象得到，在这个混杂的旅队中语言该有多混乱。在我的桌子边上就座的一般是拉尔森、霍德、里艾伯润兹。袁教授坐在我的右手，胡莫、徐炳昶和赫姆波尔坐在我的左手。我与徐教授讲瑞典语、德语和法语，和袁教授讲英语。但当哈斯伦德坐在旁边时，他当然与我们瑞典人讲丹麦语。拉尔森与徐教授说汉语，而当旅队中的人带着问题前来时，他又用蒙古语给他们下命令。有时为了调剂一下，我还与冯·考尔用俄语交谈，因为他生于圣·彼得堡。这样共有8种语言。在哈密、然后在新疆肯定还会加上维吾尔语，我的维吾尔语超过这些人。

在这个混杂的语言群体中人们有的是练习欧洲和亚洲语言的机会。准确地讲，我认为最棒的事情是讲瑞典语，因为我在亚洲流浪多年，连说一个瑞典语单词的机会都没有。

第五章　任务之一：气象观测

对任何一个文明国度来说，拨出大量资金建立气象站都是寻常之事，我们也清楚这不是一种无目的的付出，因为气象服务会促进共同福利。最值得注意的是，天气和农业、森林、水电利用、海空巡航有着密切关系，很难用数据来说明天气预报和风暴信号曾使多少人、轮船和贵重的货物幸免于难。最近几年，由于公共气象站缺乏，几座大型水电站已建立了自己的气象站，这说明气象学对一个国家的水电利用是多么重要。

北半球现在有众多的气象站依据国际公认的准则实施不间断气象观测。欧洲的气象站最多，瑞典有41个，德国有上千个。北美和非洲也有气象站。与此同时，很多轮船上每天也在实施气象观测。观测报告从许多不同的观测点每隔几小时就可传输到中心气象站，气象学家们在此得出自己的气象预报结论。

只有亚洲仍然不重视天气预报。如果数一数北半球上现有的气象站，构成大陆板块相当大一部分的中部亚洲形成了一个不间断的空白地带。的确，人们在乌尔加、乌迪、乌里雅苏台和迪化已进行了虽不很充分但却是非常有意义的连续调查。在沙漠带和西藏我也进行了多年观测，固定的观测点有焉耆库尔·察尔克力克和曼达尔力克。但毕竟我们的知识只是建立在宽泛的不连续证据之上。的确，从这些证据中人们可以得出这个大陆气候特点的总体线条和气象因素起作用的一般方法，人们也知道了哈蕾的可怕风暴——我自己就多次由罗布泊的东北方向经历过这种风暴，人们也可以从理论上界定它们形成的原因和从实际的角度解释它们新产生的结果——然而我们到底知晓多少它形成的原因和特征呢？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填补中亚的那一大片空白地带是我的原始计划的一部分，我现在已把它付诸实施了。这样，北半球的气象站网络中的最后一片空白就

将最终消失，这个半球的很多与气候学和气象学条件相关的困扰人的难题也会找出答案。我们也能为中国做一件无法估量的好事，因为一个沙尘暴预警系统会运转起来，从而减少沙尘暴对农业造成的损失。如果我的计划成功并得到中国当局的充分支持，我打算在中亚建立的永久气象站也将发挥同样作用。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的气象学家霍德博士的工作将给气象学和气候学带来一场革命，其成果将在所有有关这一课题的通俗读本中找到重要的位置。事实上，霍德博士及其同事的任务非常重要。即使我们的考察在归来的时候没有别的发现，但只要有了他们的工作，就足以证明这次考察是值得的。

霍德博士的气象站在我们扎营于呼图尔图古尔的当天就建成了。那是一个带有顶棚和格子墙的立方形木棚，风可以通过木格子自由流通而太阳光线却照不进来。木棚由4根柱子支撑，其高度足以消除地面的冷热变化带来的影响。整个木棚被绳子从四面紧紧固定住，最强烈的风暴也不可能将其掀翻。气象站离我们只有几步路远，我们可以方便地读取里面仪器上的数据。在露天的不同高度还有各种小的温度计，它们被水平固定在夹子里。在地面上还放着日射测量温度计以及其他敏感仪器。

对霍德博士来说，他的气象站成了我的帐篷“城”边缘的“郊区”。他的帐篷中放满了仪器箱，里面装着无液气压表、厨房温度计以及各种各样新奇的仪器。在他的帐篷的入口处有一个帆布凉篷，在凉篷前放着其他的箱子，这些箱子有的被打开，有的还从未被碰过。这些满当当的箱子中装的是为计划中建立的气象站而配备的全套设备。

如果有人想在天黑以后进入霍德博士的“郊区”但又不熟悉那里的地形话，那他必须小心才是。因为他在那里为旅队的无线电话竖立了两座高10米、相距有40米的无线发射塔，在发射塔外围距地面大约2英尺之处还有3根铁丝——这是必须避开的陷阱。借此机会我还要指出我们还有一座无线电台，冯·考尔对之负责——我们不能没有它。除了别的问题以外，干电池的电流只能用4分钟，因此，要想听到别的

电台，除了要有好运气外，还必须具备灵敏的感知能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安德鲁斯在这方面有过相同的不愉快经历，这一点他已在《踏着古人的足迹》一书中讲过了。他曾在汽车上设立了一个无线电台，但却什么也收听不到。我们的问题可能是由于无法排除的气候因素造成的，当然，我们也不期望能知晓世界上每天都发生的一切——我们已认为不听外部世界的新闻是一种放松，但我们希望收到外部电台的报时声，以便更精确地确定经度。

如果有人在霍德博士的“密室”看到他，假如他不是在读仪器或释放试验气球的话，他通常都沉迷于数字、公式和图表，或者忙于和赫尔·沃尔兹与赫尔·齐莫曼两人实施气球观测。霍德博士帐篷的内部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博学。他本人是我们看到的最有魅力和和蔼的人之一，他不是那种躺在自己的知识上就如同神龙躺在自己的金色宝藏上那样的学者。相反，他乐于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研究，由于他的讲解清晰明了引人入胜，听众一不小心就成了气象学家。

在霍德博士的观测站，每天都要在国际公认的时刻，即7点、2点和9点进行观测。除此以外，在每个固定营地，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要两小时进行一次观测。晚上的观测工作委托给守夜人，他们从傍晚9点至夜里1点、从夜里1点至凌晨5点分两组值班。他们必须检查云团和风向，因为霍德博士重视这些因素胜于重视温度曲线，其实从温度曲线的走向可以获得相似的结果。由于在乌尔加、张家口、乌迪、乌里雅苏台和迪化所进行的一系列观测很少注意云团和风向，我们在这里就面临着非常重要的任务。

为了监测温度、空气压力和湿度，气象观测点建立了温度记录器、自动记录式气压计和温度计。霍德博士对云块的高度、形状和运动方向特别关注，他拍摄了一系列不同云团的美丽照片。

除在26米的山顶上以外，我们在营地也测量风速，这里最大的风速是每秒30米，的确，这里的风无时不在呼号。早上8点风就刮起来了，中午风力加大，下午6点以后风力减弱，晚上则一般是风清月朗。即使下雨，大部分降水还未落到地面上就蒸发了。降水到雨季才

增加，但那时候的气候是什么样呢？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正是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情况尚待查证。

霍德博士认为，通过他的研究方法，他能够确定在未来的土地开垦和利用中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植树造林则有可能，因为通过这种方法土地的价值可能会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们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期望能找到解决干旱的办法。中亚无可争议地面临着一个干旱期，几乎所有中亚的湖泊都在下降和缩小。为了解释这些问题，我们要用到有关嘎顺淖尔的详细资料。准确的结论也许要用数十年方能得出，但通过精确观测，我们可为将来的工作打下基础。

霍德博士还对日晒、太阳射线以及地球的夜间射线进行了非常精细的观测。和在包头一样，他已经在夜晚对地表上空的大气分层进行了多次观测。现在他已开始发起了自蒙古边境的系列观测，不管是宿营还是行军他都没有停止过。每当队伍被迫停止时，他都显得很高兴。他利用停留的时间工作，收集同类的和连续性的资料，这些资料使他能将这里的情况与别的国家的情况联系起来研究。

在柏林附近的林登伯格航空气象站，每天都释放试验气球，因此，至少在欧洲将不会有气象站能像林登伯格这样能进行更彻底的和不间断的空气运动观测了。该气象站的建立者是阿斯曼，赫尔·戈塞尔于1912年接手林登伯格气象站——此人早在1906年就在斯特拉斯堡利用试验气球探测大气层。在德国，所有大一点的气象站和天文台现在都释放试验气球。瑞典有3家气象站，芬兰有1个，靠近赫尔辛福斯。斯德哥尔摩的天气服务中心每日都能接到分布于欧洲各个地点的大约20个试验气球站的报告。在中国到目前为止据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气球升空。印度利用试验气球进行研究的状况更不值得一提。同样，在这方面中亚也是一个广袤的未被认知的地带。既然如此，如果运用霍德博士的试验气球研究方法进行整整一年的观测，那么可以想象这将对中亚15000米高空气流运动的科学研究、对了解那里的大气条件的工作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考察不仅要向科学界提供有关地球表

面状况的资料，与此同时还要把15000米高空的气流运动的知识呈现给世人。

试验气球将揭示在地球最大的陆地上空赤道与极地之间的气流交换是循着什么路线进行的，同时还应揭示我们已习以为常的欧洲的多变的气候伸展到亚洲的程度，换言之，高低气压已到达东欧的什么地方？在多远的垂直方向可以感受到亚洲每年的冷热变化？在地球表面的什么高度气流进行着从海洋到陆地的旅行或者相反？当地表上空的气流从低温区流向海洋，而且在这些气流上空的更高空域的相反方向出现一次气流交换时，在多高的空域会出现冬天的相反状况？

我们的目的就是找到这些问题和其他类似问题的答案。如果成功的话，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抱此希望，即将可能发现大气循环的重要规律。

通过试验气球人们不仅可以确定更高空域的风的方向，而且还可以发现地表上空各种高度上的气压分布变化，同时，如果有足够的气象站，人们甚至可以把各个大气层的等压线图画出来，这种图与地图有很大不同。在试验地图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把这些尚不存在的地图的大致轮廓勾勒出来。

气球的平均高度达到海平面以上7500米，而最大的高度则是目前的14700米。从轮船上释放的气球比我们的气球要大得多。我们有3种不同的气球，但即使最大的一种也不可能在15000米的高空实施清晰地观测。它们都用最好的黄色或红色橡胶制成，直径为120厘米。红色气球重30克，但必须携带90克的重量才能升空。比较大的一种重10克，须载重325克方能上天。小气球的升空速度为每分钟150米，大的为250米。因而后者在10分钟就能升到营地上空2500米之处，而营地的海拔为1595米。

早在1925年秋天，我还在筹备这次考察的时候，在亚洲腹地建立4座永久气象站似乎对我而言就是具有最大的科学价值的任务。尽管在次年和1926年冬天到1927年的时局压力下第一个计划经历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调整，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建立这4座气象站的打算。我已

经表明了这些气象站对我们获得北半球的气候和气象条件的知识是多么重要，同时也表明它从实用的角度和天气预报方面对中国将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1926年11月底至12月初，瑞典大臣艾威罗夫和我与当时的中国政府就考察计划进行谈判时，我就主动提出，在欧洲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至少一年的系列观测以后，气象站连同整套仪器设备将作为礼物送给中国政府，条件是在考察结束和欧洲工作人员撤离后，中国政府必须以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维持这些气象站的运转，而且这些工作人员还要在随后的年头里执行我们的计划——因为只有系列观测能够维持10年以上，这些气象站的真实价值以及它们对中国政府的好处才能显现出来。多年的系列观测会使确定合理的平均值成为可能，因此它能够提升这些科学观测的层次，使之与地球上最有价值的科学活动相媲美。

中国政府对我的好意报以彬彬有礼的感谢，但在我和我的工作人员离开后他们到底会如何对待这些气象站呢？

反对派一开始似乎以不可调和的态度反对我的考察，然而在一系列谈判之后我们的立场又越来越接近、还一起讨论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实际问题，当我最终的条件使得中国学术界认为可以向我敞开中亚之门的时候，气象站的问题得到了它应有的关注。

在建立气象站的计划和将来接手维持其运转方面，那些原来反对我的人现在变成了我的支持者。但是他们向我提出要求，即要我带4名中国学生随团考察，他们的任务是参加4个气象站的工作。

1号气象站计划建于额济纳河，2号气象站建在哈密，3号气象站建在迪化——考察队的大本营有一段时间也设在这里。旅队的大队人马后来越过罗布泊去了察尔克力克或车尔臣，为的是在那里建立4号气象站。

从以下的事实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我的计划确实产生了兴趣，在我离开北京以前，中央气象台就要求我指示2号和3号气象站每天向北京

通过电报发送天气报告，费用自然由中国政府支付，我很乐意地满足了这项要求。

除了4号气象站以外，在昆仑山脉边缘地带至少3000米高处我们还要建立一座持续数月的高山气象站，这里的观测与4号气象站同时进行，目的是为霍德博士的调研提供资料。他想知道在不同的季节随着高度的变化温度是如何升降的，那些带着黄土尘粒的沙尘暴能达到怎样的高度。我们只能向高山气象站抽出一个欧洲人，其余的工作人员都由当地人组成。

在北京逗留期间我也很想在和田河上建立5号气象站，站点就设在1895年4月至5月间我那次悲惨的沙漠之行中碰到和田河的地方。霍德博士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建立这样一个气象站非常重要，因为它将使人们清晰地知道沙漠深处的气温、沙暴以及气候的其他状况。与此同时，在这里设气象站还能使我们对夏季和田河的水量及河流的涨落有一个细致的了解。我于1895年5月5日到达那里时，发现河床是干的。只是在很远的地方我才找到了一小潭的水，如果够深的话，这些水可以维持整个夏天。11年后，英国考古学家奥雷尔·斯坦因爵士发现了那个曾经救过我命的水潭，他还送了我一张那个“上帝之湖”的照片。我的仆人卡西姆还给他做过向导。林子中的牧人说6月初河床涨满，一个半月后水量下降，秋天则完全断流。在有涡流形成涝坑的地方，留下的水整个冬天都冰冻着，但这些水池在春天开始慢慢变小，到了5月份河床就干到底了。我想，如果能收到和田河在全年的各个月份涨、落、干涸的情况的照片以及它以顽强的生命力抗击沙漠侵袭的情况的照片的话，将是一种珍贵的纪念，这样的知识只能在当地进行一年不间断地观测才能达到。因而，我在4个正计划建立的气象站之外再增建一座的愿望很强烈。

对我的这座移动的“城”中那些不得不留在气象站的人来说，与壮观的大部队及其快乐多彩的生活永远分开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我想，当我们继续前行去迎接新的变化和冒险时，他们却要面对整整一年的孤寂生活，其内心的孤独和悲伤是可以预见的。我们现在有时候已开始讨论向几个气象站分配工作人员的问题了，困难的事情是，

每个人都想去最后一个气象站，以便尽可能多地参加考察。在这方面最倒霉的人要数那些留在额济纳河的人，因为他们首先要与大部队分开。但当他们了解情况以后，我也没有向他们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嘎顺淖尔及其周围地区是整个旅行当中将要碰到的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如果我本人必须去一个气象站待一年的话，我首选嘎顺淖尔，次选和田河。如果形势要求我在哈密、迪化或车尔臣三地中选择一个作为驻地的话，那对我并无多大意义，因为三个地方都缺少沙漠的安宁。但不论在哪个地方都有无穷的机会去研究地表、它的生命以及人类的生命和活动。

冬初之时，J·G.安德森教授曾向我指出，不能像过去经常发生地那样让气象站的工作人员错过进行人体测量的机会。我因此请教了北京联合医学院解剖学研究所的保罗·斯蒂文森博士。斯蒂文森博士和布兰克博士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前者给预备去气象站工作的人上了人体测量指导课，甚至还特别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编写了一本小册子——《人体测量术》。这本小册子作为人体测量指南非常有用，里面还配有照片和图画。斯蒂文森博士私下对我说，说服不同的种族进行人体测量是很费劲的事情。但我们的两名主要工作人员——瑞典人索得鲍姆和丹麦人哈斯伦德，在迄今为止胡莫博士所进行的人体测量工作中，已证明他们是灵活的中间人和翻译，而且很快就能独立工作了。

第六章　考察纵队

蒙古的土地留住了我们——自在呼图尔图古尔建立营地以来一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弄不明白到底怎么了，大家并不烦躁，人人都在工作，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我们制订计划，每天都等待着出发，可是骆驼怎么还不来？

买骆驼的人找到各色商人和中间人，这些人与某些蒙古共和国的富人有关系，这些富人好多牲畜过千。几天以前我们的两个蒙古人回来报告说他们已经买到了100匹上等骆驼，每匹100墨西哥元。但在交割牲畜以前各卖主的要求是先交银子——时局很坏，谁也不知道他们与之做生意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因此，在还没看到这些骆驼的影子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拿出10000银元（超过1000英镑）的数目交给代理人。付钱的场面非常浪漫有趣，太阳如红莓般落下，其光线扫过正在进入沉睡状态的草原，夜晚的清凉贴着地面悄然而来，许多人都披上了皮衣。银元山堆在俱乐部帐篷的前面，银元摆成长排，每排1000元，旁边站着冷静的蒙古人和精明的汉人，他们有的等待，有的点数，有的把银元放入口袋，这些口袋被装入木箱在次日早晨由冯·玛森巴希和穆伦温格保护着送到骆驼的所有者那里。

6月16日第一批新买的骆驼送来了，它们个个高大丰满，漂亮动人。我兴致勃勃地在拉尔森和他的蒙古人的引导下观看了新到的24匹牲畜。它们的驼峰厚实坚挺，上尖下圆，站得很稳，这些骆驼基本上都已脱去了冬毛。此时霍德博士正在释放气球，气球冉冉升起，在蓝绿色的苍穹下闪闪发光，如一颗美丽的钻石。新来的两个蒙古人成了旅队的新成员，他们可爱、结实、饱经风霜的面孔是他们的种族自成吉思汗以来就具有的特征。他们看到气球升空时的表情很有趣——两人盯着那明晃晃的气球，惊讶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至肉眼无法再

看到气球为止。

目前旅队拥有200匹骆驼，虽然营地里只有104匹。根据最近的清点和称量，我们需要294匹骆驼驮运行李，这个数目经过对行李的重新打包后下降到270匹。63匹骆驼用来乘骑。每三天就能空出一匹骆驼——到哈密时将有大批骆驼无物可载。我们支出15000块银元买270匹骆驼，这是一笔活的资本，因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根据需求或赚或赔地将它们转变成现金。

太阳下山以前我又去看了一次骆驼，它们有的站得笔直，显得颇为高贵，另外一些在躺着反刍食物。

周围一片寂静，在水银泻地般的月光下呈现的是帐篷的深黑色的影子。我一直站在自己的帐篷前，凝视着装饰帐篷的白色带子。它们不是没有生命的装饰品，而是具有深刻的含义，在带子每边的两个底角上可以看到一个“寿”字。在帐篷正面的中间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符号以圆状显现出来，这个圆的周围有5只蝙蝠展翅欲飞，其意为“福”，两边则是片片白云。

向未知的地方派出一群带着10000块银元的蒙古人似乎有些冒险，当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而没有他们的消息时，人们不可能不着急。我给冯·考尔、索得鲍姆、哈斯伦德在包头、归化城、北京和天津办事的18天期限也已超限4天了，但仍然没有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我们听流浪的中国人说，国民党的旗子已在包头升起，张作霖成了北京的独裁者。如果这些我们无法证实的消息是真的，那么京包铁路只对军队开放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的人肯定被这种倒霉的事延误了。但如果他们已带着银子和行李上路并在途中遭遇土匪的话，那么消息肯定会传到百灵庙和大本营的。

6月26日星期天，我们过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节日。一群陌生人进入了营地——5个男子、3个女子和6个脏兮兮的孩子。他们说自己是一个巡游剧团，想给我们表演几个拿手节目。我们的人认为他们是乔装打扮的土匪的探子，如果真是这样他们装得倒很像。一个可以到全中国去的演艺团为什么偏偏游荡到蒙古的荒漠中来呢？也许是竞争太

激烈，因而只要给钱，他们也可以给蒙古人演出。这样的冒险者无需害怕土匪——抢劫他们得不到报酬。再说，土匪们也需要娱乐。

巡游剧团在仆从们的帐篷附近安顿来下，受到茶饭招待以后，那几个“夫人”就开始彼此帮着抓虱子，于是一场对寄生虫的无情屠杀就上演了。胡莫博士觉得这种“可敬”的事情应发生在别的地方，而不是这里，因为这会使我们面临沾上带有斑疹伤寒的寄生虫的危险。于是我请求袁教授把他们遣送到河流对面的什么地方安顿好，这样，寄生虫就不可能渡过河来钻进我们的帐篷。

喝下午茶的铃声准时响起，大家都集中在俱乐部帐篷里的桌子边。通常下午茶比较随意，花的时间也不长，但没人会错过——因为在白天5点的热气侵袭后大家都渴了。然而，我们今天坐的比平时要久，因为那个巡游剧团要求为我们演出。于是，椅子、凳子在俱乐部的遮阳篷下和门口的桌子前面一字排开，大家各就各位。演员们在包装箱和给养袋子围起来的空地中央搭起了露天戏台，其位置就处在帐篷前面、我们称为“马可·波罗街”的公共道路南面。一只空箱子就放在那儿，两个巡游乐人坐在椅子上，一个吹笛子，一个演奏一种弦乐器。

为了打扮和化妆，演员们一直待在旅队仆从们的帐篷里。观众逐渐安静下来，蒙古人和其他仆从坐在箱子和旁边的地上，露天的畜舍被撤掉。如果这些演员是伪装的探子，那么我们这个移动“城”的居民数量将使他们三思而行。

现在两个男人上台了，天生一张女人脸的男人扮演旦角，头戴女人的假发，身佩中国妇女的饰品。另外一个戴着一副长长的黑胡子的男人将自己的眼睛周围抹得惨白。他们对自己的角色很熟悉，忽儿歌唱，忽儿尖叫，忽儿咆哮，发出一串串无法理解的话语，与此同时，乐师们也在起劲地演奏着。我问徐教授和袁教授能不能看懂，他们说只能零零星星地听懂一两个词。但毫无疑问那段子与爱情有关，男的问：“请问芳龄几何？”女的则以骂作答。那出戏分为四折，两个恋人自始至终都在吵架。虽然听不懂那些充满双关语的口角，但看戏对我

来说也是一种放松。如果能够读一读这出美妙的戏剧的剧本的话，那肯定很有意思。人们也许认为，两个恋人在整出戏中都打情骂俏肯定会显得乏味，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那不是两个人面对面站着说话，演员们跳着舞着，用扇子击打彼此的前额，造成了一种掌掴的声音效果，或者用一种硬木制成的板子发出有节奏的嘎嘎声。他们跳跃如体操运动员，蹲踞如老鼠，频频做鬼脸。毫无疑问，他们讲的都是琐碎事，但其动作不具有攻击性，其模仿也很出色，中国观众从中得到了很大乐趣。音乐也很棒，虽然具有亚洲音乐艺术的单调节奏，但我却是百听不厌。在从东到西的整个亚洲我倾听着这种具有魔力般催眠作用的音乐，梦想着更加美好的时光，它能抚平内心的狂躁，它使思绪走向安宁——人们知道，弄蛇人的笛声能使眼镜蛇平静下来。

演出结束了，演员和乐师接到奖赏后就离开了，观众们四散而去。不管怎样，总算在我们的“城”中有了一次像样的娱乐活动。

白天，霍德博士在温度计上读到了32.2摄氏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在大本营遇到的最高温度。晚上气温降至14.8摄氏度，但这一温度对我们而言似乎也热得非同寻常，因为一种褐色的小甲虫出来活动了。我在自己的灯笼周围发现了600多只，它们的紧密团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我写字时它们在纸上到处乱飞。零上几度时见不到它们，那时我可以不受干扰地记日记和写信，而现在则不同了。

6月28日，有两个蒙古人带着4匹子骆驼来营地出售。我们以每只90元的价格买了下来，外加一条他们的黑狗。

6月30日，真让人惊喜！我们正要坐下吃饭，一个蒙古仆从前来向拉尔森报告说一群骆驼正向营地走来。我们急忙拿着望远镜冲了出去。只见我遣往东北去的两个蒙古人骑在骆驼身上，驱赶着一群骆驼走来。他们走得很快。当骆群靠近时，看到帐篷吃了一惊，于是撒腿往北方狂奔。众驼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弯状队伍，奔跑时搅起的旋尘把它们完全遮蔽。但赶驼人很快控制住了局面，骆驼群再次接近小溪，又蹦又跳地跑了过来，哗啦哗啦弄得水花四溅。我和拉尔森检查了42匹新驼，它们个个膘肥体壮，给人的感觉是完全能承受夏季去迪化的

长途行军。

夜晚来临，由骆驼组成的骑兵旅从草场归来，它们的队伍更加壮大了，看到这些壮美的牲畜迈着高傲的步伐走路的样子真是一种乐趣。落日带来了另外一种景观，此时的落日和已过去的四周大为不同。红色完全消失了，西方的苍穹上布满了小块拉长的带有银白色边缘的蓝灰色云彩。太阳时而隐身于云彩后面，时而喷薄而出，但最终还是掉入蓝黑色的云墙之中。这面蓝黑色的云墙已经扩展到苍穹的最高点并越来越接近我们，从未见过的寂静笼罩在整个地区的上空——就是一根燃着的蜡烛也不会产生丝毫摇曳。这是风暴来临前的平静，人们可以看到一股恐怖的风暴正在逼近，暴怒的风神正向东方滚滚而来。大家都迅速钻入帐篷，接着就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榔头敲打钉子的声音——必须抓紧时间加固帐篷。第一阵风卷起了铺天盖地的尘粒，我慌忙将四处摆放的图表、书籍、笔记、衣服等容易被风刮走的东西收拾起来。风暴以巨大的力量在头顶肆虐，帐篷每时每刻好像都要被撕裂似的。转眼间已是一片漆黑，风咆哮着在周围冲撞，人们只能听到风暴的声音，它整整狂叫了两个小时。

7月1日早晨，我早早就起来了，为的是出席诺林博士率领的组织精当的小型旅队的出发仪式。他这一路纵队有麦斯尔斯、黑德、冯·玛森巴希、伯格曼、丁、陈、两个苦力，两个蒙古人和一个厨子。他们带了6个星期的给养和3顶帐篷。

关于他们将要执行的任务的情况如下：

诺林10天前回来时向我们提出了一项计划，目的是要对通往嘎顺淖尔的路线进行一次比我们预先计划的更为彻底地绘图调查。最初的计划只打算提供这次行军路线的简单地图，因为我很早就习惯这样做了，除此以外，诺林和袁教授还要对与这一路线有关的若干地区进行调查，不过这都要视我们能为此付出多少时间和相应的区在地理学和考古学方面的重要性而定。小型的专用考古图将由伯格曼和黄文弼画出。总体来说，在此次情况下我们的路线图只是一条线，只是时不时地往这儿或那儿延伸一下。

诺林的计划真是太好了，我几乎不用特别强调地指出，就欣然同意了他的计划。他将一直对通往嘎顺淖尔的路线实施三角测量。我们因而会得到一个连续的三角形系统，这些处在专门的石堆和固定的点之间的三角是以经纬仪来衡量的，三角形的边的长度为10公里和15公里。三角形系统的主轴是通往嘎顺淖尔的旅队路线。赫尔·黑德具体实施三角形的测量工作，他骑着骆驼从一个固定点走到另一个固定点，而诚实的苦力王魁则身上扛着贵重的经纬仪步行。

诺林本人将对三角形内部的地形状况进行考察，在这方面他依赖的是那些固定点。他的助手是冯·玛森巴希，他的考察对象是谷地中的水道和已确定的道路。两个人在工作时都使用了平板绘图器，诺林甚至还可以省出时间来实施地理观察和描绘地质地图。黑德与冯·玛森巴希曾经作为军官学习过地形学课程，因此，在营地附近做的几次实习中，当诺林向他们讲解地形观测的主要对象时，他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两人对分配给自己的任务热情很高，满怀喜悦地盼望能够为考察作出贡献。

我们通常都与中国学者讨论制图计划，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了真诚的支持并引发了他们的极大兴趣。诺林在大队的右边或北面与之保持大致20公里的距离，中国人建议组建一支他们自己的测量纵队，也就是说在大队的南面10公里左右的地方进行地形测量。这样，我们大体上将以三支平行纵队向前推进，北方纵队受诺林指挥，中间纵队，即主力纵队归我指挥，南方纵队受袁教授节制。袁教授于7月3日自此出发，陪同他的有考古学家黄文弼、资料收集者刘和白、一个厨师、两个苦力，还有两个蒙古人。他带了4星期的给养和15匹骆驼。

北路的伯格曼在陈的协助下负责考古和丁道衡的古生物学考察，他们任务最重，因为角度测量需要极高的精度，因此他们就于7月1日早早出发了。袁教授的纵队最有可能与大队保持同样的前进速度，但为了不致落得太远，他还是于7月3日出发了。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地形测量以外，袁教授还希望有机会进行考察和古生物学的调研，这些工作都要花时间。

按说，两边的纵队将会一直与主纵队保持联络——有蒙古信使骑着敏捷的骆驼在各纵队间来往联络。我们有几匹这样善跑的骆驼，其中一匹就是放开四蹄飞奔的马也追不上它——里艾伯润兹昨天已为这几匹骆驼摄了影。

水和草地是决定宿营地的主要因素。因此两个或三个纵队或许能时不时地在同一个水泉或水道边过夜，其他时间我们都是分散的。然而，有一点十分肯定，那就是我们在走完一半路程后至少能相会一次，地点就在一个叫善德庙的地方。先期到达那里的纵队，很可能是主力纵队，它必须等待其他两支纵队的到来。骆驼要在那儿休息几天，而地形学家们也将在那儿比较各自的收获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如果一切顺利，结果令人满意，那么制图工作将会以同样的方式一直持续到嘎顺淖尔，从而形成三角形系统的大框架。

第七章　在呼图尔图古尔的最后一天

我们的日子过得既单调又快乐，在蒙古的炎夏和这样的高度，也只能过这样生活了。我以前曾讲过，我们的固定营地的高度为1570米，但那只是建立在仅仅两周的气压观察之上的结论，现在，5个多星期之后，我们可以确定的平均值为1595米，可能的误差约为60米，更为确定的数值只有在与亚洲其他地方的站点的数值比较后才能得出。

7月8日，一些蒙古人赶着骆驼向营地走来，他们从北方赶来了19匹骆驼，这使我们的驼队数量增加到了220匹。

一对汉人兄弟前来向我们出售8天大的羚羊崽，每只5元。拉尔森警告大家不要买，他说如果买了，我们就会被蜂拥而至的小羚羊淹没。那可怜的小家伙最终被留了下来，它得到了温热的奶子，大家尽最大的努力抚养它。现在它就盖着东西躺在我的帐篷前面，我确实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如果知道它妈妈的下落，我一定会把它送走，但草原太大，羚羊就如同擦着地面飞行的云彩一样迅捷。

在我们的宠物中还有一只小巧、整洁、优雅的跳鼠，胡莫博士将其养在一个很大的空箱子中，现在它几乎完全被驯化了。在箱子的底部有一个带有软垫的开口笼子，它每天都睡在这里面。箱子里还有水、米、石碗，而且里面总是有一堆金凤花，金凤花瓣似乎是它最喜欢吃的东西。它吃东西的样子非常迷人，先是两条大得不成比例的强壮有力的后腿将整个身体支着坐起来，然后再用小的发育不全的小腿的爪子将花瓣送进嘴中。这个灰褐色的小家伙有两扇很大的薄耳朵和两只褐色的大眼睛。它是胡莫博士在值夜班时抓到的，它是夜里活动的动物，太阳一下山它就活跃起来了。当它在地上自由活动时，总爱

使用后腿使整个身子直立起来。其可作支撑的尾巴长而有力，末端为一束白毛，中间有一条横向的黑条。胡莫博士对它很有信心，他将其从笼子中抓出来放在自己的肩膀和胳臂上，小东西一点也不害怕，且有很强的好奇心。但它的食谱很奇特，不仅仅限于蔬菜。一天，胡莫博士觉得它需要有个伴，于是从小溪中抓了一只青蛙放入水盆里，但早上发现青蛙被吃得只剩下了头部。还有一件事使大家在一段时间里对它失去了爱意，那就是它将自己的两只孱弱无助的小崽给吃掉了。它让它们活了几天，但似乎它对自己的后代毫无兴趣，而且还不管不顾地在它们的身上踩来踩去，两只可怜的小家伙躺在那里吱吱直叫。我解释说，跳鼠表面的残忍也许还带有一点英雄主义色彩，它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囚禁中面对不可捉摸的未来。

然而，那天也有一件让人激动的事情。赶来骆驼的蒙古人报告，他们在百灵庙和归化城之间的商路上遇到了一支汉人商队。商队的头人说他们三天前去过归化城，在那里看到有欧洲人在买骆驼，更多的情况他们就不知道了。我们认为，在归化城买骆驼的人除了我们的特使冯·考尔、索得鲍姆和哈斯伦德外不会是别的欧洲人。大家的情绪因而高涨起来，所有人都盼望他们摆脱险境，同时也希望几天之后我们能够结束在营地的牢狱般的生活。

当预定的会合时间超过7天以后，平时总是镇静自若的拉尔森也沉不住气了。晚上12点30分，他与胡莫博士一起来到我的帐篷，当时我正在写东西。拉尔森建议派一个最可靠的蒙古人给归化城的贝尔吉恩医生和凯辛博士送一封信，问问他我们的人是否离开和在什么时候离开那里，如果没有离开，耽误的原因是什么？

7月9日像平常一样过去了。晚上喂好小羚羊并安排好它的卧处以后，胡莫博士和我站在插着红十字旗的帐篷前聊天，突然拉尔森挥着双手跑了过来——他一般是很平静的，这时候又喊又叫，肯定有什么事。

“怎么了，怎么了？”我们急忙问道。

“他们来了，全部旅队都来了。”拉尔森喊道。

“在哪里？”我们问。

“在那边，在山的北面。”拉尔森答。

果然，骆驼在夜幕中隐隐可见。我们急忙趋向小溪与大路交汇的地方。他们来了，古铜色的脸犹如美洲印第安人，浑身尘土，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看去真如土匪。但好在大家都身体健康，情绪高昂，骆驼状况也良好。他们在归化城买了五匹骆驼，价格在120墨西哥元左右。

营地的情形多么让人激动啊！三个归来的人成了英雄，成了真正的集会中心。人们七嘴八舌地向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冯·考尔走到我的跟前，两脚一碰行了一个军礼，报告说旅队的任务已全部完成，而且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我向他和另外两人表示了欢迎和谢意。

“你们把北京和包头的邮件都带来了吗？”我问他。

“是的，全带来了。”他答。

“你们收到钱了吗？”我问。

“是的，一切顺利，所有的钱都收到了，包括旅行费用，购买骆驼的费用和委托费。”他说。

“饿了吗？”我问他。

“是的，快饿疯了。”他迫不及待地答道。

厨子们受命下厨，饭很快就做好了。与此同此，骆驼的负载被卸了下来，邮件被开包。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的东西，而且还有一大堆的报纸。

7月15日，拉尔森来到我的帐篷报告：

“现在已有237匹骆驼。我们买了240匹，但死了两匹跑了一匹。到现在我们已花去21286.90墨西哥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匹骆驼花去

了88墨西哥元。价格如此之低，多亏了安德鲁斯的帮忙。在237匹骆驼中，26匹在诺林的纵队里，15匹在袁教授的纵队里。除了需要27匹乘骑用的骆驼外，大本营的行李需要195匹骆驼驮载。为旅队的蒙古人准备的16匹骆驼已计入195匹骆驼以内。我们最多还需要30匹骆驼，我确切希望明天就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你看来，什么时候可以上路？”我问他。

“最迟在7月20日。”拉尔森答。

“你觉得到迪化时还能剩多少匹骆驼？”我问。

“所有骆驼都能到达。我在蒙古已生活了34年，但从未看到过如此多的上等骆驼。一开始它们可能不好驾驭，性情固执，但那之后很快就会平静下来。”拉尔森答。

最后一名信使于7月17日凌晨4时离开，他带走了我们的伙伴和两箱子装满考古发现的箱子，我曾希望他能够带一封涉及嘎顺淖尔情况的信走，这些情况可以在西汉早期的历史书中找到，其发生年代在耶稣诞生前两百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学问高深，他自己带了6箱子中国古籍，对考古很有用，这些书中就有早期西汉的历史。应我之请，徐教授通读了这些书，在去嘎顺淖尔的途中他为我翻译了书中9个不同的段落，里面提到了嘎顺淖尔和额济纳河。史书的作者是班彪、他的儿子班固和班超，还有他的女儿班昭，因而此书是一部家族作品。对我们来说，手头拥有可以在其中找到今天旅队正在经过的地方的历史资料该是多么重要啊！早期汉代的历史书中提到了一个湖，即居延海，而未提及嘎顺淖尔和苏泊淖尔。他们还知道居延城，而居延县这个名字的出现则是耶稣之后4个世纪的事情。我们是这样解释上述情况的——即使如听上去的那样没有看到那些湖泊——正如在罗布泊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些湖在汉代早期可能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湖，像罗布泊一样，湖的分割很可能是由于不断发展的干旱造成的，这种情况是在后来才发生的。

耶稣前第四世纪，中国出现了7个王朝，最北面的分别是燕、

赵、秦，它们都与蒙古相连。考古学家黄文弼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忙于调查和跟踪百灵庙以南50里的古城墙废墟，它们一直向大本营西南方向延伸开去，旅队在去善德庙和嘎顺淖尔的途中要跨过这道城墙。黄文弼在一封信中向徐教授表达了这样一个猜测，即这段城墙是以上提到的3个王朝建立的长城，它们自成体系互相独立，其目的是为了防御蒙古人。我不清楚黄文弼在他的书中为这个猜想找到了什么佐证，但徐教授认为这一猜想可能涉及一个重大的历史发现。

我简要地提及上述这些小插曲的目的是想表明，在中国的土地上考察时有中国学者的合作对考察的好处和意义有多么重大。如果我单独旅行或只带欧洲人考察，那么为了得到2100年前嘎顺淖尔的历史情况，我最多只能在回到家后向欧洲的汉学家们请教。而今，在历史现场，不仅有历史资料，而且中国的学者们就可以向我作出解释，因此我立刻就能知道想知道的事情。

也许人们现在会明白，当我说中国工作人员是考察队的无价礼物时意味着什么。

诺林博士带领的北线纵队现在已出发两个星期了，迄今与他们的联络尚未中断，骑着骆驼的蒙古信使来回奔波，不仅传递双方的信件，而且向诺林带去了他们所需的东西。在7月3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神圣的巴音博戈多，它的意思是‘富裕的神’。它名副其实，南边到处都有铁矿和锰矿。含矿带一直延伸到查干—敖包—苏莫，我已经对之实施了制图学调查。伯格曼首先发现了这个矿带。”

7月5日伯格曼报告：

“我必须向您报告令人满意的消息，陈在我们早先的营地附近发现了一处很大的石器时代村落，这是迄今为止我发现的最有价值的地点。在两天半的时间里我们已收集了不少于1450件文物，在这些东西中最多的是制作精美的刮削器和石头，其中一些看上去像斧头。也不缺陶器，但陶器上没有纹饰，因而没有确切的线索确定其年代。即使

那儿未找到陶器碎片，也可以从一部分人工制品上作出判断，这些人工制品很可能使人想起更古的石器时代。那里很可能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此后在石器时代就一直有人居住。然而，我现在还不能就此肯定地表达我的观点，因为我现在尚没有机会研究以前在蒙古发现的所有石器时代的遗物。我以1:2000的比例尺画了一张那个地方的地图，对此图我非常满意。正如您将看到的那样，陈的发现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为了鼓励他，我已承诺给他25墨西哥元的奖励……”

7月8日诺林自查干—敖包—苏莫来信：

“迄今为止我们的工作令人满意。我已绘制好了两张地图，其内容和以前的地图一样丰富，黑德的美妙的三角形网络向西面又伸展了60里。由于现在你们好像还要在呼图尔图古尔待上一段时间，我们也就不太着急赶路了。伯格曼一直在寻找新的地点，他感到非常满意。”

人们肯定会明白这样的报告会给我带来多么大的快乐，一切都进展顺利啊！

中国人也一直与我保持联系并报告其所获。袁教授在7月11日写道：

“亲爱的赫定博士，我现在处在距大本营只有18公里的地方。白（三名资料收集员之一）在附近发现了石制工具和骨头化石。这就是我们一直走到大路以北三公里的原因。我想尽办法制图。明天队伍将向南面移动，在山脊的顶部您很可能用望远镜就能看到我们。更西面有一个有溪水的地区，我将快速穿越那里，以便尽快到达其西面的山脉……”

黄文弼只能用汉语写信，他将自己的报告送给徐教授，徐教授则从来不会忘记向我翻译报告的内容。我也同样告诉徐教授我所收到的报告的内容。发现铁矿石的消息使他特别高兴，我们已经梦想着建立一条铁路把包头和巴音博戈多连结起来，而且也已算出它会给中国带来数以百万元计的利润。

从北京买来新的干电池以后，旅队的无线接收站又恢复了运转，它的天线发射塔迄今为止一直徒然而立，茫然地“注视”着星空。现在我第一次接到报告：“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收到瑙恩的广播了。”我急忙奔向霍德的帐篷，发现他和冯·考尔正躺在地毯上戴着耳机收听呢。他们刚刚收到瑙恩的报告信号，也就是说，现在是中欧时间1点钟，相当于格林威治时间12点钟，而在我们这里则大约是晚上8点。我戴上耳机，清晰地听到了里面传来的嘀嘀声——听到来自柏林的消息使我非常激动。如果电池有很强的电流的话，我们不仅可以收到全世界的消息，而且还能天天与亲友联络。我本来想着要带一部真正的无线装置，但由于困难重重和价格昂贵而作罢。我们需要的唯一东西就是经度，而这通过瑙恩的时间信号就可以得到。

考察队中的11名德国人非常优秀，有了这样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在北京等待的紧要关头，有人敦促我送一些德国人回去，当时似乎也有必要这样做，但我坚持住了，没有把一个人“扔下船”。只有冯·德沃尔少校由于个人原因而自愿旅行回家，他后来失踪了，这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难过。

没有德国和中国，这次伟大的考察就不会发生。在德国我不但收到了人们对我的计划的理解、关注和支持，而且找到了慷慨的赞助者。另一方面，如果我拒绝与中国人一起工作，那么整个计划就会泡汤，我也早就打道回府了。

7月16日，考古学家黄文弼带着他的由10匹马组成的小旅队回来了，几分钟之后，在徐教授的陪同下他来到帐篷向我汇报，他向南骑了40里直到长城，然后从两个方向循着长城走了20里。从他携带的古籍中的有关记载和现场考察，黄文弼得出了一些确定的结论，当然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只有他一人负责。根据他的观点，有3段独立的长城建于公元前4世纪，后来在公元前3世纪秦朝将其连接起来。这些长城现在所存不多，可看到的是一些离地面几英尺高的圆状土墙。黄文弼还找到了一些烧砖的残片，但其余的长城似乎是由草和黏土填充而成的木头框架构成的。墙非常厚，它的外面、也就是北面有壕沟。黄文弼在距一个村庄一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早期汉代建立的城，其中的屋

宇街衢早已荡然无存，但城墙还清晰可辨，而且可以很容易地确定西城门的位置。扎沙庙村的农民很熟悉这座城，他们把它称之为“庄库瞭”。黄文弼在此发现了大批烧砖，上有“之”字形装饰，他随身带了一些样品。这座古城处于阴山北麓，阳山位于更北的地方。黄文弼对自己的发现非常满意，他已经计划在我们的和平之旅结束后对这一地区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说真的，7月16日不是一个坏日子。我们终于得到了足够的骆驼，黄文弼的发现前景广阔，而且，就在日落前拉尔森和我正在视察驼群时，胡莫骑着他的灰马沿着“马可·波罗街”飞奔到我们面前报告了如下情况：

“百灵庙的考察队已胜利完成任务踏上归途。我们拍摄了1100米长的电影庙会胶片。实施了6次人体测量和血液测试，此外还购回7匹上等骆驼。”

“好极了，其他人什么时候回来。”我问道。

“半夜。”胡莫答。

“你们淋湿过吗？”我问。

“是的，都泡透了，在谷地和坑中的水已经没到骆驼的膝盖上。”胡莫答道。

“你们饿吗？”我问他。

“饿极了。”胡莫说。

厨子接到做饭的命令，旅队医生和工作人员的外科医生给他摆了一桌丰富的饭食，但他急于向我们讲述所看到的奇闻趣事，以致饭菜都凉了。我心有不安地催促他：“把饭吃完，把饭吃完，伙计。”

午夜时分，里艾伯润兹和哈斯伦德赶着骆驼，披着一身银白的月光归来了，于是又建起了两顶新的帐篷。三人高兴异常，里艾伯润兹

对自己拍摄的胶片充满热情，因为那已超过了他的期望。

次日早晨，胡莫和哈斯伦德向我作了详细汇报。他们的故事非常有趣，写出来大家共同欣赏：

在目前的兔年的第7个月的第16天是麦达尔节，又称麦特莱雅。该节持续3天，今年恰好在7月13日至15日进行节庆。寺庙主持的名字叫智仁喇嘛，职位仅次于他的是大喇嘛和东霍诺。寺庙里还有一个“神”——吉根，即转世者，与西藏人的林波彻相应。吉根的名字叫乔尔罗斯喇嘛，他对我们的旅队非常友好，把他们与前来做客的年轻王爷杜姆罗·纳姆奇安排在同一所房子里。当地的首领达克汗百灵王也理所当然地前来庆祝。在上一次这个地区的军事征讨中，百灵庙被汉人夷为平地，10年以后才得以重修。吉根的新房子为中式风格，放有沉厚的圣书的图书大厅、柱廊、庭院、阳台都一如西藏风格，建房的神木来自博戈多·库伦，即乌尔加。听着胡莫栩栩如生地描述，那里的情景仿佛就在我眼前。

在通往举行节目表演的庭院的门口，乐队的圆形喇叭、鼓和钹已准备就绪。高级人员或顺着墙站立或坐在阳台上，他们对面的垫子上则坐着妇女。两个戴面具的黄衣喇嘛穿着像流苏一样的裙子进入场地，开始表演人物和舞蹈。查干·敖包根，意思是“白色的老人”，他是一个小丑人物，非常有趣，他被认为是黄色面具的发明人。经文打开，一个人大声诵读麦达尔，即那个即将到来的救世主菩萨的教诲。左面出现了一群戴黄帽子的高级喇嘛。他们进入庭院排成了一队，前有音乐开道。大喇嘛在罩篷下走过来，紧随其后的士兵扛着麦达尔像，其像放置于一个类似于公共电话亭的轿子上，士兵们还扛着麦达尔的学生的画像。他的后面则是众多的戴面具的人。这个行列离开寺庙，在外边的空地上扎营后开始吃茶点，然后绕寺庙转一圈。在寺庙的四面他们都作短暂的停留，因为每面都对应着上天的一个区域。回到寺庙后，这些人就在众多的旁观者和来宾面前开始诵经。

7月14日节庆达到高潮。早上10点钟时大海螺喇叭深沉的低音在寺庙的房顶上回响，接着叮当作响的铃声加入其中。在进行节日表演

的庭院里，善男信女们根据职位和资历各就各位。驱妖舞开始了，戴着牡鹿、野兽以及其他动物面具的喇嘛两人一组踱了进来——跟我在西藏看到的一模一样。里艾伯润兹被挤撞的无处可站，不得不爬到一个低矮的柱子上去拍摄。仪式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喇嘛们举着一张很大的三角形纸片在人群的头顶上晃动，据说它能够将所有的魔鬼和罪孽吸走。然后所有人都走到外面的平地上站成一个半圆，中间点起一堆火，三角形纸被扔进火中烧掉，这代表魔鬼的黑色物质全都化成了火焰。另外一个重要的节目是两个魔鬼附体的人登场表演，两个喇嘛先把魔鬼驱入他们的身体，后者看上去真的如中魔一般。两人面庞鼓起变成了红色，眼睛几乎都快要蹦出来了，嘴唇上满是白沫，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和不可控制的狂喜之中。他们确实很危险，我们的人受到警告不要靠得太近，因为这两个人都拿着矛和剑四处乱挥。真的，他们还弯弓射箭，不仅向空中射，而且还向水平方向射。有一次他们还向正在屋顶上拍摄的里艾伯润兹扔石头。

7月15日的节庆中出现了新的舞蹈和戏剧，还增加了两个戴着高帽子的魔术师。

中午时分曲终人散，成群结队的香客四散回家。正如胡莫所讲的那样，他们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妇女们佩戴银饰、发带、耳环、项链、手镯和戒指。黄色、红色、绿色和蓝色配合得十分和谐。

我们的人有幸作为吉根的客人住在他的房子里，那样就没有人敢冒险去碰他们。他们一到百灵庙就去拜访头人达克汗百灵王，他友好而诙谐地接待了他们和其他造访者，客人们给他带来了礼物、杏子、蜜饯、糖果和哈达。

在节日的第一天，乔尔罗斯喇嘛举行“招待会”，他坐在“宝座”上，前来参观的人们接受他的祝福。吉根手持一本黄书，轻触朝觐者的头部，算是对他们的赐福。香客们都向他敬献礼物。7岁的哈姆博喇嘛，藏语称“堪博”喇嘛，携其他人来到“神”的面前，乔尔罗斯喇嘛起身坐到他旁边的宝座上，慈爱地抚其头与之谈话——这是一个动人的、难以忘怀的画面，因为双方都显现出天生的高贵气质。

胡莫、里艾伯润兹和哈斯伦德都受到了非常友好的接待，为了他们的安全，吉根甚至还颁发了专门的命令。虽然接圣水的荣誉轮不到他们——用孔雀羽毛在圣器中蘸水向香客身上滴撒，但他们仍然受到了尚礼的主人的应有的关照。他们向寺庙敬献了50元钱，向圣僧们赠送了许多小礼物，如闹钟、刀子以及其他东西。当他们向吉根辞行时，吉根向他们索要在寺庙拍的照片，且许诺给我们写一封推荐信，称那将对我们的西行考察大有好处。我们因此决定派一个特使给他送上照片及其他礼物，同时再将他许诺的推荐信取回来。

我曾谈过旅队的骆驼，并且引用拉尔森的话说他从未看到过如此多的好骆驼集中在一块。昨天晚饭时他把大家都逗乐了，他说在视察驼群期间发现，如果从后面观察一匹站着的骆驼，它的身体就像一个直立的椭圆形。但他说，我们的许多骆驼都是平放着的椭圆形——它们太胖了，肚子圆滚滚的像气球，营养太丰富需要减肥。的确，我还从未听说过几天之内就要开始2000公里沙漠之行的骆驼要斋戒3天，但这对我们的牲畜却是必要的。最近这3天，约有100匹肥胖的骆驼要拴在营地里接受减肥治疗。

拉尔森向我透露，他一宿没睡，而且，更为糟糕的是，蒙古人也不能安睡，原因是担心骆驼会出什么事。如果就像现在一样，骆驼再无所事事地过上7周好吃好喝的日子，它们就会变得过度兴奋而不听使唤。由于骆驼肚子太圆，驮鞍和行李来回晃动而无法在驼背上保持平衡，因此只要一件行李滚下来，或者只要一个骑者的头盔被风吹落，那旁边的骆驼就会受惊，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地全速奔入草原。它们一跑，其他的骆驼也会跟着跑。于是，不会有箱子，也不会有面袋子了——一切都会被扔掉。箱子被摔开，里面的东西散落四处。更为糟糕的是，扔掉了行李的骆驼一身轻松，狂奔数小时才能平静下来。经过这样一场破坏性骚乱后，需要几天时间收集散落的东西，修补箱子和重新装载。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其中一项就是让那些最强壮的牲畜空着肚子走路。另外一项措施是把大队人马分成几个部分，彼此相隔100米，这样就可以把灾难限制在小范围内，尽可能阻

止骆驼“叛乱”的扩大。第三项措施目前还在营地周围的地区进行实验，这项措施是，挑出速度最快的骆驼由年轻敏捷的蒙古人在行军途中骑乘，他们将负责追赶那些跑掉的骆驼并迫使其停下来。

无论如何，出发时的场面确实激动人心。由于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使自己冒摔胳膊断腿的危险，我让拉尔森给我选择了一匹性情平和的乘骑骆驼。于是一匹18岁的母驼成了我的坐骑，它浑身黑色，高大、平和、优雅，我可以抚摸它的眼睛、鼻子，对此它毫不在意。如果是其他骆驼的话那情形就不同了，它们会吐唾沫，在你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的衣服上、脸上已是一片狼藉了，那情景让人想起了乳脂。但我的骆驼却彬彬有礼，举止得体。那个把它与另外几匹骆驼一起卖给我们的蒙古人起初不愿意与它分开，因为它曾经驮着他的儿子去过池南府，在经过锤声震耳、火花乱飞的铁匠街时它眼睛连眨也不眨一下。但当拉尔森告诉他我将骑着这只骆驼去哈密和迪化时，他改变了主意：“如果那位伟大的首领要骑它，我很乐意把它转让给你们。”

这些天来当我的眼睛从“书桌”上游移开来转向外面的游动的“城”时，心中不免伤感。到处都在打包，到处都放着箱子。信封和纸片满天飞——一切都为了出发。

最让人心疼的是与那个小羚羊的分离，它无拘无束地四处跑着，不时进帐篷来看我一眼。它对一切都感到好奇，甚至在我们的狗身上闻闻嗅嗅，而狗则对它的冒犯不屑一顾。

该地区的头人没有向我们索要任何补偿，但我们给了他100块钱和各种小礼品，以作为旅队的牲畜在他的领地上吃草的代价。众多其他居民，既有蒙古人也有汉族人，都由于他们给旅队的服务而收到了报酬和奖励。

与此同时，7月19日，我们在“碱水河”上的最后一天到来了。到处都洋溢着出发前的气氛，所有的骆驼在中午1点前在营地集中，整天时间都花在为骆驼上装上。它们的左脸颊都印上了我的姓的第一个字母H。里艾伯润兹今天要拍摄骆驼集中起来的壮观场面，但天公不

作美，雨下得很大，光线暗淡，气温很低。

时已仲夏，令人窒息的热浪随时都会出现。今天中午1点钟时的温度为18摄氏度，这是一个很舒适的温度，而且天下雨时还感到有些冷。目前为止，旅队还未碰上大热天。当我们在嘎顺淖尔把骆驼安排好时，那么最坏的日子才算过去。我们估算两个月才能到达那里，考虑到要制图的原因，旅队每天走得很慢。

霍德博士整个7月都异常焦虑，因为气象观测就要在呼图尔图古尔进行，他一直迫切地催促我使之成为可能。这件事情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当明天我们随大部队出发时，齐莫曼、玛斯考尔、刘以及一个蒙古人还要一直在这里待到7月31日。气象站会保留，气象观测工作将继续进行。

“马可·波罗街”已失去了蓝色帐篷群所形成的美丽外观，我们走后留在后面的人肯定会感到很孤独，但留下的小羚羊也许会为他们带来一丝安慰。

我们因而可以提前12天走。为了赶上大队人马，齐莫曼的9匹骆驼的小旅队每天都需要长距离行军，很可能在善德庙，或在从这里到嘎顺淖尔的路上与我们会合。

我昨天还在想，把这一小股人马留在呼图尔图古尔是否明智和恰当。地区的头人曾对拉尔森讲，只要旅队全部驻扎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没有人敢贸然进攻一个有这么多欧洲人的营地。但这里的和平与安全常会受到威胁，他不能为那些留在后面的人的安全负责。当然，如果有什么风声，他肯定会提前向他们发出警报，而且他还很乐意为他们提供一支蒙古卫队。穿越亚洲的旅行总是伴随着危险，如果总想在任何时候都避开它们，那么最好还是待在家里，我不相信就真的如听上去那样可怕。

人类的计算经常会发生错误，我与拉尔森同意把7月20日定为出发日期，但天空乌云厚积，天气阴冷多风，看上去像要下雨。诚如预料，我们刚在呼图尔图古尔吃完最后一顿午饭，天就下雨了。我从未

想到那个地方的一场雨会阻碍旅队的前进，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抱怨干旱少雨，如果不下雨夏天的草会成什么样子？我们渴望下雨。拉尔森曾请求精通天气变化的霍德，看老天爷的“水门”何时才能打开浇灌牧草，现在终于下雨了。雨落得挺快，但要等到地面湿到吸鞋的程度还需要时间。下午时雨越下越大，噼噼啪啪地打着已经湿透的帐篷布。装着沉重行李、给养和其他东西的箱子已经成对排好，用绳子捆着，只等着一声令下往骆驼身上上装了。面、糖、其他容易受潮的东西恐怕会变质。蒙古人已放下工作进帐篷喝茶了，他们不喜欢在倾盆大雨中干活，但拉尔森过来把他们轰了出去。所有的给养箱子再次被集中起来用帐篷布盖好。

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过去了，地面已经湿透了，走路时脚下泥水四溅，扑通作响。水从我的帐篷的遮阳篷上哗哗流下，在帐篷前形成了一个个小湖。湖水四溢，到处一片汪洋，所有的坑中都积满了水。外边人迹杳然，大家都缩到了帐篷里面忙这忙那。拉尔森经过一番视察后前来报告，说明天出发已不可能了，因为驮鞍、盖布、绳子都已经湿透。如果我们已经上路走了一段时间的话，事情就不会这么糟糕。但现在骆驼吃得太好，太活泼，已经成半野的骆驼了。如果现在给它们上装，越来越干的绳子就会慢慢变松。行李会从驼背上滑下，而且只要一件行李滑下，其他骆驼就会飞奔甩掉自己身上的负担。湿盖布很容易腐烂，而且随着湿度的升高会将骆驼擦伤，现在已经完全脱毛的驼肚比冬春时更容易受伤。

因此我命令，7月20日仍然原地不动。工作人员继续自己的工作，甚至无线电台也被重新建了起来。后半天阳光灿烂，风也刮了起来。

到7月20日晚上我们已经清楚，22日之前出发已不可能了。盖布表面虽干，但里面仍是湿的。而且，事实上我们也需要在7月21日这一天把一切重新布置好。

和该地区的西部相对的三个地方的名字分别是冬杜尔—吉恩—户舍、巴润—衮—户舍和德云—衮—户舍，其意分别是“中部伯爵的土

地、西部伯爵的土地、东部伯爵的土地”。“衮”意为“伯爵”，这是拉尔森在乌尔加时蒙古人送给他的称号——可见这个地区对外来者并不十分友好。1900年斯堪的纳维亚蒙古传教团的若干瑞典传教士被谋杀，他们是斯奇伯格、斯艾伯格（一个有瑞典血统的美国人）、希尔达和克拉拉·安德森姐妹以及伦德小姐，据说他们是被“义和拳”杀掉的。

7月21日就快要结束了，我刚喝完下午茶，骆驼们都在营地里，需要一整天为它们上驮鞍，但现在都已完成了。不过箱子的事情还没完，因为等绳子干后还要将其重新捆装一次。大量的行李被再次散开，这样箱子就能两个一组地分开放置，目的是为清早的上装做好准备。整个景象看上去颇为奇特，人们几乎找不到路，营地给人的印象是刚经历过一场战役。我不停地在躺着和站着的骆驼之间走来走去，在它们的队列之间形成了真正的大路和街道。空气中充斥着只有骆驼才能发出的气味，这种味道虽称不上芬芳，但只要你一直生活在骆驼中间，就不会去在意它。骆驼过夜的宽阔场地上已被厚厚的驼粪覆盖，这种东西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会成为这个地区蒙古村民的燃料。

就在我们紧锣密鼓地准备出发之际，诺林和伯格曼派来了一位信使——他受命快去快回。信使带来了诺林纵队的令人渴望的好消息，他们正在北面向嘎顺淖尔前进。

诺林写道：“我们的工作进展顺利，大家都干得不错。由于索得鲍姆的加入，我们的工作更加容易了，因为我现在不必在行进时一直待在旅队里了。我们现在急于知道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和每日走多远。今天我们停在原地整理地图和日记，但明天又要继续前进了。”

同一天的伯格曼也写道：“自上次写信以来我已经发现了14处石器时代遗存，大多数都不很丰富，但却看得出来是村落。这样，我总共发现了28处遗址。我现在对自己要求很高，一天至少要找到一处遗址，然而我只能遗憾地说，我将不可能做得这么好了，因为诺林打算天天前进，我只能在休息的日子里做一些适当的工作，尽管如此我仍然确信自己将会发现许多东西。一旦到达嘎顺淖尔，真正的大发现就

会出现。”

由于今天刚刚听说西部地区很不安全，因此这支已与我们分开的弱小纵队的消息让人松了一口气。我还为留在后面的齐莫曼、玛斯考尔和刘的安全担心，但他们只是淡淡一笑，泰然处之。

第八章　骆驼暴动

7月22日的黎明终于到来了。拉尔森于凌晨5点准时叫醒了我。天色虽已开始发亮，但我的帐篷中仍是一片黑暗，不得不点灯。明端来一个盛满热水的大盆子，准备给我洗衣服。因为急着出去，我起床的动作比平时快。

伟大的日子来到了，这将是一个我和所有人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旅队现在将要赶着自己的骆驼，而不是像从包头出发那样赶着雇来的骆驼出发了。营地里一片嘈杂。拉尔森下了一道又一道命令，骆驼尖叫着对放到背上的重物发出抗议。人们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语言在急切地交谈和问答——蒙古语、汉语、瑞典语、德语、丹麦语和英语。场面如此独特，宛如一支小部队要去一片陌生的土地进行远征。

我把两只总是随身携带的箱子装好了，里面都是我每天要用的东西，日记、书写材料、地图、罗盘、圆规、两套干净内衣、几本参考书、我母亲的《圣经》和《圣歌书》，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5点15分时我们开始用早餐——呼图尔图古尔的最后一次早餐。拉尔森平静轻松，他很高兴马上就要出发了，他履行第一旅队最高指挥的时刻也终于来到了。他甚至在别人之前已做好了准备，他急急忙忙走到外边。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他问马仁，一个长得很像美洲印第安人的蒙古人。

“是的，所有的骆驼都装好了。”马仁回答。

“你数过了吗？”拉尔森问。

“与我们一起走的不多不少150匹，还有98匹留在这儿。”马仁回答。

“再见。”拉尔森一边向我们大声道别一边向旅队最前面走去，他要徒步带领第一队前进。第二队由穆伦温格率领。没有别的欧洲人与他俩做伴。拉尔森只有11个蒙古人——对这么多骆驼来说确实嫌少。但我们留在后面两小时后才出发的旅队只有4名蒙古人——两个跟诺林纵队，两个跟袁教授纵队。

拉尔森在清晨6点消失在顶上有敖包的山后面。他带着20匹骆驼，其他3个跟在后面的小组各有约15匹骆驼。现在最后一匹骆驼也过了山，越过呼图尔图古尔向西而去。在这个方向上的原野起伏平缓，用7.15毫米的军用望远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的3队骆驼——事实上，在清晨7点30分时仍能看到最后一组骆驼的身影，它们就如同明亮的海绿色中一道移动的黑线。看到他们上路真让人心中轻松啊！说真的，我们没有必要心存担忧，因为拉尔森和他们在一起。即使这个或那个骆驼甩掉了行李，那也无关紧要，因为它们所带的行李主要是给养、比较重的个人设备和装银元的箱子，这些东西都不怕摔。

与此同时，帐篷被拆掉了，毯子也被卷起来了，骆驼被带到行李跟前，厨房也被打包，我们耐心等待出发。霍德博士已释放了78号试验气球，气球高度达8000米，肉眼无法看清。南方刮来一阵强风，天晴了，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身上生疼。突然几个蒙古人指着北面的草原喊：“拉尔森的骆驼！”他们一下子来了精神，飞身骑上骆驼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冲去，为的是拦住9匹向东全速奔跑的离队骆驼。逃跑者中一匹还驮着行李，另外两匹背着驮鞍，其他几匹身上什么也没有了。

傻瓜也会看出发生了什么事情——那9匹骆驼受惊挣脱了，正疯也似的逃跑。在更远处的山下，胡莫博士看到了另外15匹骆驼，它们的身影映衬着地平线，放开四蹄向北方狂奔，因此跑掉的不仅仅是几匹，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旅队七分之一的骆驼。

拉尔森的一名蒙古手下飞奔着冲入营地，他已经来不及从骆驼身上跳下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只是用两条胳膊画圈，摇着头大叫：“全都乱了！”然后一夹腿就飞奔而去。

现在时间是8点20分，我们等待着拉尔森的信使。胡莫博士、傣特曼和我一起登上敖包用望远镜向西搜索。在两公里开外的地方有大约50匹骆驼正在吃草，但那是一个汉族商队的骆驼。在更远的西边看到一系列黑点和一道道黑带，那黑点显然是扔掉的行李，而黑带则可能是拉尔森纵队的骆驼。在西南面左方的高地上我们的蒙古人正骑着骆驼对一匹驮着行李奔跑的白驼紧追不舍，它被追上制伏了。蒙古人欲将其带回营地，但那牲畜脾气倔犟，不想跟他回来，傣特曼和胡莫赶紧下去帮着把骆驼的负载卸下，并设法将那家伙带回了营地。我们最先看到的那9匹骆驼也打东北回来了，我下山查看这帮“叛逃者”，白驼大腿左右的皮和肚子被箱子的边沿磨开，正在流血。9匹骆驼当中也有几匹血流不止。如果骆驼走得慢一点的话，其身体自然不会与行李碰擦。当然，谁也没去将箱子设计的去适应那种速度。

与此同时奔向灾难现场的沃尔兹带回了详细的情况。

“情况看上去很糟糕，”他说，“东西扔得满地都是，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100多匹骆驼失踪了。”

“拉尔森怎么说？”我问他。

“他要两桶水，而且认为旅队必须在新营地进行重新组织。”沃尔兹说。

中午1点吃午饭时，我命令所有没有特殊工作拖累的人都出去帮助几个蒙古人寻找骆驼和丢弃的行李。

“这次事故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有人问。

“失去了两周的间歇期和一些骆驼，而且，穆伦温格带的银元箱正在去蒙古共和国的途中，银元箱子可能会在那儿与骆驼一起被偷走。”

沃尔兹回来后，我立即派玛斯考尔和赫姆波尔去拉尔森那里。玛斯考尔很快回来报告说新的宿营地看上去像一个战场一样可怕。拉尔森与两个蒙古人待在那里。

在山顶上瞭望的当儿，我的帐篷又被重新搭了起来，那虽然是好意但却没有必要，因为一吃完午饭我就在胡莫的陪伴下出发去新营地了。我只随身携带了一卷地图、一个罗盘、一支铅笔、一个笔记本和若干香烟。临走以前我向小羚羊告别。刚才我们检查受伤的白骆驼时，小羚羊轻盈飘逸如玉人般地翩然而至。那骆驼仍在张着鼻孔紧张而激动地喘着粗气，小羚羊的到来惊得它飞腿后踢。如果这一腿踢着了，那巨大的力量会使小羚羊如小球般飞向帐篷，但骆驼踢空了，其后腿从粗心的小羚羊头上掠过，我们赶紧把小羚羊带出了危险区。

沃尔兹的坐骑拴在一袋大米上与别的骆驼站在一起，但它只戴缰绳而未拴鼻绳。不知道什么缘故它也受惊了，横冲直撞地冲入其他骆驼中间，米袋子像一片羽毛枕头似的被拖来拖去。尔后它又冲到最后几顶帐篷中间，把那儿搞得一团糟，最后，那家伙又冲入那些拴着的骆驼中间，把它们也冲得无法控制。好在经过一番努力后闹事的家伙终于被抓住并紧紧地拴了起来。

在距一个十字路口不远的地方旅队碰上了汉族商人的骆驼，我忙于画图，没有注意那群牲畜，但让胡莫吃惊的是那里有几只背着驮鞍的骆驼，我们赶紧停下来看个究竟。那个汉人帮着挑出了6匹不属于他的骆驼，它们的左面颊上都烙着字母“H”。它们被拴在一起由胡莫带着，大家都很高兴不会空着手去见拉尔森了。我们还给他带了一些别的东西，其中有从8号营地附近的泉水中汲取的两桶冷水。

草原一片荒凉，但溪水两岸的牧草却新鲜嫩绿。我们接近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方，这段距离只有4.17公里，以平常的速度我们需要59分钟就能走完。因此这不算长距离，但却是一段多灾多难的距离。

还未抵达事故地点，我们就看见草原上遗落着三三两两的鞍布，它们无语地孤零零地散布着，或彼此拧在一起，或纠缠在绳子里。在路上散布着箱子、口袋、行李箱、桌面、帐篷杆子、椅子等，其混乱

程度让人吃惊。然而，新宿营地，也就是大恐慌发生的地方，才是混乱的中心。一到这里人们就本能地想起了战争，大约有50匹骆驼已被重新聚到一起，鼻绳系在四处放着的箱子上。令人惊讶的是只有为数不多的箱子被摔开了，一些箱子上有血迹。拉尔森前来见我，平静如常，但很沮丧。他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最后终于简明扼要地表达了他的需要：“我渴得要命。”

骆驼卧倒在地，水桶取了下来，拉尔森喝了个痛快。我不知道他喝了多少，因为其他人也在喝。水真是解渴的好东西，在这些干旱地区的夏季，干渴总是如影随形地折磨着人。

拉尔森开始讲事情的经过。他一开始就发现骆驼们骚动不安，它们显得紧张不安，眼睛盯着地平线，头快速转动。但旅队还是出发了，旅队缓慢前行，并不时地停下来看看行李是否歪了。直到离开8号营地3公里后3个小组仍保持着一定距离。之后拉尔森把它们分成5个小组，各组靠得很近，以平行队伍向前开进。他们穿越了干河床后就沿着它的右岸向平原的西部走了不大一会。这时候拉尔森发现已不可能使驼群保持平静了，于是决定设营休息。

然而，他与整个旅队都处在一条峡谷中，谷中溪水奔流，使人想起一旦下大雨就会有洪水泛滥的危险。于是旅队继续向前，走了200米后在一个平缓安全的山坡上驻留。如果他留在峡谷中的话，那就不会出任何事情。但就在这个小坡上厄运降临了，一只骆驼挣脱绳子，从同伴的旁边跑到了最前面。

它很快加快了速度，其背上的箱子上下颠簸，里面的东西哗啦作响，惊得它猝然狂奔。邻近绳子上的骆驼在互相碰撞中也受到惊吓而狂奔起来，其他骆驼也被拖着一起跑。于是就产生了一场可怕的混乱。如果骆驼是连在一起向西跑的话，那么拉尔森手下的蒙古人会很快赶上并截住它们。但它们一开始转着圈跑了几次，又蹦又跳地企图摆脱身上的行李。行李不是被摔到左边就是扔到右边，像火柴盒似的被拖着。哗啦啦的声音震耳欲聋，响彻山谷，犹如房子倒塌了一般。人若置身于这种令人眩晕的混乱中会非常危险。

拉尔森徒步而行。他左手抓绳，右手抓着那个驮着我的大旅行箱的疯了似的骆驼的鼻绳。骆驼们扯着绳子，屁股跃起，拉尔森有被踩到蹄下的危险。可这时他的右手还握着一把柄上满是木结的蒙古驼鞭，他使出全身力气毫不留情地抽打那些狂暴的动物的敏感的鼻子——骆驼的鼻子一受到重击就会就变得麻木从而使骆驼平静下来。他控制住了自己的那一条驼绳和驮着我的箱子的骆驼。我想，它们并未真正平静，但它们停止了骚动。因为拉尔森一旦发现哪个家伙有骚动的迹象，他的鞭子就会毫不犹豫地挥向其鼻子。拉尔森的绳子上大约有20匹骆驼，他希望把它们全部控制住，但一串逃脱的骆驼从旁边冲了过来，把拉尔森的骆驼绳一下子冲断了，他只控制住了7匹骆驼，其余则狂奔而去。

穆伦温格也勇敢地与疯狂的牲畜搏斗，拉尔森很欣赏他的力量和敏捷的反应，他的唯一不足就是想抓住太多的骆驼。他一只手抓着两串骆驼，又想用另一只手抓住冲过来的第三串骆驼，但头两串却挣脱了，个个鼻子流着血着魇似的四散而去。它们或者扔掉箱子，或者将其拖在后面，箱子松开后散在地上，而它们仍继续狂奔。但穆伦温格并未认输，他骑着一匹速度很快的骆驼如箭般追上去，追上后就用鞭子猛抽逃窜者的鼻子，并抓住绳子将其带回出事地点拴在重箱子上。然后他又冲向下一个逃跑者，每次他都能抓回一个骆驼。但场地很快就空了，他的追捕也变得越来越长。拉尔森说穆伦温格在这一天的表现非常棒，他追回了驼队的相当一部分骆驼，但如果有人想从他本人口中得到一些这方面的情况的话，他只是笑着强调说自己并没有做多少事情。

蒙古人马仁的表现也很出色，他驯服了6匹骆驼。150匹骆驼中只有13匹被控制住了，其余的都如风中的谷糠一般消失的无影无踪。拉尔森说他曾看到一匹很大的骆驼驮着两只220公斤重的箱子，如羚羊般轻巧地越过溪水跑走了。他曾在蒙古带过100匹驮着皮毛的驼队，那些骆驼也制造过类似的骚乱。他也曾目睹过无数次小的骚乱，但像7月22日这样，所有的骆驼都一齐发疯的事情他却连想也没想过。

几个蒙古人已经记住了带头闹事的骆驼，都说应该煞一煞那家伙

的威风，办法是加重其负荷，这样就能将其内心的邪魔驱除，从而使之懂得规矩。不仅如此，蒙古人还断言这场灾难是有根源的，并不全是因为骆驼太胖，吃得太好，休息得太多，或是受了惊，而绝对是他们自己疏忽大意的结果，那就是他们没有向以前营地附近的神圣敖包贡献牺牲。我请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多地去贡献，以便我们能够免除由逃跑的骆驼和丢失的箱子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拉尔森讲完时已是下午4点，他确信他简直不能形容几小时前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其所目睹的混乱就如同经历了一场大战。

霍德、冯·考尔和里艾伯润兹逐渐与我们会合。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发现了箱子和盖布并十分明确地指出拉尔森应向哪个方向派出蒙古人。里艾伯润兹很后悔没能与拉尔森一起出发，拉尔森则绝对肯定地告诉他，那种场面如果拍成电影肯定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其所值能超过成本的50倍。但他又颇为理解地安慰说，里艾伯润兹在去嘎顺淖尔的路上将会有十几次的机会再次目睹那种场面。我也尽力安慰他，指出如果他在现场的话，肯定会被撕成碎片，摄影机也会被摔碎。

三人转回了8号营地，胡莫与他们在一起。拉尔森和我与几个蒙古人在一起，他不断地发出指令和听取汇报，而我则盖着一块布睡着了。

一小时之后我醒了，营地一片宁静。拉尔森举着望远镜站在营地西面的山上，旁边只有一个戴草帽的蒙古人，他正在接受那些不时地送回来的东西。我问拉尔森是不是有重要的东西丢失了。

“是的，丢了两只装有4000块银元的箱子。我们正在派专人寻找——穆伦温格已去找了，但迄今尚无结果。”

“他知不知道驮着银元的骆驼向哪个方向去了？”我问道。

“不知道。整个现场是一团混乱，眼睛不可能只盯在一匹骆驼身上。”拉尔森答。

“如果钱丢了怎么办？如果土匪或窃贼发现了那两只箱子，我们就再不可能有什么指望了。4000块银元的损失太大了。”我说道。

“不过，就现有的给养走到哈密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不找到箱子是不会罢休的。这里还有一只箱子被摔裂了，所幸银元没有滚出来。”拉尔森说。

“好啦，事情只能这样了，我不想再次派信使到北京取钱了。我们必须省吃俭用了。到哈密以后会有30匹骆驼空出来，把它们卖掉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到达迪化。”我说。

在距我坐的地方几乎不足15步远有8匹骆驼，它们的鼻绳被紧紧拴在重箱子上。这些牲畜紧张不安，激动得难以自已。它们平常安静温和，但现在由于疯跑而变得无法控制，几乎不能安静，不停地绕着箱子兜圈子，拽绳子，与已经消失的同伴一起飞奔是它们最大的快乐。它们一个个不停地呼哧呼哧喘气，宽大的鼻子往外喷着白沫。它们的眼睛平常柔和似梦幻，但此时却像火红的木炭，眼白充血，令人恐惧。突然，我的白色硬太阳帽从头上掉了下来，带着很大的响声滚动在几只骆驼中间。这使它们异常恐慌，纷纷扬起后腿直立起来，脖子乱晃，围着箱子猛烈跳动。好在帽子继续滚动，安全地通过了这个炼狱，没有被它们啃坏。我走向前去轻声细语地抚慰它们，渐渐地，它们的“舞蹈”停了下来。

大约10点时一个蒙古人赶着15匹骆驼归来，一些骆驼还驮着行李。我们让骆驼卧下为其卸去负荷，并一个一个地把它们拴在箱子上。

“快来呀！”拉尔森喊道，“丢掉的钱箱子回来了。”

“太好了！我们得救了，这样去哈密之前就不用卖骆驼了。别的东西丢掉并不要紧，我的愿望是尽快出发向西。”

半小时后又有两个蒙古人出现在山头，他们领着20匹骆驼，个个背上都驮着从周围地区捡回来的行李。

“这是我和霍德的行李。”拉尔森喊道。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只骆驼？”我问。

“加上那些已在8号营地的大概有100匹，约有50匹还未找到。”拉尔森说。

“在搜索期间我们可能不得不在此住上两天。但我实在不想再待了。假如情况很糟的话，我们也能承受得起损失。只是骑骆驼的人必须步行了。”我说。

日落时分，老营地的人来看望我们。人们在8号营地和9号营地之间来回穿梭，有时候捡回的行李被送到旧营地，因为发现行李的地方离旧营地更近些。而且，我们还不得不时刻了解什么东西还未找到和多少匹骆驼已被找了回来。赫姆波尔来回查看，记下未丢失的箱子的数目——他知道丢掉了多少只箱子。第二天他还将自己的记录与玛斯考尔的记录进行了一番比较。

黄文弼也从老营地过来了，我问他有没有丢东西。是的，他的6只装有宝贵的中国古书的箱子有一个不见了。他很达观地对待这件事，脸上若无其事，但他却一个人独自进入草原，一直找到太阳下山才回来。

最后，徐教授也带着两个学生出现了。他对一片狼藉的场面非常吃惊，而他更惊讶的是我的平静——我居然还能开玩笑。

暮色渐浓。胡莫和明、两个蒙古人和几匹骆驼带着我们和拉尔森的帐篷、睡袋以及部分厨房用具来了。

显而易见，我们还要在这里至少待上三四天，因为受惊的骆驼需要一段时间平静下来，很多牲畜已闲了一整年，背上重东西就发狂一点也不奇怪。更糟糕的是拉尔森还要为旅队找更多的人手。他要雇10名汉人为蒙古人做帮手。晚上，一些人被派到村子里物色人选。

晚上大家都疲惫不堪，没有出去搜索的蒙古人一整夜都与拴在一

起的骆驼睡在一起，以便随时应付不测，但牲畜们一直很平静——它们也该累了。

当天的这一幕确实很有趣，那是一种群体心理在作怪，开始是一只骆驼受惊或觉得实在无法忍受沉重的箱子的困扰，于是猛然跳起扔下负荷，继而邻近的骆驼受到感染群起效尤。结果所有骆驼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影响，在15分钟内整个驼队四分五裂，一切秩序都荡然无存，所有的牲畜就像风中的谷糠一样飘然四散。那真像一场公共集会，一位强有力的、精力充沛的演讲者把听众吸引到自己周围，人们跟随他，因为他讲话有说服力，至于他说的什么，听众从不思考。如果骆驼们知道自己在奔跑中会被箱子尖利的棱角擦伤腹部和腿而备受痛苦的话，它们也许会离开那个煽动者，可它们只知道跟着乱跑。

在这场大混乱中也有挑战、反抗和革命的成分。如果骆驼能够思考的话，人们可以想象它们会起而反抗强加在其背部的“枷锁”，会决定跟随那个能告诉它们如何摆脱压迫的骆驼。它们把我的宝贵的箱子扔在地上——那是对压迫者的抗争。它们对人喊道：“如果你们想将货物弄到嘎顺淖尔，那就请自己拖着去吧。我们再也不愿做你们的奴隶了，你们对给我们造成的麻烦的唯一回报就是让我们在草原上吃半天草。但这种好处在我们摆脱你们残忍的皮鞭以后自己就可以得到。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自由最可贵，让行李见鬼去吧！”

7月23日一整天都在搜寻逃跑者。7月24日早晨，来自早先同一营地的几支小旅队正向我们走来，其中有18匹骆驼带着霍德的氢气桶。我急切地想知道骆驼怎么会愿意驮这些类似鱼雷的奇形怪状的东西，而且它们比一般箱子还要重。我爬上营地高处的山顶举着望远镜观察着，只见旅队平静而缓慢地抵达营地，把其危险的行李卸在距帐篷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暴动的骆驼身上，我怀疑它们将来还会如此。至于在前天的大混乱中一直向西突奔而走的那只混蛋骆驼，昨天有传言说它已被拴在一顶蒙古帐篷上，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不知道。那传言不真实，蒙古人今天报告说人们在好几个地方看到它，先是在

东面，后又在东北面。我们的一个蒙古人曾追过它。

另外两匹完全消失的骆驼中的一匹出现在许多地方，它已经不停歇地跑了48小时。今天晚上我们的两名搜寻人归来后报告说那匹骆驼现在肯定在距此300里之遥的北方，没人看见它吃草，它只是不停地跑，可见疯得很厉害。这种牲畜我多年前就见过，根本没有找回来的可能。在因心力衰竭而倒地死亡之前它不会停止奔跑。这类骆驼身上确有令人匪夷所思之处，它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越辽阔的草原，如幽灵般飘忽于沙漠之中。在漆黑的夜晚它迈着轻盈、迅捷的步伐通过游牧人的帐篷。骑手和游牧人看着它在草原上快速掠过，所有的人都知道怎样与之相处——没人想要抓住它们，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这种牲畜已走火入魔，不可能再为人类服务。它将永远消失在荒野之中，直至死亡。

这天晚上的清点安排在骆驼群中。沃尔兹、冯·考尔、穆伦温格、拉尔森和哈斯伦德已数了多遍，马仁和高姆博也同样数了一遍。11次点数的结果表明在我们的营地中有233匹骆驼。此外，8号营地还有10匹，两匹有人骑着进行侦察搜索，诺林和袁教授带着40匹，因此旅队现共有骆驼286匹。还有3匹失踪，其中一匹无望找回，但没有它们我们也能过得去。由于它们疯得厉害，摆脱它们也许是件好事。

为去善德庙而招募的10名汉人有4位今天晚上已到营地。他们虽然是农民，但知道如何与骆驼打交道。由于土匪横行，农民觉得种地已毫无意义，因此很乐意来工作，我很高兴我们能彼此帮忙。增添了10个新人手，骆驼就容易控制了。一个月之后，它们就会变得驯顺起来。

当然，10名汉人的到来也多了10张吃饭的嘴。诺林在归化城买了大量中国面粉，在善德庙还可以再买一些。前天的大灾难中我们损失了350块钱，要不是及时补救的话，损失还可能更大。

现在是晚上10点30分，天开始下雨了。外面一片漆黑，不时传来一两声骆驼的尖叫声，很快，听上去好像是众驼在一起叫唤，由于蒙古人也开始叫喊，我便以为一场新的革命又要爆发了，可这一次骆驼

们什么事也没有，一切很快又归于沉寂。外面放哨的人不会挨冻，昨晚的最低气温为17摄氏度，今天的最高温度已超过了30摄氏度。

雨点欢快地打在帐篷上，今天晚上我肯定会梦见不停奔跑的骆驼，不管是阴雨凄凄还是阳光灿烂，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它们不是被草原的魔鬼驱赶着就是被自己朝思暮想的未知仙境所吸引，片刻不停地向北方跑去。

7月25日营地的生活再次进入正常的轨道，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9号营地比8号营地略高，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瑙恩无线广播电台的时间信号格外清晰，音质大大好于以前。建立无线电台和竖起发射天线塔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霍德、冯·考尔、傣特曼和几个中国学生只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项工作。在旅队停留时间超过一天的地方我们总要将无线电台建立起来，如果一次走得距离很长，那么即使在只停留一晚上的地方也要将发射天线塔竖立起来，以便我们能随时知道时间和经度。

诺林的北方纵队已有好几天没有消息了，但我肯定他们正在不紧不慢地向西推进。而袁教授的南方纵队刚送来一封长信，内中报告说他发现了一座火山，现正在给其环状山坡作图，那个地方叫盖希克。

从北方纵队伯格曼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与其资料收集人陈的收获也不小。由于考古学家黄文弼在主纵队，所以我希望我们也能获得这样或那样的发现，虽然我们走得比其他两支纵队都要快。据推测，在更西方的通往嘎顺淖尔的整条路上将会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但在去哈密的路上这种遗址会越来越少，因为旅队在那里要通过一个宽达200公里并且布满沙丘的不毛之地。如果在石器时代那里的气候条件就和现在一样的话，那么就别指望有重大发现。但陆地内部的干燥是逐渐形成的，因而可能在几千年前戈壁还不像现在这样是沙漠。不论怎样，我们的考古学家们都会睁大眼睛。

然而，希普卡山口一切平静。胡莫博士时不时有几个病人，他们

大部分是蒙古人。拉尔森或哈斯伦德担任病人的翻译。拉尔森刚带着新来的4个赶驼人当中的一个前来看病，我听见他这样对胡莫说："这个人腹部有一个疖子，不要给他切得太深，我明天还需要他。"

今天的天气很怪。昨天的最高气温接近33摄氏度，晚上却只有11摄氏度。今天下午5点的温度只有16.7摄氏度，7点的温度只有15摄氏度，与此同时，北方吹来一阵中强度风，满天乌云飞渡，距地面只有80米。巴音博戈多和其他小山顿时云遮雾罩。天气变得十分冷，我们都穿上了皮袄——这才是7月底呀！看上去好像秋天已经开始，我们已逃过了酷热的夏天。如果有人觉得太热，我一般会说："再过几个月你就会希望这种热天回来了。"

今天晚上所有的骆驼都早早地被拴了起来，驮鞍已被置于这些不安分的动物的背上，我们把这当做最后一次上驮鞍。明天或后天拉尔森便要带着它们动身了，拉尔森提前出发去选择合适的宿营地。骆驼们还算平静，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变得听话的。我们现在雇了8个赶驼人骑着骆驼走在左右两侧，每队两名蒙古人，以便一发现骚乱的征兆便立刻出手制止，因此所有人都手持拐棍。"我们将要和骆驼战斗，"拉尔森说，"我们将要把它们驯服。"骆驼这种古老的运输工具必须用棍棒进行管教，它们如果太胖、太壮就会狂奔，如果太瘦则走不动。我们至少有150匹野性十足的骆驼，但是，正如前面所讲到的那样，我们总有一天要让它们懂得规矩。

有人认为旅队的行进速度太慢了，但我们并不着急。我们不是马拉松运动员，旅队走得越慢，考古学家们的机会就越多，我们获得的其他成果就越丰富。如果走得太快，旅队的成果就少，考古学家们就没有时间去挖掘。走得慢了得成果，走得快了得时间，不管怎么做，我们总有所得，但我们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赢得时间，而是为了花时间在亚洲的土地上进行考察，因此每一天都有收获。我们没有为自己的活动设立时间限制，因为整个大陆都在我们面前敞开了。

7月29日，拉尔森叫醒我并对我说："我们很快就要出发了。"我已告诉他要叫醒我，以便我能目睹他们开拔，因为这次出发很可能孕

育着灾难。天气很好，温度计显示的温度为零下3摄氏度。高地之间的峡谷雾气氤氲，牧草和土壤上晨露散发着湿气，但太阳升起以后云消雾散，湿气顿失。

骆驼已经身负重荷准备就绪——同样的骆驼，同样的箱子，都在一个星期前经历了一场灾难。拉尔森用10条绳索串起了150匹骆驼，跟在骆驼周围的是13名蒙古人、7名汉人、两名仆役，还有穆伦温格和里艾伯润兹，他们两个人等着拍摄下一次骆驼暴动的情景。

第一批骆驼开始向西进发，接下来的一批骆驼隔着一定的距离跟在后面，最后一批在清晨6点15分也动身了。刚走出营地还不到一公里的时候，有一队骆驼显得狂躁不安并且跑了起来，紧随在后的蒙古人骑着骆驼如箭般冲过去迫使它们停下，幸运的是其他骆驼尚未受到感染。危险很快被解除了，后面的队伍又缓慢地驮着黄色箱子向前移动了。

我放心地回到“写字桌前”给我的亲戚朋友写信，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收集邮件，下次也许要等到半年以后。如果在去嘎顺淖尔和哈密的路上遇上去归化城或包头的商队，那便可以托他们的领队代转。我们给包头和归化城的邮政局长分别留了20和30块钱，要求他们每次支付给帮我带信的人五块钱作报酬，并负责给我们买邮票。但也许根本就碰不上商队，这完全靠运气。不管怎样，今天是最后一次发信的机会。要送走的信件装成了一个标准的邮包，胡莫将其带到8号营地。齐默曼、玛斯考尔、刘、小羚羊以及那只鹰都还像以前那样待在那里。

然而，正当胡莫准备策骑而行的当儿，玛斯考尔来见我们，他一边喝茶一边报告说，8号营地一切正常，回去时他带走了本该由胡莫送去的最后一批信件。由于他是步行，我们很久仍能看见他在草原上的高大身影。随着他的离去，我们与文明世界的最后一线联系就割断了，除了瑙恩无线广播电台的时间信号外我们什么也收不到了。

晚上拉尔森派人送来了一条令人满意的消息，他的两个蒙古人骑着骆驼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赫定，我们现在距你的营

地有25公里。旅途很顺利。里艾伯润兹无事可干，想早点动身，这样以后就会有更多的时间。这里雨很多，令人愉快。祝一切顺利。”

谢天谢地！总算一切顺利，我们应该再也不会被桀骜不驯的骆驼耽搁在半道上了。因此，应该尽量高兴地起来才是。

第九章　在13号营地的战争会议

次日早晨，即7月30日，明在5点15分将我叫醒，并很快做好了准备。天气很暖和不需穿任何外衣，但为了保险，我还是穿了两件皮马甲。天空显得很阴郁，黑云低垂，疾风劲吹。使一切各就各位费了好大工夫，将近早晨10点时第一部分人马才出发，其他部分按照固定的距离依次跟在后面，最后动身的是我和门托。和平常一样，我把自己舒服地安置在硕大的母骆驼背上，这只母驼被命名为“山茶花夫人”。

“山茶花夫人”的步幅要比我以前骑过的骆驼大得多。我昨天试着骑了7次，发现它走完150米长的基线平均要走150步，其步幅的长度为一米。它走完150米距离的平均用时为2分零55秒。由于旅行没有受到干扰，行进的速度很统一。我的坐骑每小时前进4695米，全天所走的距离为24.6公里。

正如这些地区的一般状况一样，旅行路线经过的地区是极缓的波状地带，在高处视野开阔的地方人们才会注意这种波动，当然，如果不是云块低悬、大雾浓重的话，人们还会看到地形在向很远的前方波动的状态。

当天一动身旅队就经过了一道极为平坦的谷地。谷地底部很平，草木新发，尚显低矮。这时的地面上横贯着规则的裂缝，是倾盆大雨汇成的水流在干涸后留下的痕迹。

9点钟时第一滴雨落了下来，很快，美丽的雨帘就持续不断地流泻下来，远处无尽的旷野顿时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身上挂了一张蒙古遮雨布，确切地说是门托驮鞍上的一块口袋布，以免我的皮马甲、白马裤、护腿和系着带子的鞋被淋湿。然而，渐渐地，一切都湿透了。

一个小时之后，所有的小路都如蜿蜒曲折的银带子似的闪闪发亮，不时有小溪和水潭溅起水花。地面吸饱了水，骆驼过处，泥浆飞溅，噼啪作响，有黄黏土的地方表面上看还挺结实，但踩上去却是稀泥满地，非常黏滑，骆驼走在上面左摇右摆，我时刻做着被摔到泥中的准备。许多地方的黏土中混杂着沙子和砾石，在这样的地方骆驼便能稳步前进。前方有一条布满车辙的道路，车辙中满是雨水。

跨过了一条涨满黑黄色雨水的溪流后，旅队踏上了一条大路向西南方向进发。雨还是淅淅沥沥地下着，到处噼啪作响，水从所有东西上流泻而下，我自己则亲身感受到了水是如何渗透衣服令肌肤冰凉透骨的，利用平时的地图卷是不可能了，我把笔记和路线图记入一个已湿透的笔记本中。在我的罗盘针的玻璃盘上雨水啪啪奏响了一阵音乐。水从四面八方流入我安坐的碗状“鸟巢”之中，在我看来已经够湿了，但水还是不断地溅起来，使我的臀部一直在进行着盆浴。水温吞吞的——是我自己的体温暖热了它。当我叠起左腿展开右腿时，水浪就从两腿之间飞溅起来，哗哗地如从一条漏船上流出来。要是有一个瓢就好了。“山茶花夫人”每走一步，水都要前后溅起一次。当然，我并不担心被淹死，因为在我的“浴盆”的边沿一股水一直流向挂在骆驼脖子上的羊皮，并沿着羊皮的褶皱流向地面。这样，瓢还成了多余。我拿出手帕浸入水中，然后，举到“浴盆”外将其拧干，就这样直到将里面的水吸干为止。真的，自长大以来，我的身体的下半部还没有这么痛快地在水中浸泡过。

前面的一条谷地里出现了无数的深水潭。虽然很潮湿，但黑色的大块头甲虫随处可见，它们似乎喜欢下雨。它们成群出动，黑色的翅膀如同漂亮的黑色雨衣，雨水一落其上就滑落在地。胡莫博士观察一对正在做爱的甲虫“夫妇”，他找了一只未交配的小雄甲虫去干扰它们，正在兴头上的雄甲虫勃然大怒，向来犯者展开了猛然的进攻。我们可以清晰地听见双方的骨头和颌骨被咬得嘎巴作响。

中午11点30分时雨变小了，我给门托和我各点了一支香烟，但还未等我们抽完烟，雨又变大了，香烟也被雨浇灭了，我的“浴盆”中又灌满了水。站在一个缓坡的顶部，我可以看到巴格哈诺尔像一块玻璃

隔板似的在西南方闪闪发亮，巴格哈诺尔的意思是“小湖”。而在西北方则是达吉恩—苏莫寺。接着，旅队向下进入一处低地，里面牧草丰美，春意正浓，一群马正在吃草。行至平坦处，水潭满眼闪闪发光，感觉好像进入了一片沼泽地，骆驼脚滑，站立不稳，骑在上面的人费好大劲才能保持平衡。门托的骆驼看到一具横在路上的骆驼骨架子慌忙闪躲，看来曾有“沙漠之舟”在此“搁浅”。

在路的右方可以看到蒙古人的畜群和蒙古包。我们多次惊飞野鸭，但没有看到别的猎物。

中午12点30分时大雨倾盆而下，任何躲避的努力都是徒劳，我浑身已湿得不能再湿了。至于我的笔记本，后来我费了好大劲才把粘在一起的各页分开，一些记录和直线已无法辨识。

终于抵达10号营地的大门，拉尔森、穆伦温格、里艾伯润兹的帐篷出现在眼前。旅队领导拉尔森穿着蓝色长外套，仪态威严，像一位19世纪中叶的治安监察官似的看着我，他面带笑容地调侃我是不是被雨淋透了，我说：“噢，不，没有那么厉害，但是看看‘山茶花夫人’跪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举起双腿，水就如瀑布般从骆驼的脖子上流了下去。拉尔森笑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但他还是和门托把我的东西搬到自己的帐篷中，而我则从头到脚换了一身新行头，然后是喝茶和吃早饭。外面雨还在继续下着，打得帐篷各处啪啪作响，只是比以前翻江倒海似的阵势稍微小了一点。

旅队的所有家什都湿透了，需要一天时间晒干它们。而且，7月31日又是个星期天，太阳暖暖地照着，风也不小，在帐篷和帐篷之间扯着绳子，上面挂着裤子、衬衣、内衣以及床上用品。

拉尔森在星期六已经告诉我说在距营地大约一公里的山脚下有几个坟墓，黄文弼和徐教授很感兴趣，当即带着胡莫和几个德国人就去了。晚上我正躺着读书时徐教授进来了，他问我是否同意让黄文弼留在这儿开挖一个坟墓。我当然同意，他能找到点什么的话我当然高兴了。然而，干这件事需要几天时间——起码3天。他会在这儿待那么久吗？是的，他当然会。他只要循着我们的足迹，就很可能与齐莫

曼、玛斯考尔和刘会合，他们是在8月1日从8号营地出发的。

然而，附近的蒙古人星期天来到我们的帐篷，抱怨说我们的汉人扰乱了他们的坟墓的安宁。我不知道他们几个会不会因此而中断工作。大约有12个坟墓被用石头区别开来，石头形成四边，长约3米，在四边之内也摆放着石头。如果这些坟墓和科斯洛夫在乌尔加发掘的坟墓一样的话，那么3天也够了，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因为这件事延误行期。

晚饭之后我与胡莫一道去墓地察看，最大的一座坟墓有8米长和5米宽，另外一个为6米长4米宽。在前一个坟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外屋的石头，直径大约有一米。黄文弼告诉我，他在这儿发现了5座坟墓，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现了10座。我们前去观看，发现有一排垂直的石板，大约有22块，彼此之间的距离有几米远。这是不是某个首领的坟墓呢？此地距营地有25分钟的路程，晚上返回时灯光照得明亮。胡莫一路上抓到了15种新的蚱蜢。

今天是8月1日，我们将钟表向后拨了一个小时。

等拉尔森在里艾伯润兹、穆伦温格、蒙古人和汉人的陪同下带着150匹造反的骆驼出发时，时间是清晨5时15分。那些牲畜显得相当温顺平和，缓缓地向西南方向移动。这是一个不错的日子——天空碧蓝，万里无云，一丝风也没有，晶莹的露珠挂在草尖。

赫姆波尔和胡莫又开始划定基线了，长度还是150米。我的骆驼今天用154步走完了这段距离，用时两分钟。

我和门托于清晨6点30分上路，其他人也整装待发。霍德正在放飞87号气球，其高度几乎达到9000米。最后，他们带着氢气筒也出发了。

旅队沿着漫长的旅行路线慢慢地接近了一处小山脉，在这里我们离开了那些古墓，它们又一次陷入了无尽的静默之中。中国人昨天满足了蒙古人的愿望，没有动那些坟墓。蒙古人坚持说，由于诺林的纵

队从山上的敖包取走了一块石头，结果造成一人病倒和三只羊死亡。这也许是真的，但诺林并没有拿走敖包的石头。

地面慢慢向着山脊的方向升高，石头也越来越多，在山的链条中，山口如一扇门大开，人们不可能从山口上走过去。景色虽然单调，但也有壮观的和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望不到头的荒原，平缓的丘陵，使在其上行进的旅队犹如大海中的一滴水般微不足道，大家不停地走，但乡野依旧，单调如初。

早晨10点钟时穆伦温格飞马赶来，我忙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有一串10匹骆驼又骚乱了，有的已经扔掉了行李，拉尔森要几个蒙古人去帮忙。穆伦温格转回营地，门托和我继续向西行进。

20多分钟之后，哈斯伦德带着两个蒙古人骑着尖叫的骆驼飞奔而来——他们要去帮助拉尔森，他对我说："拉尔森遇到了麻烦。"他已经给后面的所有分队下了命令，强迫所有的牲畜躺倒在地，紧紧拴住，这样逃跑的骆驼跑过来时它们就不会跟着乱跑。又有两个蒙古人骑着骆驼和马飞驰而过，那情景真像消防队冲过街道去灭火。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所有的骆驼都跑了吗？我们是不是又要停下来？如7月22日那样在整个地区进行搜索呢？

旅队现在处在山区，不时有孤立的小山出现在眼前。左面一个牧人赶着一小群羊在放牧。我们急切地向前走，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根据报告，发生骚乱的地点应距我们3公里，但3公里之后什么也没有，我极为担忧，只等着看到甩掉行李狂奔的骆驼，但一切都平静如常，在两座小山之间的一块平地上还有35匹骆驼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青草。

现在终于看到了拉尔森的最后一个分队，我们移动的速度比它快得多，两者慢慢靠近，在我的后面很远处是骆驼队。骆驼们不停地嘶鸣，傍晚8点时一个蒙古人又飞奔而过。天气也变热了，太阳烤得后背生疼，我不得不脱掉皮马甲。

接着前去帮助拉尔森的一个蒙古人回来了，他牵着自己的骆驼徒

步行走。我们向他打探消息，得知一切都已平静，拉尔森正在继续前进，太棒了！终于可以放心了，不会再耽误时间和丢失骆驼了。

傍晚8点30分时我们接近了拉尔森的后队，当两者相距还有数十米时，传来了狂野的驼叫。我们稍作停留，思忖着要不要下去抓住那帮正在跑过来的牲畜，以免自己的坐骑被影响也将我们扔下来。然而，逃跑者很快就被两个骑者制伏了。大家继续前进，路上到处都散落着桌子、凳子、椅子和驮鞍的盖子。哈斯伦德告诉我说有4匹骆驼受惊了，它们驮着桌子和椅子，这些家什的响声吓着了它们，并使邻近的3匹骆驼也受到了感染。25分钟后才给这些动物再次装上行李。

不大一会儿，拉尔森的下一个纵队在很远的地方出现了。道路由三四条并行的小路组成，但行人很少，两边小山上刚刚萌发出绿色。然而，到处都可见到骆驼的骨架和头骨，经过风雪雨露的侵蚀，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解体了。我们的坐骑好像嗅到了亡魂的气息，加快脚步绕弯走了过去。生与死是永恒的轮回，活着的骆驼也许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因为它们总有一天也会驮不动人类的沉重的行李。

旅队的一名仆人牵着坐骑来见我们，由于不再需要，他被打发走了。四周到处都可以看到多石的山脉延伸开去。

右方出现了一座布满石头的不规则山脉。地面上长满了矮厚的艾属植物，窄小的草叶子一片又一片地从艾丛中探出头来。旅行队在极为平缓的丘陵之间穿行，这些丘陵一般比它们之间的草原高约10米。

终于看到了行人！两个贫穷的汉族农民赶着骆驼，驮着他们的家当走了过来。我们再次跨过了一个小土门槛，西面和西南面的风光一览无余地呈现在面前。四面的小山都消失了，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床，门托说那儿有水。晚上9时40分时旅队跨过了一条深数米宽10米左右的干沟，这可能就是刚才提到的那条河道的延续。在干沟的边沿草长得非常茂盛。

20分钟后又碰到了一条沟渠，沟渠中的水流向南方，因此这道渠该不是前一道的延伸了。在其右岸，堆放着尚未烧制的黏土和一顶蒙

古包。拉尔森及其人马在稍前方的斜坡上停住了，牲畜的驮载正在被卸下来。和平常一样，这位旅队首领过来请我到他的帐篷中喝茶，甚至还拿出巧克力，他告诉我说有20匹骆驼打算逃走，但幸亏被他制止了。只有两匹扔掉行李跑开了，但一匹被骑着马的蒙古人抓住了，另一匹被碰巧坐在路边观望的路人拦住了。

各队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我的帐篷也竖了起来，两小时后霍德和仪器箱也到达了，接着到来的是沃尔兹、冯·考尔、两名中国学生和氢气筒。骆驼必须在它们的行李旁待3个小时，如果它们径直去吃草，后背就会受到鞭打。当然，一下子还不能使它们平静下来，直到把其体内蓄积的野性全部驱除为止。

11号营地坐落在洪嫩查干—朝喇水道旁，更确切地说叫洪嫩—查干—朝罗—古尔，它的意思是“绵羊的白石头”。它流向南去，汇入莫仁—古尔，也叫哈屯—古尔，意思是“公主之河”，也就是黄河。

这里有一个收费站，东西来往的每匹骆驼都要交税。仅仅因为收税的缘故，5名汉人就生活在这里，几个游牧民也住在附近。

旅队现在所处的地区的西面据说一直延伸到善德庙。当地的一位蒙古人声称：“如果你们走得比今天慢的话，那么一月之后才能到达善德庙。”然而，即使我们今天没有走完16.2公里，他的说法也是夸大其词。

这个地方冬天降雪不多，但今年的雪却大大多于往年，降雪时间超过了一般年份的两倍。我们得知最热的时候已经过去。大部分旅队都在冬季旅行。更西面有土匪出没，但现在似乎还算平静。这里狼并不多见，但往北可能就不一样了。羚羊偶尔也会光顾，但没有黄羊和野驴。

现在是下午4点钟，空气中一丝风都没有，挂在矛竿上的旗子无力地下垂着，这种情况在白天是极少见的。

胡莫博士发现，那些喜欢在雨天交配的大黑甲虫今天却尸横遍

地，有一些虽然尚有一点气息，但也都仰面朝天躺着等死。死的无一例外都是雄甲虫，而雌甲虫则可能已钻进土里生育下一代去了。雄甲虫的命运真让人同情，它们为什么不愿做单身汉呢？或者，也许有这样的甲虫，它们不愿意为了爱的缘故而在下个雨季前赴死。

下午，诺林的一位蒙古人送来了一封他于昨天在营地写给我的信：

我们现在处在距布赫尤特—苏莫寺以西大约25公里的山脚下，打算在此等待大队伍——如果等的不是太久的话。最近我们经常问自己您那儿是否发生了什么情况？自从7月26日以来我们就一直想念您。几天前我们派了一个蒙古人沿路去刘大口，但没有打探到你们的消息。

我们现在几乎已经弹尽粮绝，食糖和黄油已断了好几天了。您最好在两天内赶到这里，我们将非常感激。如果我们的蒙古人归来时能带来下列物品：一罐食糖、两罐黄油、一壶柑橘酱和一瓶燕麦——如果两天之内还不能到达这里，那就恳请多送一些食物。两匹骆驼身上长满疥疮，恐怕其他骆驼也会感染。如果我们的蒙古人能带一些药回来最好，索得鲍姆说硫黄和焦油有用，但拉尔森肯定知道什么最好。我们盼望很快能再次见到您。我们的营地在北面大约6公里的路边上就能看得见。衷心的问候。

您的忠实的诺林、伯格曼和索得鲍姆。

徐教授告诉我，汉人定居者必须在绥远向蒙古首领交20块钱，但在这一地区则只需交一块钱。由于灌溉条件很差，今年的大旱已使饥馑蔓延开来。在包头和五原之间的黄河岸边情况则不同，那儿可以提供充足的灌溉用水，那里水草非常丰美，牛吃草时几乎都看不见身形。在我们所在的这一地区玉米的价格比两月前上涨了两倍。

8月3日拉尔森叫醒我时强调说，必须派一个蒙古人去袁教授那里。于是我给袁教授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打算逐渐提高行进速度，并希望能尽快见到他及其纵队。

在这一地区的西南方向住着几位汉人垦殖者，他们种植黑麦、豆子等其他农作物。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在这儿待一段时间，回去时带着毛皮等货物。因为无法灌溉，他们几乎是靠天吃饭。我们营地旁的溪沟今年没有洪水，但去年大雨之后洪水漫过三次。汉人农民们毅力非凡，他们与反复无常的气候的战争几乎没有胜算的希望，但还是会不知疲倦地奋斗下去，直到最后胜利。

8月3日旅队继续西行。一路上一片死寂，人踪杳无，以至于出现了骑骆驼的蒙古人和两个骑马扛枪的汉人士兵时大家竟非常惊讶。我们互相打着招呼，问一些平常的问题。更有意思的是跨越一道4米深的浸蚀水沟时，在其拐弯处发现一潭水，而顺着沟旁则坐落着一个叫大西头的汉人居民点，蒙古人称之为布屯—奇—洛。两个汉人正在这里修建一所泥巴房子。

这里的地面布满无数的沟渠，虽然只有几米深，但到处都是直立的沟墙。它们在北面会合成了一个大的沟壑。在一个沟壑旁两个汉人正在开垦土地。旅行路线现在沿着沟壑的边沿向前伸展，在北面相邻的则是一系列突出的山脉。沟渠的河床中到处是杂草，显然河床已很久没有流过水了。

在一条谷地里，一小队汉人商队正在休息。他们的帐篷周围摆放着成捆的驼毛、草垫和绳子。继续前行，我们超过了霍德和傣特曼。此刻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感人的一幕——驮着仪器箱子的骆驼乖巧得如羊羔一般。大家跨过沟壑，其底部有几潭水，水边的草长得异常茂盛。沿着沟床行进时，旅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跨过来跨过去。有时候沟床是干的，有时候分布着几潭水。越往前走便越清楚地看到，这条沟壑变成了夹在两山之间的谷地，就如强烈的风蚀作用形成的峭壁一样。

天气的确很热，但我一点也不在意。中午1点钟时荫凉处的温度是27.9摄氏度。一群羊正在谷地吃草，一个牧羊人带着5条汪汪乱叫的大黄狗看守着羊群，半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一个小的汉人定居点——一个用泥墙围起来的独立农舍。里面的居民很友好地回答了我们的问

题。

我们沿着这条谷地的底部走了一个多小时，在黑乎乎的陡峭石壁之间蜿蜒行进，最后在一个转弯处走上了谷地的右岸，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宿营“火炉”，有的由石块砌成，有的则是挖个坑了事。显然这里被旅行队和商人经常用做休息的地方，那些西去的旅客离开这里后在很长的时间里再也见不到水了，而东去的旅客在经过长期的沙漠之行后终于可以在此一解干渴了。

继续往西，山脉渐渐淡去，代之而来的又是开阔的、一望无际的低矮丘陵荒原。地面很硬，长满了艾草。快下午5点时下起了雨，同时也刮起了强劲的西北风。胡莫急忙前来把他的雨衣给了我，他自己则身披着一件皮马甲，我必须服从这位医生的命令。大家停下来等着，过了一会儿蒙古人马特出现了，他在与牧羊人的交谈中得知附近有一处泉水。我们向西和西南骑行了一个小时后找到了它，马特和门托冒着瓢泼大雨和电闪雷鸣为我支起了帐篷。

我们已经走过了40.6公里。各队在暮色中依次抵达。很快黑夜就笼罩了四周，远处还能听见喊叫声——这是最后一支纵队在赶上来的声音，一些人赶上去把他们接入营地，只有拉尔森和他的大队人马仍不见踪影。后来得知他已在东面的一条沟中停了下来。我们也在徒劳地四处寻找胡莫博士。由于相信大队人马可能在诺林提到的那个布赫尤特—苏莫寺庙附近宿营，他已经向那里赶去了。直至深夜他才追上我们与大家共用晚餐，享用了玉米牛排、绿豆、面包和黄油等美味。那个寺里没有人住，下大雨时他在一只白猫的陪伴下在寺院的走廊里睡了好久。

昨天40公里的长途行军使我的背部有点僵硬，8月4日清晨7点起床后我们开始了真正重要的一天。今天的营地号是12号，这是我的吉祥数字。没人知道将在哪里宿营，只知道从现在起再也看不到汉族农民定居者了，前面要到达的地区只有蒙古游牧人。因此，旅队随时都可以找到水，只要愿意，也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宿营。

拉尔森带着狂野的骆驼和巨大的行李在我们以东30里处度过了一

夜，将近10点时才赶到12号营地。所有人都又饿又渴，早饭吃得很香，而骆驼们则身驮行李等在一边。拉尔森和他的人不肯走，觉得我昨天临时决定走这么长的路同时又不告知他们有点残酷，但甚至连我自己都一点没有料到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营地喝饱水以后，他们便忘记了自己不得不在早上空着肚子上路的情形，只是笑着说自己运气不好。我也安慰他们，说我自己也有整整7天没有喝水的经历，而且受一点苦对身体有好处，何况，他们很有可能会经历更加艰难的日子。

他们接着便继续前进了。我穿上衣服开始用早餐。早餐有燕麦粒、鸡蛋和茶。赫姆波尔和那个叫隋的学生如往常一样为我划出基线，门托和明将我的帐篷拆掉包装好放到“山茶花夫人”的背上，最后我爬进了自己高高的座位中去。旅队离开了12号营地。在4公里之遥的东北方向，胡莫博士和白猫曾待过的那个布赫尤特—苏莫寺院隐然可见。

旅行路线由17条平行的小道组成，各道之间是低矮、狭窄的绿色草地。一整天的路都很好，非常适合走汽车。为了最终能够进行一次汽车旅行，我总要记下沿路的地形特点。我们继续沿着可以很方便地行汽车的道路向西北行进。从张家口直至这里的整个地区都适合开汽车，直到现在我们还未发现任何障碍。

西方展现出一望无际的景色。好像突然来到了大平原上，人们的眼睛可以毫无遮拦地极目远眺，终于感受到了巨大的亚细亚及其无边的旷野。只有在西南方向蓝天消退的远处可以看到一处较高的地形。原野虽然单调，但人们不会厌倦，它总是那样的美丽。坐在高高的骆驼身上，放眼四顾远近风光，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中午1点30分时我越过了一条宽280米的沟壑，其底部有几个潮湿的凹地，在大草原的右边有一些马在悠然吃草，在更前方的山脚下是3座蒙古包兀然而起。大地非常平坦，四面八方没有一点起伏。

一大群羊的出现表明我们已进入了游牧人的地界。一条宽15米的沟渠昨天还涨满雨水，其底部的黏土泥还闪着潮湿的亮光。沟壑右边的浸蚀台地有4米高，整个地面的高度非常缓慢地从山脚处下降。昨

天的大雨使这里经历了一场洗礼，在路上形成了无数带有泻湖的三角地。地面到现在还是湿的，雨肯定非常大。

在山脚下我又看到了两顶蒙古包，中午3点时诺林营地的4顶帐篷出现在前方。旅队于是向那里开去，索得鲍姆急匆匆地前来迎接，请我前去与他们一起喝茶。拉尔森、胡莫、穆伦温格和里艾伯润兹也已经到了那儿，我很愿意去小坐一会儿。黑德、伯格曼和玛森巴希对我表示热情欢迎，请我在诺林的营地上就座。他们已经把诺林一路上带着的桌子铺好，在我面前摆上了咖啡、茶、柑橘浆、面包和牛奶。我们一边抽烟一边聊天，说着彼此的经历和工作。的确，自从7月1日以来大家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3个瑞典人在帐篷前挥舞着瑞典国旗，在黑德和玛森巴希的帐篷前飘扬着德国国旗。第三个帐篷中居住着丁和陈，第四顶帐篷是其他人的居所。

不巧的是诺林没有在。我们在一起坐了一个半小时，大家估计诺林的纵队应在次日早晨超过我们。拉尔森的人马已经过去了，我问他打算在什么地方宿营，他说在溪水边上。但现在距那儿还有多远呢？最远大概有10里。拉尔森已经离开了一个小时，为的是赶上他的队伍和他们一起在营地搭帐篷。我仍然待在原地聊天——这里实在是太舒服了。但也不得不向他们道别并邀请他们共用晚餐。这里距13号营地也只有一箭之距，他们可以在晚上返回，并在第二天带上口袋和行李赶上我们。

我骑着骆驼继续前进，身边只有门托一人，在右手谷地的开阔处出现了一个小寺庙。这里的土地上面还留有洪水的痕迹，草原有时像沼泽地，到处都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水潭。对骆驼的坚硬的蹄子来说，这种地方显得太软和湿滑。右边一直延伸着低矮的山丘，山上的雨水都注入了如碗般的低地中。这些小山之间的高地已经变干，但却有裂缝。旅队的左手则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然而，在西南方的远处的地形似乎显得较高。走过大路右边一个平缓的小山脊时，我们看到山脚下排列着3顶蒙古包，在左面的平地的一个地方有两顶蒙古包，而另

外一个地方则有4顶，10里以外还有一个小寺庙。

太阳泛着红光下沉，傍晚7点30分时旅队终于到达一个宽阔的浸蚀沟，它似乎从很远的地方延伸而来，有两条溪流蜿蜒穿过。旅队的骆驼手毫不在意地让骆驼卧倒卸载，我叫他们再往前走一点，在右岸高出河床大约10米的山坡上停留。那儿有两顶蒙古包、一顶帐篷，很可能有行商住在里面。

太阳已经落山，暮色很快笼罩过来。门托已在一个小山顶上给我搭建了帐篷，从这里向下可以俯瞰溪流潺潺的河道，向东则可以看到我们来的方向。

傣特曼和霍德到达时天已黑了。远处传来一阵一阵的喊声，那是沃尔兹和冯·考尔的队伍。突然草原上传来了一片嘶喊声，几个人同时喊叫，这样做是有用的，因为这种具有穿透力的号叫似乎能使骆驼平静下来——显然又发生了一场骆驼骚动。人们可以听到箱子落在地上的响声。但喊声很快就弱了下去，变成了熟悉的吆喝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拉尔森派了几个蒙古人下去为新来者引路，喊声越来越近，最后穿过了河道。第一队爬上了坡，第二队紧随在后。它们都是驮载给养箱和其他家什的骆驼，很快，所有的骆驼都上来了，它们卧倒后被卸去驮载开始休息。于是，一切又平静下来了。

这样我的纵队的各个部分都集中到了13号营地。但探险队仍然分散在各处，我们不知道齐莫曼、玛斯考尔为什么没有送来他们的消息。袁教授也远远落在后面，但他有一个月的给养和资金。诺林在自己的营地中。而在10里之外的东面，哈斯伦德一向平和的骆驼队也发生了骚乱，我们不知道那儿现在是什么样子。在13号营地一切都进行了重新组织，因此我们晚上决定一直在这里待到次日。

说到这次前往迪化的长途旅行，奇怪的事情是，骆驼决定了我们的行动和前进方向，而不是我和拉尔森，而且骆驼具有完全的决定权。当它们想休息的时候，它们就扔掉行李跑掉，然后它们肯定知道第二天就无事可做了。但对我们来说，被动物们以这种随意的方式摆布真是一件既可怕又不舒服的事情，我习惯骑着骆驼前进。前后都有

队伍，但却不知道他们的情况，那些撒野的骆驼最先跑开。它们既是我们的帮手——帮我们驮着行李向西走，但也是一群四条腿的造反者，随时都会给我们造成新的损失和延误。

由于上述原因，在当时很难确定行进的速度。我们必须首先在行李的帮助下将骆驼制伏，直到它们安安静静、行为得体，这样才算完全控制了它们。

当时只有我们纵队在13号营地，不过那却是旅队的主力部分，拉尔森负责给养，霍德负责仪器，大部分中国人和蒙古人负责其他事情。旅队有的部分在暮色苍茫中来到，其他则在天黑后才到达，帐篷在四处乱糟糟地搭起来了。给养箱子构成的墙壁就近在眼前，因为周围的小山限制了空间的扩大，帐篷俱乐部无处可建。旅队的饭食犹如野餐，我们在用鞍柱和驮鞍盖布搭成的房子中用早餐，午饭和晚饭则在厨房附近的箱子上吃——我们有羊肉、甘蓝、褐豆和萝卜。

白天很热，阴凉处的温度为33摄氏度，晚上最低温度是16摄氏度。

我给诺林发了一封信，命令他们把营地和所有人马都转到13号营地，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却不见他们的踪影。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寻找逃走的骆驼。快到晚上时，我又派出第二个信使，去告诉诺林如果他正在前往13号营地的路上，就不要在晚上路过满是灌木的草原，因为在这个不熟悉的地方骆驼可能会迷失方向。

晚上1点时我已睡了几个小时，此时我听到诺林问拉尔森谁的帐篷与我的帐篷挨在一起，还问我是不是已经睡了。“还没有呢。”我回答，“快进来吧。”他们两个进来跟我聊了两个小时，诺林告诉我，他们四处徒步寻找丢失的骆驼，直到下午6点钟才返回，但一接到命令，他们就立即收拾行装，于暮色渐浓的8点出发了。接着，他们在路上收到了我的第二封信，于是就在灌木草原的边缘宿营，与此同时，诺林则在漆黑的夜色中继续徒步向我们的方向走来。

他对耗去了他及其手下一个多月而完成的任务颇为热情。我认为

他需要休息，但他非要向我报告一番——黑德的三角勘察真棒，玛森巴希多么认真地描绘他的水道的地图，伯格曼如何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石器时代遗址，丁多么耐心地观测岩石，还有他自己，看着一页一页翻过的地图是多么喜悦。最后我打发他们去睡觉，诺林暂时栖身于拉尔森的帐篷。

清晨我第二次醒来，而这次则是被嘶叫的骆驼、帐篷杆的声响和急切的讲话声吵醒的。诺林的纵队已经来了，我赶紧穿好了衣服。

整整一天都被一系列重要的会议占满了，第一次会议在诺林的大帐篷中举行，他与伯格曼和索得鲍姆一起住。即便对我这样一个绘图老手来说，看到黑德的3张巨幅精妙三角系统图也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他把在那个地区所能发现的任何一个敖包都用作固定点，并利用经纬仪在可以俯瞰周围的山峰和高地上形成了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的观测点。在没有敖包的地方经常竖起两米高的石堆。这些点之间的角度被量了一遍又一遍。整个地图构成了一个绵密的三角形网络，需要做的只是将两个点用天文学方法连接起来，从而使之可能以正确的角度进入经纬系统。从黑德的三角系统中，诺林能够随时随地为他自己的详图和玛森巴希的测量得到新基线。

我们在诺林的大帐篷中坐了几个小时。在这里，三个瑞典人的床和帐篷柱之间的一张桌子充当了会议桌。地图在桌子上被一幅一幅地铺开，大家围着桌子坐在颜色鲜亮的毯子上，讨论着、比较着、同时还用罗盘针测量着。我展示了3张13号营地的地图。霍德和傣特曼报告了天文固定点的情况。诺林图上的区分线和地理着色做得十分精湛。他解释了整个地区的地形，这个题目我在后面还要讲到。最后，玛森巴希展示了谷地小道和浸蚀沟渠的制图测量。他们都急切地等待展开下一步工作，每个负有科学任务的成员都以兴奋和迫切的心情准备投入新的工作。大家正是这样，我从不用向他们做任何提醒，相反有时候真想拖拖时间，让他们休息一下，在这方面我特别担心诺林，几乎可以说，他除了工作外什么也不喜欢，而且拒绝进行足够的休息。

晚上，有消息说齐莫曼和玛斯考尔正在我们以东15里处扎营。信使带去了指示，命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13号营地。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显然有一处比较小的汉代遗址，也许是军用路线上的一处堡垒或站点。这里还有大量的陶片和瓦当，黄文弼还发掘出一个类似祭台的小平台，平台周围是几百块角度弯曲的砖头，还找到了一枚铜钱。中国人对这些发现很感兴趣并在几个地方同时展开了挖掘。

最后，我命令拉尔森在次日早上带上他的队伍和骚动不安的骆驼上路。晚上拉尔森派信使来报，说他已走了40里，一切平安无事，他打算继续向善德庙方向前进。

中午两点时齐莫曼和玛斯考尔带着他们12匹骆驼的旅队赶了上来，他们和学生刘的情况都非常好，一个个帽子上还插着树枝。他们访问了诺林地图上标出的附近的寺庙。那只小羚羊一直坐在一个铺着垫子的管子里随他们旅行，它也是活蹦乱跳，在来到13号营地的长途行军中，一点都没有受伤。

一小时后袁教授独自一人骑着骆驼来了，我和他与徐教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他对自己的工作成果非常满意，向诺林、黑德和我展示了他绘制的漂亮地图，这些高水平的地图完全可以与诺林和玛森巴希的地图相互参照，然后通过黑德的三角形系统予以确定。大家坐了好久，谈论着制图问题。

过了一会儿，我们再次与袁教授就他去嘎顺淖尔的希望和计划进行了讨论，我为旅队在那个“盐湖”停留时的任务作了一个计划，其中包括：

1.绘制带有古海岸和一般形状的嘎顺淖尔和苏泊淖尔地图。

2.在周围进行考古调查。

3.进入嘎顺淖尔以西的沙漠进行探险——根据早期汉朝历史记载，那里肯定有一座比楼兰还早六百年的古城。

4.对额济纳河支流三角地及其下游进行制图考察。

5.进行考古调查。

6.是否去“黑城”卡拉—霍托则视情况而定。

“黑城”是1909年被科斯洛夫发现的，在那里我们将不进行挖掘，因为据我所知，科斯洛夫还打算去那里，他自然有进行发掘的优先权。而且，我更喜欢全新的任务，科斯洛夫和斯坦因都没有关注那里的河流和湖泊的史前考古，这一任务的吸引力是新鲜的，值得我们的考古学家去完成。

诺林希望得到1号任务，袁教授没有特别的要求，只是说愿意做分配给他的任何事情。作为一个历史考古学家，黄文弼首先要第3号任务，我们同意到达目的地后就在伯格曼和袁教授之间进行适当的分工。

直到夜黑时我们还在进行各种讨论，徐教授一直和我坐到晚上11点，接着来了霍德博士，一直待到夜里12点30分，之后，我又在胡莫的帐篷中与诺林一直坐到1点30分。这个晚上我睡得不多，因为明天早上我们纵队就要向西进发了。

从13号营地开始我们分开了相当长的时间，诺林、黑德、伯格曼、玛森巴希和丁要继续他们的工作，行进速度慢得多。袁教授要加快他的工作进程争取在7周、至多在9周内到达嘎顺淖尔。根据黄文弼本人的意见，他们还要在此停留三四天，以便继续实施挖掘，其余的人将和我一道登上西去的征程。

第十章　善德庙之旅

由于晚上的长谈，我们直到8月9日早上8点才动身。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帐篷中，旅队为诺林纵队和袁教授的南方纵队都留了3个星期的给养。黄文弼得到了10天的给养。诺林有29匹骆驼，袁教授有17匹，黄有5匹，我自己有67匹，其余的都在拉尔森那里。

旅队在起伏平缓的大草原上快速前进，两条低矮的山脊夹在左右两边。在草原的中间，赫然出现了两条泻水沟，而且沟壁很快就变得陡直。北方的小寺庙和几个蒙古包与我们渐行渐远，不时出现一群正在放牧的牲口。在旅队前进的西方，低矮的丘陵在远方与蓝天融为一体，大路不远处一个老人正在坐着纺线。路的右面一座孤山兀然而立，其状如棺，顶上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敖包。

这里的野韭菜长得很茂盛，整个地方都散发着这种野菜的味道，雨后尤其如此，骆驼很喜欢吃这些东西，但吃过之后它们的呼吸很臭。在有流水的沟旁，我们停下来搭起我的帐篷，我总是带着它，这样我就不会受旅队的约束，想走就走，想歇就歇。我比旅队走得要快，他们要等一个小时后才能赶上来。

次日早晨醒来时又是瓢泼大雨，我们又要忍受浑身湿透的滋味了。草原现在四处覆盖着直径半米的球状植物堆，这种植物的根部把土和沙子缠绕成一堆，产生了奇特的堆状景观。越往西走，这种植物堆越普遍，在上面开汽车旅行看来是不可能的。

我们所过之处时时可以看到倒下的骆驼的骨架和头骨，它们是旅队横越亚洲的漫长道路上的里程碑。

哈斯伦德和塞拉特前来报告，说哈沙特泉就在附近——他们发现了它，大家驱驼前往。旅队慢慢地跟了上来，根据惯常的安排扎下了营寨。晚上，月华如水，柔美动人。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7摄氏度，

晚上的最低温度不到13摄氏度，蒙古的夏天确实很温和。

8月11日是个大晴天，早上8点就开始热了，风呼呼地吹拂着被太阳炙烤的后背。我们越过了一带小山丘和高地，看到高处是一个敖包。就在这个敖包旁边，一匹死骆驼无声地躺着，这个惯常的祭品呈现出惯常的死相——头颈猛烈地向后背转了过去。除了骨架以外，没有别的东西留下。它坚硬的四足还完好无损，它肯定踏过了亚洲的沙漠之路。此情此景给人的感觉是那垂死的骆驼来到这个圣处寻求帮助，但就在石堆旁被发怒的山神击倒，从而结束了它的漫游。

向前不多一会儿，道路分开了，右手通往北方的达·库伦或乌尔加，左手通向善德庙。

旅队向西越过一片四面是山的平地，趋向一个壮观的石门，石门周围是一小串越来越高的山脉，该地区所有的沟渠在此连成一体。我们进入这个形似石门的狭窄谷地，里面有一条快要干涸的小溪，溪岸上杂木繁茂。山坡很陡，有些地方垂直地直插谷底。大家几个月来只看到平地，感觉此时眼前的新景观很有魅力，于是我下令在此建立营地。

次日早晨醒来时大雨如注，我们怀疑在峡谷涨满水时能否走出去。然而，溪水只涨了一点点，走不多久，峡谷豁然开朗，前面现出了宽阔的平地。

西北方坐落着一个小寺庙，据说该寺的喇嘛过去曾达到900个，拥有数千匹骆驼。但现在只有约20个僧人，都穷得跟庙中的耗子一样，只会抱怨时运不济和持续的干旱。相比之下，汉人更为勤劳，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和时间花在劳动上，而不是去徒劳地求神拜佛。

旅行路线再一次转向西北进入一个荒凉的峡谷，里面草木稀疏，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石头，其孤冷和荒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块石板的天然凹陷处积了一汪雨水，有20匹骆驼在此饮水解渴。看不到它们的主人，但它们却好像跟着我们。

峡谷向上进入平坦的高地，十多只羚羊轻盈地跑开。跨过一个花岗岩山脊以后，一望无际的旷远景色又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们继续前行，发现了一处清冷的泉水，于是决定把帐篷搭起来。

人们总要依靠水和牧草，直到现在旅队还没有缺过这两样东西。

就内容的单调无趣来说，我害怕这种写法有点像色诺芬在《远征记》中的经典描述，不过同时我还没有提到我们一天走多少路程。因此我愿意说我们一般一天走30公里，偶尔走40公里。

8月13日早晨，天气变得寒冷而阴郁。难道秋天已经逼近了吗？噢，那可不是，在野榆树落叶之前还有好多热天等着我们。风来自东方，从那里的大海刮来了南方的湿气。旅队南方的山脉叫卡拉那林乌拉，汉人叫它“狼山”，它们处于黄河大河曲的北面。

远处有一队人马正在走过来，近前一看是5名汉人和10匹骆驼——他们肯定装载着鸦片——这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

风又开始吹了，它忧郁地摩挲着万物，发出瑟瑟的声响。阵风发出各种奇怪的鸣响，使人产生错觉，好像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似的，但转头回顾，却什么人也看不到，因为所有的人都被我落在后面很远的地方了。

接着又是一个鸦片贩运站。来自宁夏和王爷府的鸦片贩子在此休息。他们日行百里，早晚各休息一次。为了能走55公里的日行程，他们的骆驼必须得到很好的照顾，在其帐篷前的草垫子下面就盖着玉米堆。这些人都有步枪和毛瑟手枪，不惧土匪的劫掠。

达莱布鲁克是一处泉水，它的意思是“海”，可见它以前应该是很大的。在这个泉水的附近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鸦片站，不久又碰到了一个赶着100匹骆驼的友好、开朗的中国男子，他说拉尔森就在前面10里的地方。

我们继续前进，果然很快看见前面有7顶蒙古包。该地叫卡拉—托罗裹伊，意为“黑头”——大队人马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次日凌晨4点以前，拉尔森就跟着他们的大队人马向草原深处进发了。我们的日子则舒服得多，太阳升起以后才动身，循着他们的足迹在不规则的山脉之间穿行，一会儿通过鸦片贩子的帐篷，一会儿通过大群的放牧着的牲畜。为了庆祝星期天和第100个气球上天，白天的劳顿之后旗子插到了我的帐篷前。通常，瑞典国旗挂在我的帐篷前柱上。俱乐部帐篷则未搭建，晚饭是在厨房边的草垫子上吃的。正当大家盘腿坐在盘碟前用餐的时候，小羚羊一下子蹦进来踩到了褐豆中间。

第二天，即8月1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自我第一次到亚洲以来，42年已过去了，而现在我仍然在为这块大陆着迷，虽然在今天和那个日子之间横亘着漫长的岁月，但我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那最后的几小时过得多么慢啊！我的父亲为我大声朗读了几段圣歌中的赞美诗，祈祷我一路平安，顺利归来。坚强的母亲没有表露出对分别后的不确定的焦虑。然后我就横穿波罗的海，经过俄罗斯抵达中亚。

如今，42年之后，我还在旅行。这次是在中国的内蒙古，骑着高大的骆驼趋向遥远的亚洲心脏。大草原上分布着干燥的峡谷和光秃秃的山脉，即使在今天这样的时空里还得继续向西前进。

小羚羊是所有人的宠物，也许从来就没有动物受到过如此的眷顾，它每日坐在如同轿椅的箱子中旅行，一只平和的骆驼是它的坐骑。箱子一放到地上它就要跳出来寻找玛斯考尔，后者得随时给它准备好奶瓶。它还在用橡皮嘴似的奶嘴像小孩般吮吸。但今天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它急不可耐地想吃奶，竟然连奶嘴也吞了下去，所有的人都忧心忡忡，但胡莫博士让大家放宽心。隔一个星期小羚羊的小粪便就被检查一次，但橡皮奶嘴没有出现。然而，经过这次不寻常的事情之后，小羚羊反而比以前更可爱了，有时还摇摇尾巴，要求霍德博士把充气时坏掉的气球给它。

8月16日，我们站在低矮的丘陵上再次看到了一览无余的草原风光，终于在西南方向看到了渴望已久的善德庙，据说到了那里就走完了归化城到嘎顺淖尔的大约一半路程。

这里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商人的9顶蒙古包，另一部分就是和尚的寺庙，经过蒙古包时只看到一个人和几条狗。根据协议，我们将在这里为后面的诺林和袁教授留下给养。

旅行路线通过一条峡谷通向一个高地，拉尔森的营地就设在上面，新的帐篷“城”在这里逐渐扩大。中午3点，风力增强变成一场真正的风暴。沙粒穿过帐篷布覆盖了里面的一切，床、毯子、箱子、口袋——所有东西上都覆盖着一层黄土，洗涮脏物用过的水看上去就像豌豆汤。周围景色顿失，全是黄色的旋尘，甚至最近处的帐篷也难寻踪影。风速达到每秒24米。气温为23摄氏度。正如霍德所言，风暴也达到了距地面500米的高度。

自包头起我们已走了473.7公里，到额济纳河尚有420公里。我们曾被告知善德庙是一个收费站，每个箱子必须交5块钱，然而到达以后什么收费的事都没听说，一分钱也没掏。相反，人们还善意地建议我们西去时不要太靠北，以免落入讨厌的蒙古共和国的收税者手中，他们的收费站就在120里之外的北方。

旅队为了休息、放牧牲畜和重新打包行李，不得不在善德庙附近逗留两天，在这两天中还要挑出留给后面两个纵队的箱子。这地方还不错，从中国商人那里甚至可以买到蜡烛和火柴等零碎杂物。这里的海拔超过了1700米，晚间的温度降至零上6摄氏度，气候也不错。第一天的部分时间用来清洗行李上的沙尘，所有的东西都要拍打晾晒。拉尔森、玛斯考尔和哈斯伦德解决了给养问题。在9号营地雇来的4名汉人被辞退，代替他们的是新雇来的两个人。拉尔森将于8月19日撤营先我们而去，我听到他在凌晨4点就叫醒了他的人，但却没走成，因为两匹骆驼失踪了，一匹在白天找到了，另一匹则永远没有了踪影。第二天考古学家黄文弼的小队追上了我们，他在13号营地待了4天多时间，发现了70件铜器，绝大部分是箭镞，还有170件铁器，20

件骨头和早期汉代的硬币。他还说，自从我们分别后，伯格曼发现了一个绝好的地方，他在那里找到了几百件很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器物，有斧头、雕有图案的石刀等。

和我本人一样，霍德也急于在嘎顺淖尔尽早建立第一个气象站，他要求带着他的手下和仪器与拉尔森一道出发，后者定于8月22日离开，前天晚上我们同意了这一设想。这样我的纵队就失去了霍德、傣特曼、冯·考尔和李，最后黄文弼也要求加入拉尔森的行列，因为最吸引人的工作在召唤着他。晚上所有的人都来到帐篷与我道别，显然，在到达嘎顺淖尔之前，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

在善德庙附近的21号营地我们纵队经历了第二次损失，虽然这次损失只持续了几天时间。听那里的商人说只要走两天就能到达黄河河曲。8月20日和21日晚上我忙着制订新计划时得出结论，重建与黄河大河曲的绘图联系是有价值的。早上我命令拉尔森组织一支轻型小旅队，并向赫姆波尔和齐莫曼详细交代了任务。他们要去最近的比利时传教团那里收集情报，并绘一张路线图。我请求徐教授派两名学生前去当翻译，刘和马被选中。8月21日下午这支轻旅队出发了。然而，他们离开后我的心中便犯起了嘀咕，派这样一支小的队伍进入据说是土匪横行的地区行吗？如果他们出了事回不来怎么办？

第二天拉尔森出发了，带走了6个曾有战争经历的德国人。

现在探险队完全分散了。它们的分布情况如下：和我在一起的只有一位瑞典人、一位德国人、一位丹麦人和两个中国人，他们是胡莫、玛斯考尔、哈斯伦德、徐炳昶和隋；正在向前推进的纵队中有拉尔森、6名德国人、沃尔兹、里艾伯润兹以及中国人黄文弼和李；诺林带了两名瑞典人、两名德国人和一名中国人，即伯格曼、索得鲍姆、黑德、冯·玛森巴希和丁；在袁教授的纵队中也只有两个中国人甘和匡。很明显，以这种方式将探险队分成5个纵队比走在一起能获得更大的成绩，这样各队的独立性更大，行动起来也更方便。

当旅队正在这样重组的时候，我病倒在善德庙，不适宜过多活动。痼疾胆结石病一直困扰着我，治疗的方法是服用吗啡。胡莫博士

有一种很好的治疗方法，他心里非常着急。他把我转移到玛斯考尔的大帐篷中，叮嘱一定要为我弄一张铺着床单的、真正的床——自从离开包头后我就再也没有享受过这种奢侈了。我的头部两边各设了一个箱子，这样我就有两个“床头柜”，上面有药品、茶、水、书籍、地图以及其他零碎杂物。

拉尔森在8月22日走后，我们营地就变得十分冷清，极少有造访者，寺里的一位高级喇嘛来看望我。和别的喇嘛一样，他有骑士般的尊严，他在我的帐篷中受到款待。谦和有礼的徐教授每日来三次，有时和我在一起待一两个小时。独处时我一般都在读书。

旅队处在东都尔衮区，其首脑是一位暴君似的王爷，他很不喜欢外国人。他没有打扰我们，而我们也只不过派徐教授带去了我们的名片，徐教授在王爷府的王子或王爷那里还带回一封介绍信。旅队在这位王爷的领地上没走几天，然后进入阿拉善，我青年时期曾到过那里。

好在我的健康恢复了，8月26日大家把营地挪到距寺庙更近的地方。喇嘛们不让我们在寺庙上方的山上搭帐篷，而只同意我们在寺庙下方的谷地扎营。门托和我把帐篷移往那里，并且为来自其他纵队的人做好了准备。北方的寺庙群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各种各样的庙宇大约有50个，就像半圆露天剧场似的坐落在山坡上。

喝完茶以后，徐教授、哈斯伦德、塞拉特、门托和我前往寺庙进行回访，但那位高僧正好出门云游布道去了，因而我们被引见给寺庙住持。住持是一个长着圆脑袋的小老头，样子有点猥琐，他盘着腿坐在装修很好的小门里，周围是各色铜质神器。

他没有回答我们的问候，只是惊讶而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我们也盯着老头看了一会儿就退了出来。

我们爬上山顶上的主庙，那里还整齐地排着一列神龛。一位喇嘛走上前去点燃了门口铁香炉中的香，然后就坐在庙厅右首的垫子上。经书摆放在他面前的红色亮漆桌上，他一边以动人的声音高声读经，

一边不时敲响大腿上的两片铜钹，同时还要用一根状如鸟颈、顶部有球状物的鼓槌用力敲击一面悬鼓。有时候他也敲放在桌子上的一个东西。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消除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给神灵带来的不悦。

四根红色亮漆柱子支撑着长方形的庙厅天花板，柱子之间挂着4幅很大的美丽唐卡。前墙上挂着红色框子的绘画，后墙则为书架所占据，书架上放着本教的圣书。还有一些美丽的菩萨像放在玻璃柜子里。屋子的中间有一个神龛，蒙古人称苏佛尔伽，为常见的西藏物品，祭桌上有黄铜器具和香炉，桌子中央挂着一顶织物做成的罩篷。

我们在两边是白墙的走廊上漫步，然后走过点缀着石英的黑色水晶石天然台阶，穿过庭院和开阔地——一切都和西藏的寺庙相同，建筑风格是藏式的，虽然有几个屋顶带有传统的前檐、雕刻和绘画。

善德庙如画般坐落于群山之中，其脚下是一条狭长的谷地，有个人正把谷地中的水用口袋布做的瓢汲起倒入一个木桶中。几匹马、一头驴和一匹俊美的骆驼正在一个水槽边喝水，骆驼的主人是一个穿着外衣的库库诺尔蒙古人。在红彤彤的斜阳余晖中，上述的一切都变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然而，钢蓝色的天空预示着北方的风暴。

许多喇嘛来到旅队的营地，惊奇地流连于帐篷之间。他们穿着脏兮兮的、臀部为红色的宽松袍子，将古铜色的双臂露在外面。这些人坐在那里张着嘴，对看到的一切吃惊不已。旅队的狗警惕地盯着骑者、漫游者和寺庙的狗。晚间我们不得不把小羚羊锁起来，因为它不知天高地厚，竟带着一股英雄主义气概要凛然加入一场狗的混战之中。

最后，小旅队终于从黄河回来了。大家在我的帐篷中一直坐到半夜，两个德国人向我讲述了自己以及汉人和蒙古人是如何度过这几天的。我们观察着地图上的黄河河曲——这份地图很大，是他们从传教士罗茨那儿弄到的。这里距他们的三道桥驻地的直线距离是57公里，因为路上有弯曲，他们实际走得更长，回来时他们选择了一条更西的路线。接下来的几天他们搞出了一张样图。我对他们的工作大加赞赏，指出那是对旅队的地理学和制图学工作的宝贵贡献。

他们出去的详细情况如下：他们的小队人马在8月21日骑着骆驼向东南方进发，目标指向卡拉—那林山系。该山从北方隐然可见，犹如一个有谷地穿过的开阔高原。但在南方，它的众山峰几乎没有高出地平线，在多山的乡野道路缓缓向下通往谷地入口，那里有一个蒙古哨兵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盘问。地面沙子很多，沙丘高约20米。几间老房子已经人去房空，居民显然是被沙子赶跑的。

狭窄的谷地中满布着寸草不生的黑色石头，行进十分艰难，当暮色完全被黑夜吞噬时他们才在杜苏鲁安泉边建立了营地，该泉的溪水在10米之外就消失在沙子之中了。泉的附近还有一顶蒙古包和一顶帐篷。

第二天他们在东南方通过了一个山口，山口之上有一个敖包——达马托伊敖包——上面有木刻藏文，北坡很陡，但南坡却很缓——要是南北调换一下就好了。谷地两侧危岩耸立，植物稀稀疏疏，不时还可看见一株孤树顽强地在石缝中生长，使人感到了一丝浪漫和美丽。

谷地向东拐去，一路上蜿蜒曲折，狭窄难行，两侧高壁直立，右边和南边的高度达到250米，一直通往黄河平原。在谷地两边的高处，陈旧的防御工事随处可见。溪流占据了狭窄的谷地底部的大部分，他们只能涉水而行。谷地的出口面向东南，在其末尾的南边竖着一堵高1.2米，宽30米的堡垒墙壁，在谷地入口处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黄河谷地。

两名德国人向东越过山脚下的乱石堆和小沙丘，最后到达第一个居民点。那里没有沙丘，地上植物比较茂密。通过当时已断水的第一道河谷，他们在一个叫赛因诺尔的地方扎营休息。这里有3处居民点，而且附近还有几处。除了玉米外，这里还种植小麦、小米、大麻、西瓜、豆类、甘蓝及其他蔬菜。为了种地，居民不但要向蒙古人，而且还要向绥远的当局交税。那里有羚羊、兔子、野鸡和鹧鸪，还有狐狸和狼。秃鹫、天鹅、野鸭和鹅也很常见，骆驼、驴、绵羊和山羊则都是家养动物。那里1月份的温度为零下25摄氏度，冬天下雨不多，3月份多沙尘暴，一般都来自西面。黄河在12月至3月为封冻

期，4月至11月为通航期。由于这个缘故，羊皮筏派上了用场。一只羊皮筏一般由100张膨胀起来的羊皮组成。在运河中最容易抓到黄河鱼，乌龟也不少见。

汉族商人已在运河通过的山脚下站稳了脚跟，通过这些水道运来了面粉、玉米、煤以及其他用来交换蒙古皮毛的货物。

我们的侦察队伍还跨越了一条自西南流向东北的较大运河。该河宽超过15米，深超过1.6米，流速为每秒1.5米，径直通向山脚。那里在二百年前便是黄河故道，至今还有堡垒和城墙的废墟，后来，黄河河道越来越往南移。汉人殖民者在开发土地方面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他们很快就向黄河移动的方向发展，现在这里的蒙汉人口比例已是1:100。

8月23日的路线通向东方，他们不得不绕过几道河流，这些河流仅有一米宽、半米深，两边的河堤高约30厘米。居民点也越来越多，他们还经过了一些飘着青天白日旗的国民党军营。

在大路的右边分布着一带7米高的沙丘，沙丘的东端是摩灵庙。该庙已历时两百年，喇嘛数量达到130人。除此之外，他们还不得不坐着用绳子拖拉的渡船渡过了一条15米宽的运河。将骆驼运过河花了一个半小时——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将骆驼弄上渡船。

运河的另一边坐落着有400名居民的三道桥村和几座军营，里面的士兵以前都是土匪。他们的司令叫王英，我们在包头时对他就有所耳闻，现在据说他住在五原。

运河自西南流向东北，长180里，这条运河是一个杨姓家族的人世代努力的结果。该工程始于一百年前，直到1917年才告竣工。杨姓家族居于运河以南30里的杨奎村。三道桥村的东头是一个比利时传教团的驻地，它周围墙高3米，门边有望楼、射击孔和壕沟——俨然就是一座堡垒。在这个已有4年历史的布道站，我们的人受到了希莱尔·罗茨神父的热情款待。他3天前才从宁夏归来，他去那里的原因是三道桥村周围的治安状况不好。正如他所言，三道桥村受到了土匪和土

兵的双重勒索。

从他门口8米高的望楼上可以看到四面八方很远的地方，尤其是可以看到北面的狼山等山脉。在三道桥村东北小镇山坝塘有7000名居民、一个守备队和一个比利时布道站。在中国的这一地区，共有18所比利时布道站。

三道桥村距现在的黄河河床90里。

罗茨神父告诉我的人说，这年5月23日，甘肃的凉州、古浪镇及其他地方发生了地震，死了大约50000人。

当地的指挥官彬彬有礼地拜访了陌生人，并在8月24日他们返回时在渡口送别。第一天回程走的恰好是他们出去时走的最后一段路，接着他们向偏西方向行进。在沿着山麓旅行时他们发现黄河故道已模糊难辨。绕过一个突出的山峰之后，旅队就上了山，在一条狭窄的溪谷中向西北方向前进。

这条溪谷叫布东猫头，里面到处都是沙丘。次日他们转向北面，在一个地方被一个高达40米的沙丘挡住去路，他们花了40多分钟才带着骆驼走了过去。最后一段归程又与外出时的路线重合，他们没有在谷地中发现居民，但却遇见了一些小商队，全部加起来有140匹骆驼，行李都是绵羊毛。

经过到黄河河曲的旅行，骆驼需要休养几天。因此我在善德庙多待了两天。

赫姆波尔和齐莫曼的帐篷就像一个画室——充当桌子的包装箱子放满了地图、日记本、绘图圆规、磁罗盘和尺子。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着，我希望在离开这里前看到他们的报告。

报告真的及时完成了，结论是三道桥村在21号营地以东56度，距21号营地57.9公里。使我吃惊的是黄河故道离我们如此之近，而且正好贴着山脚延伸开去。那河现在距卡拉那林—乌拉则相当远，河道的移动是沿从北到南的方向进行的。人们不仅纳闷，灌渠的水怎么竟从

西南流向了东北方向。

第十一章　在骆驼受难的路上

8月29日终于能够出发了，旅队在山上的一条峡谷中穿行，几乎一天都通往正南方，我们的前面是带有黑色低矮山脊的卡拉那林—乌拉。旅队穿行于沙丘之间，这些沙丘有时候被植物连在一起，有时候则光秃秃寸草不生，有的如盾牌和弦月，有的如金字塔，而有的则如海豚的背部。这里的景观酷似新疆草原和沙漠之间的过渡地带。和布林诺尔终于现身于两个高大沙丘之间的平坦凹地，旅队在此搭起了帐篷。确切地讲这里有两个小水塘，一个是淡水，另一个的水中含有碱。凹地周围全是高大的不毛沙丘。齐莫曼测量了其中的两座，一座高12.5米，另一座高18米，大部分旅队成员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观。

第二天我们直接进入沙丘，但沙丘仅仅占据了一条狭窄的地带。景色一下子就改变了，沙漠突然停止不前，代之而来的是点缀着小山的平坦沙丘，左面可以看到高高的沙漠，稀稀疏疏的绿色植物与流动的黄色沙丘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反差。如果我们选择穿越无水沙漠的直线，那就只能使用驮着轻行李的快速骆驼，以日行千里的速度行军，对一个旅队而言那是不可能的。

8月的最后一天旅队又一次转向西方，此时我们的左边是截然分明的沙海的边界，而右边的沙带则越来越窄，最后竟至完全消失了。

9月1日，秋风送爽，格外宜人，旅队继续向西推进，南面的高高的沙丘在早晨的阳光映照下显得格外壮观。我们沿着两个几乎已干涸的小湖的岸边行进，小湖名叫“白草之湖”。在此旅队遇到了一支从王爷府运玉米的商队。由于要回家，那些人高兴地如玩沙子的孩子，心情愉快地与门托开着玩笑，在巴因莫托附近——这个地名的意思是“多树的地方”，一个勤勉的汉人建了一间泥房子，现在一个汉人大商队正在那里休息，他们的目的地是古城。这里稀稀落落地长着一些

野榆树。

然后出现的是由房子和庙宇组成的寺院。在其坐落的山脚下，旅队开始安营。寺庙很小，但保存完好而整洁。这里还有一个收费站，每匹骆驼须交28分钱——要我们交税是不可能的。我们得知，去年大概有12000匹骆驼打此经过，但由于内战和匪帮的影响，今年驼队的通过量大大下降了。西去的驼队带着毛织品、茶和给养，东来的驼队则带着兽毛、皮草、地毯、干果等。

第二天旅队在山间行进时，来到一个极为平坦的波形地带，行至高处可看到远处的壮观景象。景观不断变化，最后，旅队进入一片深绿色的高大树丛中，大家在其中差点迷路。

那个晚上旅队是在“新水泉”边度过的。

拉尔森仍然带着给养队打头阵，不清楚我们能否在嘎顺淖尔和额济纳河以东赶上他们。他们的宿营地很容易辨认，在查干—德尔苏附近就曾有过他们的宿营地。我们就在“新水泉”度过了阴郁的9月3日夜晚，凌晨4点钟，天尚未亮时大家已经醒了，6点以前就要上路。太阳升起后，我坐起来吃早饭，赫姆波尔和刘则张罗着划基线，通过基线我每天都在各种地段测量我的坐骑的步幅长度，与此同时门托拆掉我的帐篷，打包好东西，然后以惯常的方式安放在我的晃悠悠的骆驼背上，并布置好我的“瞭望台”。

在满是沟渠的地方还没走多远，我们就碰到了一个由15名中国人组成的奇特驼队，女人和孩子坐在行李卷上，衣衫褴褛，其情堪怜。男人们徒步行走，驼铃如丧钟般叮当作响。

旅队现在正在经过的地方荒凉如月球的表面——干旱缺水、寸草不生，只是偶尔一见低矮的植物丛。29号营地附近的泉水水量挺大，但牧草很稀少。所有的驮鞍都在这里被卸了下来，骆驼身上已显出擦伤的痕迹，需用涂油进行处理。一匹骆驼病了，上路时它不再驮东西，但是它还要消耗面粉和黄油。

9月5日天气晴朗，风儿未起，但起初有点凉，地形平坦荒凉，行进的很枯燥。此时一个蒙古人骑驴迎面而来，我们吃惊地抬头看去，啊哈！居然是索恩宁·吉布什！他从驴上跳下，非常高兴地向我们问好，然后将拉尔森的信交给我。我们的驼队首领在信中说，他准备把11匹没有负载的瘦弱骆驼留在后面，待休养好后由诺林使用。除此之外，其他骆驼都很健壮。吉布什带着6匹骆驼留在这里，其中一匹已经死去，另一匹也病倒了，其余几匹在不远的西面由一名中国人牧养。

旅队设在阿尔嘎林乌苏附近的营地与一个汉人定居点相邻，这里有一个泥巴小屋、一顶蒙古包和一个用草原上的干灌木围起来的院落。我们拜访了这个居民点的主人，他是一个快乐而满足的人。他的外屋堆放着面粉，天花板上还吊着两扇羊肉，起居室有一个在冬天能够加热的炕，炕上现在正用小火熬着冒热气的茶壶，我们就在炕上坐了下来。屋墙上装饰着几幅风景画，我们特别欣赏一幅中国水墨的骏马图，那马的头转向一个非常危险的角度，两条腿夸张地高高举在空中。屋子里的装饰表明，再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有追求舒适生活的愿望。

当徐教授问他的同胞在沙漠中年复一年的生活是否感觉凄苦、孤独时，后者达观地笑着说："不管怎样我总得挣钱养活自己。"他计算后说，去王爷府（他直接称为衙门）需7天行程。

当天晚上夜深时，吉布什带来了拉尔森的4匹疲惫不堪的骆驼。次日早晨我们继续前进，他则要与哈斯伦德和我的骆队中蒙古人的"小队长"巴图留在后面。哈斯伦德受命卖掉留在后面的9匹骆驼，价钱任由他定，否则它们会成为旅队的负担。诺林的纵队恐怕也累了，没有能力带走它们。

今天的路在山间通往西北。"山茶花夫人"身体虽然很好，但脚却磨烂了，因此它需要休息。替代它的新坐骑脚很好，但脾气倔犟，不让它和伙伴在一起就闹别扭。

在乌兰托洛果依附近的营地，哈斯伦德和巴图带着4匹漂亮的新

骆驼赶上了我们，这个地区的名字的意思是“红火”。新骆驼是他们用28.5块定金换来的，因为我们的4匹骆驼已不能役使了，这样，拉尔森的5匹骆驼就暂时留在后面由吉布什和旅队的一名汉人看养。

旅队宿营的泉水周围都是血红色的山脉。太阳如熔化的金子一样下落，轻薄的云层边缘光芒四射，光线消失之后，地平线闪耀着红光，如同草原燃烧产生的反射光。在这种奇异的红光的映照中，骆驼开始饮水，个个如红色的陶像。很快，暮色四合，亮丽的色彩渐渐消失。

在距乌兰托洛果依附近的宿营地不远的地方旅队偶然发现了3辆汽车的车印——在这个沙漠地带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发现。后来我们从拉尔森处得知，他和他的前锋队伍与那些车辆同时到达乌兰托洛果依，他甚至知道其中的一位司机来自乌尔加。因为他们正是从那个地方来的，要前往宁夏接回15名俄国教官——他们在冯玉祥的军队中服役，现在准备回家。我们的人与俄国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他们邀请里艾伯润兹带着摄影机旅行了一阵子。这样，里艾伯润兹就坐着汽车跑了50公里，并有机会拍摄下了深陷于沙子中的汽车和人用铲子开道的情景。

9月7日的路线通过一个谷地，实际上是夹在两座陡直的小山之间的雨水沟。在这里又可以不时看到高大的野榆树，旅队正好从一棵榆树下走过，立刻就能听到风吹树冠的沙沙响声，其茂盛的树叶形成了巨大的罩篷，站在下面，凉爽宜人，令人振奋。风吹树叶的声音就像汹涌澎湃的瀑布，这是来自遥远土地的问候。但这一刻很快就过去了，旅队继续在烤人的太阳下行进。

旅队离开谷地，转向左面进入一条边沟后通向一个山口。山口的入口处有一条峡谷——一条真正的死亡之谷。旅队由此进入一片平原，我们看见一处地方躺着10具骆驼的骸骨。

旅队日复一日地向西走，没有植被，没有水，没有生命，仅仅有一次我们看见一条蜥蜴跑过。我们安营于沙拉霍鲁斯泉附近，它的意思是“黄芦苇”。如果不是一堆石头做“泉眼”的标志，我们很难找到

它。这堆石头的顶部是一个骆驼的头骨，其张开的嘴里还放着石头，看上去很凶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警告，表明在这个入口之内是没有希望的鬼乡——人肯定会通过，但骆驼注定要死。

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0.8摄氏度，昨天为25.3摄氏度，前天是24.8摄氏度。过去两晚的最低温度分别是零上5.5摄氏度和9.5摄氏度。由于强烈的日照影响，白天非常热。大家盼着夜晚赶快到来——如果提前两个月出发我们怎么能受得了？夜晚格外凉爽，但月光清冷。周遭一片死寂，人们可以听到骆驼缓慢的呼吸声和自己心脏的跳动声。

第二天云层很厚，南风格外强烈。旅队沿着左面的一列小山行进，尔后跨过一道山口，其山神受到了两个敖包的抚慰。接着又出现了沙丘，沙子直向眼睛吹来。冬天的浮雪使这条路无法通行，路边不时可见一处处的石堆——不知道是为旅行者指路的还是祭奠山神的。路边出现了一只死骆驼，那是拉尔森纵队的不幸者。它倒在途中，死相如常，四条腿伸出，脖子扭向后面的驼峰。看上去它刚死不久，尸体仍然完好，3只硕大的秃鹫一直在旁边盯着它。等秃鹫们“做完工作”后，它惨白的骸骨将会暴露在太阳光下。我的骆驼害怕了，悲伤地看着牺牲者，那曾是它的一个朋友和旅伴啊！

一座黑色山脉上又有两个敖包。从远处看去它们就像帐篷一样大，浑浊的空气将它们的比例变得难以判断。9月10日我与门托再次走在前面，天空云彩密布，天气不是很热。我们走过一条峡谷，两边黑色的山脉上覆盖着沙子，不时出现用干木头建成的敖包，状如一排扬起的手臂。这里只能看到沙丘、小山以及5米高的红柳。同时，我们不得不跨越一道横卧在谷地中的沙丘墙，在沙丘的另一边我的骆驼绊了一下，差一点摔倒在地，不过我倒没有摔下来。景色不断变化，和大草原上千篇一律的景观一点也不一样。山的右面有一道缺口，里面堵着巨大的沙丘。许多地段都是不毛之地。其他地方则因美丽的红柳而有些生机。旅队离开右边的沙拉霍鲁斯泉，向前进入一条涨满咸水的河道。

在一块散发着墓地气味的土地上，学识渊博而勤勉的黄文弼四处

寻找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他在前面的旅程中已经收获了许多。他告诉我们走哪个方向可以到达附近拉尔森的营地。当然，我们首先必须穿越迷宫般的沙丘和烦人的沙地，沙丘之间的凹地中常常长着茂盛的芦苇。

我们前锋的帐篷现在已清晰可见，一顶白色帐篷和几顶蓝色帐篷如画般出现在黄沙之中，我们走近时，拉尔森和霍德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帽子来迎接。他们看到我出现在沙丘中间时非常惊讶——因为没有料到我们会这么快。他们领着我驰入营地，沃尔兹、里艾伯润兹、傣特曼、穆伦温格、玛斯考尔以及仆人们都欢天喜地地和我们打招呼。

晚饭是在里艾伯润兹的帐篷吃的，人们问着没完没了的问题。自8月22日以来大家就没有见过面，而今天已是9月10日了。拉尔森走着和我们一样的路线，由于疲劳的骆驼的拖累，他在善德庙和35号营地之间休息了5天，我们一天也没耽搁。他于昨天中午12点到达这里，打算在晚上继续前进。但到晚上时，一个中国人打出了一口井，井中水量大，水质好，于是他就待了下来。尤其吸引他的是，附近的芦苇为骆驼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拉尔森不得不将11只骆驼丢在后面，但他又花240块钱买了4只新驼。现在15只骆驼已退出了前锋纵队，由马特带着在后面缓慢行进。但它们还得带着行李。拉尔森还需要一名赶驼手，由于我们的人手多，就把一个老一点的汉人转给了他，蒙古人称那人为敖包公。我们是在善德庙招募到他的，他平常徒步赶着一串负载驼，在营地他则充当帮手。他总是早晨第一个起床的人，到凌晨3点时他就已收集柴火在厨房生起了火。他干得很好，在寺庙时我们给他花18块钱买了一件皮衣和其他衣服。

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变动，自离开善德庙以来，霍德、傣特曼和冯·考尔组成的“气球队”就一直跟着拉尔森的纵队。然而，他们发现与前锋队伍一起前进不太切合实际。前锋队伍一般在早上4点30分就出发了，而每天的气球试验是在7点天已大亮时进行，因此每天拉尔森走后他们还要等几个小时。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要求再次加入我的纵

队，我当然同意，黄文弼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因为他要在35号营地附近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这样，拉尔森失去了8个人，他们的队伍更轻装了。

我原来的坐骑也被拉尔森接收了，新来者高大俊美，买自百灵庙，我在晚间试乘了一次，觉得它行走姿态非常可人。

直到晚上10点，我们纵队的前锋骑手才追上我们，不久后都陆续驰入营地。这真是一幅壮观的景象，在圆圆的月亮泼洒的柔美光线中，骆驼群平静而庄严地走过我的帐篷，在沙地上拖着长长的影子。新帐篷迅速在露天驻地搭了起来，这样，晚间的宿营地又和以前一般大了。

不能不承认，像军队那样开进反而不好，因为各个纵队会互相阻碍，难以顺畅前进。将给养纵队摆在最前面，其他工作纵队随后开进是比较明智的，因此我决定，次日早晨拉尔森先去奥胡林—乌苏，然后不必等我们就可以继续其穿越沙地的额济纳河之行，额济纳河注入嘎顺淖尔和苏泊淖尔两湖。我自己打算在35号营地待一天，让骆驼得到休息。为了能够确定所在的经度，我们还决定把无线电天线塔竖起来，胡莫博士还想要调查沙漠中的植物状况。

我们已连续不停地走了13天，的确也需要休息了。

第十二章　抓贼

拉尔森于9月11日凌晨5点出发时要求带上敖包公，可大家到处喊着找他，却不见其人影。大家想也许他在外面给厨房收集柴火去了。旅队不能因为一个人而耽搁，于是他们就上路了。

门托很快注意到我们的新骆驼不见了，哈斯伦德立即清点，发现旅队最好的骆驼也不见了，现在大家才觉得事情不妙并招来旅队的人询问。没有人看到敖包公，也没人能提供有关他的情况，但仆人王报告说，夜里两点时有人在厨房旁边的给养箱子中乱摸，他被惊醒后喊了一声：“谁在那儿？”敖包公应了一声，说要在厨房生火，因为这没什么异常，王也就放心地再度入睡了。

于是大家又看给养箱子，厨师吴立即指出丢了一袋米、一袋面和大量的茶与糖，他的5块钱也丢了，此外，一套骑鞍也不见了。显然，窃贼在夜里将偷来的东西装在旅队两匹最好的骆驼上逃走了。敖包公对这一地区的路线非常熟悉，他曾经几次到过额济纳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熟悉那些秘密小道和当地情况。敖包公无疑认为，因为会合而兴高采烈的我们会聊到深夜，因此早上肯定会睡懒觉，所以他确信自己会轻易得手。

由于我尚未睡醒，哈斯伦德就承担了追逃的任务。他带上蒙古人巴图、门托、塞拉特和马特，骑着5匹骆驼沿着逃亡者的踪迹追了上去。但所有的蒙古人都跟了上去，他们暴怒得如同追逐猎物的猎狗。他们承担着看护骆驼的责任，并且也拿了报酬，如果骆驼被盗，那将是他们的耻辱。在蒙古，盗驼者被看做最大的恶棍，窃贼多被毫不留情地打死或枪毙。我起床后，听说4位最优秀勇敢的蒙古人在像一只暴怒的猛虎的哈斯伦德的带领下追了出去，就很担心他们会杀了那个家伙。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探险队沾上血迹，不过，我也对这件事很生气，感到罪犯应该得到他应有的惩罚。

与此同时，哈斯伦德正带着人马上上下下四处搜寻。要在200匹骆驼走了几天的路上找出两匹骆驼的脚印实属不易。然而，经过一番耐心查看，他们还是找到了，脚印通往南方进入高高的不毛沙漠。风很大，脚印变得无法辨认，塞拉特和马特继续向南面追去。哈斯伦德与其他人认为那窃贼已逃往我们早先的营地奥塔霍依，以便从那儿继续向东逃窜，因而决定去那儿看看。这样，他们的追捕路线就经过我们现在的营地，但他们没有发现窃贼和骆驼的踪迹。

下午时天空落下一抹轻雨，晚上天空呈现出一派万分壮观的景象，天空光线很暗，西方重云浮动，云层之间万束电光来回扯动，彼此相距很近，难以分辨清楚。它们有的如裂缝，有的如撕开的布条，有的如“之”字形一闪而过。整个地区都被照亮了，宛如白昼降临。此情此景令人激动、惊慌和不知所措。

第二天早上我们已装备好了一支专门小队去追寻窃贼——这难道是要去对付一大帮匪徒吗？突然门托冲了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他们来了。”

“谁？”我问。

“塞拉特和马特。”门托说。

“光他们俩吗？”我问。

“不，还带着窃贼和骆驼。”门托答。

我们赶忙冲出去看，营地的所有人都在看那一队得胜而归的蒙古人，独有我一个人严肃地站在帐篷的入口处。

在南面的沙丘之间出现了3个人和4匹骆驼，塞拉特和马特各领两匹骆驼，走在他们中间的是脖子上绑着绳子的窃贼，两个蒙古人各抓绳子的一端牵着他。窃贼的双手被反捆在后面，弯着腰，拖着步子往前走，看上去好像要去刑场似的。

他们直接向我的帐篷走来，敖包公一下子瘫倒在我脚下的沙子

里。

“你是一个不错的人。”我说。他只是摇头，看上去十分悲惨。

“把他带往厨房严加看管。”我说。

他被拴在一个沉重的箱子上，由于蒙古人担心他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逃脱，于是两条只能用钥匙打开的铁脚镣在此时派上了用场，这样他就插翅难逃了。

吃午饭时我看了一眼那个可怜的逃跑者，他坐着蜷缩在新皮衣中，我命令在白天解开其绳子和脚镣，允许他喝水吃饭，同时也同意给他几根香烟抽。当一个蒙古人在他后背来了几拳头时，我立刻阻止了这种暴力行为。

接着我与徐教授长谈了一次，全部事情还必须委托给他处理。我向他保证说，在两只骆驼找回来之后，我对那个人一点兴趣都没有了，而且，就我自己而言，并不要求他一定要受到惩罚。但我不想将其在我们来的路上释放，那样的话他还可能会去偷诺林和袁教授的骆驼。徐教授的意见是，法律和正义应该起作用，不能这样简单地放他走，那样还会对其他人产生不好的影响，他必须被转送到额济纳河的马木法庭去，那儿肯定会判他监禁。于是我们决定将倒霉的敖包公带到额济纳河，他在那里运气如何还得等着瞧。

塞拉特和马特已经30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待他们睡足以后，我把他们叫到帐篷中将事情的经过讲给我听——我确实听得入了神。

窃贼有很多优势，他早走了4个小时，有全旅队两匹最好的骆驼，除此以外他还熟悉这一地区，最后，新起的风还帮他抹去了脚印。因此，要追踪他和骆驼是一件费时费力的苦差事。两个骑着疲惫的骆驼的蒙古人几乎没有机会追上或缩小他们之间的距离。可以说，只要骆驼的体力允许，他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往尽可能远的地方逃窜，然后，待所有的脚印都被风抹去后，在某个难以到达的峡谷好好休息一番。当然，他也算到自己的行动会很快被发现，同时也清楚如

果那些蒙古人追上了他，那自己的小命就没有多少价值了。

脚印在3个高大的沙丘后面消失了，他们分头向不同的方向寻找。不久塞拉特在一个凹地里发现了脚印并招呼马特过去，他们循着脚印往东整整走了40里。沙子厚得可怕，脚印一会儿上到山上一会儿进入谷地，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可以看出，窃贼选择这样的路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尽可能地沿着沙丘的受风面逃跑，这样骆驼的脚印很快就会被风吹平。追捕者识破了这一伎俩，于是调整了相应的搜寻方法。

现在，脚印转向南面，接着又向东去，然后直趋一个布满石头的山顶。石山在沙漠中兀然而立，比周围的沙丘要高，在这里脚印又消失在沙子之中了。马特向西寻找，塞拉特则转着圈找，很快他发现窃贼耍了花招，企图诱使追捕者偏离方向。窃贼在两个地方下了骆驼，然后回来用手抹去了骆驼的脚印。新发现的痕迹通向东北，但很快又消失在沙漠结束和坚硬的砾石地开始的地方，砾石地通往的那个地方布满很常见的低矮的沙丘。

经过紧张地搜寻，他们发现窃贼窜往一处低矮的沙丘，在那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逃跑路线向前延伸着。突然，两个追捕者不约而同地勒住了骆驼——窃贼就在两个沙丘之间的凹地里，他坐在地上，一边休息一边吃着偷来的给养，同时还在重新打绑腿。两只偷来的骆驼就在旁边吃草，距离几乎不到一公里，约一里半的样子。塞拉特骑着骆驼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冲了上去，在此期间他要穿越一个旁边有高大沙丘的凹地，所以有一会儿工夫他看不到窃贼和骆驼，当他走出凹地能够看清楚时，窃贼已动身离开了。然而，两个蒙古人确信窃贼还没有发现他们。很快，窃贼再次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以尽可能不被发现的诡计掩盖着他留下的痕迹。两个蒙古人扬鞭策骑，但两匹骆驼由于脚下打滑发出愤怒的尖叫声——骆驼总是这样。叫声惊动了窃贼，他感到情况不妙，加快了速度，有一段时间一个高大的沙丘遮挡住了他，两个蒙古人信心十足地朝前走，没有冒险抄近路，他们甚至在沙丘的顶部也看不到他，但显然正在接近他。由于那里沙丘纵横，石山密布，他们不得不分两路前进，期望形成一种两面夹击的态势。

在奥尔塔—布鲁克，即“长泉”所在的凹地里，塞拉特又一次看到了逃跑者——他躲入了高高的芦苇丛中。不幸的是塞拉特的骆驼已疲乏至极，在这个关键的当口躺倒在地。当塞拉特想让其站起来时，它再次尖叫一声，受到惊吓的窃贼立即骑着骆驼上路了。塞拉特在他后面开了一枪，但为了避免伤及骆驼，他把枪抬得很高。窃贼对枪声置若罔闻，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塞拉特扔掉骆驼，试图用双腿赶上他。

在一块石头上他又在窃贼后面开了3枪，马特也扔了骆驼，但当他来到塞拉特的骆驼跟前时，它居然站了起来，于是他骑上骆驼大步向前追去。他越逼越近，窃贼觉得放掉用绳牵着的一只骆驼更为明智——那只骆驼就是拉尔森给我选的坐骑，这样他就跑得更快了。蒙古人生怕他溜掉，塞拉特朝着他的头开了一枪，子弹呼啸着贴贼耳飞过。

他们现在距窃贼也就是一百多米，马特使劲全力向他喊道：“如果你不立即停住就会被打死。”

于是窃贼终于承认了失败，下了骆驼等着追捕者，两个蒙古人走上去后，他把骆驼的鼻绳交给塞拉特，闷声说：“既然你们找回了两只骆驼，现在就放我回家吧。”

然而，他非但未能走掉，反而饱尝了一顿骆驼鞭子的滋味，最后不得不跪在地上请求宽恕。塞拉特要枪毙他，但马特劝住了同伴，他认为窃贼应当被带到我的面前接受我的裁决——毕竟他偷走的是我的骆驼。然而，马特也承认，他当时也像噬血的老虎，疲惫不堪，呼吸急促，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喇嘛，很想一枪毙了那小子。但他却建议：“我们必须先休息一会儿，让喘息均匀。”两人最终同意让那家伙活着，如果被盗的骆驼是他们的财产话，那他们就会像打死一条狗一样打死他。

当时已是下午4点，他们所处的地方在营地东南约50公里。捆绑好窃贼以后，他们拿出他偷走的东西，坐下来饱餐了一顿。已被紧紧捆住的窃贼请求他们给点水喝，但却一滴也未得到。

4点30分时他们开始徒步返回。窃贼的脖子和手上都绑着绳子。他不停地躺倒在地，说自己快不行了，要求去死，但蒙古人断定他是一个奸诈的无赖——他根本没想去死，他只想保住性命，然后继续去偷窃诚实人的骆驼。后来拉尔森听说这件事后，认为蒙古人应让那家伙躺在沙漠里。然而，我很高兴他们将他带了回来，如果把他放入沙漠，他可能还会对诺林纵队和袁教授纵队施用同样的计谋。

天色变暗时他们仍在赶路，前面路还很长，因此没人能看到他们的宿营地。他们掘地取水，但徒劳无功，带的东西也吃光了。幸运的是牧草很好，骆驼在附近自由放牧。窃贼躺在地上，被捆得结结实实，他叫唤说绳子勒进了他的手腕，要求将绳子松一松，马特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塞拉特就仁慈地把绳子放松了一点。

疲劳渐渐袭击了他们，不一会他俩就睡着了。但窃贼没有睡，他抓住机会用牙咬断了绑手的绳子，在两个蒙古人已进入梦乡之际像猫一样轻手轻脚趁着夜色逃走了。好在塞拉特偶然醒来了，他发现窃贼已无踪影，于是立刻叫醒马特循着脚印追了上去。聪明的马特直趋那个凹地，果然就在那儿撞见了那家伙。窃贼眼看自己就要二度被擒，于是决定冒死一搏，他迅速扔掉皮衣扑了过来。马特后来承认，那一刻他被那个人的凶相吓住了，因为他显然已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与此同时，他也几乎没有办法召唤塞拉特了。马特明白，自己的性命面临危险，于是他使出浑身力气，用右拳瞄准窃贼脸部猛然一击，同时敏捷地避开了贼拳，窃贼被击倒在地，神志恍惚——马特轻易地就制服了他。

当他们返回宿营地时，发现被偷走的鞍子也不见了，问及窃贼时，他声称什么都不知道。然而，拳头帮他恢复了记忆，他招认说鞍子放到了附近的山坡上，他打算潜到骆驼跟前，带上最好的那一只，在沙丘后面搭好鞍子，然后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走。

这时已是凌晨3点30分，窃贼现在被捆得更紧了，连手都肿成了紫色，由于他们注意到他又偷偷去咬绳子，遂决定把他的双手缚在背后，并将其两条腿也拴到了一起，然后更加小心地看管他。

早晨，天色露出一片灰色时他们再次上路了，窃贼呻吟着说自己快不行了，但招来的却是一顿毒打。

蒙古人对他喝道："夜里你偷走骆驼逃跑时不就是找死吗？你这个混蛋。"

两个蒙古人十分坦率地对我说他们如何愤怒，而当窃贼试图第二次逃走时，他们就更愤怒了。有一个地方的脚印曾显示窃贼曾与一个骑马的人一起走了好长一段路，但窃贼拒绝承认这一点，于是又招来一顿鞭子。在回来的路上，塞拉特和马特将窃贼作弄了一番。他们对窃贼说，对他唯一的开恩是允许他自己选择葬身之地。因此，无怪乎那个可怜的家伙出现在营地时显得十分无力，就好像一只被俘的脖子上拴着绳子的大山猫，而蒙古人则趾高气扬地把他夹在中间。

将窃贼在厨房旁边拴好以后，蒙古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被偷走的给养拿出来扔在沙丘上任由大风去吹，给养袋被风撕成了碎条——没人愿意再食用被偷走的东西。

塞拉特和马特汇报结束后，我对他们表示感谢，我送给他们每人50块钱作奖励。巴图和门托也为追捕窃贼尽了全力，因此，他们每人也得到了25块钱。

第十三章　从神话岛到黑城

9月12日下午，一场沙尘暴起自西北，飞沙旋转着飕飕地掠过，风力达到每秒19米。一团黄灰色的雾气飘浮在地平线上空，其状模糊，难以捉摸，我与徐教授在一个沙丘的顶部坐了好久，观察着细薄的沙浪一次又一次地掠过沙丘表面。

被盗的骆驼及其追捕者都因几乎200里的奔跑而疲惫不堪，塞拉特和马特要求在35号营地休息一天，那里有极好的牧草。

由于窃贼的狂妄举动而导致的耽搁使我们与拉尔森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我们只好等着在额济纳河再与他会合了。哈斯伦德检查了一下给养，发现许多食品都已不足了，尤其是大米和面粉已所剩无几。为了弥补这些欠缺，我派赫姆波尔和齐莫曼带上蒙古人洛布桑去追拉尔森，他们将带着得到的给养在追上前锋队伍的地方等我们。

次日早晨，霍德开始了他的气象观测，气球很快消在8400米高空的雾层中去了。我骑上新骆驼与门托一起向西北方走去，前进路线与锯齿状的山链保持着较小的角度。在到达一座有敖包的小山之前，我们穿过了四面的沙丘和稀稀落落的红柳丛。站在小山顶上可以看到北面很远的地方，在蓝色渐褪的地平线现出平缓起伏的丘陵，颇像海中的碎流。在南面，沙海辽阔无边，遍布的沙丘如波浪般翻滚开去。

奥胡林—乌苏泉，其意思是“牲畜水”，它的四面都是日益逼近的沙漠，旅队的营地就设在这里。东面是两座平缓的沙漠覆盖的高地，牧草很稀少，但水却出奇的好。

9月15日早晨，马特和一个中国人前来与我道别，他们带着拉尔森的15只骆驼及其负载殿后，我们也将一只显露疲态的骆驼留下了。给马特的命令是，带着他的队伍缓缓前进，遇到水草好的地方歇上一两天。我们的行进次序一如平常，哈斯伦德带着主力队在太阳升起之

前先行离开，为的是在白天的热浪袭来之前到达下一眼水泉。我本人与门托于一个小时后动身，而霍德一放完气球就跟上来。

旅队走过的地方虽然人烟稀少，土地瘠薄，但却是我在亚洲所见的最为壮丽的景观之一。这里充满了对人类的不屑和对自身的自豪，其荒凉的面孔展现出对我们这些在它的无助而又可怕的贫穷中冒险的“害虫”的轻蔑。我们敬畏其力量、伟大和巨大的面积，但我们也富于挑战精神——探险队正在准备征服这里的沙漠，让其高傲的头颅低下来。我们是对手，沙漠想毁灭旅队的骆驼——驼队的行进路线上满是死骆驼的头颅和骸骨。沙漠还想把水全部夺走，但我们却耐心地从一个水眼走到另一个水眼。夜里躺在帐篷之中，侧耳倾听黑暗中的寂静和孤独，人们会感到安全——因为我们拥有所需要的一切——但事实上我们还得依赖变化不定的土地，同时还得依赖“沙漠之舟”骆驼，它们能把我们带到难以到达的地方，没有他们，我们无法活着回来。在它们的健康平安之中寄托着一切希望，如果它们倒下，我们就完蛋了——就像船上的人遇到沉船事故一样。

9月16日笼罩着一种神秘的、传奇式的不确定气氛，这种感觉不是每天都有的，再向前走一点旅队就进入了巨大的戈壁，到达一个个真正的绿洲。

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向着西方地平线上的两道短而暗的直线前进。直线越来越清晰，原来是两片枝繁叶茂的高大树林，它们并排铺开，相距很近，林子之间的缺口构成了一条狭窄的道路。自从离开北京后还未见过这样的景观，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无边的沙漠中竟有这般高大的、活生生的树丛！这是幻象还是在做梦？这会是真的吗？我的感觉就像灰蓝色的沙漠之海中突然破浪钻出一只海怪，惊得人目瞪口呆。

左边的小树林约有50棵树，右边的约有150棵，旅队的帐篷就在大树林西缘凉爽宜人的荫翳中竖立起来。营地的布局与平常不同，帐篷形成了一个圆圈，中间则是树一小片开阔地——晚上在小开阔地上点起了篝火。我的帐篷处在一棵巨大的杨树下，可以尽可能长时间地

享受其密密麻麻的叶子带来的清凉，我的感觉犹如登上了神话岛。在这短暂的美好休息时段里，每一个飞逝的钟头都是那样的舒服。这一天无疑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小绿洲的名字叫奥农—托罗依，意思是“很多杨树”，其水源来自几眼泉水。我立刻就认出了我的塔里木和田河边的“老朋友”——长着茂密圆叶子的野生亚洲杨。这种杨树的学名叫“不等叶杨”，也就是胡杨，它每年新长出的枝条上的叶子窄窄的如柳叶刀，而老枝上的叶子则是心形的，边缘如齿。

人们立刻就注意到两片小树林的边缘地带非常分明，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它们一起形成了沙海中的孤岛。边缘地带之外没有一棵树，如同用火烧过一般干净。所有的杨树都很老，看不到一棵新树，这片奇异的森林似乎没有继续支撑下去的希望，因为漫游的骆驼会把它的每一棵新苗吃掉。大部分树都挺拔美丽，蔚为壮观，有几棵年岁已高，只能苟延活命。另外几棵树的树身和树冠已塌断，但在塌断处却已长出新的树枝，还有几棵已枯死，但树根依然固守在土中。风暴将树根枯萎的树干刮倒在地，如同倒下的英雄，最高的树达到20米。在树干之间和厚厚的树冠之下漫步，宛如行走在哥特大教堂的回廊和拱门之下。

这样，在伟大的旅行途中我们的“沙漠之舟”宛如登上了一处环礁。这里，在高大的树下，清凉的水正等待着我们，我们第一个念头就是在这里多待几日，好好地享受一番这个小小的人间天堂带来的舒坦。杨树之间长着茂盛的芦苇，这可是骆驼的美食。看它们津津有味大嚼大咽的样子真让人高兴。它们用柔软的、多肉的嘴唇把嫩绿的芦苇一口一口送入嘴中，轻而易举地撕去硬邦邦的苇茎，然后用坚硬的牙齿嚼几下吞咽下去。在疲惫的沙漠长途行军中，能看到骆驼吃草，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是最大的快乐之一。

白日将尽，红日西沉。在帐篷之间的开阔地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柴堆，那是将3根大杨树杆锯掉后堆起来的。杨木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内部塞满了干树枝。天黑以后，我们围坐在柴堆前，升腾的火焰

带着贪婪，咆哮着很快吞没了杨树干。

9月17日当我们离开杨树林时已是下午1点30分。队伍向西面走去，一会儿通过红柳从，一会儿穿过贫瘠的沙质平原，一会儿走过带有咸味的小泉眼，甚至不时还可以碰到茂盛的草地。

次日，我找了一名患痛风症的蒙古老人做向导，报酬为9块钱，他骑着自己的骆驼走在前面，承诺把我们引向去额济纳河的路。

西北方向出现了一群低矮的山丘。左面是黄色的沙丘。我们碰到了一个领着8匹载着毛皮的骆驼的蒙古人。沙地上出现了红柳丛，这种坚韧的灌木越来越多，有的已枯死，有的枝干萎缩，歪七扭八的像抽筋，颇似中国的龙。

沙地上高高的红柳中有几棵杨树，看上去很迷人，红柳根纠缠在一起。9月，随苍蝇和蜂群而来的蚊蚋非常恼人，骆驼也被叮咬的卧立不安。

在沙拉—布伦附近有一个蒙古帐篷村，村旁有一眼泉，周围是长方形的墙，构成一个浴池。在另外一眼泉旁，马可以站着尽情喝水，我们就在这眼泉边安营过夜。

9月21日，旅队的13号营地设在沙尔杜亚尔泉旁边，它的意思是“黄色的红柳”。在这里，我们刚收养不久的一条驼队狗引发了一场激烈有趣的辩论。狗的名字为霍依鲁克，是一个蒙古英雄的名字。一匹驮着货物的骆驼在行进中逃脱，一小时后才被抓回来，徐教授和胡莫认为霍依鲁克惊吓了那牲畜，他们听文物收集员刘说它咬了骆驼的后腿。玛斯考尔、哈斯伦德和我站在霍依鲁克一边，说驼队狗从不咬骆驼。于是大家同意对骆驼进行正式医疗检查，来到骆驼营地后发现霍依鲁克就躺在骆驼中间，根据蒙古人的证言，它每天晚上都如此，为的是保护骆驼。骆驼的左后腿踝关节处确实有一处伤口，我们的对手已相信他们赢了，但几个蒙古人称这个伤口在呼图尔图古尔就已经有了。徐教授说，饥饿的狗吃鲜肉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开玩笑说，也许是刘咬了骆驼。第二天霍依鲁克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这些替它鸣

不平的人以此为证指出，霍依鲁克认为我们是忘恩负义之辈，不想再和诬告它对骆驼施暴的人发生任何关系了。

9月22日，旅队直到下午才出发。前路通过贫瘠的高大沙丘，经过一个巨型沙丘的背阴处时，太阳正好升到它的顶部。此时，远处传来深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铃声，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响。20匹骆驼中走来一个衣着光鲜的商人，我们简单地打过招呼之后问："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他们来自古城，有100匹骆驼和30个人。有些坐在轿子里的人掀开帘子看着我们，问了我们同样的问题。他们的最后一队骆驼数目较大，但铃铛却小一点，声音格外清亮，他们迎着阳光向归化城方向走去。不一会儿，太阳没入地平线，沙丘的影子消失在暮色之中。

旅队很快就到达了舒布恩格布鲁克，整个西方的地平线像在燃烧，红柳丛间闪耀着神奇的光线。为给后面的人显示方向，我们收集柴火点起了一大堆火。他们在天完全黑下来后才赶上来。不久，新的铃声又接近了——这是前面那个大骆队的第二部分，但现在天色很暗，他们的骆驼在惨白的星光下宛如游动的鬼魂。

挨着营地有一个名叫沙乌金—诺尔的小"湖"，大约20平方米，深约10厘米。在这里的一个沙丘顶上坐着一个放牧的喇嘛，他卖给我们一只绵羊和一只山羊。

9月23日，旅队绕过松软的沙丘，穿过红柳丛向西方前进，几乎一整天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景观，最后大家在索契因亚赫泉附近宿营。这里又有一队来自古城的百匹驼队从我们边上经过。很明显，秋天的驼队运输开始了。大部分驼队来自古城，该地在商业上似乎比迪化还重要。

旅队接近勃洛松齐——总算发现了斯蒂尔勒地图集上的一个名称。有些地方的地面硬而平，有些地方则覆盖着小沙丘。最后我们穿越了一段更为难走的沙丘，上下坡时骑在骆驼背上前后摇摆，滋味很不好受。

就在营地西面的平原上有一座高约35米的小山，上有一个堡垒，第二天早上我们的一些人上去察看，据黄文弼说，那是汉代的遗物。这里有大量的陶片和烧火的痕迹，我们收集了一些陶片。

发黄的树叶已呈现出秋日的景色，旅行路线通过稀稀落落的树向西北伸展。旅队在索霍安呼图古尔附近宿营，泉水的味道很不好，散发出硫黄的气味。9月26日的旅程经过了几个很低的山口高地。原野几乎没有植被，一片荒凉，我们只在两个狭长的地段看到过红柳。

在沙胡里泉附近旅队分开了。我们按时到达宿营点后得知不远处就是黑城，那就是科斯洛夫于1909年发现的13世纪古城。大家都想去看一看，于是所有的人都分成组或走或骑前往那里。最后走的是玛斯考尔和中国学生刘与隋，他们带着骆驼和晚上宿营的东西。只有我和哈斯伦德在沙胡里泉附近过夜，蒙古人和旅队的大部分骆驼都在这里。

清晨我们循着其他人的脚印跟了上去。7点时凛冽的寒风刮了起来。原野单调乏味，我们走过几片狭窄的高地。高地两边很陡，但只有几米高。每个高地上都有一到两个敖包，在第一个高地的脚下生长着一片壮观的杨树和红柳。高地上则寸草不生，全是光溜溜的鹅卵石。我们还看到3处古老的瞭望塔，排成一线挺立在风中。

现在黑城出现了，虽然极为荒凉，但却漂亮，令人印象深刻。其南城墙和西城墙上有成排的突出的望楼。在黑城西南还有一个清真寺，清真寺附近则是我们的人的帐篷。大部分人都在城的周围走动、绘图或摄影。我爬上城墙画了几个简单的草图。城墙几乎完好无损，只有东边和西边有门，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学生们丈量了城墙的周长，南墙425米，西墙357米，北墙445米，东墙405米，墙内侧有建筑和房屋的痕迹。墙里墙外都是新的沙丘，一直延伸到与城垛齐高的地方。在西门以内则是一个孤立的沙丘，这是多年来强烈的风将沙子刮进城门堆积起来的。

描述这座古城是考古学家的事情，科斯洛夫已就黑城写了一本书，奥雷尔·斯坦因和兰登·瓦尔纳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该城无疑是

马可·波罗所说的额济纳，这个名字经常可以在中国人和额济纳河的蒙古人的历史记载中看到。今天这里被称为哈拉霍托，意思是“黑城”，但据说也叫巴图—彦云—霍图，意思是“英雄将军之城”。根据对随身所携带的历史著作的研究，徐教授就该城在历史上的作用有自己的看法，也许我应该在后面再讲一讲这个问题。我熟悉的古城楼兰比黑城早一千多年，当马可·波罗访问额济纳的时候，楼兰已在沙漠中沉睡了千年。

我只在黑城逗留了两个半小时，黄文弼也不愿意待在这儿，所有人都渴望去额济纳河探险。

下午两点，旅队继续前进，旅行路线通往西北，很快进入两座长满植被的大山之间。事实上，这两座山形成了一道门户，里面则是真正的山的迷宫，旅队的路线就自然愁肠百结般地穿行在通道和峡谷之中，枯死的和充满生机的红柳处处可见。有些如真树一般，高达六七米。地面上半是带有风沟的发软的沃土，半是坚硬的碎石，在两座山丘之间出现了一片根系纠结在一起的杨树林，绿色的山包就像黑城附近的清真寺圆顶，高10米左右。

原野变得越来越开阔，绿色圆顶似的山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我们把最后一批“岛屿”扔在后面，再次扑进了“大海”。肥沃的土壤由于风的作用出现了一道道沟，但这儿的沟壑还是比较浅平。

48号营地处在荒凉的平原的中心，地面又平又硬，到处都散布着死树干。这又使人想起了古老的罗布诺尔楼兰周围的沙漠。但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儿的许多枯树的根还在土里，而黑城以西的枯树无一例外都是低矮的无根之树。平原周遭的整个环境犹如一个刚刚经历了血腥战斗的战场，“战死者”横七竖八地躺在各处。大概这里在13世纪仍是森林，后因缺水树木逐渐干死。

距“黑城”不远处有一处废墟，很可能是一处前沿防守阵地。

一只黄色的蝎子从胡莫和哈斯伦德的帐篷的褶缝处爬进营地，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只这类蝎子，它立刻就成了旅队收藏物的一部分。

霍德博士放完了最后3个试验气球，它们达到的高度分别是12900米、12700米和10800米。

第十四章　田园牧歌般的营地

9月28日是伟大的一天，我们来到了额济纳河，拉尔森已经到那里5天了。清晨5点哈斯伦德就带着驼队出发了。7点时我也动身了。旅行路线通往西北方向，穿行于长满植被的半圆形山脉之间，左手方向可以看到两个苏佛尔伽，也就是神龛，以及一间房子的废墟，而右手稍前一点则有5个神龛。

终于，在西北方向展现出一幅令人兴奋的图景——额济纳河的杨树林。旅队很快到达那里，在杨树树荫下行进，大半杨树叶子已显出秋天的黄色。在干涸的河床边上，成群的绵羊在吃草——这儿的森林更为茂密。

继续前行，开阔的水面在树林之间闪着粼粼波光。这就是那条河了，不，它仅仅是一条小支流，很浅，大约有20米宽。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主河道岸边，巴图来迎，把大家引向渡口。他骑着骆驼走在前面，我们紧随其后。走在前面的是我们的向导，其次是门托，最后是我自己。面对浩大的水面，骆驼显得有点迟疑，但巴图的坐骑已到过这里两次，一点也不害怕，相反倒似乎喜欢在水中行走。我们的沙漠骆驼很可能一生也没看到过这么多水，它们跟在头驼后面，小心翼翼地用前蹄试探着噼里啪啦地走进去。河水又稠又黄，像豆汤一样，最深处只有1米，最宽处为212米，流速相当快。

拉尔森在西岸迎接我们，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欢天喜地地把我们带向固定营地。路西边的沙山异乎寻常的高，沙山之间是红柳、柏树似的灌木和其他植物。同时，还有两座光秃秃的沙丘横在前面，再向前走是一片杨树林，树叶已开始发黄，但绿色仍是主色调。我们向南通过第一片绿荫匝地的树林，看见一段开阔的平地形成的河岸，在河岸最外沿的水边，一面瑞典国旗在一根高达7米的旗杆上迎风飘扬。

整个地方呈现出一派浓郁的田园风光，这是我们进驻的最迷人的

营地，大家期望得到的东西是那样真实，以致对神话岛的记忆渐渐消失在身后的远方。那里只有约200棵杨树和几片随风摇曳的芦苇，这里则有一大片森林，草和芦苇像人一样高，干枯的树干足够烧几年，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拥有那片小绿洲十分缺乏的水——一条大河从帐篷旁边流过。

当我审视着这个即将在未来一个月中成为旅队大本营的营地的时候，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欢乐与感激之情。等待我们的是美好的休息和工作时间，而留在身后的是包头以西的千里荒原和沙漠。伟大的发现之旅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所有工作人员都走向俱乐部帐篷。俱乐部建在森林边缘，此时完全沐浴在阳光之中，帐篷里边热得几乎难以忍受。只有5个营地凳子经受住了近1000公里的长途考验，几张桌面损坏了，因此只有我们5个人在俱乐部享受着热烈的氛围，其他人无处可坐，只能站在露天杨树荫里的几个箱子旁吃饭。这里凉爽宜人，虽然秋天正在逼近，但夏日的余热仍未退去。对我们而言，这里的9月末似乎比呼图尔图古尔的7月末还热，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这里的高度只有900米。

下午，大部分人都跃入水中，在紧靠大本营汹涌而过的急流中或沐浴或游泳。玛斯考尔从河岸陡坡上爬上一道高约30米的土堤，喊着他的宠物小羚羊跟上去。虽然小羚羊从未见过河流，更没游过泳，但它一刻也未犹豫就跳入水中向它的主人游了过去。

在来额济纳河之前，我就决定要对这条河流的下游及其注入的两个湖泊进行一番彻底调查。因此，在吃饭的时候我委托拉尔森造一艘船，至于如何去造，我并不关心。他平静地回答说那并不难，如果是掏空一棵树做独木舟的话就更容易了，他已清楚地知道船应该是什么样子了，并保证他造的船能把我载入湖中。次日早晨造船工作就开始了。

我们同时还忙于其他几个计划，一系列重要的调查方法尚需讨论。的确，旅队可支配的时间不少，在最好的情况下，诺林的纵队和袁教授的纵队到10月中旬才能赶上我们，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可能迟

到。在知悉他们的进展情况以前，我们还不能向西前进，只有等到他们到达之后我们才能制订返期的计划，因此各种分工必须让大家都满意。同时，也只有所有的学者都重新聚到一起的时候，才能决定谁在整个冬季留在1号气象站，谁跟大部队继续前进。这样，我们除了等待外别无良策，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时间。

在邻近的地区，额济纳河径直流向东北，宽达140米，自营地数起，河中有11道土堤。河流的流速达到每秒1米，就在营地的下游有一个河滩。河道最深处为1米，其他地方深约20厘米，而在距我们散步的地方不远处，有两个地方的水深不见底。自然，在我在大本营的41天里，这些数字都在变化，霍德博士测得的水流量为每秒20立方米。

大本营有16顶帐篷，开口都面向东南。营地长为180米，最宽处为80米，我的帐篷距波光闪耀的河流40米。蒙古人的3顶帐篷处在左翼的最外沿，挨着他们的是气象观测屋、风向与风力测量杆、河流水位测量器和日晷。旅队还在这里修了一座桥，目的是为了能够迅速测量水位、水温和流速。在这个被称为“港口”的小区，无线电接收站的天线也竖了起来。和蒙古人的居住区相比，“港口”比较开阔通风，没有树荫遮挡。

第二排帐篷处在森林边缘，第3排在森林里面。森林与河流之间的半月形地带是开放的。这里有3件事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啪啪作响的瑞典国旗、长列的给养和仪器箱、晚间点营火的地点——这个地点距我们帐篷不远。一到下午，当夜晚的凉意渐浓时，就可以看到那帮无所事事的蒙古人拖着或扛着干树枝堆放到火堆上，拉尔森已把点营火变成了一种业余爱好，他把干枯的树干劈成适当的长度，然后，将其垒成一个长方形的柴堆于晚饭之后点燃起来。

厨房及其所有的箱子、储备、壶和盘子都摆在俱乐部帐篷附近的杨树林中，这里经常可以看到拉尔森的身影，因为他负责从我们的邻居土尔扈特人那里采购绵羊、母牛和公牛。在这里，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面容清秀的老年妇女为诺颜蒙古族语：首领。，也就是我，高高

兴兴地带来一罐牛奶。

那就是额济纳河——地球上最为美好和光荣的河流之一，它是多么勇敢地与夏日火热的沙漠抗争啊！经过令人窒息的荒凉沙地的长途行军之后，置身其凉意习习的岸边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如果人们只能喝到散发着硫黄味的碱水，那么当他经过高过骆驼肚皮、而且甘甜如泉的河流时，他是难以一下子相信自己的眼睛的——我们感到似乎一下子进入了一个人间天堂。

一个有些启发意义的场景拉开了9月的最后一天的序幕——偷骆驼的罪犯要接受判决。在我们帐篷前的瑞典国旗前站着徐教授和我，在我们的身后其他人站成了一个半圆形。盗驼贼被蒙古人带来了，他显露出顺从和悔恨的神情，双手举帽，弯腰如弓。我上前讲话，徐教授做翻译。

“我们雇用你时完全信任你的诚实，期望你能够光荣地履行职责。你辜负了我们的信任，因为你将我们最好的骆驼据为己有，虽然你知道旅队一只多余的骆驼都没有。根据中国法律，你的罪行将使你受监狱之苦。的确，我们完全有权力将你送往马木交给司法当局，但我们仍要以慈悲为怀。你将再度获得自由，并由两个蒙古人将你带到南面60里外的一个森林区，你将在那里被释放，然后去你想去的地方。你将得到头几天的给养。现在就准备上路吧。”

徐教授在翻译时也添加了几句他自己的劝诫：罪犯应放弃偷骆驼的恶习，想想如何给自己的孩子做个好榜样。

罪犯心怀愧疚地磕了个头，感谢我对他的宽赦。然后他被带到南面60里外的森林中释放。然而，当蒙古人转身离开后，他在后面喊道：“看好你们的骆驼，我还会回来的。”那不过是空话，他很清楚如果那样的话，蒙古人就会毫不客气地撂倒他——不需遵守任何冗长的程序。

拉尔森、玛斯考尔、穆伦温格和几个蒙古人花了大量时间安排、检查和估算旅队的储备。尽管在呼图尔图古尔和行进途中各花去了两

个月时间，我还未能亲自查看那一长排一长排的给养箱，它们像墙一样摆在营地的边缘，但却逐渐变小。我向拉尔森解释说，如果可能的话，和我一块去哈密的骆驼可以只带半数行李，我们只需带路上够用的给养即可。在有人烟的地方依靠和当地居民一样的食物可以生活得很好——比吃加工过的食品要好。然而，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最必需的储备已开始短缺，面粉、大米和糖尤为不足，这些不足必须在出发前于马木补足。

全部给养都被解开放在草垫子上，装豆子的箱子像小山似的放在一张垫子上，鲱鱼箱放在另外一张垫子上，沙丁鱼箱、玉米牛肉、豆类、可可、茶、巧克力、牛奶、奶酥、柑橘酱、糖果放在其余的垫子上，而所有那些不能吃、而专为享乐或工作用的东西，如雪茄烟、香烟、烟草、硬脂蜡烛、石油筒、火柴及其他东西则被放在一旁。

只要这些货物堆放在露天，晚上就要在营地设立岗哨。与此同时，为了使所有货物保持新鲜，便于登记和编号，木匠们把箱子做得小了一些，最后，带有旧铁把手的新箱子被放在牲畜的背上，准备再次跨越沙海。

大家手把手地把给养储备分成了不同的部分，额济纳河的1号气象观测站至少在一年里所需要的东西被单独放在一旁，主力队伍在去往哈密的旅行中所要消耗的东西被放在另一边，第三部分货物用作在固定营地休整时使用，估算为一个月时间，第四部分货物的箱子中则装着收藏品。

与此同时，造船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9月30日，人们邀我去“船坞”，我们英武的“蒙古公爵”拉尔森就站在这里，他威风凛凛地扛着一把斧头，自豪地向我展示着那艘用新伐的白杨树干斧凿而成的独木舟，独木舟粗糙沉重，穆伦温格跨进去以后解开了拴在木桩上的缆绳，然而，他还没驶出两米远，船就翻了，他不得不游回岸边。冯·考尔设法再试一次，结果还是掉进了水里，站在岸上观看的蒙古人和汉人都大笑起来，门托甚至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您真的认为我应该划着这个‘贝壳’渡过苏泊淖尔的波浪吗？”我小心翼翼地问着拉尔森，“我一点也不想自杀。”

“耐心，再耐心，我亲爱的博士。”他回答，“我们正在准备建造第二艘‘贝壳’，然后用一块甲板把它们连接起来。”

顺河而下30公里处居住着土尔扈特人的头领和王子，我们必须赢得他们的友谊和信任，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气象站和让他们同意我们在此放牧越冬的骆驼。因此，在最初的几天里，我们就派了一名信差，带着我和徐教授的名帖，告知我们很快就要登门造访。作为回报，对方也送来了自己的名帖，并欢迎我们去他的府上做客。

下午快结束时我一般都要视察一番骆驼，晚饭后拉尔森则点燃硕大的柴堆。于是，我们在森林边缘围成一个半圆形，铺开垫子，大家或躺或坐地在上面休息。这时蒙古人的乐队——由一支笛子、一把弦乐器和一名歌唱者组成——便开始演奏他们那动人的亚细亚旋律，这也使我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伟大的意义。天气越凉，人们就越喜欢篝火，烈焰飞腾的柴堆周围成了大家聚会的场所，除了进行观测和接收瑙恩时间信号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聚集到这里来了。从现在起，在这里的篝火旁，我与徐教授和移动“城”的其他成员举行会议，同时，第二天要执行的命令也从这里发出。

胡莫博士和哈斯伦德为他们那支准备前往嘎顺淖尔和苏泊淖尔的小旅队置办装备，他们将成为第一批到达那个渴望已久的湖泊的人，旅队考虑在那里建立第一座气象站。他们着急的原因是，胡莫博士要赶在第一场夜霜落降前去那里收集植物和昆虫标本。他们要带4匹骆驼，还有租自土尔扈特人的两匹马，带驼人是塞拉特。拉尔森极不情愿将骆驼用在短途旅行上，他不会将前往哈密的上等骆驼交给胡莫他们，他们只得到了留在这里过冬的骆驼，它们大部分出自安德鲁斯的驼队。这些虽都是好骆驼，但却都已稍显羸弱，急需休息和放牧。

下午时辰一到，小旅队就整装待发，塞拉特带着4匹驮着行李的骆驼出发了。而旅队年轻的医生和丹麦朋友则忙着与大家告别，生活的快乐使他们红光满面，青春洋溢，这使人打心底里高兴。他们飞身

上马，骑着土尔扈特小马轻快地消失在森林之中，身后卷起一路烟尘。他们的鞍子上绑着武器、望远镜、摄影器材、皮包和雨衣，所有这些东西在一起叮当作响，俨然一幅出征的景象。

次日，拉尔森将“船”准备妥当，那“船”由两只独木舟组成，两条粗粗的横木将它们固定在一起。两根横木之上是甲板，这些木板是做驮箱时省出来的，因为驮箱做得比以前要小。我登上“船”并邀请徐教授共同参加首航，乘员还有赤着脚、手握撑竿的冯·考尔和高姆博。他们撑船离岸，很快就进入中游，不久大家就搁浅在一段隐蔽的沙地上，船员们跳下船将其推入水中，现在只有左岸的河水较深，离营地不远处深深的河道又流向了右岸。

突然船又再次搁浅，这次是在河床的中心，一些蒙古人一直在岸上跟着我们，这时他们趟过水来想上船，门托走向我坐着的船首，在岸边他就陷入了深不见底的水中，跟其他蒙古人一样，他也不会游泳，于是他们紧紧附着在一个独木舟的舟体上，本来就因负载而已经沉重不堪的独木舟被拖进水中灌了许多水，好在最后一刻他们跳上了陆地。经过这次水中之旅以后，他们的脚比以前稍干净了一些。

那之后，冯·考尔和我只用一只舵单独试航，不久航行越来越顺利，但结果却是这只船被弃置不用了。对这条浅浅的河水而言，这条船显得太沉重了，而且在开阔的湖面上也很危险，因为一旦遇上风暴，水浪很快就会将独木舟灌满，因此，必须找一条更为特别的船。要是有一条我在西藏使用过的英式可折叠船就好了。经过激烈地讨论，造船专家冯·考尔很快给我看了新船的设计图纸。新船由木条制成，上覆帐篷帆布或旅队俱乐部帐篷的天篷布。但当进行试验时，才知道这两种材料都不防水，于是想到用羊皮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拉尔森也将渡船拖到了“船坞”附近的陆地上，目的是让它彻底干透——它对加固营地也许还真的有用，现在则要将它放置一段时间。

10月4日，考古学家黄文弼要出发到嘎顺淖尔以及该湖的南部地区进行一次考察。根据西汉的历史记载，固原老城据说就在那里。这次考察估计要持续25天，他带了5匹骆驼、必需的一些给养和随从。

与此同时，我派蒙古人萨兰·高里尔去波罗桑旗寻找马特，他带着16匹需要休整的骆驼留在后面的36号营地，高里尔要去给他带路。马特保住了骆驼和行李，还找到了一匹失踪的骆驼，只有两匹骆驼死于途中。

10月5日，赫姆波尔和齐莫曼出发沿着河流向东北方向作一次短途旅行，我们听说在河的左岸有泥房子，起初为汉族商人所建，现为土尔扈特人的王子所有，这种房子也许适合作1号气象站的物资仓库。如果是这样，1号气象站就要移到那里。我曾经向徐教授建议应该把收藏品留在1号气象站的营地中，等着后面的骆驼将其运到归化城去——这样就可避免前往哈密的骆驼作出牺牲。徐教授完全同意我的建议，收藏品留在后面由1号气象站的负责人照管。然而，那座泥房子并不合用，因此，为了给1号气象站寻找一处更好的地点，有必要向湖泊远处进行一次新的短途旅行。

晚上我去看望住在大帐篷中的中国学生——4个人都在工作。他们勤奋好学，愉快而友好，学生李和刘相当出色，学生马却有一件憾事，因为他被挑选出来留在1号气象站。留下来的欧洲人心情也和他一样，所有人都想与其他人一起旅行到终点，没人愿意失去宝贵的探险机会。假如满足他们的愿望，那么我们就只能建一个气象站，那就是考察的终点和田河气象站，但学生马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年轻人，他说服自己接受了这一安排。

由于有了这么多的经验，霍德博士也在后悔没有在包头也建一座气象站，而这本来也是我们的意愿，只是后来放弃了。不管是从科学的角度看还是从实际的角度看，在包头建一座气象站都实属必要，因此，我们决定征得徐教授的同意后重新执行旧计划，委托学生隋在包头建立一座气象站，于是他将从这里返回北京与我们的委员会和中央气象站取得联系，并于3月1日前往包头进行气象观测。当我告知他这一决定时，他非常平静地接受了，陪他上路的是洗衣工和一名厨子——这两个人现在已完全可以不用了。另外，两名游手好闲的蒙古人被我们解雇后也随他一同走了。

不知不觉间秋意渐浓，森林呈现出越来越重的黄色，草木开始凋零，10月7日的前一晚降了第一场霜，在地面1.6米的高度温度已降到零下1摄氏度。与此同时，就在前一天，我们还经历了一次20.9摄氏度的天气，10月7日早晨7点，河水的温度为7.6摄氏度。洗脸盆的水中也漂着一层薄冰，人们感觉到夜间的丝丝寒意好像还留在地面和空中，于是大家都感到围在火舌飞舞的炭火盆旁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了。

第十五章　中国节日和德国信使

时间在流逝，在一个美丽的日子里我们获悉，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16年已经过去了，旅队中的中国人决定举行一场庆典，蒙古人和欧洲人都受邀参加。在距那个伟大日子的最后一周，人们已完全可以推测出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了。中国学生和蒙古人忽然开始练起了跑步和运动技能。学生们不但从傣特曼那里借走了颜料和刷子，而且还请求冯·考尔和齐莫曼帮他们进行一些准备工作。拉尔森向蒙古人解释说10月10日晚上的营火必须是世界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也许远在北京的人都可以看到它的光亮，他还说北京距此不过区区1500公里。尽管如此，我从来未曾想过将会有一次如此重大的庆典。

10月10日前一晚上的温度降至零下8.3摄氏度，中午12点的温度甚至还不到零上4.9摄氏度，3点时河水的温度为10.5摄氏度，晚上9点时河水温度降至5.5摄氏度，而空气中的温度为0摄氏度，这些气温数据对那些即将参加庆典的人来说有一定的重要性。

庆典在早晨10点开始了，我到达现场时，所有的欧洲人，中国人和全部随从都已经聚集在一个类似壁龛的凉棚前面，凉棚的两边是一些白杨树，场地的中间是一个用两只箱子摞起来做成的平台，上面铺着白布，装饰着树枝和各色花束，在“宴会厅”的入口处悬挂着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其右边是画在纸上的瑞典国旗在迎风飘扬，左边是德国国旗。场地的四周有许多挂在绳子上的纸片，上书意义重大的格言警句，其中一些是这样的：进步，天天进步！自由、平等、博爱！有志者，事竟成！古人说“知易行难”，孙中山说“行易而知难”！（Understanding is not difficult，but knowledge is difficult.）

这时徐教授走向前来，宣布庆典开始，并向旗帜敬礼，然后便是两分钟的静默时间，静默时所有的人都脱帽鞠躬，表示在思考节日的意义。

庆典的第二个项目是唱国歌，在唐代有歌曲类似于后来的国歌，但那歌曲只是颂扬伟大的唐太宗，据说演唱歌曲时，甚至连皇帝也要起立。现在的中国国歌很奇特，其中没有一个政治词汇，也没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暗示。其歌词来自远古，据称有四千年之久。歌词较为简约，大意是：“云彩多么美丽，就像白色的棉花。日月的光辉永不熄灭。”歌声不断回荡在额济纳河岸边。

向中华民国国旗致意后，徐教授登上平台，用中文向他的同胞进行了一场演说，然后他又将其翻译成法语演说给我们这些外国人听，我只记录了其中的大意：

“欧洲认为中国的命运比古老帝国的命运好不了多少，即使这在如今看来是真的，但也只是表面现象，而且这是互相争雄的将军们的错误，但这种局面将会过去，中国正在走向更好的时代——没有内战，没有分裂，没有争斗，没有战争。”

“在基督文明来临之前的第七世纪，中国人并不欣赏战争之术，但在孔夫子时代发生了变化，野蛮人入侵中华，中国不得不保卫自己。那时候有一个名叫鲁的国家并不十分强大，但当野蛮人四面来袭时，它进行了坚决地抵抗。孔夫子本人也是鲁国人，因此，他带着新的理论在他们同胞中间宣扬祖国之爱和守土敬业精神。如果没有孔夫子，鲁国早就亡了，现在他的新理论和新文化泽被神州大地。秦以武力征服中国，鲁则以其文化和精神征服中国，其征服是一场和平渗透。孔夫子的传统肇始于鲁，自那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忠实于这一传统，其目的是尽可能地发扬光大中华文化，并以之作为抵抗外敌的干城。”

“目前，中国正在遵循这一古老传统的原则，要用中华文化作为抵抗外敌的武器，也就是抵抗那些将中国视作殖民地的外部强权。”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落后的，我们需要所有能够得到的帮助，这种帮助不仅仅来自瑞典和德国。在这些优秀的向导的帮助下，我们将在中国文明化的过程中取得巨大的进步，这将给人类带来好处，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必定会为世界作出更大的

贡献。”

最后，徐教授对我说了一些友好的话，并感谢我们和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感谢所有欧洲人的友谊、尤其是感谢那些参加今天节日庆典的欧洲人的好意。

令我吃惊的是，庆典节目单上的下一个节目竟是“斯文·赫定博士讲话”。好啦，我想，以前我也曾陷入比这还要严重的困境，于是我拔腿走上讲台。我表达了参加如此隆重的庆典的喜悦之情，表达了自己的诚意、由衷的同情和希望——这些同情和希望不但来自于我们，而且还来自于我们所代表的人民，并衷心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繁荣。最后，我四度向中华民国国旗欢呼致意。

然后，齐莫曼以所有客人的名义发表了一次极为精彩的讲话——他说的是法语，有的地方甚至还押韵。齐莫曼不久便被选为额济纳河气象站的站长。齐莫曼之后，学生刘也向他的年轻的、充满热情的同胞发表了讲话。

节目单上的第七个节目是“音乐和朗诵”，其下有一系列的小题目。

节目中朗诵的许多诗歌都来自远古时代，如一个生活于7世纪的伟大的鲜卑族将军斛律金，他不识汉文，但却在诗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感情，诗歌说：“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另外一首歌讲的是西汉时期的苏武，汉武帝派他为特使出使匈奴，匈奴人企图说服他归顺。由于他不辱使命，拒绝诱惑，匈奴人将其流放至边远地区，他在那里牧羊19年。后来，他终于获得自由回到中国，即使在两千年之后的今天，人们仍以下面的歌曲歌唱忠诚的苏武：“苏武羁留匈奴威武不屈，牧羊十九载冰雪做伴，茹毛饮血不辱使命。牧羊北海之滨，不忘汉家故土，旄节毁而难归，备尝艰辛志不坠，忠诚汉家心如铁。夜醒闻听胡笛音，心意翻腾珠泪滚，忽闻北风起，群雁南归捎羁愁，白发老母依门望，看穿秋水思儿郎，娇妇独坐

帐幔后，满腹幽怨谁与诉。夜半梦连连，争恨鸿雁不飞渡。海枯石烂心不变，一腔赤诚同日月，可期匈奴力渐衰，汉皇威扫胡天霾。”

然而，我们的中国东道主们不仅向我们吟诵了古典诗歌，一些颇为现代的、多少带有一丝共产主义意味的、歌颂自由的歌曲也在额济纳河畔的树林中回荡。

庆典的文艺表演部分是在帐篷群前面的平地上举行的，驮鞍上的盖布铺在地上形成了一个边长12米的小广场，人们在这里唱歌、朗诵、游戏，各种活动一个接一个。

不过，参加庆典活动的大多数人，包括蒙古人和土尔扈特人，都觉得节目的第二部分，即文艺表演，比第一部分更有意思。因为他们现在至少能明白节目的内容，因而可以尽情享受其带来的乐趣。

接下来要举行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跑道”旁边是一排看台，全用箱子摆成，上铺驼布。

其实，只有徐教授、拉尔森和我坐在看台上当观众，因为其他人几乎都参加了比赛，沃尔兹是一个极棒的“运动员”，可惜他生病了，但发着高烧的他坚持要参加比赛，我苦苦哀求他保重身体，但也难以让他回心转意。里艾伯润兹机警的如同一只猎犬，扛着沉重的摄影机来回忙活着，他拍下了一系列珍贵的照片。

徐教授、拉尔森、齐莫曼和赫姆波尔都是裁判员，我自己不是一个运动员，无法根据比赛规则描述这些狂热的比赛的过程。

日落前夕比赛结束了，饥肠辘辘的运动员们开始准备用餐。菜单上有葡萄酒、肉馅饺子、沙丁鱼、蒸苹果、米饭、绿豆汤、咖啡、茶、饼干、雪茄烟和香烟。“葡萄酒”为蒙古所产，味道很怪。

庆典活动取得了成功，人们胃口大开，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用不着发表讲话了。的确，歌颂祖国的讲话已经足够了，现在该填饱肚子了。

大家心情非常愉快，中国人都是非常优秀和礼貌的东道主。

用餐之后是颁奖活动，颁奖过程颇为难办，因为所有的欧洲人都主张把自己的奖品颁发给一无所获的蒙古人。

最后一个节目的主角是拉尔森，他用一整堆树干摆成了一个约4米高的四方形，其中填满了干燥得像引火绳似的树枝和圆木。夜色降临额济纳河，柴堆燃起了火焰——如此大的篝火我以前从未见过，只有整幢房屋燃起的火才可能与之相比较。

在熊熊升起的烈焰旁我们举行了最后一场体育比赛——6名德国人和6名蒙古人拔河比试力气。最终蒙古人获得胜利，他们早已习惯于搬弄旅队沉重的箱子，这功夫早已经练成了。德国人不肯认输，还要再次比试，结果绳子突然绷断，这12个人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四仰八叉，腿齐齐地指向空中，观众们被这突然的一幕逗得大笑不止。

接下来又是音乐演奏——中国音乐、蒙古音乐和欧洲音乐各自施展魅力，留声机、曼陀林各展风采。人们在音乐声中饮茶、聊天、逗趣，各种语言交替着。

时间宛如长了翅膀似的在轻快、和谐和友好的气氛中飞逝，最后，我代表客人们真诚地向徐教授表示感谢——庆典举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一盛举，我们不会忘记在这个凉爽的秋日里中国人民对自己祖国的真诚敬意。

喧嚣的庆典过后，额济纳河之滨又重归平静，秋天的凉意在继续——晚上的气温已低至零下8摄氏度，早晨10点则上升至零上3.1摄氏度，而下午6点又开始降霜了。

现在“供应纵队”该向马木进发了，在我们向哈密进军之前他们要对给养进行补充。马木坐落在额济纳河右岸，距离我们有223公里之遥。10月13日午饭之后，玛斯考尔率领旅队出发了，他们手下有学生刘和马，一名赶骆驼的汉人和7匹骆驼。他们要完成一系列任务，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取回从北京来的邮件，它们是徐教授和其他中国人渴

望已久的东西。我也急切地想看到这些信件，因为我想知道北京委员会对我的建议的答复。

我和徐教授写了许多信件，交由马木的邮局寄走——考虑到考察队将来的变故，这些信件还是相当重要的。它们都是徐教授深思熟虑的结果，为了稳妥起见，他把这些信件都为我译成了法文。

其中最重要的一封信是写给迪化的新疆“统治者”杨增新的，他拥有很大的权力。在信的开头，我们向他简要地介绍了考察队的科学目的和在额济纳河的旅行，然后告诉他考察队很快将转向哈密和善鄯，然后由此趋向吐鲁番和迪化。

“我们欲在哈密建立一座气象站，我们得知您总是不遗余力地襄助科学事业，我们相信您也将支持我们的考察活动，我们怀着极大的敬意等待您的消息，期望您敕令沿路各当局在必要时予我们以协助。抵达迪化后，我们将亲自登门拜访，亲耳聆听您的高见。为不致唐突，现提前致函前来，敬请过目。”

这个简短的信件对杨增新而言并不算什么新情报，因为在冬天，张作霖元帅已经将考察队的事情电告了他，并且还给我写了一封亲笔签名的介绍信带给杨增新，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北京委员会也已经告知新疆方面考察队即将到来的事情并请求予以支持。

我们这封信件的目的旨在告知杨增新考察队的行动路线和考察队目前的情况。他肯定已经等待好久了！他将如何接待我们？中国的政治局势——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已经耳闻了一些不确定的传言，这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对我们的态度？自1911年以来就在新疆实施铁腕“统治”的杨增新会不会感到这场由中外科学家组成的科学考察是入侵？我们能否成功？对这些我们自然一无所知，然而这种种不确定性却增加了考察的魅力和悬念。在前去哈密的路上这些担心肯定会与日俱增，所有这些神秘疑问的答案只有在到达新疆边境时才能得到。

考察队的中外成员都利用此次机会向远方的亲人写信，因此邮件变得十分沉重。一切就绪后，送信的“邮差”队伍就上路了，玛斯考尔

挺着笔直的身体平静地走在队伍之中——他带着自己的骆驼要走完第一段行程。刘蜷缩在牲畜背上，开始着手画行军路线图。

玛斯考尔从我们中间离开后，我们这座移动的“城”的一位“居民”变得非常难受，那便是小羚羊。它四处乱蹦，徒劳地在玛斯考尔的帐篷中寻找它的主人，晚上在篝火旁它也是焦躁不安和满腹狐疑的样子，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将它逮住并锁在俱乐部帐篷的储藏室中——它的睡毯已经铺在那儿了。伴随时光一天天地流逝，玛斯考尔也变得越来越遥远，小羚羊也慢慢平静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然而，所有人都相信，它不会忘记它的主人、保护者和朋友。

和各种实际的准备工作一样，大本营的科学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天气好时，傣特曼不管在白天还是晚上都要进行天文位置观测，10月12日，经过一系列的观测和接收瑙恩时间信号后，他确定了1号气象站的地理位置，其所在位置为额济纳河畔。通过新的观测手段，他打算尽量使观测结果接近最终值，与此同时，他还在画水彩画。

为了寻找理想的1号站位置，几支小分队出发作短途考察，但最终我们还是觉得最合适的地点莫过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营地，这是拉尔森在9月23日选定的，这样，霍德博士就可以和他的中国同事们于10月中旬开始着手建立气象站了。

经过一番忙碌，气象观测工作就正式启动了，湖岸附近的空地上竖起了篱笆，里面很快竖起了4根高高的柱子，用作气象观测的仪器就要放置在这些柱子上面。

霍德博士每天都要释放试验气球，他十分热衷于研究夏秋高空气流运动的结果。10月12日的气球升至距地面14840米的高空，这已相当于15700米的海拔高度了，连续5周的观测结果出来以后，这一数值还会变得更为准确，而根据一年半以后的观测结果，我们就会更加接近真正的绝对高度。

在10月15日以前的日子里，大多数人，首先是我，可以说忧心忡

忡，因为我们的给养开始短缺。旅队虽然能够平安抵达哈密，但在那儿需要用钱。我已为自己向迪化转了一大笔款子，但现在还需要将一部分钱转往哈密，以便我能够顺顺利利地从那里旅行到迪化。

因而这些天我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从早晨到深夜一直坐在帐篷中的“写字桌”前不停地写呀写，只有当晚上帐篷前的篝火燃起时，我才出去坐一两个小时，与其他人聊聊天或听听音乐，然后便回帐篷继续工作。每过两个小时，门托都要进来换一个火盆，里面是红彤彤、暖洋洋的木炭火。

为了使信件尽可能快地抵达斯德哥尔摩，所有外国信件都要委托给迪化的邮局，经由一条较马木更为安全的路线送出去。

10月8日我给沃尔兹下达了命令，要他在10月15日出发前往迪化去送信，他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高兴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沃尔兹来自巴伐利亚，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和登山家，他浑身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力气，他属于那种不知困难为何物并酷爱野外挑战的人。

从额济纳河到哈密的直线距离为650公里，哈密到迪化的距离为550公里。然而，这位信使还要再从迪化返回哈密，再走550公里，这样他总共要走1750公里，但事实上道路并不是一马平川，最后他至少要走2000多公里的路程。

将这样一个不愉快的任务交给一个手下使我内心感到很不安，并且只有两个赶骆驼的人跟着他，一个是蒙古人萨尔彻，另一个是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要途经一些土匪出没的地区，因此我很不放心。但沃尔兹本人却一笑置之，声称他倒确实希望能与土匪们会一会。那两名亚洲人也很高兴能够与沃尔兹一同前往，和沃尔兹一样，他们也认为这次使命是对自己极大的信任，是一个荣誉。

拉尔森在一旁平静地断言，如果沃尔兹说的情况出现，土匪们将倒大霉，因为勇敢的沃尔兹是一个神枪手。里艾伯润兹则声称，如果

谁能为他搞来一队真正的土匪让他拍摄的话，他愿意为每名土匪出价50元。他还说，如果人们事事害怕的话，那最好不要来亚洲旅行，而应舒舒服服地待在家里吃肉喝酒。

沃尔兹只能带一顶帐篷，那两名同伴也要与他睡在里面。拉尔森的任务是挑8匹最好的骆驼供他们使用，3匹用做乘骑，其余的驮载给养、冬衣、睡袋、帐篷、个人装备、武器弹药、炊具和两个小水壶。

我为他们规划的行军线路是沿着巴里坤的大旅队所走的路线通往古城。到达这里以后，骑马或坐马车与随行的中国人一同去迪化，蒙古人萨尔彻和8匹骆驼将留在这里，到迪化后他要去见杨增新，向其转达我的私人问候，同时呈交信件。在这封信中我只是再次陈述了以前通过马木转送的信件的内容，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派来考察队的成员——德国人赫尔·沃尔兹作为专门的信差拜访您，并向您问安。很久以前我们曾向迪化转送了一笔钱，其中一部分我们需要在哈密花费，因此该信差的任务是将这笔钱取出来，经由吐鲁番和善鄯转回哈密，如蒙阁下您能敕令沿路各当局向其提供必要的保护，我们将不胜感激。”

见过杨增新后，沃尔兹就要去提取钱，并接收已经送到那里的我们的信件、报纸和书籍，他可以以自己认为的最好的方式运送这些珍贵的东西——或者要求杨增新派一支卫队护送，或者用一辆平常的小马车，而他自己则充当武装警卫。

如果他们能日行40里，那么这趟迪化之行40天就足够了，因此，沃尔兹在11月25日一定能抵达目的地。5天的时间足够他完成在迪化的任务，15天之内他可以再次骑马回到哈密，这个时间应该在12月15日——大概与我们同时到达，因为我们也正在考虑于11月5日出发去哈密，预计在12月5日到达。

为了给沃尔兹送行，10月14日晚上营地的所有人都聚集在篝火旁，篝火也比平时要大许多，蒙古人的乐队演奏乐曲，风也刮了起来，广阔草原上的沙沙声与美妙的乐声融合在一起。刚从嘎顺淖尔做

植物考察归来的胡莫和哈斯伦德带回来一种奇特少见的烈性酒，当所有的罐头容器和杯子都斟满酒后，我走到篝火的前面和沃尔兹作了一番美好的告别演说，最后我还用瑞典语四度向他祝福。

10月15日早上7点，大家都起床了，8匹骆驼膘肥体壮，背负轻装准备出发，其中有一匹白骆驼从一开始就跟着我们，还有几匹是新购买的，还没有进行过艰苦的长途跋涉。所有的骆驼都处在最好的状态，我对它们怀有一种敬畏之情，这种心情是人们在港口向即将驶向大海的轮船挥手道别时所特有的——这些“沙漠之舟”将要经历多少场风暴啊！它们能坚持下来吗？它们之中的某些是否会永远地躺倒在路边呢？

沃尔兹乘骑的是一匹黑色骆驼，这匹骆驼一直把他从包头驮到我们现在的营地。萨尔彻和那名年轻的中国人正在四处检查行李，他嘴里叼着香烟，看那神态好像只是要进行一次轻松的短途出行。

接下来是最后一次握手，然后这支小旅队就消失在蒙古帐篷群附近的树林中了。

与他们一同而去还有我的一大部分旅行日记，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的信件在新年到来之前是不会到达斯德哥尔摩的。为了让那些在家里想念我们的人放心，我还与沃尔兹一起拟了一封电报，它11月底就会到达目的地。

我们后来经常想到沃尔兹和他的孤独的旅队，试着计算他们的行程和所至。他可以自主选择路线，我们只是推测他可能会选择直接到达巴里坤的沙漠线路——那里有一部分线路是无水的，这样，就会离开处在山脉南面的哈密至少100公里。

事实上，我并不特别为沃尔兹担心，一个曾在战场上勇敢善战的德国军官是不会畏惧沙漠旅行的，即使旅程有2000公里对他来说也不在话下。

第十六章　泛舟额济纳河

10月15日考察队分散在6个不同的地点。主营地的24人中只有14人留在原地，由于还要组织两支新的小型考察队，我们的人数还会减少。

玛斯考尔和沃尔兹带走所有的信件以后，我就摆脱了繁冗的通信工作——可以考虑去湖上进行一次短途旅行了。因此，一告别沃尔兹，我就转身到“船坞”视察拉尔森的奇舟，它已在陆地上躺得时间够久了，现在已经完全干透了。我和哈斯伦德又驾船试航了一次，我们顺流下行了几里路，由于不断搁浅，就在左岸登陆了。情况很明显，我对哈斯伦德说：“那船不能在额济纳河航行，它太重了，很快就会沉入水中。甲板要撤掉，独木舟还要再挖空一些，直到它的重量和厚度减少一半为止，这样我们起码能驶过一半的浅水滩，而现在我们却常常搁浅在河中。”

造船工高姆博和4个蒙古人在岸上跟着我们，他们帮助哈斯伦德把船再度拖入“船坞”。哈斯伦德接受新命令后立即开始着手工作，独木舟的底部放着通红的木炭火盆，这使得凿独木舟的工作越来越容易，速度也越来越快。造船的工作在夜晚继续进行，晚上干活时的照明光源就是篝火。我晚上上床歇息之时仍能听到斧头的砍削声和锯子的摩擦声，等到第二天早晨睁开眼时我听到的仍然是同样的声响。独木舟还在继续被凿薄，它的周围出现了一堆堆像小山似的木块和木片。

我们必须要在10月17日早晨出发，因为时间不等人，河水已经开始回落。我们以前测得的最高水位为59.5厘米，现在的水深为55.5厘米，这意味着船更容易搁浅。

下午4点船才改造完毕，完全跟我的要求相吻合，两只独木舟的最宽处约有45厘米，前部的宽度为30厘米，两条结实的横木将它们连

接起来，两者之间的距离为35厘米。独木舟的前面放着一块箱子盖——那是绘地图的桌子。在中间部位，一块小木板固定在两只独木舟之间，我坐在上面，一只脚放在左面的独木舟中，另一只脚放在右面的独木舟中，身体的其余部分在水上保持着平衡。在我们后面固定着另外一块小横板，船员哈斯伦德坐在上面操纵桨板。

10月16日下午我们驾驶着这艘所谓的船进行了一次新的试航，这次情况比以前好多了。不管船什么时候陷入泥滩，哈斯伦德都会立刻跳入水中把船推开，于是我们又可以继续在水中航行了。这趟漂流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船一会儿漂向右岸，一会儿又被冲回左岸。我们在一个有遮蔽的小湾“抛锚”后将船拖上了岸，前面是一片老杨树林。

这次试航极为成功，第二天早上我们要顺着额济纳河航行到更远的地方。此时天已不早了，太阳正在西沉，我们起身返回。一路上不时穿过小的灌木丛，翻越长满红柳的小丘，更要通过一片片随风摇曳的芦苇荡。几分钟之后，一道水沟横在前面，这是额济纳河的一条边渠，大约有20米宽、30厘米深，里面有一股浅浅的水流，哈斯伦德把我背了过去。很快暮色四合，天越来越黑，突然火光闪亮，亮光在树丛中闪烁，狗的叫声传了过来——我们到家了。

经过一番琢磨，我制订的短途旅行计划是这样的，独木舟不装载行李，因而拉尔森要带一小队人马沿着左岸前进，并时刻与我们保持联系，在选择宿营地时他要与我们商量。徐教授和李很想看看那两个湖，于是拉尔森也带上了他们，赫姆波尔和齐莫曼也带着他们的小旅队向湖的方向前进，准备图测额济纳河的西部湖湾。该湖湾名为奥博恩古尔，与嘎顺淖尔相通，在返回时他们还要图测昆都仑古尔湾。据说该湾一直流向东部，在额济纳河的中游冬都尔古尔伸入苏泊淖尔之前与之交汇。

10月17日早晨出发时，1号气象站的人只有霍德、胡莫、傣特曼、里艾伯润兹、穆伦温格和隋留下，陪着我们上路的随从有蒙古人门托、班彻、马特以及汉人明和王。两名德国人有自己的仆人和骆驼。大家同时离开，但很快就走上了不同的路线，3天之后我们才能

在土尔扈特人首领的大本营附近会合。我打算在徐教授的陪同下去会会这位王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会见他的大儿子，因为他本人老病交加，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趁此机会向他引见齐莫曼，他准备在这位王爷的土地上逗留一年半的时间。

哈斯伦德和我骑着牲畜走到前一晚上停船的地方，然后下马登船。我们只带了几件必需品：地图、指南针、手表、铅笔和望远镜。由于要一次次跳入水中，哈斯伦德甚至将自己的衣服都交由沿岸行进的旅队保管，自己只随身携带了一件毛背心和游泳内裤。

拉尔森拿着枪随着我们在左岸前进，他打了一只野鸡和野鸭，他的坐骑由蒙古人班彻引领着。

我们用船篙撑离陆地驶进水中，船行进的速度很合适，既不是太快也不是太慢。河岸上满眼秋色，枯黄的灌木丛、低矮的红柳林、杂草、芦苇都覆盖上了一层漫漫黄色。荒丘不时闪现，长满植物的沙包由于河水的冲刷大都形成垂直的岸墙。我们很快就发觉这种强烈的浸蚀坡地的水流很适合航行，因此就尽可能地让船沿着岸边前行。

但水流总是从此岸流向彼岸，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穿越河床。正是在这些河段我们习惯了搁浅，因为这些地方隐藏着令人迷惑的沙滩。船篙一插入沙滩，船就开始打转，于是哈斯伦德就要跳进河中，踩着泥寻找深水处。

我本人坐在“桌子”前，一边观测，一边画出额济纳河下游的河道图。我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因为额济纳河和别的河流一样也是九曲十八弯，很少有地方能让人省心一两分钟，因此，我不得不时刻看着指南针和手表，一刻不停地在地图上画着，与此同时，其他必要的记录和观测数据也要飞快地记下。而为了得到经过的河流的长度值，我还要一次次地测量水流的速度。

河岸上有几个地方出现了人影，好奇的土尔扈特人跑向岸边——他们的帐篷就在河流的附近。有一次我们靠着左岸航行时，两个穿蓝衣服的男子和一名全身红色装扮的女人骑马前来观看，他们非常好

奇，有礼貌地向我们打招呼，然后转身陪着我们走了不长的一段路——他们已经听说我们要在河上旅行，现在要亲眼来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做的。河岸边有骆驼在放牧，这些牲畜们睁着溜圆的眼睛看着我们，那神情似乎比土尔扈特人还要吃惊。一匹高大的黄色骆驼站在河岸边喝水，我们的船一声不响地从它的身边滑了过去，它先是抬头看了一眼，旋即转身消失在树林之中。

中午1点刚过，我们正沿着左岸漂流，拉尔森出现在红柳丛中，他对我说现在该吃午饭了。他也要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走”得太快了。于是我们停船登岸，摆开简单的食品开始用餐。食物是一壶热茶、一块巧克力和几块饼干。坐在茂密的红柳丛中是很件舒服的事情，天气很暖和，气温是23摄氏度，哈斯伦德可以好好晒一晒自己了。

吃完饭后我们继续前进，有几次我们通过一群狭长的小岛，其中一个小岛把我们和拉尔森分开了许久。中午3点刚过，旅队就到达了额济纳河分叉的地方，分开的两股水流显然一样大。左面的一股叫奥博恩古尔，意思是“敖包河”，汇入嘎顺淖尔；右面的一股叫冬都尔古尔，意思是“中间河”，汇入苏泊淖尔。根据我们从土尔扈特人那里得到的情况来判断，冬都尔古尔应该比它的“左邻”更深更窄，因此我决定先对“中间河”进行图测。

拉尔森也许会在这里跨越奥博恩古尔，于是哈斯伦德四处转悠着寻找一个合适的浅滩——我不想让拉尔森进入深水，因为他不会游泳。蒙古头领马仁的营地在奥博恩古尔左岸下游很远的地方，他在那里看护我们的骆驼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我派班彻徒步去那里看一看。徐教授也随他的小旅队已经去了那里。

我们现在正漂流在冬都尔古尔河上，在船前面靠河左岸的地方有一群野鹅正在休息，它们一看到我们就哗啦啦地窜入空中向南方飞去，它们的翅膀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异常美丽，翅膀扑动时发出的刷刷声清晰可闻。鹅群在空中叫成一片，好像是说河中怎么突然出现了陌生的怪物。与额济纳河河岸及其三角洲支流区的土尔扈特人及其骆

驼一样，这些野鹅也是第一次看到船，它们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越往前“走”，冬都尔古尔变得越窄，船也不再经常搁浅了，驾船变得越来越容易。事实上，哈斯伦德只是坐在那儿，手拿船篙专注地看着水面，由于不需要经常跳入水中，他的衣服几乎都要干透了。船漂流的速度很快，有一次在一个深深的急转弯处，水流差一点将我们推向岸边，好在我手中有一根细木棍可以把船撑开，从而避免了一场碰撞。

下午4点时河流拐向东方，接着又转向西北方向。4点45分时温度计显示空中气温仍为22摄氏度，河流温度为12摄氏度，半小时后太阳落山，空气中的气温下降了7摄氏度。

时间过得飞快，太阳已经西下，拉尔森再度在树丛中现身——旅队必须找到我们，因为在天黑以前必须宿营。

这里的河水很深，但只有15米宽，它就像一条人工运河，河床没有泥滩，左岸的斜坡很陡，而右岸则显得较为平缓，两岸都生长着茂密的树木。左岸的沙土中生长着古老的白杨树，右岸的树林沐浴在落日余晖中，树干呈现出一片砖红色，而树冠则是金光万道，美丽异常。

这个地方真不错，简直就像一个皇家花园，于是我们决定在此登岸扎营。哈斯伦德将船拖上岸，拉尔森去收集柴火，我则画了两幅草图。

这里的河段又窄又深，距离河岸30米处就看不到它了，似乎它一下子就消失在黄色漫漫的树林中去了。今天的天气确实不错，航行也很顺利——一个纤风不起的日子。周围的自然景观也颇有魅力，流连其中，身心怡然。野鸭和野鹅在岸边不停地起起落落，而野鸡们则安详地卧在红柳树下的安乐窝中静静地注视着我们，空中有一只鹰在盘旋。左岸地势更为平坦，到处都是芦苇，牧草有一人多高，牛、马和骆驼的身影不时闪现其中，有几次我们还看到了土尔扈特人的帐篷。

暮色渐浓，西面传来了骆驼的叫声，显然那是我们的旅队，他们马上就要越过附近的奥博恩古尔了。驼鸣声停了下来，这说明他们已经顺利地过了河。为了给他们指引方向，拉尔森点起了火，哈斯伦德光着身子站在火堆旁，手里拎着毛背心和内裤在火上烤，徐教授和李走过来挨着我们坐下。我们的帐篷在白杨树林边很快建立起来了，转眼间厨房也建好了。6点30分时，我们开始用餐了，摆在面前的食物有肉馅饺子、绿豆、米饭、饼干和茶。大家都坐在火堆旁的毛毯上用餐。干枯的树干很容易燃烧，火舌噼噼啪啪地越蹿越高，骆驼们的身影在火光的映衬下变成了红色。栖身于枯树干之中的蝎子在被烧焦之前肯定还以为是盛夏又到来了。天空一碧如洗，夜风习习吹来，落叶沙沙作响，走在上面宛如回到了家乡。

晚饭后我靠在帐篷中的垫子上写日记。然后就在这个“皇家花园”的大天篷下上床睡觉，只要醒着，我就能听到篝火旁的蒙古人的笛声，他们铺着羊皮睡在露天。在这样一个美妙的夜晚，大家几乎都没有睡意。

次日早晨我们继续漂流，沿途景色令人陶醉，旅队越是深入这片沙海中的神奇森林，我就越后悔里艾伯润兹没有带着摄影机同我们一起来。但这后悔来得还不算太迟，因为昨天晚上在营火旁我与拉尔森讨论了这个想法，他也与我有同感，于是我写信给里艾伯润兹，让他尽快追上我们。班彻负责把我的信送回大本营，在经过马仁的营地时，他从那儿要了4匹骆驼。估计里艾伯润兹在两天内就会追上来，我们将在下一个营地等待他。

10月19日的前一天晚上气温降至零上3.3摄氏度——最后几个晚上天气居然越来越热——我们好像正在进入春天，而不是秋天，早晨9点时测量的空气温度为10.6摄氏度，水温为8摄氏度，水的流速为每秒90厘米，昨天水位已下降了好几厘米。我们撑船离岸，继续在冬都尔古尔河上航行。旅行非常美妙，船在狭窄的河道中平稳地漂流，沿途不论是动物还是人类看到我们都惊讶无比。

河流的宽度经常变化，有时候宽达70厘米，有时在急转弯处仅宽

10厘米。总之，河床越来越深。现在冬都尔古尔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处在陡峭的码头或高达两米的浸蚀台地之间的人工运河。

继续前行，两岸不时闪过一片片美丽的树林。

大约中午时分我们泊船上岸。拉尔森也已经在一片舒适的白杨树荫下生起了火。河岸上有野猫的脚印——那动物曾在河边饮水，看上去像是一只猞猁猻。

再次出发时船上多了一位乘客——拉尔森坐上船和我们一起漂流。这样做也是情理中的事，因为正是他建造了这艘漂亮的船。他非常喜欢在河上旅行，兴奋地喋喋不休，简直无法自已。他一会儿测水深，一会儿打野味，一会儿这只脚站在左边的独木舟中，那只脚站在右边的独木舟中，举着望远镜观察四周的环境。他说的话逗得哈斯伦德哈哈大笑，我一直忙于查看时间和测量指南针上的度数，所以无法和他们在一起开心。

旅队在左面出现了，驼队沿岸行进，看上去悠然自得，魅力不凡。可是，景色突变，树林走到了尽头，红柳都变得稀稀疏疏了，几株孤零零的杨树成了树林通往湖泊的前哨。河流两岸是大片的牧草和芦苇，迷人的景色已经消失。我们还在接近平坦开阔的盆地，在那里安静地隐藏着两个姐妹湖。

此时已中午3点，空气温度为16.1摄氏度，河水温度为11.1摄氏度。马特骑着骆驼跑来报告，说赫姆波尔和齐莫曼就在下游前面的一处地点宿营，我们的帐篷也正在那里搭建着。我们经过几处河流的拐弯之后，旅队便出现在眼前，于是我们停船上岸。

在冬都尔古尔和奥博恩古尔两河之间，延伸着一带数米高的平坦的卵石高地。我们在平地上的营地的西面是土尔扈特王爷的大本营，其地称为瑟尔—松彻。

王爷住在一处泥房子里，房子是新建的，里面有40多间屋子。房子附近是他的衙门。离房子不远处有一座寺院，叫做达吉林过姆帕，

其名称值得注意，它用的是藏语的寺院，而不是蒙古语的寺院。

关于冬都尔古尔通往苏泊淖尔，或奥博恩古尔通往嘎顺淖尔的水道的翔实情况我们难以得到。我们不清楚从距王爷府半里路的宿营地能不能继续航行到河流的入湖口。于是哈斯伦德前去进行了一番侦察，他发现就在宿营地的下游冬都尔古尔出现了两条河道，左面的一条形成了一系列沼泽地，沼泽地的水形成了几条小支流，小支流最后汇聚成一个小瀑布后又回归到右边的河道。河道很窄，如一条排水沟，我们的连体独木舟能否通过成了问题。不过，我们决定先试一下再说，即使水位正在下降，也没能改变我们的决心。

由于我听说有一条小型的三角洲支流流向冬都尔古尔以东，我指派赫姆波尔和齐莫曼前去对之实施图测，他们也准备打此地再度赶往固定营地。

额济纳河附近及其三角洲地带的居民都是蒙古人，他们属于土尔扈特人的一个古老部落。在我到达之前，徐教授已代我向王爷作了通报。现在我们的宿营地距其府第仅有半里之遥。

10月20日早晨我们派马特前往衙门询问王爷何时能接见我们。然而，已过了中午12点，我们的信使还未回来。也许那王爷根本就不愿意接见我们，我们知道他眼花耳背，平时总是躺在毛皮褥子上，很少见客。他的45岁的长子主持着他父亲和部落的所有事务，几周前胡莫和哈斯伦德登门造访时，曾获得允许拜见了他的老父亲。看来，我们除了等待外别无他法。

芦苇丛中传来了风的呼号声，河面上卷起了一层白色的泡沫，天际飘来一团黄色的沙尘雾，这说明沙漠就近在咫尺。然而，这一片黄色的面纱却使在北面延伸的不高的山系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深蓝色轮廓，它们从东西两面伸向嘎顺淖尔和苏泊淖尔的北部。在东北面，诺颜—博戈多，其意思是“众神之首”，它的两座平坦的山峰隐然可见。

下午刚过不久，马特终于回来了，王子给他的回复令人费解。他答复说今天不能接见我们，因为今天是他们的月份的25日，这个日子

不适宜会客。他说将在10月28日或29日派一名信使前来，那时不管我们身在何处他都将告知我们他见客的日期。我立即召来徐教授和拉尔森进行商议。徐教授和我一样，也认为这一回复几乎是侮辱性的。如今我们近在眼前他都拒绝接见，28日，即4天之后我们早已走远了，那位王爷真的相信我们那时会掉转马头去参拜他吗？徐教授认为，一个所辖只有97顶帐篷的小小王爷只不过相当于一个汉区的地方镇长，像我们这样一支庞大的考察队进入其辖区时他应以礼相待才是。然而从那位王爷的角度来看我们，他的确也搞不清楚我们到底是何许人，是政客？间谍？抑或是白匪？拉尔森认为，我们的旅队刚抵达时，王爷肯定已派人前往甘肃询问了当地的汉人当局该如何应对我们。说不定此刻王爷正在等待上边的指示，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含糊其辞的答复。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位王爷应受到赞扬，而不是责备，因为这表明他谨慎地行使着自己的职责。徐教授同意他的看法。

也许其中也掺杂着政治因素，据说多半土尔扈特人同情蒙古共和国，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表明他们的立场。但是徐教授反对这种看法，他说如果那样的话王爷就会失去所有头衔而一无所有。他肯定是一名保守的人，效忠中国政府，不愿放弃自己拥有的小小权力。

这时哈斯伦德过来告诉我们说，他和胡莫经过王爷的府邸时曾遇到黄文弼，当时他正需要一个带路的人。于是他们就一起去了王爷府，但王爷没有露面，而是差人把他们带到了衙门。在衙门他们与几个官员见了面，并告知了黄文弼的要求。正当他们与官员谈话时王爷的长子走了过来——他是这里真正的实权人物，他友好礼貌地向他们表示欢迎。他愧疚地表示未能亲自接待他们，他强调说：“各位想必明白，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不能不谨慎啊。本地长治久安，将来还想永保平安。因此我们必须警惕来自不同派别的代表。况且，我们也不清楚各位是何人，为何到此。”

他的小心谨慎的确是有道理的，试想一下，在一个美好平静的日子里，18名全副武装的欧洲人和10名中国人带着数百只骆驼如蝗虫似的突然来到他平静的土地上，他怎能不紧张呢？何况以前从未出现过这种事情。而且，关于我们的谣言也早已在额济纳河传开了，经过蒙

古人和汉族商人之口，这些谣言已被放大。以致有人说，一支军队带着庞大的商队和大批帐篷，还有数不清的武器正在开来。还言之凿凿地说我们的前锋部队已在河岸获得了稳固的立足点，过不了几天后面的大队人马就会赶上来，这是一次十分严重的军事性质的集结。王爷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加强戒备。

我们决定谨慎从事，并且决定以友好的方式向王爷解释考察队的意图并告知在他的地盘上建立气象站的计划。徐教授承担起了起草信件的任务，那封汉文书信在开头的一番客套之后大意说：

我们今次专意来访，可至为遗憾地获悉今天您不宜见客，使我们不能亲眼一睹尊颜。我们的考察队受到中国政府和联盟的保护，欲在陕西、甘肃和新疆北部实施科学考察。我们还计划在苏泊淖尔附近，在哈密、迪化及其他地区建立气象站，目的是对降水、风向和气温的情况实施长期观测。

我们现在在额济纳河的西岸，在这里的建站工作已经完成。因此我们感到有义务对您及其您的官员进行一次拜访，以便向您解释我们的意图，并代表气象站请求您的保护。我们的考察队是具有科研目的的组织，它的所有成员都是学者和有教养的人。至于政治——我们不想和政治有任何瓜葛，我们不属于任何特殊的集团或联盟，气象站的任务是纯粹科学性质的。

斯文·赫定博士是潘真活佛20多年的好朋友，他曾几次游历西藏进行探险，在那里他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也曾数次拜访北京的喇嘛，并告知其准备出访上述地区的计划，并得到了北京喇嘛的大力支持。而我本人——徐炳昶教授，则一直对黄教怀有极大的敬意。我们可以向您保证，就气象站的成员而言，他们绝不会违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会以任何形式冒犯寺庙或敖包。

在此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把您的接见看得很重要。如果您不方便的话，我们愿意借此告知，在这个月底或下个月初我们的旅队打算继续向新疆进发。

如果我们这两个负责全队工作的人这次不幸未能见到您，考察队里还有3名成员将有幸留在这里，他们准备着随时拜访您，以便消除任何可能的误解。

除此之外，与考察队有关的所有成员都持有中国外交部和教育部发放的护照。如果您愿意，请派一名全权代表来我处查验护照。

送信的人仍然是马特，他好一会工夫才回来，随他而来的有一位“图失米德”，即秘书，还有一位官员。秘书告诉我们说，王爷有一位翻译，但却没有一名懂汉语的翻译。于是，我们聪明的蒙古人塞拉特立刻将信件翻译成了蒙古语，那位特使带着信立刻回去了。我们只好继续等待，等待的时候没有从王爷处得到任何消息。

向晚时分，里艾伯润兹赶来了，他带来了5匹骆驼，两部照相机，还有许多胶片和胶卷。他兴致极高，报告说大本营一切正常。

夜幕降临后我们又燃起了一堆火——这里有的是浮木。大家坐在火边讨论白天遇到的问题，都在琢磨王爷为什么不愿接见我们。不用说，王爷的秘书极为客气，他保证说我们是受欢迎的，还说我们完全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要乘船去湖上应该小心一点，那里水很大！

说实话，更为我担心的人是徐教授，他对我去湖上航行的担忧确实令人感动。他说：“真正勇敢的人没有必要盲目地去冒险。去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您说要去测量水深，调查湖的面积和形状。但这些事情齐莫曼就可以轻松完成，即使湖上有冰，地理学所必需的新知识也完全可以得到相关数据。想一想您对自己的亲人、祖国和考察队所承担的责任吧。您曾谈到您在西藏的湖泊冒险，但那时您多年轻啊。您曾说只要冯·考尔能用羊皮做一只安全适航的筏子就解决问题了，但那需要很多羊皮，您必须节省。如果您愿意一直等到筏子做成的话，我将欣然承担全部购羊费用。我请求您打消您的念头。您说天气好时独木舟不会出事，可一旦您在湖心时起风怎么办？”

“我们将升起船帆，全力向岸边滑行。”我说。

“您冒的险与可能得到的结果相比太不值当了。我希望明天晚上大家也聚在一起宿营，这样在您进行愚蠢的冒险之前可以把事情再说一说。”徐教授说。

徐教授的担心发自内心，也是他的善良天性使然。最后，我故意开玩笑问他：“如果我去了湖上回不来您怎么办？”

“不要这么说。”他严肃地回答，说着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帐篷。

第十七章　经由苏泊淖尔到嘎顺淖尔

10月21日早晨，河水水位再次下降，自我们到达以后，河水的水位已降低了5厘米，晚上的气温已降至零下0.5摄氏度，但早上天气晴朗，天空呈现出青绿色，大草原上则是一派黄色。靠河岸最边缘的我的帐篷前，瑞典国旗迎风飘扬。

拉尔森叫醒了我，说土尔扈特人已经来了，正在帐篷中与他聊天呢。来人当然不是老王爷，而是他的长子，我们与老王爷的交往似乎已经结束了。我很快穿戴就绪，尊贵的客人随即被请了进来，他转交给我一条深蓝色的带子和他父亲的红色名帖，后者的名号读作昆旺达失。他的辖区叫额济纳。在他名字的右边还写着：土尔扈特长老。我们的客人，额济纳的真正主人，是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有一张非同寻常的善良动人的面庞。他诚恳、有礼、殷勤，很显然他被我们信中的诚意所感动。

我派人请来了徐教授，他也收到了一条蓝色的带子和红色请帖。我们喝茶、交谈、互致问候。客人说，如果我们觉得必要的话，他欢迎我们去看望老王爷，但他现在病了，只有最亲近的人和几名仆人才可以见到他。我回答说我们一点也不想打扰王爷陛下，只是希望将我们最尊敬的问候予以转达。

客人还带来了昨天的那封信，请求我们再给他翻译一遍，之后他又重复了一遍昨天他的秘书对我们的承诺，指出我们的自由不会受限制，气象站想建立多久都可以。

他询问我们需要他提供哪些帮助，我回答说如果他能雇一辆牛车将我们的船从苏泊淖尔拉到嘎顺淖尔，然后进入那片迷人的树林的话我们将感激不尽，因为里艾伯润兹要在那里摄影。他欣然同意：“当

然可以，请告诉我牛车在什么地方恭候，您不需花一分钱。我感到非常荣幸，尽力帮助您是本人的职责。”

最后我坚定地表示，如果我们留在这里过冬的骆驼对牧场造成了损坏，旅队一定要予以补偿。我还问他能否允许我送他一件来自欧洲的礼品，如果愿意的话，我将把礼品交由气象站站长转送他。他立即回答说他非常喜欢上等的高倍望远镜，那当然不成问题。而且，正如我所言，如果他对气象站和站里的工作人员态度友好的话，他还可以得到其他礼品。

友善的客人直到早上10点才离开。他的身影刚一消失在草原上，哈斯伦德和我就迫不及待地撑船离岸进入水中。在河的左岸生长着孤零零的红柳，右岸则是一块草地——它不久前还浸没在水中。大约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冬都尔古尔分叉的地方。左边支流的河水渗入沼泽，我们早已被忠告对之不可大意；右边支流的河道变得又窄又弯。拉尔森沿着右岸走在前面，以便当船接近那个听说过的瀑布时好提前给我们招呼一声。这里的芦苇长得又高又密，他很快就消失在其中了。

没一会儿他挥舞着双臂跑了回来，气喘吁吁地向我们喊道：“停下，停下！我能听到瀑布的声音，它肯定离得很近。”我们扔过去一条绳子让他把船拽过去，船在水中速度仍然相当快。我们登上陆地后对河道进行考察，发现河水以每秒4.5立方米的速度从一处小悬崖倾泻而下，形成了一个高达3米的瀑布，它使我立刻联想起了尼亚加拉瀑布。在瀑布的下面河水形成了一处泡沫翻滚的旋涡，两岸河床已被旋涡掏空，变成了一个深深的盆状的坑。旋涡之后，河水迅速流入一条深沟，其最初的宽度只有3米左右。河流两岸几乎没有坡度，高度有两米半左右，有的地方已被河水掏空，看上去似乎快要塌下来的样子。因此，在河岸的边缘行走要格外小心才是。

经过一番侦察后，我们返回泊船处，将不必要的东西全部拿了出来。拉尔森和哈斯伦德抓住绳子让船慢慢滑向瀑布，而我则用篙撑着船使之与水流的方向保持一致。船漂向瀑布的顶部，在那里突然一个

筋斗跌入下面的旋涡里，水一下子灌了进去，好在它还浮在水面上。

拉尔森和哈斯伦德拽着绳子把船拖回岸边，哈斯伦德爬进去将船里面的水舀了出来。

我们继续漂流，河中的水刚够将船浮起，如果再少一点就会搁浅。河流如同在一条曲折的通道中穿行，船下行的速度很快，我们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越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小瀑布。岸上的拉尔森只有飞跑才能跟上我们。不管怎样，这是一次有趣而刺激的航行。

然而，河水很快就变大了。一条小溪从左面的岸上倾泻而下，形成了一道两米高的瀑布。后面还有几条小溪，我计算了一下总共是7条，外加5条支流。这些小溪和支流的水清澈见底，它们都来自冬都尔古尔的左河道，在到达这里时它们已经过满是芦苇的沼泽地。河面逐渐变宽，很快就从12米扩大到20米，最后竟和我们的第一个营地一样宽了，河水深达1米左右。河岸再度变矮，约高出水面半米左右。我们能够看到河岸上正在放牧的马、牛和不远处的一顶蒙古包。但渐渐地，牧草变得越来越稀疏，草原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小山丘，上面生长着一些植物。到最后完全看不见任何绿色了，大地变得光秃秃，地面上覆盖着干裂的泥土。

3个小时后我们在一个新的地点安营扎寨。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附近的苏泊淖尔，它好似一面青绿色的大盆子镶嵌在黄灰色的沙漠之中。

调整了几次方位后，我们继续前行——我们必须要漂完余下的一段路程。很快，河流就分成几条小的三角洲支流，这些支流又分成许多更细小的支流，众多的水流在泥滩和拥塞的浮木之间奔涌不息。我们循着表面看上去合适的航道前行，但还是经常搁浅。小三角洲前面是一个泥滩形成的沙洲，那里的水只有5厘米深，任凭我们如何推掀，船就是过不去。哈斯伦德在探测河道时突然陷入软乎乎的淤泥之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中挣扎出来。在这里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船篙插入1.1米深的河床淤泥之中。

终于，所有的陆地都被抛在了身后，湖水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万顷碧波。然而，距清澈的蓝色湖水尚有一段距离，离湖岸几百米远的地方的湖水仍浑浊如豆汤，如果我们说从这里能进入湖区，那是自欺欺人。

我们把船泊好，然后走向面北处，拉尔森、里艾伯润兹和门托正在岸上挖一条沟渠，沿着这条沟渠就可以把船驶入深水处，他们用了许多红柳枝为沟渠作标志。

太阳已经西斜，我四处转悠并遥望隐约可见的湖岸线和隐没在北方的群山。

不一会，我们就漫游着回了“家”，坐在篝火旁聊天，上床时我已经知道10月22日将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清晨时分，两声枪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拉尔森射杀了3只正在飞翔的草原野禽。我踱出帐篷，晴空万里，风平浪静——新的一天到来了。我发现只有我的中国仆人明在，其他人都去了泊船处，正在将船用人力扛到昨天挖好的沟渠那儿。里艾伯润兹拍摄了整个过程。我赶到时，船已系在一根离岸不远的木桩上。为了测量水的深度，哈斯伦德独自向外划了几百米远，他测得的水深为55厘米，看到船行无碍他便调转船头。

整个东南部的湖水全都又脏又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海鸟在此漫步和流连，清澈的蓝色湖水距哈斯伦德调转船头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他尽量将船靠近岸边。

我们携带的装备非常简单，在一个独木舟中放着一只饼干箱，它里面装着真正的瑞典饼干和两块巧克力蛋糕。那些瑞典饼干是我们的厨子跟瑞典传教士学来的手艺。另外一只独木舟中放着一只相似的箱子，里面装有香烟、绷带、药盒，还有一小瓶白兰地，除此以外还有我的热水茶壶，就这么多东西了。湖看上去很小，我们应该能在几个小时内就征服它，然后就划向西北岸。我已命令拉尔森在那里安营，其地点紧靠博洛敖包的南面。夜幕降临时他会点一堆火为我们指引方

向，以免我们天黑时还找不到他。

哈斯伦德身上只穿着一件步枪兵衬衣、一件毛背心和一条游泳裤，既没有穿鞋也没穿袜子。我只穿着平常的游泳衣，没带外衣。为了防止地图和别的东西掉入水中，我在绘图桌上放了一张叠起来的毡子。最后，船上还有我的拐杖和一根驼鞍横木，以便有风时可以之充做桅杆。

所有这些准备都要花时间，当我们向徐教授、拉尔森、里艾伯润兹和蒙古人挥手作别进入湖上时已快中午12点了。此时空中的温度为15.2摄氏度，水温为9.3摄氏度。我和哈斯伦德驾船驶入湖中——这一幕在里艾伯润兹拍摄的录像中非常漂亮。

在33厘米深的湖水里船再也没有搁浅，哈斯伦德开始大胆地挥桨了。俄而，一阵轻风起自湖面，我们赶紧停下来支起了临时桅杆。除了我的皮马甲以外，手头没有别的东西可充船帆。我们把马甲在拐杖上展开，左右支索将其固定。这张奇特的帆很快便鼓足了风，伴随着船桨的挥动和转向，船帆嗖嗖地趁风推船行进。

我们来到了湖水的蓝色区域，这里已看不到河流带来的泥水。此时开阔的湖面上忽然传来一阵强烈的呼号声，那是风掀起巨浪的咆哮声。水的运动速度在加快，湖浪也越来越猛。很快，独木舟的边缘就受到了冲击，哗啦哗啦的灌水声令人不安地一次次传来——湖中的危险增多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罗布泊和塔里木湖泊中的冒险航行，我知道这可不是好玩的事情。独木舟是由滚圆的树干掏空制成的，其边缘向内弯曲，这非但不能挡住湖浪，反而使水更容易灌进来。

哈斯伦德用力划着，风很猛，桅杆支索绷得像弓弦一样。博洛敖包很快就出现在西北方向。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湖中心的开阔区域，但南岸仍然要比北岸距离我们近。这里的湖水清澈幽深，所能见到的只是一群群不受惊扰的海鸟在自由地觅食，鸳鸯成对嬉戏，灰白色的海鸥声息可闻，天鹅在飞翔，还有一种陌生的红嘴黑鸟，很可能是一种潜水鸟。这些鸟类都是成群结队地生活在一起，在浅水处它们的数量

更大。我们的周围都是鸟儿飞翔的声音，它们落下时将湖水溅得老高。我们任何时候接近正在凫水的鸟，它们都忽啦啦拍翅而起。只是这里见不到野鹅的踪影，它们似乎对苏泊淖尔提供的食物不感兴趣。

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走一段距离我就要测量一次水深。苏泊淖尔很浅，其平坦的底部犹如一块薄薄的玻璃。我的测杆总长度仅有2.53米，其上标有米和厘米两种长度单位，但它在湖中基本够用，只有在湖中心的几个点测杆不够长，于是我就只好使用一个小铅锤测深。测得的最深的深度只有2.9米。

我也经常测量船的行进速度、空气和水温，并将所得数据记录下来。同时，我还手不离望远镜——东南方出现了蒙古包和放牧的牲畜。南面有一群马站在水中。水的折射拉长了它们的腿，看上去就好像在湖上漂着一样，它们正在尽情地享用着湖水。湖水中有碱的苦味，人也可以喝，但胃实在受不了。

湖中的水几乎清澈见底，我的测杆顶端固定着一个白色小圆盘，在1.2米的深处都可以看到它。湖底很坚硬，在湖水由黄色浑浊的河泥水变成清蓝透亮的湖水区域，水的深度达到了1.35米。现在风虽然更大了，但我心中却很踏实，因为一旦出现翻船事故，我们还可以在此找到一个安全的湖底作落脚点。然而慢慢地水深却增加了，浪头还在继续跌入独木舟中，船下面的水深已达两米。这才让人兴奋呢！我将双脚放在水中，湖水将我的双脚冲得前后摇摆。可当我低头看时大吃一惊——独木舟三分之一的空间已灌满了湖水。这种不必要的“压舱物”使两只独木舟更为沉重，同时也使浪头更容易地灌进来。

我抓起一把长柄勺子尽力往外舀水，哈斯伦德则努力用船桨挡开不断涌来的浪头以减小它们的冲击力。有时候我们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我怀疑自己舀水的速度能否赶上水灌进来的速度。而与此同时，我也没有停止测位、量深和其他的观测活动。如果风再大一级的话，湖水就把我们征服了，那时船中会灌满水，最好的情况是它还能浮起来。如果那样的话，我们面临的问题便是，在四肢麻木以前我们抓着船舷能在冰冷的湖水中坚持多久。

但一切都过去了，湖水越来越浅。这样，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我们就可以步行上岸。现在唯一的困难是我们不晓得离湖岸还有多远。从此向东，湖岸十分平坦，湖显得很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改变航向向正东驶去，这样就能借风力更好地登陆。

湖的东南岸有许多长满植物的丘陵和绿色的小山，远远看见的黑色地带只能是红柳或杨树。从所能看到的情况判断，北岸一片荒芜，离北岸不远处延伸着一带陡直的黄色黏土台地，这说明那里曾是湖水淹没过的地方。向西望去，苏泊淖尔似乎没有尽头。

现在湖水变得越来越浅了，湖底的平缓波纹清晰可见。下午4点15分时我们在东岸搁浅，从这里还要走70米才能到达陆地，哈斯伦德再次将我背了过去，然后他还得回去取我们的给养和其他东西。

我同时去寻找合适的宿营地点，在陆地转了10分钟后我终于找到一块干燥的地方。我接着开始收集柴火，在狂风中点火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只能委屈自己度过一个糟糕的夜晚了。要在黑暗、寒冷和潮湿中捱过11个小时真令人难受，我们穿得很少，况且，我们两人都已湿透。没有热饭，我也找不到更多的柴火。突然有声音从北面传来，接着我就看见班彻骑着骆驼向火堆走来。他带来了两个睡袋、两块毯子和我的细羊绒靴，那是拉尔森1923年在张家口给我做的，还有哈斯伦德的衣服，以及一大箱腌制的鲱鱼。

我们终于得救了，现在我们既不担心受冻也不用节约柴火了。班彻告诉我们，由于下午过后仍然看不见我们的踪影，拉尔森就派他前来寻找我们。徐教授一直担心地坐卧不宁，生怕我们在露天过夜时没有帐篷，没有睡袋，没有热饭。

傍晚8点钟，我们3人共进晚餐，在热水壶中的茶喝完以后，我们就只能以湖水解渴了，此时那一小瓶白兰地也派上了用场。

“白兰地与碱水——哪样好喝？”哈斯伦德问。

我们聊天、开玩笑、抽烟，火堆噼啪作响，滋滋地燃烧着，时间

过得飞快。

把最后一块柴火扔进火里后，我脱衣服钻进了睡袋，丹麦人和蒙古人把我裹得严严实实。在火堆的另一边，哈斯伦德也钻进了睡袋，班彻睡在骆驼旁边，以防它受到狼的伤害。

火灭了，黑夜笼罩着营地。我久久没有入睡，睁着眼睛看着星光闪烁的苍穹，倾听着黑夜中传来的各种神秘声音。

在露天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后，醒来时新的篝火已开始燃烧起来了。一用完早餐我们就测定了方向，然后再次进入湖中，驾着船向拉尔森的营地划去，今天哈斯伦德要一直充当划船手。博洛敖包就像一座塔似的矗立在西北方向，天气晴朗而温暖，太阳如同夏天似的炙烤着我们的后背。

刚过两点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穿越湖泊用了不到3个小时，因此，这第二条测深线路要比第一条短得多，这次测得的最深的深度为4.12米。

拉尔森、里艾伯润兹和几个蒙古人正在已经建好的登陆点翘首等待我们，他们兴奋地大声欢呼——显然为我们没有出事而高兴。蒙古人对湖泊、河流和船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嫌恶，他们认为我走水路简直无法理解。徐教授和李一大早就绕湖徒步旅行去了，由于相距太远，我们未能在船上看到他们。

牛车按时来到，赶车人是一个干瘪而友善的土尔扈特人，与他同来的还有5条黑狗。由于地势不平，沙地松软，这位老人不能从这里直线向西到达奥博恩古尔，而只好选择距西南方向几公里的一处地点出发。用餐之后我们便赶往那里，哈斯伦德和我走水路，旅队和牛车则循着湖岸的泻湖前进。

天黑下来以后，我们从营地能看到徐教授和李在河口点的营火。我们派徐教授的仆人王和马特带着骆驼过去帮他们过河，然后再将他们接到我们这里来。

在苏泊淖尔湖上度过了难忘的两天——在亚洲又征服了一个新湖泊，我可以心满意足地睡一觉了。我承认，人们早就知道这个湖泊了，但我敢肯定以前还没有人在湖中乘船行过。

次日早晨起床时，老土尔扈特已经赶着牛车拉着船上路了，我们只需跟着他的车辙印走就行了。我们先是顺着湖岸走了一会儿，穿越了几处不久前还被水淹没的地方，经过一片死红柳后到达一处干硬的荒凉高地，在那里的西南方向出现了土尔扈特王爷的府第。从高地上走下来以后，我们穿越了一片片红柳丛，还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敖包。

大约走了10公里以后，旅队到达了处在一个急转弯处的奥博恩古尔，那里的台地山脊沿着河岸向河面上空伸出6.2米，沙质坡地呈斜角直插入河中。我们将船沿斜坡滑入水中，然后顺流漂下——嘎顺淖尔已经不远了。

但我们在今明两天都没有走远，此时我只能满足于站在陆地上向湖的方向投去一瞥。10月26日旅队转向东南岸附近的一座绿色小山，站在山顶，嘎顺淖尔闪闪发光的水面一览无余，它看上去比苏泊淖尔大多了。等我画了一张湖和北面远处山脉的草图后，大家返回营地，拆掉帐篷，开始了返回大本营的征程——在那里我们的新旅行即将开始。

第十八章　1号气象站

10月26日前一晚上的温度骤降至零下8.7摄氏度，为我们迄今为止经历的最低温度。太阳升起以前哈斯伦德和里艾伯润兹已跟着拉船的牛车先行出发了——他们可以不必顾及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前进的路线。

我的纵队在森林中顺着奥博恩古尔向南进发，于10月28日过河，此时有些河段已结冰。旅队穿林越障，有时行走在灌木丛中，有时跋涉在草原上，有时行进在寸草不长的碎石地上，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大本营。瑞典国旗在额济纳河岸边高高飘扬，在新的气象观测站附近还有一面德国国旗。所有人都趋前迎接我们。对我来说，再次见到诺林及其伙伴真是莫大的安慰。事实上，伯格曼、黑德、冯·玛森巴希、索得鲍姆和丁已经与我们分别数月了。他们于10月23日到达这里，比我们早到了5天。吃完饭以后，北方纵队的负责人立即呈上了他们的报告。诺林的23张大地图给人印象深刻，另外15幅地图则描述了到额济纳河的路线。黑德展示了他的不凡的三角测绘成果，其方向也大致通往善德庙。玛森巴希对纵队经过的谷地和河道进行了一系列地形测量，从而给诺林的地图提供了极有价值的附录。

在收藏家陈的大力支持下，伯格曼在从百灵庙到额济纳河的路上发现了120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其中只有14处是在善德庙到1号气象站的途中。现在，我们收获的器物有17600件，除了石片、石斧、石刀和其他石制用具以外，大部分都是燧石核、燧石刮削器、燧石片、燧石箭镞。

北方纵队的所有成员都对自己的发现感到满意——他们当然有理由高兴。不仅如此，他们只损失了1匹骆驼，但却买了3匹。他们的12匹骆驼状况良好，随时都可以开始向哈密长途行军。

他们在途中听到了关于我的旅队的可怕谣传，有传言说我们是正

在沿着额济纳河开进的一支军队，目的是要征服土尔扈特地区。有的传言说我们正在黑城掘壕防守，因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大量黄金，引得土匪们蜂拥而至，企图在我们上路时实施抢劫。

大本营一切照旧，冬天将至，欧洲人都穿上了冯·考尔制作的毡靴，此外还配备了皮帽和棉衣。晚上大家分开睡觉时，人人都不忘记给自己的帐篷中带去一个通红的火盆。

日子过得很平常，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商讨和考虑新的计划，该计划涉及中亚的广阔地区，但在我的心中却总觉得我们谈论的是我的祖国瑞典的这个或那个小省份。我们同时也在想袁教授现在在哪里——南方纵队完全失去了踪影。诺林在善德庙西面时还与之有联络，因此他猜测袁教授可能走了一条更偏南的路线，但从那以后就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

前往马木的玛斯考尔、刘和马还没有回来，也没有黄文弼的消息，但他和其他人一样很快就会赶来，不必担心他们会延误大部队的出发时间。况且，在额济纳河失去的时间将只会在一个方面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那就是在哈密的2号气象站将不会有完整的观测记录。出于这个原因，霍德博士向我提议由他带一部分人马于10月31日出发，抄最短的沙漠路线以强行军的速度向哈密进发，这样他应当能比大部队早约20天到达目的地，这样，等我进入哈密时就会看见2号气象站已经建好并开始工作了。

我当然同意这一计划，遂立即指示拉尔森于10月3日早晨备好24匹最好的骆驼，霍德的人马将构成中部纵队。我们将分3路推进，我自己打算取道更南的路线，诺林和伯格曼将取道更北。哈斯伦德被指定为霍德前锋的向导，赫姆波尔的任务则是测绘纵队的行军路线。

10月3日凌晨，所有人都围住即将出发的人与他们道别。24匹健壮的骆驼已经轻装在身，乘骑骆驼闪闪发亮的鞍子上挂着枪盒、鞍袋、水壶以及其他用具。只有一名汉人和蒙古人仆从跟随霍德博士的队伍出发。拆搭帐篷、铺床叠被、打包装卸的事情都由旅队的负责人亲自打理，这两名仆人只在哈斯伦德的指挥下照顾骆驼。傣特曼充任

厨师。赫姆波尔和李划出了第一道基线——他们两个都要测绘线路。最后一批信件被装入了邮袋，还有最后一次握手，然后霍德就骑上骆驼，带着精干的小旅队消失在冬日的森林之中。

10月底11月初时，河水的水位越来越低，我们曾在其上度过了几个难忘的星期，河的两岸还是那么景色宜人。事实上，一部分河水被冰冻了。11月4日晚上的温度为零下10.8摄氏度——但冰的形成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水位一下子从最高位发生了33.5厘米的突降。土尔扈特人告诉我们，马木附近以及更上游一些的居民习惯于让河水浸淹他们的土地，以便给庄稼形成一层保护冰层，他们还说，一旦这种情况过后，11月中旬就会出现一次新的涨水期。河床看上去奇特而生疏，顺着河岸延伸的支流变成了一道长长的拐弯，里面是一潭死水。现在只有河床中部还可看到一支细流，弯弯曲曲地向前流淌，前面是一堆堆裸露的泥滩。

一天，拉尔森令人吃惊地给我带来了一顶土尔扈特人做的蒙古包。虽然比较小，但却十分清新，其穹顶宛如一个奶酪盘盖子。我们将其竖立在蓝色帐篷中间，左面插着带旗的矛，这样一来，人人都知道我们这个游动“部落”的头领就住在里面。覆盖蒙古包的毡块分为两种颜色，外面为白色，里面为灰色，门为红色。蒙古包中间放着一个用空石油桶做成的炉子，上有烟囱伸向天窗以外。于是，天窗只能半开半合，天光从中透了进来。门左首放着我的写字桌，一口箱子和椅子，右首放着两个皮包，里面装着我随时要用的东西。在这些家具的前面铺着来自包头的地毯，其余地方铺着毡片。冬天一到，我就怀着愉悦的心情搬进了这个温暖的住所。晚上我躺在“床上”时，炉子里的火已经熄灭了——我的毛皮床使我的身体总是紧贴着亚洲的土地，这时我便可以看着天窗外的星星和月亮进入梦乡。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过冬的居所也建成了，它是帐篷和地窝子的结合体，里面还有炕，受到了大家的极大欢迎，索得鲍姆就要在这里过冬。

11月3日，风沙突起，营地和整个附近地区顿时被笼罩在淡灰色

的沙尘之中。然而，就是在这种沙雾之中突然闪现出玛斯考尔的高大身躯。他牵着骆驼，平静而稳健地走了过来，开口就用纯正的瑞典语问：“有吃的吗？”食物立即被送了上来。

这里距马木223公里，他们去时需要9天，回来时则走了8天，并且还莫名其妙地损失了一匹骆驼。当时他们正在穿越额济纳河，刘的骆驼躺倒在水中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刘和马遇事从不退缩，他们立刻跳入河中，帮着其他人将那牲畜拖上岸，并就地点火扎营，烤干湿透的衣服。次日早晨他们出发时，发现那只骆驼已全身僵硬地死在了帐篷边上。

他们在130公里处走到了森林的尽头，最后的25公里路上他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农田、花园和水渠。小镇马木就坐落在额济纳河的右岸，它被四面城墙环绕，每面城墙至少长200米，东西两面各有一道门。小镇有不到300名汉人，仅有3家商铺。整个马木地区约有1000户人家。

友善的市长对我们的特使极为热情，他们被安顿在市长的家里。市长家里的陈设显出斯巴达式的简朴，其主人显然是冯玉祥元帅的崇拜者。他们从一个同样友善的店主那儿买到了面粉、糖、蔬菜、土豆、毛皮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并以十分合理的价钱将这些东西用骆驼送到了1号气象站。这家商店的主人的兄弟正准备举行婚礼，玛斯考尔、刘和马也受邀前往祝贺。玛斯考尔给了新娘几块银元作为贺礼，而她则恭恭敬敬地给他磕了个头作为答谢。

在返回大本营的途中他们接到了黄文弼和匡。这样，他们和刘、马以及旅队就在夜深时与我们会合了。刘带来了北京最新的消息——“国立大学”的罢课现在已波及北京所有的大学和高中。对于我和徐教授向北京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和建议，委员会在8月4日举行会议进行讨论，并于8月6日回信表示同意。

尽管已是霜天萧瑟，11月4日的中午饭仍在露天开吃，桌子边只有18个人，因为有10名工作人员缺席。我告诉他们主力队由我指挥，以拉尔森为向导，同时诺林纵队将于11月8日向哈密开进，他们立刻

报以欢呼，因为所有人都急不可耐地想再度进入“原野”。

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打包。

夜深后，几个瑞典人、玛斯考尔和齐莫曼聚集在索得鲍姆的冬“屋”里，享受着烤土豆和通红的炉火。

留在土尔扈特人那里的3个人将会经历什么样的风险？日后他们将会给我们讲述什么样的奇遇？

11月7日又是一个分手的日子，因为学生隋要离开我们前往包头建立新的气象站。

在9月28日到11月8日，我们在额济纳河度过的所有日子里，建立第一座永久性气象站的工作每天都在进行着，等到我们即将离开时气象站已基本建成。

有一天，齐莫曼让我参观了气象站的所有设施：科学仪器、住所、设备和储藏室。有些地方需要改动一下。就住所而言，在森林边缘已设立了4座大的土尔扈特蒙古包。齐莫曼住在已经建好的一座里面，第二座为马的住所，第三座住着几个仆人，第四座里面是马仁和其他照管骆驼的蒙古人，马的住所还可以接纳客人。

我和齐莫曼进行了几次深入的讨论，指出了我期望他完成的各种任务。他是气象站的主管，负责严格按时进行气象观测。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必要时刻将自己“拴”在气象站上，因为有马和索得鲍姆做他的助手。因而，他可以到河流三角洲进行短途旅行，冬天可以在冰上出游，春天能驾“船”出行。

除此而外，他每月还要通过马木的邮局向在迪化的我呈递一次报告。根据马仁的建议，他可以用最好的骆驼与马木镇保持联络。还有，来自罗依·查普曼·安德鲁斯队伍的64匹骆驼中的大多数需要留在这里悉心调养。在它们休养好以前，我们必须雇用土尔扈特人的骆驼。其往返一次的距离不到450公里，收费只有5块钱。

我们箱子中的钱不多了，因此只能给气象站留100多块钱，同时还要给袁教授留一小笔钱。我们决定一到哈密就派优秀的旅队向导哈斯伦德带上钱和信赶回1号气象站，其行程来回距离足有1400公里，如果再加上去霍德纵队的路程，共有2100公里，不过，这也难不倒他。

额济纳河下游的居民属于土尔扈特部落，因而也是蒙古人。在此说上几句他们的历史，这并没有越出我的旅行记述的范围。留在后面那个小小的沙漠河畔的我的同伴将在日后与他们进行更为密切的接触，因而他们有机会知道涉及当代土尔扈特人风俗习惯的许多事情。

我已经数次提到，我们的中国学者所带的6只大箱子中装满了中国历史古籍。在这座“金矿”里有一本出自一百多年前的著作，名为《蒙古游牧记》，其作者张牧并没有将其写完，另外一个游历者贺月涛为这本书做了结尾。此书详细记述了每一个蒙古部落的情况。徐炳昶教授将其中重要的部分作了翻译——著名的汉学家已经为伟大的文化语言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科本在他的著作《喇嘛教僧侣统治制度、等级制度与寺院》（1859年）中已经对土尔扈特人的传奇经历作了描述。在以下的记述中我不能确定那些名字的具体拼法。

土尔扈特人祖先的名字为翁罕，他七传至贝果鄂尔勒克，鄂尔勒克生有4子，大儿子叫珠勒札翰鄂尔勒克。后者的儿子和鄂尔勒克生活在亚尔地区的艾绍尔霍拉，此地距塔尔巴哈台不远。在这一时期卫拉特人有4个部落，换言之，卫拉特人包含以下4个分支：图奥罗斯或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在阿拉善和库库诺尔沿岸）和图尔伯特。4部落中唯有和硕特是成吉思汗后裔。准噶尔部生活在伊犁地区；图尔伯特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游牧；土尔扈特人在亚尔；和硕特部的牧地早先在迪化周围，但在明代末期，在顾实汗的率领下离开该地，目的是为了征服阿拉善和库库诺尔。顾实汗的外甥额图尔图带领其部落到达阿拉善的牧地，但在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额图尔图汗被准噶尔攻杀，于是他的一部分部从移至宁夏，康熙帝在此为他们安排了牧场。顾实汗的小儿子有16个儿子，其中4人在西藏喇嘛的

允许和帮助下定居于库库诺尔周围，其余12人则游牧于阿拉善地区。康熙皇帝批准他们游牧于由他钦定的地区，这些地方离中国边境只有60里左右。

此时与以前一样，卫拉特还是分为4部。准噶尔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企图凌驾于其他部落之上，而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对此无法容忍，遂决定率领所部迁于南俄。此事发生于明朝末年。中国文献资料记载，土尔扈特人的新牧地的南方有一处哥萨克人的聚居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尔扈特人成了俄国的臣民。

然而，和鄂尔勒克的后代仍习惯于每年派人向中国皇帝进献礼品，他的儿子叫书库尔岱青，其子阿玉奇接受了“可汗”的名号。到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阿玉奇向中国派遣了使臣。康熙对这个遥远的部落很感兴趣，为了得到有关他们地区的可靠情况，康熙派图里琛借道俄国来到了土尔扈特人的聚居地。图里琛将其这段3年的出使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为《异域录》。

18世纪中期的土尔扈特是一个很重要的部落，他们的王爷叫做渥锡巴（实际叫渥巴锡）。那时俄罗斯正与邻国作战，作为俄国的臣民，土尔扈特人也得参战，由于此缘故，土尔扈特人失去了许多男子。不甘受沙皇摆布的渥锡巴决定寻找新的牧场。他的一位生活在中国的亲戚来到渥锡巴的营帐，劝他夺取伊犁地区——这一地区已在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被中国控制。

渥锡巴要带走所有的土尔扈特人，他向伏尔加河西的人发出命令，要他们在冬季越过河流开始行动。但这个冬天伏尔加河没有结冰，渥锡巴只带了一部分人向伊犁进发。俄国人尾随追来，但他以突然的行动摆脱了追兵。当哥萨克人也来攻打他时，他决定选择通往布鲁特方向的路线，直奔新疆西部和喀什噶尔西北。由于受到布鲁特人的攻击和抢劫，渥锡巴只好转逃戈壁沙漠。他们在那里行军10天，没有水草，只能以马和牛的血解渴。部落损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力，成群的牲畜也丢掉了。

他们长途跋涉7个月后到达伊犁河畔。当时渥锡巴仅剩七万部

众。获悉土尔扈特人正在接近的消息后，伊犁将军立即派兵沿边布防，同时派使者去见渥锡巴，询问其有何要求。渥锡巴回答说他一心归顺，因为他是一位喇嘛教徒，渴望回到喇嘛教的故乡，他从此再也不想受俄国人的统治了。对他和他部落的人民来说，俄国的宗教、风俗和服饰都显得格格不入。

当时中国人的意见也不相同，有些人主张善待土尔扈特人，另一些人则主张将其赶走。乾隆决定对其以礼相待，将其首领渥锡巴招至热河。他在那里授予渥锡巴“可汗”封号，授予他的兄弟“王爷”封号，其他土尔扈特头人也受到很高礼遇。

土尔扈特部落得到了新的牧场。他们被安排在4个地方游牧：南路在喀喇沙尔以北，北路在塔尔巴哈台以东，东路在伊犁和迪化之间，西路在库尔加以东。在斯蒂尔勒的地图集中有关“中亚”的书页里，今天仍可以在上述地方找到土尔扈特人的名字。

除此以外，中国皇帝还送给他们14万匹马、牛和羊，而此前他们已在新疆得到了12万头牲畜。除了谷物、棉花、布匹、蒙古包和其他用品外，他们还得到了两万斤茶叶。

他们将明朝皇帝授予的大印交给中国皇帝，并得到了新授的清朝印。

中国史书最后也记述了土尔扈特人的一支是如何到达额济纳河的。如《旧约》一样，史书准确而枯燥地追溯了一代又一代，直至来到额济纳河的第一位首领。我们获悉和鄂尔勒克的儿子书库尔岱青的第四个儿子纳木图额伦有一子，名叫纳图亚尔马木特，因此他也是阿玉奇汗的远亲。在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纳图亚尔马木特的儿子阿拉布珠尔通过准噶尔地区前往西藏，他打算拜见西藏喇嘛并与之晤谈，他显然是在寻求帮助。那时准噶尔的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与阿玉奇不和。阿拉布珠尔因此未能安全返回，而是进入了甘肃的肃州。

他从肃州向清朝皇帝派出使团，宣布自己要做天子的臣民，清帝将肃州西南的舍尔腾划归其游牧。毫无疑问，此地指的是阿纳姆巴鲁

音—乌拉东南的希尔丁或舒尔腾地区，我曾于1901年1月去过该地，那里有两个湖，分别名为布伦音诺尔和苏哈音诺尔。我在这一地区遇到的蒙古人为我提供了穿越沙漠的向导，他们肯定是阿拉布珠尔部落的后裔，因为阿拉布珠尔十分感激地接受了清朝皇帝的安置，在舒尔腾世代游牧。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阿拉布珠尔请求为皇帝的军队服役。由于满洲皇帝的政治目的也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将蒙古人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因此，阿拉布珠尔的请求被欣然接受。皇帝遂命阿拉布珠尔率500人进行一次西征，目的是为了寻找距罗布泊200里的卡斯湖。

事实上，卡斯湖远在罗布泊东南400里的地方。康熙皇帝可能是从当时的中国地图上知道该湖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欧洲人，他将其称为噶斯。在1900年和1901年，我也到过该湖，我的两个大本营——曼达尔利克和杰米尔利克就在卡斯湖边和其邻近地方。

阿拉布珠尔一直与其部落待在卡斯湖边，并死在那里。康熙封其为“固山贝勒”。其子和继承人丹衷亲自到北京，被晋封为“多罗贝勒”。

雍正时期，卡斯湖边的土尔扈特人中弥漫着不满和分裂的情绪。有几个首领带着部众投奔了准噶尔部，丹衷感受到了来自邻居的威胁，遂向清政府请求将牧场内移，清政府答应了他的请求，中国史料记载：“陕西总督查郎阿令携部众游牧于阿拉克山、阿勒坦、持卜什等处。”这个游牧部落在那里一直徘徊，似乎找不到永久的栖身之处。

但是他们在上述地方并未停留多久，因为清朝皇帝很快就让他们在额济纳河下游安家了，其地直至嘎顺淖尔和苏泊淖尔。这样丹衷多罗贝勒在1729年就成为额济纳河上的第一位土尔扈特人首领。这说明，土尔扈特人在额尔济纳河及两个湖边的历史还不满两个世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最北面的土尔扈特人曾向我们保证说，苏泊淖尔

在过去的近两百年里从未完全干涸过。

昔日中国境内的蒙古人都受到皇帝的直接统治，随着1911年中华民国的成立，这种关系自动发生了改变。现在，额济纳河上的97户土尔扈特人便处在甘肃省最高当局的管辖之下，尽管他们的王爷在某些事情上可以和北京直接交涉。

额济纳土尔扈特人的地盘东接库尔纳，其地在我们的1号气象站东南侧，南到巴音博戈多附近的马木，西连沙漠戈壁，北至阿济善山脉，东南直抵甘肃边境的贺兰山脉。

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描述了老土尔扈特人的历史，目前他们的后裔生活在额济纳河西北的4个地区和伊犁附近，以及噶喇沙尔和其他所有提到过的新疆的地区。除此之外，在科布多西南部还各有一个土尔扈特人部落。这两个部落被称为“新土尔扈特人”。这样土尔扈特人共有7部，其中5部为旧土尔扈特。

自从马可·波罗的“保护者”元朝灭亡之后，中国人把蒙古人分为3大部：一个是漠北的喀尔喀蒙古，一个是西部草原地带的额鲁特蒙古，一个是南方的漠南蒙古及众多的其他部落。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是成吉思汗的后裔，额鲁特蒙古是和硕特蒙古的子孙。

在这些蒙古民族和部落的世界里，我们找到了勇敢坚强的土尔扈特人。提到他们的早期聚居地，正如歌中所唱的：“你不会在这些异教徒的小屋中永远住下去，你如同陌生的客人，总要在大地上游荡片刻。”但在额济纳河的土尔扈特人已度过了200个春秋，他们很可能永远在此生活下去，直到最后一个部落凋零殆尽。

第十九章　沙漠行军和沙暴

11月8日一起床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旅队准备进入第二个考察阶段，即在冬季越过额济纳河和哈密之间的沙漠地带——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头一天的行军距离并不长，这实际上是一次试验，目的是让蒙古人看看骆驼的行李是否放得合适。

大部队已经出发，而此时拉尔森却告诉我说有15套行李需要驮载，但骆驼不够用了。这样我们只好将这些东西留在1号气象站，于是所有在以后几个月中用不上的东西和装备都被留了下来。哈斯伦德被安排在下一次出发，他将带来余下的东西。由于从呼图尔图古尔出发时过分役使骆驼，从而导致目前骆驼的短缺。我们那时有272匹骆驼，我的主力部队有127匹。现在损失的骆驼已达到28匹，在前面等待我们的荒凉沙漠之中死去的骆驼肯定会更多。

和以前一样，哈密之行也是分成3个纵队：霍德是中部纵队的前锋，晚一天出发的诺林在北部纵队，我本人则在南方纵队。

旅队很快将额济纳河抛在身后，接着森林也消失了。我们在森林旁边的碎石地面上建起了营地，这是50号营地。

考察队的28名领导成员中只有9人在我的纵队，他们分别是拉尔森、黑德、冯·玛森巴希、里艾伯润兹、穆伦温格、徐炳昶、黄文弼、丁、刘。有5个中国人留在后面，其中有3个人在袁教授的纵队——我已有两个月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了。考察队还有19名照顾骆驼的蒙古人和汉人。另外还有一名厨子、5名仆人和文物收集者白。我们的给养足够消耗40天，为了度过无水的荒漠地带，我们还带了6只木制的蒙古水桶，其中的水可供3次宿营之用。

一个有800匹骆驼的中国商队也于同一天离开额济纳河，他们来自归化城，途经哈密和巴里坤前往古城。其驮载的货物有布匹、茶叶、香烟以及其他百货。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个商队，是因为在我们旅行的第一程他们就一直在跟在我们不远的前方。其负责人请求与我们同行，因为考察队的来复枪可使他们免遭土匪的劫掠。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供那么多的骆驼饮用的泉水。

终于又上路了，多让人高兴啊！但没有人怀疑这次沙漠之旅将会是多么艰难。

11月9日早晨，借着拆装我的蒙古包之际，我坐在火堆旁注视着旅队分成7行向西北逐次进发，片刻之后我起身跟了上去。转身回顾，额济纳河畔的森林逐渐从视线中消失，众多已塌陷的汉代烽火台的身影也愈显模糊。地面很硬，上面有一层细圆的碎石，其中生长着稀落落的杂草，其根系拢起了一堆堆的黏土丘。出现了一条干涸的河床，其中有死杨树，这里在古时肯定是一条三角洲支流。

第二天我们推进至莫鲁音—古尔附近的森林地带，莫鲁音—古尔底部宽180米，有几个地方比较潮湿，但其余地方十分干燥。其左岸有一处泉水，泉水不远处是一个水潭，上面有一层清冽的淡水冰。莫鲁音—古尔与额济纳河相似，只是这里的森林较稀，树也较粗矮，山柃木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我的蒙古包就建在一株柃树下，于是沙沙作响的树叶声又可以伴我入眠了。我们似乎正在告别这个美好、难以忘怀的夏天，随之而来的便是严冬，这将是我在亚洲所经历的最难熬的冬季之一。不远处是一个土尔扈特蒙古包，我们获知河边住着20户土尔扈特人。一个名叫坚桑的土尔扈特人前来搭讪，他将把我们带到下一处泉水。他说这个地方叫托罗依—苞鲁克，意思是“沙脊上的杨树林”。在春季和初夏河水很深，连续的夏雨之后河流通常要涨水，涨水时节不能渡河。他还说莫鲁音—古尔岸边的森林中有狼、狐狸、野猫和羚羊，但没有猞猁狲。他本人以狩猎为生，猎获的兽皮出售给汉族商人，一张狼皮可以卖12块钱。坚桑也知道霍德和哈斯伦德从托罗依—苞鲁克取南路趋向哈密，他建议我们走北路。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这样做非常好，但对旅队而言却是灾难性的一

步。

11月11日前一晚上的温度为零下14.2摄氏度，这是迄今为止最冷的天气。晚上纤风不作，月光如水银般从天窗中流入，炉子中的火也是噼啪作响。尽管晚间温度很低，但白天1点的温度却已升至零上10.4摄氏度。

还是有向导好！旅队行军路线直通北方。我们正在通过的草原上长着一丛丛的灌木和牧草。这里野禽很多，可以看到它们一群群地飞往莫鲁音—古尔的水潭。到处都是羚羊和瞪羚踩出的小道。我骑着骆驼走在前面，后面是拉尔森和向导，然后是考察队的其他成员，他们的后面便是长长的队伍。里艾伯润兹骑着骆驼走过来，要在骆驼上为我摄影——就像是在开阔的沙海的一艘船上给另一艘船摄影一样。

走了24.7公里以后，大家在沙拉—霍鲁逊泉的远处宿营。此地叫扎赫—沙拉霍鲁逊，意为“黄芦苇的边界”，我们的帐篷就支在枯萎的芦苇中间。乌尔加和肃州之间的十字路就通过这里进而伸向远方。这里曾有一块用木板做的路标，上面画了两只黑色的手。但据说它从未被使用过，只是有一次作为试验让一辆汽车走过一次。在这种平坦坚硬的不毛之地，汽车可以任意行驶。

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蒙古的东部边界地带称为无人区也许更为恰当——它不在蒙古共和国的管辖之下，也看不到牧人——至少在我们去新疆的路途上没有看到牧人。汉人在此也没有固定的聚居点，甚至连一个商店都没有。但是，在几个地方我们却看到了荒弃的鸦片田。坚桑告诉我们说，现在考察队走的这条路线投入使用还不到两年，来往于归化城和古城的汉人商队多走此道，为的是避开额济纳河上游的收费站。该路线通向嘎顺淖尔的正西面，但走在路上却看不到嘎顺淖尔。从53号营地可以看到40里开外的嘎顺淖尔的西端。北面的山系名叫托斯陶，其蓝色轮廓显得很突出，其中一个山峰上立有敖包，在那里每年都要祭拜当地的保护神。西北部低一些的山系叫乌努泰因哈拉山，意为“黑狐山”，据说那里有黑狐狸。这个多山的地区还是野骆驼的乐园，它们经常从山那儿出来，有时到达嘎顺淖尔，有时

甚至跑到这个湖边来。今年人们在莫鲁音—古尔下游曾两度看到约10个一群的野骆驼。坚桑和另外几名土尔扈特人就看到过这种奔跑速度飞快的“腼腆来客”，它们一旦嗅到人迹，就会以风驰电掣般地速度撤走。因为怕激怒众神，土尔扈特人不杀野骆。

查干—博戈多山坐落在距此有8天路程的西北方，我们的土尔扈特向导说那座山是“白色的神灵”，那里的山谷植物茂盛，有熊等动物出没其间。

此时天气非常晴朗，但西风猛烈。度过了一个温度极低的霜降夜之后，考察队于11月12日向西北方向挺进，因而渐渐地离开了嘎顺淖尔。边疆的沙漠地带都是粗沙和光圆的碎石，其下则是松软的土层。道路很好，就像用水泥铺过似的。地面很平，看不到起伏的地浪。人们只是偶尔从骆驼行进中的起伏感到地面高度的变化——当前面的队伍突然从视线中消失后，你才意识到地面高度发生了变化，而不久之后消失了的队伍又会出现在另外一个平坦的地浪的顶端。给这样的地形画草图是很简单的事情，你只需用一把尺子画一条直线，直线的上方是青绿色的苍穹，直线的下方则是由深蓝色逐渐淡化为紫罗兰色的沙漠——就这样草图就算完成了。也不需要画任何细节，顶多画几个略带黄色的灰色小点，说明草原上还生长着稀稀拉拉的牧草。

11月12日晚间西风几乎强化成阵风了，猛烈的呼号声持续了一整夜，次日早晨约9点时，狂风变成了标准的沙暴。拉尔森跑到我的蒙古包喊道：“赶紧出来向西看，沙暴像一堵黑墙似的逼过来了。”那的确是一种惊人的，不，应该说是一种神秘的景象。天完全变黑了，空中飞舞着无数的沙粒和尘土。幸好前一天下午我已测定了北方山脉的方向，今天它们就好像一下子被风卷走了一样，根本看不见了。门托急急忙忙冲了进来，要在我的蒙古包的天窗和地面之间固定一条绳子，然后再将其固定在外面的几口沉重的大箱子上。如果蒙古包被风刮跑了，那就再也无法找回来了。当然就更别提我那些个人物品了，它们将会被狂风刮走，很可能还会在莫鲁音—古尔河畔的森林中停留片刻。在这样的风暴中行走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像在水中行走一样挣扎着向前挪移。如果你顺风行走，身体必须往后靠。虽然人在狂

风中可以挺住，但骆驼却倒了大霉，它们庞大的身躯加上高高摞起的行李成了狂风绝好的目标，与平时相比，它们此刻要付出双倍的力气。这样恶劣的暴风会将一个旅队毁掉，因此我们决定留在54号营地，这里倒是有水，但牧草却再糟糕不过了。可另一方面，风暴可以提高温度。夜晚的温度甚至只下降到零上0.3摄氏度，那是水银柱在整个冬季的夜晚里最后一次停留在零度以上。

这无疑是我们迄今为止遭遇到的最猛烈的一次风暴，估计其速度可达每秒30米，我们好像是被围困或被冻住了似的。帐篷不仅受到沙尘的拍击，一阵一阵的砾石也把毡墙打得咚咚作响。蒙古包受风的一面眼看都要被吹得陷进来了，板条一根接一根地从屋顶掉落下来。然而，这些都不能打扰我的写作。拉尔森那里也并不沉闷无聊，他和胡莫正想尽一切办法给穆伦温格和冯·玛森巴希解释桥牌游戏的规则，他们热闹的笑声一次又一次压过风暴声传了过来。徐教授和其他的中国人一整天都没有露面。在拉尔森的帐篷用完晚餐后——飞尘如雨点般落入碗中，所有的欧洲人都被请入我的蒙古包，这里的铁炉子烧得通红，不时有火星从中蹦出来，我们就围在我的灯笼周围阅读和写作。几条狗蜷缩着身子藏在蒙古包后面，因为蒙古包比帐篷更能挡风。

风暴肆虐了整整一夜，11月14日早晨它呼号咆哮得更厉害了。外面一个人影也没有，连已经习惯了这种天气的蒙古人都在睡觉。沙质地面看上去像扫过一样干净。像彗星尾巴似的淡色沙尘贴着地面旋转，速度飞快。人一旦走入其中，立刻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你感觉地球好像正在移动，你好像就要被波涛翻滚的巨浪吞没似的。走向帐篷时，你必须保护好自己的脸，因为无数细小的沙粒如鞭子一样朝你的皮肤抽来。我们不仅要问，昨天在我们之前出发的大旅队现在不知怎么样了，他们甚至还带着几个坐柳条轿椅的旅行者呢。事实上这种轿椅有更大的受风面，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风暴中，他们会被轻而易举地从骆驼背上掀下来。但我估计夜里起风以后，他们可能也停下来了。

在这样的日子中你不可能真正停止工作。风在我的蒙古包上又拉又推，又扯又摇，慢慢地将其推向下风处。但为了以备不测，所有可

以移动的东西都被我装入了皮包。人们逐渐适应了空中震耳欲聋的响声，这种声音听上去就如倾盆而下的冰雹打在正在乱石堆中行进的马车的顶篷上一样。我们当然不可能上路了，但必须保持平静。太阳就像分散的光线，非常模糊，而且一到下午就完全消失了。拉尔森和穆伦温格的帐篷被吹翻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埋在厚厚的沙尘之下，连驮鞍也要挖一挖才能拿出来。突然，传来一个人的呼救声，原来一顶帐篷快要被风吹得飞起来了——风暴将帐篷钉拔了出来。我急忙赶了出去，发现里艾伯润兹拿着摄影机正等在即将发生的灾难现场。灾难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帐篷轰然倒下，里面的人扑在帐篷布和他们的财物上，以防被风吹跑。然而，有一卷卫生纸却成功地逃脱了，它眨眼间就全部展开了，足有100米长，如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飘带在风中啪嗒作响。我们的肚皮都快要笑破了——一半是因为那卷卫生纸，一半是因为里艾伯润兹，他怎能放过这次宝贵的拍摄机会呢。

晚间温度计测得的温度为零下7摄氏度，风暴小了一点，但早晨的风仍很大。我们现在起程向西北方向前进，路上还赶上了一个小旅队，他们晚上点起的篝火在我们躲避风暴的营地都可以看到。让大家又惊又喜的是，那是诺林纵队，他与伯格曼和玛斯考尔取道更北向我们的旅行路线赶过来了。我们打算一起走几天，然后我计划循北方路线考察，而诺林则要通过不熟悉的地区向南方推进。这样我们就能分别从两面对夹在两支考察队之间的山系进行绘图测量，蒙古人称这些山系为库库图姆林乌拉，意为“蓝色的铁山”。

我们一道行进，地上不时长满了稀疏的牧草和带刺的植物，但更多的地方则是一片荒凉。不时出现的黏土台地证明这里原来是嘎顺淖尔淹没过的地方。瞭望左面的“黑狐山”，由于蜃景的作用，其西部的一串顶峰颇像漂浮在地平线上空的一串黑珍珠。

沿着西北方向走了30.6公里以后，我们在一处极为荒凉的地方建起了营地。

11月16日早晨，已经没水洗脸了。水箱中的水不多了，必须节省着用。由于缺乏燃料，每天在我们的帐篷中烧得通红的炭火盆今天也

熄灭了。没有人因为无法洗脸而抱怨，因为几乎已是零下10摄氏度的霜天了。

我们向正北出发时风暴几乎已经平静下来。沙漠单调无趣，小路在黑灰色的地面上蜿蜒曲折，犹如一条亮色的飘带。蒙古人骑在骆驼上聊天、唱歌、吹口哨、叫喊——身边有心情愉快的人相伴真是令人愉悦的事情。东北方兀立着蓝色的山脉，构成了托斯陶山系的延伸部分。

在这里很少看见骆驼的残骸，今天我们只看到了两具，前几天连一具也没看到。人们对这里的印象是，这条路上的交通不是很繁忙，更稀少罕见的是蒙古人为神灵们树立的还愿石堆，渐渐地一个也看不到了，大家感到好像正在离开蒙古人的地界。大沙漠西部的地方出现了新的景观，那里的山顶上飘扬的是先知的绿旗。另外，我们还通过了一处路标，那是汉族商人用众多的石头堆起来的一座小金字塔。

56号营地所在的地区与上一个营地所在的地方一样荒凉，但大家还是找到了一些柴火。一只骆驼驮着几捆柴火，以备在没有树木的地方做饭用和在蒙古包中生火用——现在蒙古包成了俱乐部，所有想取暖的人都去那里。

11月17日，拉尔森于早晨6点30分出发，我在一小时之后也动身了。道路通往北方，我们在想它为什么不折向西方呢，这样走离哈密会越来越远。尖厉的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吹得人脸部生疼，骆驼身上可移动的东西都在乒乓作响。在这种多风的寒冷天气里画地图真是不容易，手很快就没有知觉了，在测定方位的间隙也越来越难以将手暖和过来。路在山间穿行，一次又一次穿过干燥的浸蚀河床。然而，山还是走到了尽头，考察队又一次进入平地。在最后一座山顶上出现了一堆石头，它使人想起了海岸上的航海标志。

西北风缠住了我们，骆驼在颤抖，我也随着它的抖动而摇晃起来。然而，看到远方的新营地升起了烟柱，我的心中油然生起一种轻松感。到达营地时我已冻僵了，由于骆驼一路上不停地颤抖，我现在站在地面上感到地面好像也在上下摇晃。然而，一坐到红彤彤的火堆

旁，我顿时感到身心释然，地面也平静如常了。远在西方的“白神山”的淡蓝色山峰如金字塔般闪现在地平线上空。

晚间的气温为零下8.2摄氏度。11月18日的太阳闪着清丽的光芒。一阵轻风从东方吹来，西北的天空覆盖着云层。我们依依不舍地与诺林、伯格曼和玛斯考尔分别，还有那只小羚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它。我们沿着西北方向前进，而诺林他们则向南趋向查干—博戈多断层块周围。我们右侧的山脉构成了托斯陶山系的一部分，左侧的山系则是“黑狐山”的一部分，前天考察队就翻越过该山。和通常一样，植被坚硬枯萎，让骆驼吃这种东西有点不人道，最好能将驮箱磨成锯末给它们作饲料。但跨过了一带芦苇和一处泉水后，渐渐出现了一片灌木，有些还是绿色的，这正合骆驼的胃口，借此我们也要休息一下。从起风暴那天起到现在，考察队已3天没找到水了。天黑以后，南面的山顶上隐隐闪现着诺林纵队的营火。同时，他们肯定也能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的营火。

夜幕降临时，西北的天际变得更为阴郁——难道又要遇上风暴吗？

第二十章　寒冬腊月

午夜时分，风暴的吼叫声将人吵醒，清早我正在穿衣服时听到有人喊：“好一场暴风雪啊！”接着就听到了穆伦温格的一声喝彩，他随身带着雪鞋——真有先见之明。外面，一小堆一小堆的雪在骆驼走过的地方堆起来，凹地被填平了，小山后面和草原浸蚀山脊的后面都堆满了皑皑白雪，细密的白色结晶在暴风的裹挟下从西北方向飘过来，东方天际的一片片红中带黄的色彩说明太阳已出来了，但其他地方的天空还是漆黑一片，在西北方，黑乎乎的不规则云彩犹如撕成碎片的旗帜。天空一派忧郁阴沉，给人一种不祥之感，好像难以穿透的苍穹一下子覆盖在广阔的沙漠之上。

西伯利亚的寒流突然就来临了，前一晚的温度降至零下5.1摄氏度。现在，暴风天气中出现了奇特的事情，那便是气温下降了，下午4点30分过后气温已降至零下7摄氏度。这是气温在白天里第一次没有达到零度以上。空气压力在过去的48小时内几乎降低了26毫米，从656毫米降至630.5毫米，尽管一直以来所处的高度没变。天亮以后风暴就平息了。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早上一开始天空就变得平静蔚蓝。

在西南方向，查干—博戈多的主峰清晰可见。一只骆驼不得不被留在58号营地，它不愿进食，怎么也站不起来了。我们顺着一条谷地向西北前进，谷地的部分地段横着两座沙山，上面长满了红柳丛，走出谷地又是开阔的荒原。风景美丽如画，狭窄的山谷在陡直的几乎要倒下来的山脉之间蜿蜒穿行。

11月21日更为孤独、单调和荒凉，但那一天无风，太阳重新将温暖的光线洒了下来，因此骑行变成了一种乐趣，而不像在暴风雪中那样是一种折磨。第二天下午又下了一场雪。

11月23日一片平静，天气几乎已经变热了。平坦的大地伸向北

方，几乎看不到尽头。放眼望去，远方的地平线清晰可见。如平常一样，考察队走得很慢。过去的5天我们刚刚走了100公里，现在的地方距额济纳河256公里，距哈密480公里。

今天是11月24日，距圣诞前夜还有一个月。我们将会在何处度过节日呢？大家都乐观地期望圣诞节时所有的纵队都已会集在哈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骆驼身上了，如果它们能坚持下去，我们就能按时到达，但它们之中的许多已筋疲力尽、羸弱不堪了。

自离开莫鲁音—古尔后我们就再也没看见过人类。在额济纳河和我们同时出发的大商队在我们考察队前面很近的地方行进，有时我们发现他们留下的营火还未完全熄灭。但从东西两面来的旅队现在在哪里呢？人们说他们走的就是这条北方的沙漠路线，向导说这是条新路，顶多才有两年，霍德纵队走的南线已有6年之久了，可我们所处的地方则是死亡和静默之区，既没有人也没有动物。

在前方数公里处兀然出现了一处闪亮的黄色地带，我问门托那是什么，他说那绝对是牧草。谢天谢地！骆驼终于有东西可以吃了。不一会儿工夫我们就看到一片地上生长着小片杨树和在风中摇曳不定的牧草，还有一丛丛红柳。我们跨过了一条汩汩流淌的小河，河的源头是一处泉水，其下游的浮冰闪闪发亮，呈现出淡蓝色。骆驼已开始吃草了，看着它们大口吃草的样子真是一种享受，它们喝水时眼睛兴奋地直发亮。突然刮来一阵强烈的西风，但我们可以在厚厚的红柳丛后面躲避。必须在此休息几天，因为这个叫依克海—古尔的地方是莫鲁音—古尔之后的第一个绿洲。帐篷就支在曾经的鸦片田里，经过了沙漠的艰辛之后，这里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我们的猎人打到了几只瞪羚和各种野禽——又有鲜肉吃了。欧洲人的给养储备还很充足，可以一直坚持到哈密，但不知节约的蒙古人的面粉大约只能吃4天了。因此有必要先派一个人到前方去购买面粉，也许前面的大商队可以匀给我们一些面粉，否则就要去新疆边境的汉人小城大石头去买面粉——那里有一家商铺。于是，为了尽快补充给养，我委托穆伦温格带着骆驼手张、蒙古人班彻和辛吉，骑上4

匹最好的骆驼，外加一匹运货骆驼，以强行军的速度向前赶路。他还必须购买一些豆子给那些瘦弱的牲畜补充营养。我只能从自己的钱箱拿出一部分钱与徐教授慷慨赠送给我的200块钱凑足400块给他。他们一办完事就要全速返回，争取尽早与我们会合。他们回来时可以视情况自行决定是购买还是雇用新的骆驼——我们甚至不能肯定在大石头能否买到必需的东西，所以就更别提能不能弄到骆驼了。总之，一切都要视情形而定。穆伦温格是一个可信赖的能人，他爽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况且，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话。从我们得知的那些不可靠的情况判断，他应该能在一个星期内到达大石头，而且，由于我们同时也向西方移动，这样，我们有希望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见到他。穆伦温格本人则确信他将会在12月8日满月升起时与我们重逢。

11月25日，穆伦温格一行人匆忙上路后，余下的人仍在依克海—古尔绿洲休息了几天。然而11月28日夜里气温已降至零下22.7摄氏度——我们再度上路了，前进方向指向西南。考察队的右侧有一个小山脊和3座平坦的穹形高地，查干—博戈多的蓝色金字塔形顶峰兀立于西南方向。我们碰到一块奇特的汉字铭文——拨开牧草表面的黑色碎石，新鲜的沃土层下出现了一块两米高的汉字铭文。徐教授将上面的文字翻译给我听：

“只要团结起来，神仙也会帮助我们。这条路虽不常走，但为了避开那些收费站，我们只有再走一次。”

我们一路上都能看到穆伦温格的脚印，他显然想给骆驼省一些力气。路旁的灌木丛上挂着一绺一绺的羊毛，这种景象我们已见怪不怪了。这是驮载着羊毛的骆驼在经过多刺的灌木丛时留下的，这表明羊毛是这些孤寂的商路上最为重要的商品之一。

我们在今天的行进中将两匹骆驼留在了后面，有一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达营地。有多少骆驼能到达哈密？我们早已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了。考察队所走的路线非常荒凉，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在15处宿营地中只有一处让人满意。情况如果像今天这样继续下去，那我

们的处境可就更艰难了。蒙古人已得到了豆子、猪油和一些面粉，这些东西我们都不需要。我们所有物资的储备仍很充足，当然啦，如果蒙古人和汉族仆人没东西吃了，我们会和他们共享一切。

第二天刮起了南风，查干—博戈多山又在东南方向出现了。我们仍向西南方向前进，路两边是黑色的山脉。接着进入一条宽40米的谷地，谷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弯曲，逐渐转向西南方，最后再度开阔如盆地，周围都是低矮的深色山峰，有的地方寸草不生，有的地方则稀稀落落地生长着一些牧草，到处都是大片积雪。我们在一条冲积沟中找到了一处泉水，水深有60厘米左右，上有淡水浮冰。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牧草也相当好，于是大家决定在此扎营。

11月30日，一阵强烈的西风迫使我们收住了脚步。早晨，牧草上覆盖着一层白花花的霜，但太阳一出来霜就融化了。徐教授的帐篷中生着火，我与他在一起坐了一两个小时。大家饭后还要在我的帐篷中东拉西扯地聊上一通。由于蒙古人和狗需要吃肉，我们就宰了一匹不再需要的骆驼。月亮起晕了，显得异常美丽。周围的群山寂静而阴郁，骆驼们正在津津有味地反刍食物。

晚间的气温已降至零下24.7摄氏度。

12月1日，我们在山脉中通过了一条平坦的谷地，跨过了许多小小的冲沟。北方的山系更多了，其轮廓全都笼罩在更为浅淡的蓝色之中。南方只有一处低矮的山脊靠近我们。地面起伏不定，骆驼走得很累。有一匹骆驼已走不动了，我们只好把它留在后面。突然，前面出现了16只野驴，我们的猎手追了上去，但一无所获。穆伦温格在路的中间给我们留了一封信，还用一些小石头排了一个“two”，表示这是他与我们的第二次联络。纸条上的内容很短，只是告诉我们一切都好。

夜里开始下雪了，温度降至零下14.1摄氏度。12月2日早晨雪仍在下，雪花通过蒙古包的出烟口纷然而入，飘落在炉子上时发出噗噗的声响。我走出门外一看，发现雪足有两厘米厚。然而，太阳却明晃晃地升上天际，漂亮的小雪花在阳光中闪闪发光，犹如珠宝店中的钻

石。

我们继续向西南方向走，雪在骆驼的脚下嘎吱作响，使人不仅想起了家的温暖。

我们又遇上了一匹累垮的骆驼，它耷拉着眼睛跟着我们，也许对我们没有帮助它感到吃惊，它也许还相信我们不是走在最后面的人，接着跟上来的人将会收留它。一想到被遗弃的骆驼我就心疼，拉尔森和蒙古人都下不了狠心杀掉它们。每当我谈起这种事情时，他们总是说丢弃的骆驼吃草或休息之后可能会重新获得体力，即使这种机会不多，它们还有可能被某个旅队中跟上来的什么人救起。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因为当一只骆驼已无法站立的时候，它就气数将尽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希望这可怜的牲畜不要在地上躺的太久，在月光照亮白色的雪原之前愿死神赶快前来结束它的痛苦吧。

我们在雪地上建起了营地，营地的前面就是通往南面山脉的谷地的入口。蒙古人忘记了在上一个泉水处给6个水壶灌水，结果害得大家拿着勺子、盘子和铲子到处搜集雪，然后再在火上融化成水。我们的处境越艰难，徐教授的信心越强，心情越平静。在我们不得不忍受痛苦的情况下，他显示自己是能经得起考验的。

12月3日，我们进入营地前面的谷地，沿着斜坡向西南方行进。大家很快就发现了穆伦温格的第三封信，信上说他还没有赶上前面的汉人商队。接着我们又在一处泉水旁的树上发现了挂着的第四封信，写信的日期为11月27日，信中说他们已追上了汉人商队的后尾，获悉到大石头还需要整整5天时间，但从他们那里他既没有买到面粉也没有买到豆子。

68号营地建在一个条件恶劣的山谷的入口，我们的猎手在周围寻找猎物，虽然空手而归，但却不止一次地看到野羊或瞪羚踩出的新鲜足印。

12月4日的路线通过一个迷宫般的小山谷转向西北方，山脊不时挡住去路，然后通过另一边的谷地与另一条路相接。然而前方最终变

得开阔了一些，可以看到远处镶嵌在山间的新绿洲，那里泉水较多，白杨、红柳和芦苇得到了水的滋养，我们的帐篷就搭建在一片沙沙作响的杨树林中。

这个美好的69号营地位于查干—布尔古逊附近，我们在此休息了两天。这里风景美丽迷人，四周环绕着暗色的山脉，有很多老杨树虬枝盘绕，叶落净尽，杨树的下面是茂盛的灌木和漂浮着蓝幽幽浮冰的泉水。北面的景观极为壮美，极目远眺，浅灰色的平地像无边的大海一样向远方伸展开来。

12月6日，前一晚的温度为零下21.4摄氏度，夜里2点30分时狗的叫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它们狂吠着向南面扑去，在它们的叫声停顿的瞬间，我听到远处传来了旅队的驼铃声，那声音越来越近——来了一支旅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营地设在正南方的谷地里。在像这样的沙漠旅行中，商队的到来是我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途径，我们希望得到有关北京的消息，并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可出售的东西。

我们在早晨获悉那是一支有1200匹骆驼和90个人的商队，要打归化城前往巴里坤和古城，其中有两个分队前往哈密。这些生意人结伙搭伴，他们大约有50多种不同的营生，他们的货物都驮在租来的骆驼上，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货物是纺织品、茶、香烟以及各种食品。骆驼的主人共有7名，每人提供了大约200匹骆驼。他们当中只有3个人以前走过这条路，这几个骆驼主人是回回，都是穆罕默德的信徒，据说他们是比汉人更精明的商人。

在我们两个营地间立刻出现了红火的贸易场面，商队的几位成员来到我们营地，徐教授和胡莫博士也在早上访问了他们。匡和塞拉特在那儿成功地买到了80斤面粉，事实上那面粉只有50斤。他们本来打算将面粉留给自己用，但玛森巴希知悉此事后，立刻表示反对，他付了面粉钱，指出面粉应该平均分配给所有人。

我在后半天由徐教授陪同也去了一趟我们的邻居那里，我们在一个回回的帐篷中做客，他提供了许多有趣的消息。然后我们两人就在

这个巨大的营地周围转悠，附近的景色真是美不胜收。

两天的休息给人和动物都带来了好处，黑德和里艾伯润兹又去狩猎了，他们回来时带着一只兔子、两只瞪羚和几只鹧鸪。当然，这些肉吃不了多久，于是一只筋疲力尽的骆驼又成了蒙古人的盘中餐。

第二十一章　焦虑的日子

12月7日早晨，我们继续沿着西北方向前进，而那个大商队还有两拨人马留在原地。考察队还没走出多远就碰到一只被丢弃的骆驼，它已无法跟随我们前进了，它站在路边，腿不停地发抖，眼睛呆滞而无神地看着我们。

前路通往一条谷地，我们再次跨越了几天前遇到的山系，这个广阔地带的风景真是无与伦比。

南面黑乎乎的山中有一条巨大的陡峭山脊伸向北方，似乎挡在我们前往西方的道路上。然而，还没到跟前我们就发现自己处一个切割的很深的排水沟的边沿，水沟出自南面的一条谷地。在谷地，水沟出水口的四周生长着茂密的芦苇，那支汉人大商队现在就扎营于此。我们的营地则安顿在下面一点的地方，该地名为沙拉—霍鲁逊，意为“黄芦苇”，一条小河咕咕作响，两边都是大块的浮冰。北方如以前一样是无边瀚海，其风光是我们自离开包头以来所看到的最为壮观的景象之一。

黑德少校是一个好猎手，他天天带着新鲜猎物来犒劳我们。在沙拉—霍鲁逊附近他又打到了两只高大的雄瞪羚。我们的两个人还从中国人那里买到了少量的小米和糖。和我们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带的给养不仅够自己消耗，而且还可以接济他人——他们确实有丰富的经验。

刘拜访了一位识路的中国人，他给刘讲了去大石头的路线的详细的情况。根据刘从他那里得到的关于宿营地、泉水、牧草和路程的情况，我们画了一幅草图，并据此判断，考察队距大石头还有240公里，需要走11天。刘随身携带的一幅中国地图上，大石头到塔什布拉克的距离为58公里，从塔什布拉克到哈密为120公里。因此，我们距哈密应该还有约420公里——那是不可能的，根据我们自己的行军路

线，距离不会超过300公里。

12月8日的路线首先通往西南方，一座金字塔形的小山顶在一个拐弯处凸显，其脚下有一堆石头，茂盛的灌木一下子就到了尽头，前面出现了一条奇特的谷地，其底部不足100米宽，两边高耸的山脉直插谷地底部，风光虽然壮观，但色彩颇为忧郁。

接着谷地变得开阔了一些，我们走过一处由两座山峰构成的天然门廊。根据山顶上的石堆路标的指引，旅队来到一处十分恶劣的宿营地，那里没水没草，柴火也很稀少，因此我命令在此禁止用水洗东西，即使厨房也要节约用水，狗只能用洗碗水解渴，它们还可以利用不时出现的一堆堆小积雪来解渴。

傍晚8点时，气温已降至零下12摄氏度，但风却小了一些。晚上出现了一幕令我难以忘怀的情景，当时从东面传来了古老而又熟悉的驼铃声，其节奏沉稳、庄严，离我们越来越近，徐教授、胡莫和我急忙跑出去一看究竟。四野笼罩在满月的银色清辉之中，那个旅队的第一批骆驼如幽灵般出现了，它们个个高大有力，步态庄严平稳，背上的行李也安放得稳妥有序，旅队的所有人都步行向前。

那种感觉令人着迷，我已经无数次地看到过这种场景，但还是想一遍又一遍地看，那长长的行列消失以前我简直无法离开。不，它没有消失，在东面的远处又传来了新的驼铃声。然而，由于没穿皮袄，我冷得受不了，我欣然屈服于我们的医生的仁慈权威，他令人给我弄了一盆燃烧的炭火。在黑夜里，当痛苦和不安搅得人不能入眠的时候，我认识到自己与寒冷和黑暗之神作对实在无益——我直到早晨才入睡。门托叫醒了我，他按时给我弄了一盆火，拉尔森和其他人已出发了，只有黑德留下来陪着我和门托。由于我认为自己的不适应只是暂时的，所以就没有对胡莫博士说什么，然而，我已没有胃口吃早饭了，他们拆蒙古包时太阳已经升起，我坐在外面烤火，看着阳光将东方地平线上空的云彩染成玫瑰色。

我们继续骑着骆驼前进，一阵剧烈的西风刮来，冻彻骨髓，我渴望到达72号营地，好在再走14公里就能找到一处开阔的泉水，其浮冰

周围都是不错的牧草。胡莫博士在帐篷之间的篝火旁给我做了首次体检，立刻确定了诊断结果——胆结石症复发。他命令我休息——起码在今明两天，徐教授同意他的意见，请求我躺在床上等待疼痛减轻后再开始行动。我的抗议无济于事，没有比不能继续旅行让我感到更痛苦的事情了，在任何情况下考察队都不能停止前进，更何况现在的情况很不妙——骆驼疲惫不堪，给养越来越少。不过，在72号营地待一天并无大碍，这里的水和牧草都很好，于是我立刻躺在床上，像一个小孩似的备受呵护。

休息的时候一支来自安西的蒙古商队来到我们这里，他们带着大麦和面粉去加萨图汗。他们说两天前碰到过诺林纵队，并说他们准备今天在塞比斯特泉附近宿营，其地在距此3天路程的西南方，诺林纵队的骆驼走得很好，显得很活跃。这一消息令人欣慰，因为我一直更为惦记进入陌生地域的他们。自离开安西以后，蒙古人已在路上走了13天，还要走6天才能到家。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是应该赶到塞比斯特泉附近和诺林、伯格曼和玛斯考尔会合呢？或者只是从他们附近穿过？

几天以来，所有的人，包括中国人，都在步行。骆驼越来越疲惫，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烈士”倒下，我们必须保存它们的体力，甚至乘骑驼也被当做载货驼使用了，不善于走路的蒙古人依然骑行，生病的我仍被安置在自己的“鸟巢”里。

12月11日早晨8点30分出发，胡莫博士走在我的旁边，风静尘息，云霞满天。

两个小时后他下令停下，然后生了一盆旺火，将我扶下来躺在铺于软沙之上的皮袄里。我的胆疼得很厉害，他只好给我注射了一针吗啡和咖啡因，这样可以减轻疼痛。我在火盆边整整躺了两个小时，然后循着其他人的足迹继续前进。我坐在高大的骆驼背上，随着它的走动前后晃动，我坐得极不稳，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宿营。前面不远处终于出现了营火的烟柱，我们很快就和其他人会合了，我的蒙古包已经支好了，它现在充当的是“野外医院”的角色。

为了照顾我，胡莫博士在晚上将自己的睡袋、皮衣以及其他东西都拿到了我的蒙古包，他觉得这样做很有必要。

第二天我和胡莫博士以惯常的方式跟在队伍后面行进。离开74号营地刚两公里，我们就看到两个人影在阳光里匆匆走上前来，他们是拉尔森和诺林。看到诺林他们安然无恙真让人高兴，他们说伯格曼和玛斯考尔就在西北约50里处的塞比斯特泉宿营。

诺林在既无水、草也不好的74号营地与我们一起待了一个晚上。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生病的我运到塞比斯特泉，那里有一切——水、草、柴火全都有。而且医生以不容辩驳的口吻命令我必须在那里休息两个星期。同样，他还不准我再骑骆驼，因为其颠簸起伏明显对我的病不利。

走不动又不能骑骆驼，那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捱到塞比斯特泉呢？这里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用我们那点可怜的木料也做不出一个来。

第二天早上，已经出现的水短缺迫使我们继续向塞比斯特泉方向前进，徐教授建议用帐篷柱的箱子板做一个雪橇，可以由人或骆驼拉着走。但拉尔森指出，由于地上石头很多，这样的交通工具走上两公里就会散架。他主张做一个担架，由4个骑着平稳骆驼的蒙古人抬着走。然而，我坚决抗议坐这种“飞机”。因为它随时都有掉在4只骆驼中间的危险，要不然就会被一旦受惊奔跑的骆驼扯成碎片。

就这样我们迎来了12月13日，这一天在我的一生中应用3个星号来标识，它是我最珍贵的记忆之一。因为在这一天，最伟大、最美好的事实充分证明，我曾拥有最值得珍视的友谊和忠诚，我相信我的同伴们也会记住这一天——不论怎样，至少有一件事情他们肯定忘不了，那就是抬着我这个沉重的大活人穿越死寂的戈壁沙漠的奇特景象。

早晨9点30分我们出发了，等着我的是一张铁床，床的两边是两根固定的帐篷杆，床上铺着睡袋和几只垫子，我穿着毛皮袄和山羊绒靴，戴帽子躺在上面，身上还盖着一张大羊皮。等我像一个木乃伊一

样被裹好后，头一批人就进入了位置，根据约定好的次序，黑德和胡莫、诺林和冯·玛森巴希将单架扛在肩膀上一齐前进，7分钟后马特换下了黑德，其他3人只是换了一下肩，不久又有人接了过去，那是里艾伯润兹和他的仆人查理以及蒙古人将逊。行进的速度和担架的重量要求每7分钟换一次班，因此我们组织了两套人马互相换班，这样一套人马负重时另一套人马就可以休息7分钟。我手里握着表，7分钟一到我就喊换班。蒙古人不会齐步走，单架在他们肩膀上不规则地扯动，因此，每当4位欧洲人换班时我都有一种轻松和安全感。与此同时，我还像平时一样在笔记本上记录观测结果。

走了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又休息了半个小时，担架就放在熊熊燃烧的火堆旁。可能我是唯一需要火的人，那些抬着我走的人早已大汗淋漓了。休息时，黑德骑上诺林的骆驼先走了，他去传令拉尔森立即派出至少8名蒙古人前来接替头两组人——他们骑骆驼，因此可能会很快就到达这里。

稍事休息之后我们一行人继续在荒野上行进，里艾伯润兹又是摄影又是拍照，我对他拍摄的那些胶卷很好奇，但只有到了哈密才能将其冲洗出来。

中午1点时，我们在一处有芦苇的地方停下来，并点燃起了一大堆芦苇火，还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午餐有烤羚羊肾、绿豆、饼干、黄油、茶和奶油。

吃完饭后我们又上路了，我的“轿子”在一片新的戈壁上晃悠着，举目望去看不到尽头。门托、班彻、马特和将逊抬着我，现在的换班时间已缩短为5分钟。3点30分时太阳已接近地平线，我们走进一个由低矮山丘组成的迷宫，地面起伏不平，这对抬着我的人来说更为吃力。

又过了半个小时，前面出现了一队迅速移动的队伍，他们的黑色剪影在落日余晖中显得格外生动。那是我们的10位蒙古人和汉人，他们从塞比斯特泉前来迎接我们。他们骑行的速度很快，我们原地停下来等他们。他们下了骆驼以后，其中4个人立即走向担架接替原来的

人，他们的步子迈得又小又快，路边的山丘比以前更快地向后闪过。然而，他们的步调很不一致，我感觉自己好像在海啸中划船一样。

突然，伯格曼走过我的身边，我俩热情地握了一下手。伯格曼年轻，充满活力，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几分钟之后玛斯考尔出现在我的旁边，他和平时一样，平静而快活，我向他表示了对失去可爱的小羚羊的同情，指出在我们的和平进军中小羚羊已完成了它的使命。

不幸发生在几天前，当时诺林的纵队正在行进，伯格曼在距大路几公里的地方打了一头野驴，玛斯考尔走了过去，他忠实的小羚羊也如平时一样跟着他。约摸走到中途时它转入新营地，可小羚羊却在此失踪了。他们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去找它，但一无所获，他们又是喊叫又是吹口哨，但无边的沙漠却寂然无声，似乎不愿交出它的“猎物”。小羚羊很可能迷路进入了多山的地区，它的身体太轻盈，在坚硬的地面上没有留下蹄印。小羚羊就这样消失了，我们非常怀念它。我设法安慰大家，说它已找到了自己的亲戚，并被友好地接纳为一个群体的新成员。

我们队伍的行进场面颇为壮观，前面是3个骑骆驼的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为我遮挡着地平线上射来的太阳光线。我的“轿子”两边是骑在骆驼上的欧洲人，他们就像是拱卫在我身边的仪仗队，骑行在我后面的也是一队蒙古人。

现在我们走得更快了，太阳下山了，夜暮时分开始了，天渐渐变黑了。天气很冷，冷气穿透了我的皮袄。前面出现了火光，当到达第一顶帐篷时我示意队伍停下，那是诺林、伯格曼和玛斯考尔的帐篷，虽然拉尔森已在200米开外的地方为我们建好了营地，但我再也不想向前走了，我已受够了。我的“轿子”被安放在帐篷的入口处——在蒙古包还未竖起来之前，胡莫博士把我安置在了一个温暖的帐篷里。

从愈益加重的夜晚寒气中进入一个温暖的帐篷真是一件美事，我像个帕夏一样躺着，帕夏的意思是总督。接见旅队的成员。徐教授是第一个接受我召见的人，他在我的床边坐了好久，焦虑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帐篷的入口出现了拉尔森的高大身影，他向我汇报了旅队的

情况。黄文弼、丁和刘也进来向我问安。几位仆人也表达了他们对我的关切之意。

时间过得很快，我的蒙古包也搭建好了，那些住在其他营地的人都回去了，我们的营地变得一片寂静。诺林对我说，曾有3个、后来又有两个形迹可疑的蒙古人带着俄制1886型军用来复枪来到营地与照顾骆驼的人攀谈。他们的营地距我们有一段距离，他们大约有50匹上等的骆驼——你可以想象他们是怎样得到这些骆驼的。毫无疑问，现在我们与一小股土匪成了邻居，为了打探我们的虚实，他们正在小心翼翼地试探我们，看能否对我们发动一次突袭。诺林建议我们应该先发制人，组织所有能拿起武器的人向他们的营地出其不意发动进攻。此计划完全可行，晚上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琢磨着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计划。我们的人将生擒土匪并将其绑送哈密当局，他们的50匹骆驼要为我们疲惫至极的旅队服务，不过到了哈密之后我们也要把这些骆驼交还给那里的当局。制伏这些困扰和平商队的害虫以后，我们应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哈密，整个新疆的人也将把我们视为英雄。

为了安全我们在夜间布置有岗哨。夜里两点时我听到蒙古包前传来坚实的脚步声，我知道那是正在放哨的伯格曼，我喊他进来，他进来后生起了炉子，这样一来把胡莫也吵醒了，我们讨论着行动计划，一直到夜里4点。

早上我接到报告，说那股土匪已经撤走了，他们很可能觉得我们太强大所以不敢轻易下手，这样我们的剿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这种奇怪的情形下，75号营地成为整个旅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营地，在这里的塞比斯特泉，我们走上了冒险的新舞台，也是在这里，考察队的进程陷入了麻烦和不确定的境地。

我将自己严严实实地裹在睡袋里，一整天都在和徐教授、诺林、黑德、玛斯考尔、冯·玛森巴希、拉尔森、伯格曼以及里艾伯润兹进行重要的讨论，胡莫博士在必要时还做了会议记录。

在我患病以前，考察队曾决定将拉尔森和一些蒙古人留在塞比斯

特泉看管重行李，而其他人则带上必要的行李、给养和113匹骆驼继续向大石头前进，到那里以后，骆驼将留在商铺中强化饲养以补充体力，余下的蒙古人和骆驼待在一起，与此同时，雇一支骆驼队前往塞比斯特泉接走拉尔森、蒙古人和重行李。我本人和其他人将带着汉人仆从或乘雇来的骆驼，或乘我们自己最好的骆驼通过塔什布拉克继续向哈密行进，以期在圣诞来临之前到达那里。

现在，我的病情使计划有所改变，即胡莫博士和我也要留在塞比斯特泉。胡莫博士坚决不同意我继续乘骆驼旅行，他命令我必须停下来休息。他说，先行向西推进的人应该有可能弄到一辆车和一队骡马，这样，我坐在上面就可以继续哈密之旅，而不必担心病情恶化。但当拉尔森听说塞比斯特泉附近有土匪出没后，便认为重行李被劫的可能性太大了，他建议用我们自己的骆驼将其运到大石头。他建议在夜晚行进，这样在白天就可以放牧骆驼。我很支持这一计划，因为我也不愿意将贵重行李留在后面，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将其取回来。

诺林提议，他和伯格曼陪我和胡莫留下，这样他们便有机会在塞比斯特泉附近进行一次彻底的地理学和地形学调查，因为这个地方在很多方面都令人感兴趣，他们需要一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实施调查。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大量的笔记和计算需要应付。也许不用我特别强调，对胡莫博士和我来说，在塞比斯特泉等待的时间里显出十分不同和更为鲜明的色彩，当时旅队决定在这些不确定的日子里诺林和伯格曼的帐篷应搭建在距我的蒙古包不足5米远的地方。在自包头开始的长途行军中，我和我的两位优秀的同胞很少搭伴，现在我们可以在一起同甘共苦一些日子了，然后再共同经历转换营地的艰辛。总之，不管结果如何，肯定不会留有任何遗憾。现实经常比幻想要更神奇和浪漫，虽然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并不比读者更了解未来的变化，但我的预感告诉我将来的变化将证实我刚才的断言。

当各种讨论和协商结束时，夜幕已经降临了，也许这是我们一起在营地看到的最后一次落日了。我将所有考察队的工作人员都叫进了我的蒙古包，中国人、德国人和瑞典人在我的床边集合起来，我们共

有5位瑞典人、4名德国人和4名中国人。我经过深思熟虑，尤其是和徐炳昶达成一致意见后，发出了以下命令：

首先，拉尔森将大队人马和全部行李带往大石头，与他一起走的还有德国人和中国人。为使自己的旅队更有效率，拉尔森要走了诺林的7只骆驼——诺林的骆驼总是好过拉尔森的骆驼，因为它们是按照汉人的饲养原则进行喂养，而不是按照蒙古人的饲养原则受到照顾的。有了这几匹好骆驼之后，他把4匹弃驼留在塞比斯特泉。至于在大石头采取什么办法解救我们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确实对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在将穆伦温格从依克海—古尔派出时，我们曾相信他会在12月8日与我们会合，后来得知我们离那儿的实际距离要远得多。现在已是12月14日了，如果穆伦温格已经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他早应该回来了——也许他在大石头根本就没东西可买。因此我不得不拜托拉尔森了，让他们去一探究竟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其次，玛斯考尔和刘在文物收集人陈和汉蒙浑血儿奥特宏的陪同下马上以急行军速度驰向哈密，目的是在奥尔加呼屯或大石头，最不济也在塔什布拉克组织一支骆驼救援队搬运留在塞比斯特泉的行李并购买所需给养。如果可能的话，为我雇或者买一辆车，外带3头骡子。玛斯考尔和刘也从诺林那里借了7匹状况良好的骆驼，他们要尽快回到塞比斯特泉，而且，要根据实际情况将诺林的骆驼留在返回地点，以便让其休息和放牧。刘和玛斯考尔返回这里后，准备在下一次西行时制作路线图，因为在强行军的夜晚是无法制图的。玛斯考尔拿走诺林的旅行箱后，我们在塞比斯特泉就剩7块钱了。

最后，哈斯伦德将带上诺林和伯格曼的邮件和钱，在哈密以东100公里的塔什布拉克等待我们——这两人正准备进行一次短途旅行，可能在我之后两星期才能到达哈密。他俩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渴望得到家乡的消息。

谈到穆伦温格我们既吃惊又慌张，他好像完全消失了，就像掉入了一个深渊似的不见踪影。在前几天的旅行中我们既没有看到他的脚印也没有发现他留下的信件。我们猜想他是否已经转向了更南的路

线，直接去了哈密而放弃了大石头，因为大石头处在通往巴里坤的道路上。他在依克海—古尔出发时所带给养仅够一星期之用，但他带着来复枪，没吃的可以打羚羊，因此他没有饿死的危险，就算出现极端情况，他还可以宰掉体弱的骆驼充饥。而且，他还是一个十足的胆大鬼，他曾在光天化日之下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法国人的俘虏营溜走，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在去哈密的路上走丢的。当然，从他那里得到帮助是不可能了，而且，我们的大旅队还很可能将他在半道上捡回来，从而给我们期盼的救星以帮助——呵呵，事情反过来了！

命令发布完毕之后，我便开始起草冗长的电报，电报有800个字，将把它从哈密发往斯德哥尔摩。电报讲述了我们在额济纳河的考察、1号气象站的建立、扩展考察的计划以及向塞比斯特泉和哈密的长途旅行。第二封电报稿被压缩至560字，并由胡莫为徐教授翻译成法语，为德国人译成德语。胡莫将第三稿和最后一稿清楚地誊写了一份读给我听，然后按照和黑德事先商量好的办法将其放置于蒙古包的入口处，好方便他早上前来收取。

给养储备被检点一番后也分配给大家，留下的人也得到了自己的那一份。在最后一刻，胡莫得到了留声机，它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等待的日子不致变得太枯燥，而那些即将离开的人却再也没机会听到它发出的声音了。

大部分人今天晚上睡得都很少，夜深时那些即将离开的人聚集在蒙古包中与我作别，我向每个人都诚恳地说了声再会，希望他们能够迅速弄到我们所需要的救济品——骆驼、骡车和给养。最后徐教授单独与我坐在一起，他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是留下和我在一起呢，还是跟大部队去哈密呢？他的愿望是留下，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以他的身份和权威，在必要时可能对组织救援队有所帮助，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根据4月26日达成的协议，他和我在考察队中享有平等的权力，因此，我认为我俩其中之一非常有必要在进入新疆时跟着大部队一起前进——政局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可能会要求我们出示保证书和声明。因此徐教授和我不得不分开，在后面我所经历的激动人心的冒险中，一想到徐教授跟随着西去的大队，我心

中就感到莫大的安慰。

12月15日夜里3点30分，起床号响了起来，听着那沮丧的声音，胡莫和我几乎不能入睡。黑德取走了门口的电报。旅队于5点15分时在漆黑的夜色中出发了，一小时之后，玛斯考尔、刘、陈和奥特宏赶着诺林的7匹最好的骆驼也上路了，最后，徐教授和黄文弼也动身了，他们带着仆人王。与此同时，诺林仔细检查了留给我们的给养，他发现某些东西的存货不足，于是他写信给拉尔森，说他们最好能全速前进，因为我们的面粉、米、糖、盐以及其他东西仅能维持10天。此信由徐教授带走了。

第二十二章　戈壁圣诞

现在我们与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全部中断了，包围着营地的是无法穿透的宁静。我们一共9人，4名瑞典人分别是诺林、伯格曼、胡莫和我，两名蒙古人是照看骆驼的门托和马特，还有诺林的3名汉人仆从——厨子王、仆人张和赶骆驼的老王，不管是汉人还是蒙古人都很优秀。胡莫、玛斯考尔和我的行李加起来需要11匹骆驼来驮载，诺林、伯格曼和仆人们的行李需14匹骆驼驮载。除了代步骆驼以外，算起来我们尚需25匹骆驼，以便在我彻底恢复健康以后不用考虑援助而继续前行，但事实上这里只有诺林的8匹骆驼和拉尔森扔下的那4匹根本不能算数的弃驼，这样我们就被无限期地困在了塞比斯特泉，等待着从这里或那里冒出一支由骆驼或牲畜组成的救援队。

75号营地处在开阔地，一串深色的山脉和短浅的谷地挡住了北方的地平线，东北面山丘密布，两天以前我的“轿子”就曾经过那里。紧挨着营地的南方是一些低矮的山丘，在其最高处飘扬着瑞典国旗。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瞪羚、野骆驼和野驴，我们再没有其他邻居了，连这些动物也很少光顾这里。从“旗子高地”可以观赏四处的美景，举目向南眺望，但见丘陵和低矮的山脊如波浪般向远处翻卷而去，最后都变成了淡淡的青灰色，西北面的山势雄浑有力，那里有艾米尔塔格山和卡尔力克塔格山如金字塔般的陡峭山峰，其上覆盖着万年积雪，像高耸的阿尔卑斯山诸峰一样，它们构成了天山山脉的门户。

我们的帐篷就搭在由沙漠、无边的空间和远方高大的山脉组成的环境中。胡莫和我住在我的蒙古包中，在我们正南方的蓝色帐篷是诺林和伯格曼的“逍遥居”，东面15米处是仆役们住的厨房帐篷，帐篷周围放着驮箱。附近则是12匹正在休整的骆驼，北方100米的地方是咕咕作响的塞比斯特泉，泉水在黄色的芦苇茬中形成了青幽幽的浮冰。

大部队离开时，我们心中自然而然产生出一种感觉，好像轮船扬

长而去，我们则抛弃在大海中的一个荒岛上。但因此就认为我们倒了大霉的人则完全错了，自然，骆驼过劳而数量不足的情况不尽如人意，但却没有发生灾难，因为我们能够应付眼前的情况，而且下决心要扩展我们的考察范围和任务。

漫长煎熬的等待开始了，狂暴的西风在帐篷外肆虐，我们的人每天都爬上那座“旗子高地”向西眺望。那面对着寂静而神秘的沙漠猎猎飘扬的瑞典国旗，好像在向无边的空寂示威。

持续不断的西风和间或出现的霜冻使我们的日子过得比预料中的要快一些，尽管有大大小小的焦虑，但我们的心情还是很愉快，并且充满了信心。我们一起工作、阅读、制订新计划，有时晚上聚在一起阅读科学著作，并展开讨论，或者聊天讲笑话，听留声机——我们逐渐培养起了一种既刺激又友善的同志友情。作为一个优秀的猎手，伯格曼每天都能为大家弄来新鲜的瞪羚肉。我的身体也迅速恢复，这多亏了胡莫博士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到12月18日，我已经能获准起床几小时了，第二天甚至可以走一小段路并爬上“旗子高地”了。

几乎就在不知不觉间，圣诞节来临了，由于我病情好转，胡莫博士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他一连几天都默不做声地忙碌着，剪彩纸，在案板上揉面做小圣诞饼，为节日作着各种各样的准备。12月24日那一天谁也不能接近他，我刚一穿好衣服，他就礼貌而坚决地把我赶出帐篷，我只好栖身于诺林和伯格曼的帐篷，这里的小火噼啪作响，暖气盎然。我们大家各干各事，诺林制作附近地区的最后一幅地图，我写日记，伯格曼去我的蒙古包和胡莫一起准备圣诞宴席。

突然，我们的工作被打断了，帐篷的入口处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呜呜声，张双手捧着一只比老鼠大不了多少的小犬崽走了进来，犬崽的妈妈也跟在他后面，那是一条活泼好动的母狗，诺林在善德庙将其收入帐下。我们在帐篷的一角用毡子做了一个真正的狗窝，让狗母子栖身于此，这样一来，狗妈妈就完全不用为它的孩子担心了。然而，一只小狗崽并未满足它的愿望，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一只又一只小狗崽降生在风暴肆虐的沙漠不毛之地。不管怎么样，狗妈妈将这样的

喜事安排在我们停留在营地的时候是很明智的。诺林和我专注地看了小狗降生的全过程，心中想着这些圣诞孩子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显然，它们将在亚洲腹地的那条小路上游荡。我们给狗妈妈弄来了毡子、肉和水，并饶有兴致地看着呜呜作声的小动物，它们还没有睁开眼睛，笨拙而无助地在其母亲周围乱爬。我们这个小社会一下子增加了7位新成员，我们4个瑞典人都收到了一份难以忘怀的圣诞礼物，那另外3个体弱的小家伙可能活不长。

现在胡莫博士带着新的“玩意儿”来了，那是将要被烧烤、油炸和烘焙的精致食品，于是，糖饼和羚羊肉的香味弥漫开来，它们与小狗的乳臭味和火燃烧时的烟味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野性的和谐。

时候已经不早了，圣诞之夜来临了，胡莫博士宣布，请客人们进入圣诞屋。他说话的时候嘴边挂着深沉的微笑，想象着我们看到圣诞屋时的惊喜神色。蒙古包的门大敞着，一片灯海灿烂光耀，可那到底是什么呢？是幻象还是做梦？我几乎认不出我日日生活于其中的蒙古包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客厅，它的中央是圣诞桌，上面有盘子、杯子和数不清的好东西，餐桌上7个臂状烛台发出流光溢彩的光线，烛台用七色彩纸包裹，平添了些许艺术气息，同时也起到了圣诞树的作用，它的周围放着波浪形长沙发，装饰品则充满了东方韵味。

在这个地球上最大、最荒凉的沙漠之中，胡莫是如何创造出这些奇迹来的呢？难道他会变魔术？诺林和我都吃惊的不知如何是好，以至于在桌子前面就座时我们仍然茫然地陷入深思，想着胡莫可能与神灵和天使沟通过。

伯格曼坐在桌子的右首，胡莫坐在左首，前面更近的位置仍然空着，帐篷中只有我们4人。桌子前面是火炉，已经热得发红了。

现在可以更仔细地打量一番蒙古包的节日“盛装”了，长沙发其实是堆在一起的睡袋和羊皮，上面盖着精致的毛皮，蒙古包的“四壁”挂着一圈来自归化、包头、宁夏和哈密的各色地毯，在其上作为向穹顶的过渡，则排列着用哈达做成的蓝丝绸中楣，这些哈达是土尔扈特人

首领和善德庙大师喇嘛的侄子在不同场合献给我的。

坐在温暖而舒适的长沙发上，我感觉自己好像置身在一个小汽船的雅致会客室中，这种幻觉被火炉和笔直伸向天空的烟囱进一步强化了。在正对着诺林和我的门上方挂着一朵白色的圆团形花，上书“圣诞快乐”。门的左右各放着两个箱子，权且充当餐具柜。蒙古包离门最近的部分由两面悬挂着的瑞典国旗与客厅主体部分隔开，左面国旗的上方是一个自穹顶盘旋而下的有翼天使，手中握着一条白色长带，上书“光荣属于天国的上帝，和平、友好洒满人间。”在我的家乡，这种天使像总是挂在圣诞树的上方。右面国旗上方挂着一个灰色的瑞典仙怪玩偶，玩偶头戴红色睡帽，手里拿着三臂烛台。玩偶是伯格曼做的，他还在穹顶的中央放置了一个仿制的佛教“法轮”，屋子中上升的热气使其不停转动。

圣诞桌无疑是智慧和品味的杰作，我们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家中亲人的肖像，胡莫在任何时候都要带上他可敬的母亲的画像，诺林前面闪闪发光的镜框中是他的聪慧而美丽的妻子。伯格曼面前是一个年轻姑娘的照片，那姑娘洋溢着北欧风情，全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我的敬爱的双亲则从墓地的庄严的静谧和一片灯海中注视着我，在他们之间放着我的兄弟姐妹的相片。我们谈论着遥远故乡的亲人，一遍又一遍地猜想着他们在的圣诞节日的活动，我们知道他们也一样思念着我们，他们也一定在想我们今天将如何度过。他们一定很纳闷为什么没在节日里收到我们的电报，难道我们被沙漠吞噬了？我们必须在寒风中完成艰巨的任务吗？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根据习俗，我的家乡的圣诞桌上铺设的白色桌布和狭长的蓝色丝绸上面会覆盖许多宗教画，画上有神采飞扬的亚当和夏娃手挽着手在漫步，还有四处飞翔的小天使和滚皮球的胖乎乎的圣诞猪。

在蒙古的一个隆冬时节，胡莫博士曾以熟练的手艺用纸张制作了一大捧盛开的红色玫瑰。

这时诺林噘着嘴“吹”出一阵嘹亮的喇叭声，张端来一锅滚热的汤，汤的味道很美，漂在上面的羚羊舌片使我一下子想到了乌龟，诺

林藏在箱子底部的一瓶酒现在就在桌子上，大家的杯子都斟满了酒，我讲了几句话，内中涉及圣诞节、我年轻时的圣诞筵席和沙漠中的圣诞前夜，并举杯为家乡亲人的健康、为考察队的成功干杯。

然而，我差点忘记了我们美好的圣诞筵席上一项非常重要和最容易勾起人乡思的一个节目——我们给神灵敬献了一道真正的瑞典菜——鱼子酱、沙丁鱼、瑞典火腿、牛舌、奶油和黄油，还有地道的瑞典硬面包，这些储备中孑遗的美味是诺林、胡莫、伯格曼在西伯利亚之旅留下的。

接着上来的第二道菜是羚羊脊肉，烤肉中还加了绿豆和腌黄瓜。味道真棒！我们现在在沙漠之中品尝的这道羚羊脊肉远远超过了皇家大酒店的水准，回到斯德哥尔摩，我一定要将我们的医生胡莫推荐到皇家大酒店当主厨。

甜食有松果香芋冰片、奶油小圆面包和糖塔，接着上来的是饼干和干酪，还有布里干酪，最后是咖啡、法国白兰地和上等雪茄。桌子上一直摆放着一盘甜点、柠檬糖和巧克力，在各道菜的间歇，我们还抽了一两根香烟。

最后，胡莫博士讲话，他讲话方式独特，语言诙谐感人，诺林和伯格曼不时予以其鼓励，大家一致表示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4位瑞典人在沙漠中的瑞典国旗下度过的这个圣诞节。在这个距额济纳河和哈密分别为400公里和300公里的地方，我们发誓要尽全力以自己的工作为科学服务，解决几个重大问题，为瑞典创立荣誉。

圣诞节过去了，当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也过去了，1928年的新年开始了。我们仍然深困沙漠之中等待救援，就像被冰围困的极地探险者一样。“旗子高地”上的瑞典国旗就是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但西面的沙海仍杳无人迹，令人望眼欲穿的救援队似乎永远也来不了。狂野的风暴刮了一整天，像刀子似的一阵一阵刮进透风的帐篷。天色阴沉忧郁，但我们的情绪依旧高涨。

1月3日，厨子王报告，燕麦片、糖、盐、胡椒、咖啡和土豆已然

告罄，第二天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吃面包，大米也只剩下几把了。但我们还有一些豌豆汤粉、可可和茶，仆人们还有一定数量的小米，水也不缺，而且伯格曼每天起码能打一只瞪羚。

次日，门托早早叫醒了我，他说西面来了两个骑骆驼的人，我听见此话就如同被毒蜘蛛蜇了似的一蹦而起。

“他们还有多远？”我问。

“三里。”门托答道。

大望远镜已在“旗子高地”上架了起来，可以看清来者是蒙古人，他们行动迅速。等他们再走近一点时我认出了来人是班彻和桑杰吉勒彻。他们稳稳地骑在骆驼上，皮肤黝黑，身体裹在如袋子般的羊皮袄中，腰间缠着皮带，头上戴着衬着毛边的巴什利克皮帽。他们从大石头昼夜不停地骑行了5天到达这里，给我们带来了50斤面粉和几封激动人心的信件。

真是一个美好的新年！

玛斯考尔在信中说，他听说赫姆波尔、哈斯伦德和穆伦温格已经到达哈密，有人曾看到沃尔兹在军队的保护下正在前往迪化的途中。士兵们虽粗鲁却友好——他们可不是土匪。

徐炳昶在另外一封信中讲了他和黑德的大石头之旅。

黑德对此也有生动的汇报：第一天打到了6只瞪羚，还发现了一匹野驼。

12月17日，断水，西风强劲，两匹骆驼死了。

12月18日，一场猛烈的暴风雪，一匹骆驼被宰杀。

12月20日，风暴更猛，我们仍留在原地。

12月21日，一场暴风雪袭来，无法上路。

12月22日，两匹骆驼被冻死，我已筋疲力尽，决定让拉尔森和两个蒙古人带上所有行李留在后面，其他人带上骆驼和必需物资继续前进。

12月23日，带领102匹骆驼上路，其中两匹在途中死掉，无水，但下雪。

12月24日，一场凶猛的暴风雪，只走了3公里，没水。

12月25日，一场风暴，两匹骆驼倒下，蒙古人最后一次分到面粉，然后他们就只能吃驼肉了。

12月26日，一场寒风，一匹骆驼死了，另一匹被宰杀。

12月27日，另外一匹骆驼倒地不起。

12月28日，我们遇到了4顶蒙古包，这是离开额济纳河以来第一次遇上蒙古包。购买面粉、糖和5只羊。

12月29日，到达大石头。一匹骆驼死去，我们希望7天内到达哈密，班彻和桑杰吉勒彻被派到我们这里。

最后，拉尔森报告说他正处在我们西方160里处，4天的暴风雪摧垮了骆驼的抵抗力，他本人还可以靠剩下的面粉对付。

这样我们得到了第一批消息，虽然不是来自外部世界，但也是我们自己前锋队伍的消息，于是我们陆续知道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然后大家又恢复了惯常的生活，而等待援军的心情则更为迫切。

当1月5日到来时，我们4个瑞典人已在塞比斯特泉待了24天，时间如往常一样不急不慢地过着，然而晚上10点20分时所发生的一场变化一下子把我们从计划和幻想的王国带回了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

当时我们4个人都坐在蒙古包中的“写字桌前”，胡莫和我正在写作，伯格曼在研究亚洲考古，诺林在制作最新的图表，除了火炉的噼啪声和帐篷外面风的怒吼声之外，一切都很安静。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仆役们从不敲门，他们都是直接走进来，而且狗也没叫。

“是玛斯考尔！”我十分肯定地喊了一声。

“是的，是我，玛斯考尔。”玛斯考尔在帐篷外用纯正的瑞典语回答，他紧接着问，“有喝的吗，伙计们？”

我怀疑在玛斯考尔的一生中他再不会受到如今天晚上这般精心细致的照顾和关爱了，我们小心翼翼地将他拖到屋子的一角，在垫子和皮毛之间收拾出了一张床，然后端来热腾腾的茶水。他已被完全冻僵了，门托将炉火拨旺，火光红彤彤地跳跃着，与此同时，玛斯考尔以其惯有的平静和轻松，回答了我们连珠炮般的问题。

“就你一个人吗？”我问道。

“不，还有奥特宏和3名中国人，还有25匹雇来的骆驼和我们自己的5匹骆驼，另外还有一顶轿子和几封信。”玛斯考尔说。

“讲讲你们的旅行经过。”我说。

“经过艰苦的强行军后我到达穆傲沟村，那里尽是粗鲁的士兵。我与他们说笑饮酒，很快成了朋友，他们帮我雇骆驼、买给养并帮忙制作轿子。轿子很快做好了，然后我就往这里赶。在路上走了7天，由于暴风雪太大又耽搁了3天——冻得人真够呛。前天我与拉尔森一起度过了一夜，给他留了一些羊肉。今天的路似乎长得永远也走不到尽头似的，我们走呀走，有时骑骆驼，有时步行，为的是不被冻僵。在距离此地大约有半小时的路程时，我们终于看到了塞比斯特泉闪闪发光的浮冰，很快又看到了帐篷和旗杆。现在，这不你们都看到了，我到了这里。”玛斯考尔说。

我们感谢玛斯考尔如此漂亮地完成了艰难的任务。不错，他有学生刘当翻译，但如果没有过人的幽默和与汉人、蒙古人出色的交往能力，他是不会成功的——人人都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感谢，我们一致推选他为瑞典公民。

最后，玛斯考尔还告诉我们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即我们将会遇到一些麻烦，但他相信只要我一到达哈密，这些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关于我们的谣言飞得满天都是，有人说我们是一支入侵军队的前锋，对新疆不怀好意。为了不让我们在沙漠中买到给养，通往东面的商队交通已被阻断，军队也已被召集起来。除了已经送到哈密的信件外，所有欧洲人的邮件都已被送往北京进行彻底审查。

形势很清楚，我们受到了怀疑，关于我们可能被迫原路返回的担心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我们根本进不了新疆，可这是我们宏大计划的最终目标，难道我们的一切努力都要付诸东流吗？

第二十三章　新疆将不会和我们发生任何关系

旅队中新来的汉人用棍子和盖布给自己建了一顶帐篷，狂风将其吹倒后他们又用箱子建了一个小屋，并且还在里面生了一小堆火。瞪羚在风暴中比平时更为大意，伯格曼一下打了4只，这对我们的肉食储备是很好的补充。

啊，这些没完没了的寒冷风暴！1月7日我们还不能出发，因为驮着沉重行李的骆驼不能顶风行进。次日风暴小了一些，太阳一出来诺林就准备带着他的人马上路。然而，5只骆驼发起暴动，扔掉了行李，但幸亏余下的骆驼没有发生骚乱。不久之后，诺林的队伍就消失在西面的沙漠之中了。解救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尖厉的西北风咆哮着，气温降到零下12摄氏度，行李全被打包，轿子被固定在长长的杆子上，上面盖着皮衣，骄椅上铺着毯子。胡莫博士如对待小孩般将我裹在一件长衣服里，然后让我坐进轿子里——我尚未完全康复，还必须小心在意。两只前后拴在一起的骆驼驮着我，轿杆的最前端固定在粗绳子做成的环中，绳子则交叉挂在驼峰上，门托骑在前面一只骆驼上。这种奇特的交通工具开始运行了，我以前从未这样旅行过，虽然在1897年3月我首次来北京时坐过骡子驮的轿子。骆驼走得很平稳，轿子垂直摇动的感觉很舒服，当两个牲畜步调一致时，轿子摇动的幅度就更大了，玛斯考尔和胡莫徒步走在轿子前面。圣诞前夜出生的小狗躺在一只铺着垫子的箱子里由一只骆驼驮着，它们的母亲在骆驼中间四处乱跑呜呜叫着寻找自己的孩子。我们终于也出发了，身后就只剩下孤零零的塞比斯特泉。

路的左右两边出现了一些暗色的丘陵，丘陵中间伸展着平地，有时有坚硬的碎石，有时有堆起的沙丘。地面通常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干草丛，既有芦苇也有红柳。在“红泉”乌兰—布拉克，在芦苇丛中有瞪

羚和鹧鸪出没。

夜晚的温度为零下26.7摄氏度，次日早上非常寒冷，前进路线指向西南方，路两边是低矮的沉积片岩和集块岩山脊。雪越来越大，凹地中的积雪厚达1.2英尺，天黑以后前面亮起火光。很快我就坐在了诺林的帐篷中，营地条件很糟，柴火很少，还必须化雪取水。伯格曼和玛斯考尔的坐骑倒在了路上。

由于刮着刺骨的寒风，第二天我们只走了8公里。转过一个丘陵后，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了拉尔森的固定营地。这位优秀的旅队向导裹着红色的皮衣前来迎接我，他像玩沙子的孩子似的高兴地大叫："欢迎，欢迎，新年好。"他用箱子给自己垒了一个带有前院的小屋，前院可以挡住飞向门口的浮雪。他的住处的内部长2.3米，宽2.1米，墙上挂着骆驼盖布，房顶由鞍柱支撑，同样盖着骆驼盖布，四角烟道下是生着火的铁炉子，炉子上茶水正呼呼翻滚，羚羊肉在煎盘中嗞嗞作响，5位瑞典人，一位德国人，两名蒙古人塞拉特和马特在火炉边坐下，我们这些饥寒交加的客人只顾面对早餐狼吞虎咽。

在4天的风暴中，大旅队在这里遭受到损失，也是在这里，黑德和徐教授率领着102匹骆驼（其中30匹是乘用驼），带着必不可少的行李继续向哈密推进。拉尔森和他的两个蒙古人带着约100只箱子留在后面，这支小队伍的其他成员还包括4匹疲惫不堪的骆驼，3条颈上挂着铃铛的用来吓唬狼群的半野的中国狗。有意思的是，它们居然也知道怎样猎取盘羊和胆小的野驴——这些动物一次又一次地误入营地周围。

我与拉尔森在我的蒙古包中进行了一次长谈。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在接近新疆各民族生活的地区，旅队必须经历一次彻底的改变。我们决定在哈密将所有的蒙古人解散回家，诺林和伯格曼的4名汉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继续留下。拉尔森认为，一到哈密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他必须和蒙古人一道循沙漠路线回家。然而，如果这样的话，他会失去游历迪化和其他可能的商业贸易机会，我建议他与我们同去迪化，然后穿越西伯利亚回到张家口。而且，和现在一样，那时他仍

旧是考察队的一员，更为重要的是，在远东和蒙古我还要派他执行一项重大的使命。

1月12日，我们再度告别拉尔森继续向西推进，路两旁是光秃秃的暗色山丘，看上去像是从白雪覆盖的大地上竖起的高塔。我的轿子缓慢而沉闷地晃悠着，脚下是石英碎石和积雪。突然远方出现了一幕非同寻常的景象，那里放牧着很多骆驼，山脚下的一顶帐篷中还冒着炊烟，他们是商队还是我们自己人？当我们走近时，萨兰·高里尔和3名雇来的中国人急忙走上前向我致意。他们受命带领50匹骆驼来解救拉尔森，他们见到我很高兴，我告诉他们这里距他们的目的地只有22公里了。

萨兰·高里尔递给我一袋信件，它们来自我的伙伴。诺林和伯格曼在他们的帐篷中为我大声朗读了这些信，消息非常不好，我们已经落入中国内部政治的磨盘之间了，我们会被碾得粉身碎骨吗？一切都完了吗？

我曾派沃尔兹从额济纳河出发提前去了迪化，一是向那里的统治者杨增新报告我们的到来，一是取回我们的邮件和钱——北京的邮政当局颇有合作精神，他们帮我们将邮件和钱转向了新疆首府。

11月25日，沃尔兹从哈密写信来，称他与仆人们带着8匹骆驼已在夜间穿越了经常没有水和路的沙漠，一匹骆驼已经倒毙，第二匹也不得不留在哈密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在11月11日到达新疆边界时，遭到20名边界骑兵的包围，这些人为了赢得“荣誉”，当着他的面往来复枪中装子弹，尽管他提出强烈抗议，但还是被拘押了6天。与此同时，还来了一位被两支骑兵中队护卫着的诺颜，即首领，队伍中有4面旗子和4名喇嘛。

最终沃尔兹被允许在军队的“保护”下前往哈密，他们通过冰雪沿着山脚走了一条捷径，骆驼在这种路上走得很艰难。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们3个人和一个骑兵一块从一个斜坡上滑了下去，幸运的是毫发未伤。

沃尔兹于11月21日到达哈密，此时他已走了733公里的路程。进入哈密以后他被带往一个有庭院的房子，门口有两个军官和20名士兵站岗。第二天，一位姓刘的旅长来访，并对他进行了盘问。

“我必须尽快赶往迪化执行重要使命，我有护照和持枪许可证。”沃尔兹解释道。

“你必须在这里等我得到迪化的指示后再作打算。”旅长回答他。

沃尔兹被解除了武装，行李受到盘查，他的所有东西都被带走搜查，看里面是否藏有钱和鸦片，由于没有钥匙，里艾伯润兹的一个装着胶片的铁皮盒子也被砸开，不过什么东西都没有损坏。

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信件在沃尔兹和刘旅长之间穿梭往来，一位会讲英语的年轻邮政局长陈先生充当他们的翻译。沃尔兹不愿意继续被耍弄，他要求将其强迫拘留12天的刘旅长支付他和他的手下以及骆驼的所有费用，如果第二天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复，沃尔兹声称他将亲自向迪化的杨增新发电报。最后，刘旅长于11月27日允许沃尔兹前往新疆首府迪化，但不是骑马，而是坐马车，并且“陪同”的还有一个骑马的卫兵。

以上就是沃尔兹信中的全部内容。

第二个报告来自穆伦温格，我在11月25日于依克海—古尔派他前往大石头。他在报告中讲述了他的冒险经历，遗憾的是，由于他大部分时间在夜间行军，没法绘制路线草图，因此他的冒险路线不太容易找到——只有像他这样的胆大鬼才敢这样走路。

他8天之后到达塞比斯特泉，我于一个星期后带着大部队也来到这里，3人继续夜间走路。12月5日，他们邂逅了一位骑着骆驼的喇嘛，此人来自拉萨，在25天的时间里他只见到一个孤独的蒙古人。喇嘛把所知道的周围地区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们，当时他们的面粉和羚羊肉只够吃一天多了。

12月6日他们转向南去，经过长时间的寻找他们发现了一条可能

通往哈密方向的小路，然而，当他们第二天注意到路边的灌木刺上没有来自驮队的棉花絮时，他们便意识到这条路不通向哈密，因为棉花商队都是从哈密方向出发的。于是他们又找到了一条有棉絮的道路，这说明它通往哈密。他们午夜宿营于一泉水边，赫姆波尔、霍德和哈斯伦德也曾在那里停留过，因为那里有空罐头盒和废纸片。

12月9日，他们发现附近有一处废墟，穆伦温格和班彻走上前去察看，而老张则带着驮畜继续赶路。他们看到他直接走向了另一处废墟，有一队面目不清的人正停在那里，其马匹在附近拴着。那些陌生人彼此看了一眼便上前与老张搭讪，穆伦温格立即提着左轮手枪走过去，班彻一脸苍白惊慌失措地跟在后面，老张称那10个带着步枪的人是士兵。穆伦温格命令两人继续前进，自己领着骆驼进入山谷，但那队人马的小头目却骑着马追了上来，命令他站住，并哗啦一下将子弹上了膛。

“把你的护照拿出来。”那人粗鲁地说。

“先把你的证件拿出来。”穆伦温格回答。

“我不需要护照，我有我上级的名帖。”那人说。

“好吧，这是我的护照和带枪许可证。”穆伦温格说。

“如果你想继续向西走，就必须把武器交给我，否则必须按原路返回。”那人说。

与此同时，整个队伍包围了他们。

“我们要去新疆，不想搁误工夫。”穆伦温格强调说。

“好吧，但先得将武器交出来。”那人说。

此后他们一起向西走，夜间很晚时才扎营，穆伦温格询问有没有其他欧洲人通过附近地区，那个带头的人答道：“有，先是一个，然后又有5个，他们现在都已成了俘虏。”

第二天他们继续前进，一些羚羊在附近吃草。穆伦温格请求借那人的步枪一用，但羚羊却及时跑开了。他们循着去哈密的路线前进，但随后却偏离大路进入旷野，我们的人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这些士兵们没有穿着统一的军装，给人的印象更像土匪。

不久他们进入了一个类似峡谷的谷地，晚上停留在一个山洞前面，附近有泉水和芦苇。洞里面有两堆火，他们说自己的头领就住在里面。但他们没有见到头领，他们说他循着去安西的路去了星星峡，他们必须把穆伦温格也带到那里去，然而，穆伦温格除了哈密以外哪儿也不愿去，那些人便声称要派一名信使把头领接回来。因此，在头领到达那里以前，穆伦温格他们就成了这些人的俘虏，但他们被允许在洞的入口处搭起帐篷安身。

穆伦温格在洞中受到礼遇，洞中除了骑鞍以外别无他物，据此穆伦温格怀疑这些所谓的士兵可能是土匪。惊慌不已的班彻坚持认为他们已落入了一帮土匪的魔掌，而老张却确信他们就是士兵。半夜，穆伦温格被吵醒，发现班彻正跪在地上念诵喇嘛经。他忙问他在干什么，那蒙古汉子回答说他们落入了土匪手中，肯定会送命。半小时以后，那个被派出去寻找头领的人单独回来了，班彻认为所有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土匪们耍的障眼法，土匪只是要把他们带进沙漠深处，然后再毫不费力气地将他们抢劫一空——图财害命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第二天，那帮人确实没有放走他们的意思，而是带着他们一起上路。傍晚时分他们走在前面，以便生火和建立营地，只有那位小头目骑着骆驼仍与3个俘虏待在一起。穆伦温格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想扑上去夺取那家伙的步枪，然后飞驰而走，正这样想时老张报告说在右面发现了一个旅队。

“我想知道那是个什么旅队。”穆伦温格向那个领头的中国人说，“也许是我们的人。”那个小头目也不反对，只是骑着骆驼快步走上前去。老张跟在士兵的后面继续向前走，而穆伦温格和班彻却原地未动，此时天已变黑了。

“现在机会来了。”穆伦温格对同伴说，“他们是土匪，我们必须今

晚逃走。”

班彻很紧张：“那我们吃什么？”

“那并不重要。只要我们能从这儿逃走。夜很黑，我们必须冲向北方，然后突然折向西面。”

“那就得牺牲骆驼了。”班彻说，“否则他们会找到骆驼蹄印，而且骆驼在山中走得也很慢。”显然他已经被说服了。

“好吧，把骆驼留在后边，如果他们是土匪，就会将骆驼偷走，如果是士兵，我们还能把骆驼要回来。”

班彻有一块肥肉，那是全部给养，穆伦温格带上了旅行箱中的一半钱，即350块，他只能带这么多，因为另外一半钱在一只骆驼的鞍囊中，那些钱永远也别想要回来了。然后，他们徒步离开了正在吃草的骆驼，迅速没入一条山谷，那里净是松软的尘土和沙子，为了抹去足迹，班彻将自己的皮袄拖在后面。然而，他很快就累了，于是他建议踮着脚尖走，这样他们的脚印看上去就像野驴的蹄印。

他们走了半夜，累了就休息一会儿，但不敢生火，因为火光会暴露他们的行踪。如果那些人追上来怎么办？但没人追来。第二天他们一直走到下午4点钟，两个人都已疲惫至极，需要休息。肥肉也吃光了，但前面出现了一处结冰的泉水。又走了一程后他们便躺倒在地，从晚上11点一直睡到凌晨1点，直到最后被冻醒。第二天他俩虽找到了很好的饮用水，但却没有东西充饥。12月12日他俩游荡了一天一夜，天亮时传来流水的哗哗声——终于找到了一条小河！他们两人在河岸边生起火，火灭后他们把沙子铺在发红的灰烬上作为“温床”躺在上面休息，两个小时后班彻叫醒了他的主人，说：“今天我们将看到天堂。”

“你是什么意思？”穆伦温格问道。

“是的，我听到了公鸡的叫声。”班彻说。

他们立即上路，不久他们看到一所简陋的茅舍，里面住着一个汉人，他们在此吃饱喝足之后购买了面粉、肉和一头毛驴，下午两人又继续踏上了去哈密的大路。

一个小时之后他们遇到了两名骑马的蒙古族士兵，士兵盘问了他俩一阵，然后就飞驰而去。10分钟后又出现了一队骑兵，其头领对他们的盘问更为细致。穆伦温格操着一口流利的蒙古语，简洁明了地回答了所有盘问。他俩被带往一处庭院，内有蒙古包、士兵和马匹，部队的“总司令”住在一间泥房子中，他俩被请到他的炕上与之交谈。他曾听说两名外国俘虏逃跑了，现在才知道眼前这两个人就是那两个被逮捕的俘虏。他现在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冯玉祥的军队——曾有谣传说一大队欧洲人正在向前推进，且在深秋有1200人在额济纳河畔的80顶帐篷中住过——由于我们的到来，整个东疆都被动员起来了。最后，他向穆伦温格保证，第二天他就会将他们的骆驼要回来，但12月14日和15日他们都没有见到骆驼的踪影。

12月16日，穆伦温格作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如果明天还不送还我的骆驼和给我两匹马，我们将步行去哈密。”他们得到了马匹，在一歪树村他们遇到了沃尔兹的蒙古人萨尔彻。12月18日他们继续旅行，终于抵达哈密，在那里刘旅长再次对他们进行了审问。12月22日，老张带着两匹骆驼也来了，穆伦温格立即向我们派出救援人员，这件事再次说明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

我从一直为赫姆波尔和霍德充当旅队向导的哈斯伦德那里接到了一封写自12月18日的信件，信中说他的纵队在庙沟村被蒙古和回回士兵截住并缴了械，还被拘留了11天。在穿越沙漠的旅途中他们的24匹骆驼只损失了3匹，这清楚地表明哈斯伦德的任务完成的是多么好。但很明显，哈密根本不欢迎他们——“可以看出那儿出了问题”。他要求火速前往东面与我的纵队会合，但遭到拒绝。

霍德博士更为详细地叙述了他们纵队从10月31日到11月27日的戈壁沙漠之行。他们在庙沟村被迫停了来，纵队受到了严密监视——12月3日有800名骑兵随他们一起行进，同时士兵的数量还在增加，

第二天纵队接到杨增新的信函，称他不希望考察队来新疆，并说他此前已电告北京，称不想在新疆见到考察队。

赫姆波尔、霍德和哈斯伦德的纵队中还有冯·考尔、傣特曼和学生刘，他们用英语给杨增新起草了一份电报，赶往哈密的电报站发往迪化，电报上说：“今天我们被告知阁下不允许斯文·赫定博士的考察队成员进入新疆，且要求我们返回北京。作为答复，我们告知阁下，考察队回头穿越沙漠是不可能的，理由如下：考察队离开北京时没有携带足够的过冬设备，因为我们打算在新疆购置这些东西，因为来此地旅行所花时间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考察队的所有给养和所余物资都已告罄，因此，我们缺乏此时返回的必要条件。我们全部的款子都在迪化或于我们到达那里以后由北京寄来。考察队在沙漠中损失了大批骆驼，余下的都已羸弱不堪，经不起多日的沙漠劳顿。我们被告知，有人怀疑我们是共产党，对此我们坚决否认，我们提请阁下注意以下事实，即北京的瑞典公使和德国公使已经向张作霖元帅阁下作过保证，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打算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捣乱，也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我们请求阁下考虑上述情况，允许我们前往哈密，借此机会请允许我们表达对阁下的最美好的祝愿。”

12月6日，纵队领导赫姆波尔接到了杨增新的答复电文。内中允许考察队的26名成员，即全部工作人员，继续前去新疆，但必须接受3项条件，即解除武装、检查行李、将所有仆役和骆驼留在新疆边境地带。

12月9日，纵队又一次登程，3天内到达哈密，在这里他们把所有武器都交了出去，行李也被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纵队直到月底才收到了由北京转至迪化的一部分款子，这样，他们在29日乘3辆马车前往迪化。

霍德在12月24日的信中进一步报告说，新疆当局不允许他们拍照、画地图和在哈密设立气象站。

但是结果一切都好，因此在最后我必须再讲讲徐教授在12月31日于大石头写的一封信，信写得平稳庄重，希望我们在边疆遇到的问题

终获解决。

大家在80号营地非常仔细地阅读了这些信件，然后花了几个小时进行讨论。新疆方面对我们的疑心这样重，以致整个哈密地区都处于备战状态。为了阻止我们补充给养，连通往东面的商旅路线都被截断了，可见考察队有多么不受欢迎。应我的请求，张作霖元帅早在年初就已在一封长长的电文中告知了杨增新关于我们考察队的情况。所以，我们对在新疆边境受到的怠慢感到很惊讶。最使我难过的是，考察队从1927年5月至9月的全部邮件已被送往北京进行彻底检查，因为在迪化没有人懂瑞典文和德文。结果，为了等待这些重要的信件，我们不得不一直等到1928年的3月底。

然而，在我看来，对我们这些人和计划的看法似乎正在改变，因为玛斯考尔在边境受到了军官和士兵的十分友好的接待。

不管我们多么希望有好形势，但新疆的气氛无论如何都是紧张的，因此我们必须打好自己的牌。晚间我给拉尔森写了一封信，讲了当前的形势，并要求他加快速度，这样也许我们能一起进入哈密。

第二十四章　终抵哈密

1月13日，旅队继续西进，晚上的气温已降至零下21.7摄氏度。我们所行的地方非常单调，全都是艾米尔塔格和卡尔力克塔格所构成的山地，它们都是天山山脉最突出的部分。路上我们一次又一次遇见冻得僵硬的骆驼尸体——黑德和徐炳昶的纵队肯定遭受了严重损失。

从15日起，大家行进时靠得很近，因为现在随时都可能碰上新疆的巡逻队。我们沿着西南方向行进，寻找斯坦因地图上标出的明水和穆傲沟之间的道路。我们当天就跨越了明水通向巴里坤的道路。

冬天的大地一片洁白，18日出现了第一个石头路标，次日我们的漫漫孤旅就结束了，当时大家刚跨越了一条在深约3米的渠沟中流淌的小河，然后就看见了西面山脊下绿洲中的柳树和杨树。我们溯渠沟而上，在左面看到了一间佛堂，佛堂里面唯一的“尼姑”是一头大黑母猪。在附近的一座暗色山丘上有一个麻扎，这是伊斯兰教圣人的墓地，麻扎有围墙和圆顶。我们还看到了牧草、野玫瑰丛、农舍、黄泥屋和有围墙的院子。大家在一小片柳树林边扎营，该地叫穆傲沟。玛斯考尔到来时驻扎在这里的200名士兵已不见踪影。我们只找到了5位汉族农民和3位维吾尔族人，其中一名72岁的维吾尔族人名叫霍达耶尔，他是附近的陶勒村的长老。他有50匹骆驼，其中的25匹救了拉尔森的行李。关于我们，他所听到的是一支2000人的队伍。能够再次用维吾尔语交流真让人兴奋，我已经有十几年未讲过这种语言了，但现在仍然没有完全忘记，经过复习以后很快就能使用了。

在这里买一只羊要花5块银元，30只草原飞禽值4块银元。我们购买了一些非常好的小麦面粉、鸡蛋、洋葱和圆白菜。真难以想象，在沙海中搏击了70天之后，我们终于在文明的海岸登陆了。向晚时分，胡莫喊道：“拉尔森来了。”真的，在落日余晖的照耀下拉尔森身着红色皮袄、神采焕发地走在50匹雇来的骆驼前面。

夜深时，西方传来驼铃声，那是一支由1000匹骆驼和25顶帐篷组成的驼队，他们要东去包头。看来，交通禁令被解除了。

我们仍在原地待了一天，并接受了张大人的来访。他是监视我们的部队的指挥官。他告诉我们，袁教授的纵队于一周前打此经过。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再也不用操心已经好久没有消息的袁教授纵队了。

1月21日出发时，胡莫、伯格曼和我使用了一种新的交通工具。这是一辆带有两个轮子的宽阔马车，全长4.65米。一匹马走在车辕中间，另外3匹则拴在前面的长绳子上。胡莫用蒙古毛毡、垫子、睡袋和毛皮铺在上面，坐在上面既软和又舒服。赶马人和马童都是蒙古人，当马车的行进速度加快时，他们就坐在马车的正前端，一般情况下他们则是跟在车边步行。赶马人不用缰绳，只是“噢！噢！一扑！一扑！”地吆喝着，他们只偶尔使用一下鞭子。马狂奔起来也不会出什么事——草原很大，马车又结实又安全。

我们在黄龙岗村附近度过了1月22日夜晚，考察队的前进路线在此与通向安西的大商路交会了。23日是中国的新年，因此一大早，仆人和村里的老人都来拜访我们。这一天街道两边的商店都关了，只有商店门前的木柱子上装饰着常见的红色年画。

然而，我们不能被中国的新年庆祝所耽搁，大家很快就上路了。不久我们就看到了考察队3个纵队的138匹骆驼在放牧，接着又看到来自北京的电报线经由安西伸向远方。我们时而走在长满植被的沙丘之间，时而走在平坦硬实的沙漠地面上。一路上，古老的烽火台遗址随处可见。我们的“大部队”时常通过一些路边长满杨树和柳树的小村庄，村子里有的汉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有的汉人聚在一起喝酒庆祝新年，孩子们则在嬉戏玩耍。这儿老狗带着小狗在狂吠，那儿一树寒鸦鼓噪。前方不时出现的墓地又提醒人们一切不过都是过眼烟云。经过清洞子村时，有毛驴和牛正在开阔的池塘边饮水，旁边停放着一辆马车。

我们已经跨过了穆傲沟东面的新疆边界，现在正在靠近该省的第

一个城镇。突然，前方尘土中有一支黑色的骑兵队伍飞驰而至。为首的是一位别克，即王爷，他身着一袭毛边袷袢，身材魁梧结实，威风凛凛。彼此通报后他便陪着我们继续前进，我们谈论着一些有关哈密形势的话题。慢慢地，所行路线逐渐变成了一条大道，旁边有水渠和老迈的柳树。进入街道，但见两边都是灰色的墙壁；走过小桥，只见两侧雕栏夹道。我们的马车轰隆隆地穿过汉城的双重城门，最后来到刘旅长的衙门前，旅长的随从在外院恭恭敬敬地接待我们，士兵们夹道向我们致敬。进得内院，但见大门上挂着两面红旗，客厅中有几位官员在等候，其中有市长和玉勒巴斯汗——一位维吾尔族的权势人物。正在用茶之际，刘旅长走了进来，他身材瘦削，面色苍白，举止儒雅。我们立刻就热烈地交谈起来，懂英语的邮政局长陈先生做我们的翻译。陈先生是一热情有礼的小个子，他曾以各种方式向考察队的前锋提供过帮助。

刘旅长询问了我们的旅行情况和旅行中所遭受的磨难，同时还问到了我们的考察路线、骆驼的损失以及我的病情和其他一些事情。我问他我们何时可以去迪化，他回答说任何时候都可以。我说我想把诺林和伯格曼直接从这里派往罗布泊，刘旅长遗憾地说只有迪化的杨增新能决定此事，他说将就此事立即给杨增新发一封电报。他了解我早年的中亚探险经历，他说现在在新疆旅行比过去要安全得多。

刘旅长接下来谈到了杨增新提出的我们继续前往迪化所应遵守的3项条件，即解除武装、检查行李和留下蒙古人。他解释说，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是由于该省处于战争状态已经3年了。我请他放心，向他保证蒙古人一定会被遣送回家，因为他们不熟悉这里，不懂新疆的语言。我们的行李则任由他检查，正在路上的拉尔森将受命把所有行李卸在衙门的大院里。刘旅长问是否可以检查马车上的东西，我欣然同意。刘旅长说检查行李时我必须在场，我告诉他说完全没有必要，我愿将此事交给他和他的手下。然而在检查行李时，胡莫、诺林、伯格曼仍在现场——所有事情在几分钟内就搞定了，他们几乎什么也没碰。

刘旅长在院子向我介绍了他的12名军官，他们都穿着长袍马褂。

然后我们就离开衙门，士兵们再次向我们致敬。

徐炳昶和袁复礼告诉我，所有这些误解至少应部分归咎于北京的一位学生写给考察队的一名学生的既不严肃、措词又不恰当的信件。他在信中开玩笑说：“祝贺你加入了200名‘好战的’人之中。”写信的人大概是想说我们的人很多，而且有精良的武器用以防身。然而，迪化当局看到这封信后，便将我们所有的信，不管是中国人的信还是欧洲人的信，统统都送到北京去审查。可能是审查局告知新疆当局我们的信件中没有被禁止或值得怀疑的内容，因此我们8月至11月的信件得以留在迪化，现在它们已被送来哈密——邮政局长陈先生在我到达的第一天晚上就转来一大堆让人心情愉快的信件。

尽管有黑色的谣言和满天的阴霾，我们还是到达了哈密，这个小回城处在沙漠的边缘和天山脚下，是地球上距海洋最远的城镇之一，它深藏在亚洲腹地被人遗忘的角落，到这里来访的欧洲人寥若晨星。哈密有汉城和突厥城，有回人巴扎，即集市，还有清真寺，也有汉人商铺和庙宇。作为一个边境卫戍重镇，好几位将军的司令部都设在这里。哈密地区被看做战区，只要中国本土的将军们之间发生内战，负责新疆省安全的统治者就要提防来自东方的入侵。

新疆有一则谚语说：“哈密瓜天下闻，吐鲁番的葡萄香又甜，库尔加的良马能追月，库车的女人赛天仙。”哈密镇的四周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果园，里面种植着各种果树。这里的灌溉用水都来自北面的天山。好几条重要的商路都起自哈密，经安西到肃州、兰州和宁夏线，还有我们已部分试走过的路线都穿越了大沙漠。

第一天我就感到我们的待遇似乎得到了改善。当然，我们仍然是俘虏，但尽管如此我们却受到了很好的关照。然而，另一方面，新的麻烦事却伴随着肃州的马姓学生的一封电报一起来了，马与齐莫曼和索得鲍姆留在了额济纳河畔的1号气象站，他的电报说，甘肃当局已经禁止了1号气象站的活动，并命令他们撤离该省，他们的资金已告罄。在邮政当局的帮助下，我们立刻通过电报指示给马支付100块钱。

这次我又见到了已经分别4个月的袁教授，他的沙漠探险之旅成果丰富。除了大量的发现以外，他还在陈藩附近地区发现了3座古城。他的人和牲畜状态都不错，而且花费也非常少。他还去了一趟额济纳河的气象站，并带来了一封齐莫曼于12月1日写的信，信中说：“袁教授彬彬有礼，非常友好，他的手下也一样，在各方面都是可以相交的人，我们在一起工作和生活，非常和谐。气象站工作秩序井然，每天早上7点和晚上9点的观测工作非常准时。我们身体都很健康，一切都很棒，令人心满意足。”

索得鲍姆也在信上写了几句话：“向所有人问好。这里一切平安，我们很喜欢这个小聚居地的平静生活。”

这便是12月1日的情况，自那以来几乎两个月过去了，现在又接到了学生马这封令人不安的电报，徐教授向肃州的民政和军政当局拍了电报，并详细写信作了解释，我们其余的人只能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考察队在哈密一直待到2月4日，在这段休整时间里我们与当局的关系一步步得到增进和改善。拉尔森的人马所带的行李被检查时，刘旅长也在现场。在这次检查中他们从我的一只箱子里取出了一幅张作霖的大画像，上面有他的亲笔题词和签名。显然，这幅画像给刘旅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旅队的一位汉人向导要返回归化城，他将带走大批骆驼，并把我们的21个蒙古人送回家去。除了应得的报酬外，每个蒙古人还额外得到了90块钱、充足的面粉、茶叶、羊肉和两匹雇来的骆驼。但蒙古人的出发时间被推迟了，因为所有东去的商队都要以其畜力为军队服务，否则不准上路。但是，由于有当局的帮助，我们得到了比较好的对待。

我给杨增新发了一封电报，告知他我们最后一支纵队已抵达哈密，感谢他的款待和关心。我还表达了想与其尽早结识的愿望，同时我也请求他允许诺林和伯格曼直接去罗布泊。在回电中，杨增新表示欢迎我们去新疆，至于去罗布泊的问题则必须等我们到迪化方能决

定。显然，他想亲自了解我们。因此，所有的考察人员、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必须在新疆的首府露一下脸。

有一天，我们的朋友、邮政局长陈先生请我们吃饭。席间38道菜一个接一个地端了进来。我们正在吃饭时门口传来了声音——刘旅长在骑兵的簇拥下，前来对我们进行新年拜访。我们没有出去迎接，据称当一个达官贵人前来拜年时不出门迎接是失礼的行为，但如果我们都去接待他，那一天时间就不够了。

第二天，徐教授和我驱车去回拜刘旅长。我们先去拜访了沙亲王，6名穿羊皮袄的士兵领着我们，车子滚过尘土飞扬的大路，进入两边都是墙壁、树木和水渠的街道，最后抵达沙亲王的住宅。他的中国风格的宫殿四周环绕着高大的泥墙，几头毛驴正从拱门进入，身上驮着一捆一捆的柴草，这些柴草来自草原，是做柴火用的，有的毛驴身上驮着木质水桶，桶上覆盖着一层白霜。

我们走进一个宽大的客厅，里面铺着地毯，桌子和一排一排的红椅子四散摆开，墙上挂着4幅很大的卷轴，其中一幅上写有汉字“福”和“长寿”，这是沙亲王4次去北京朝觐时，皇太后对他的赏赐。

我们刚被领进一间小一些的会客室，着一身中式服装的沙·马苏特出来迎接我们，汉人称其为“沙亲王”，他的礼仪非常周到。他年约七旬，身材矮胖，面色红润，慈眉善目，胡子雪白，鹰钩鼻子格外惹人注目。自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以来，他的家族就一直以哈密为首府和居住地。然而，沙·马苏特的权力是虚的，严格说来，汉人只是仅仅容许他的存在而已。他从虔诚的教徒那里征税，据说比汉人的税额还要重。因此，据说那些虔诚的穆斯林也不怎么喜欢他。他的女婿住在吐鲁番，在库车也有一些他的家族的“影子”王公。

被属人尊称为“帕迪沙”的沙·马苏特是一位活泼、愉快而有趣的人，“帕迪沙”的意思是“王爷”。我们不需要翻译，直接用其母语维吾尔语直接与他交流。他的第一个问题涉及柏林的A·V.列考克教授，此人以其在吐鲁番和中亚等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察工作而蜚声世

界。我对沙亲王说，列考克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于是王爷便回忆起了他与列考克的一些事情，并请求我代为转达他对列考克的问候。

沙亲王对我的祖国瑞典的位置很不清楚，他问我："您的祖国离伊斯坦布尔有多远？"

"坐火车4天就可以到达。"我答道。

"噢，这样说来你们确实是土耳其人的邻居了。"——他只是去趟北京就需要3个月。

然后他开始询问我们的亚洲之旅，他不理解考察队怎么会在路上走了8个月而商队走完这些路只需要3个月。我向他解释说，我们要一路上进行观测并收集资料。我问他为什么这里的人这样害怕我们，为什么觉得我们不怀好意。他说："这么多全副武装的欧洲人来到我们的边界地带，我们当然会怀疑你们可能是敌军的先头部队。现在正在打仗，我们必须小心提防。但我们没有害怕您，尤其当知悉贵国王子曾褒奖过您时更是如此。而且北京政府也建议对您以礼相待，然而，我们无法知道您的真假，当然，现在一切都明白了。"

我们辞别沙亲王后又去拜访刘旅长，刘旅长现在对我们非常殷勤，他邀请所有旅队工作人员参加宴会，除了他，镇政府官员和沙·马苏特也将出席作陪。宴会将在玉勒巴斯汗的府上举行，那是沙亲王唯一能去的地方，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不会吃到用猪油炒的菜。

我们还拜访了市长，他是一位相貌堂堂，和蔼可亲的人。

将军阿也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他在新疆服役30年，其大半军旅生涯是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度过的。

在邮政局长陈先生的府上我们不但吃到了胡桃，而且得到了很有价值的建议。

考察队忠诚的蒙古人1月29日从营地进城购买衣服和给养，他们的大帐篷、他们本人以及肥大的皮袄将我们的庭院占得满满当当，与

此同时各种各样的回拜接踵而来，人群显得更加拥挤。回访的人中有刘旅长，他在骑兵的簇拥下坐着精致的小马车走进了院子。我们的俱乐部帐篷现在已变成了手术室，因为陈先生的小女儿被狗严重咬伤，胡莫博士正在给她治疗。不得已，我只好在我简陋的工作室招待刘旅长，茶杯就摆在我的写字桌上。刘旅长送给我一张漂亮的豹子皮，作为对我前天的礼物的回赠——礼物当时由诺林转交，是一副带有支架的大型望远镜，他非常喜欢这一贵重的礼品。他向我们奉上了一大堆咬文嚼字的恭维话，他说自己在南洋生活过几年，曾与很多欧洲人打过交道，但从未遇到像我们这样的好人！他喋喋不休，不知疲倦地祝贺徐教授和其他中国人能够有机会随同我们一道从北京来到他的镇上和更远的地方。他甚至大胆地将新疆比作一个藏在家庭中的钱箱子——但只有掌管钥匙的人才能将其打开。现在，我们来了，带着打开新疆所有宝藏的钥匙。他肯定地说，我们的工作不仅对新疆有利，而且对整个中国也有益。

与此同时，沙亲王还邀请我观看猎鹰的场面。猎鹰的季节一般在秋季，其方法是将鸽子或母鸡置于张开的网中引诱猎鹰，待其上钩后予以生擒。驯化猎鹰通常需要15天，主要是训练其如何用带钩的爪子猎取狐狸和兔子等猎物，并老实地蹲踞于猎人的皮手套上。猎人带着猎鹰在冬季狩猎，一到夏天它们就会被猎人放飞，因为秋天到来时猎人将诱捕新的鹰来训练。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那些被猎人放走的猎鹰又一次落入猎人的诱捕网中。

“老虎王爷”玉勒巴斯汗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沙亲王的左右手，与中国当局有很好的关系。他出面摆平了我们的事情。他对我们帮助很大，帮忙管理骆驼，寻找牧地和牧人，购买给养和马车，总之，他处处都在帮助我们。

他的房子是伊斯兰风格的两层木质结构，门廊上面挂着两面五色彩旗。军乐队在拱门入口处吹奏喇叭，声音甚是嘹亮。街道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玉勒巴斯汗领着我们进入院子，两边士兵立正敬礼，主客登上楼梯，进入内阳台。站在内阳台上，回城和带有城墙的汉城风光一览无余，北面的天山山脉和眩目的雪原景观尽收眼底。冬季的

花园里玫瑰盛开，夹竹桃和天葵也各展风采。主人们在大房间等候，其中两人带我们在这个漂亮的宫殿转了一圈。

在玉勒巴斯汗府上举行的宴会就要开始了，宾主就座于3张圆桌边。我和沙亲王坐在中间的桌子。刘旅长和徐炳昶教授在第二张桌子旁就座。在第三张桌子就座主人位置的是市长，坐客位的是拉尔森。按照习俗，沙亲王走到我的跟前，端起酒杯和象牙筷子举至前额，然后右手在我的椅子上方轻轻一扫，似乎是向我表明椅子是干净的。

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珍馐，有鲨鱼鳍、竹笋、烤鸭等。沙亲王请我们喝酒，他本人由于信仰伊斯兰教而不饮酒。

沙亲王的谈话很有趣。

“你的年轻同胞为什么要将可敬的胡子刮掉？是为了看上去显得年轻吗？胡子是男人的装饰品，刮掉胡子是不对的。”沙亲王看着诺林和伯格曼说。

“你结婚了吗？”他问我。

“还没有。”我答道。

“太奇怪了！你为什么不结婚？”沙亲王问。

“哪有时间呀。”我答。

“噢，哪有比结婚还重要的事情，一个人起码应该有一个老婆和一大堆孩子，到迪化后你一定要娶一个俄国女人。”沙亲王说。

太阳下山了，沙亲王出去念经。念经回来后他注意到拉尔森没有喝中国葡萄酒，于是又提了几个有趣的问题。

“他为什么不喝酒？”他问我，“他是不是一位牧师或犹太法律学家？”

“他是牧师。”我回答。这当然不是真的，但拉尔森年轻时曾当过

传教士。

“我们的牧师也不喝酒，但为了补偿，都吃得很多，所以他们的胃口都大得惊人。”沙亲王说。

宴会结束时里艾伯润兹使用闪光灯给大家照相，看到这种情形沙亲王急忙跑了出去，因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不能照相的。

宴会举办得很成功——独特而富有色彩，很久以后我仍然能想起这件事情。我们向主人告辞，再次经过闹哄哄的军乐班子，坐车回我们的住处。透过尘土飞扬的街道，我看到店铺的漆柱闪耀着鲜红色的光芒，深蓝色的天空挂着一轮新月。我们因胜利而备感振奋，不久前我们刚越过边界时曾遭到逮捕和缴械，像俘虏似的被对待，这里的人把我们看成是一些居心叵测的人。而今沙亲王和将军却对我们以礼相待，想尽办法讨好我们。他们给我们送来大米、羊和瓜等食物，似乎想要尽可能地让我们在此地多停留一些时间。显然，我们的到来给这里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人们的好奇心似乎还未得到满足。

当然，我们的作派也要得体有礼。我们于次日举办了一场答谢宴会，和昨天的宴会一样，不同的是昨天的主人成了我们今天的贵宾，昨天的贵宾则成了今天的主人，而且38岁的卡拉沙鲁音吉亘活佛也是今天的贵宾之一。确切地说，卡拉沙尔土尔扈特人的王爷是卡拉沙鲁音吉亘的侄子，但由于后者尚年幼，其王爷事务只好暂由吉亘代理。

玛斯考尔在一张桌子上陪客，他和客人们一杯接一杯地饮酒，每次都是一饮而尽，这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好感，他们大声为他叫好。玛斯考尔和他们一起玩一种猜拳游戏，猜拳时两人互为对手，同时向对方伸出若干手指，并大声喊出一到十之间的一个数字。玛斯考尔有一次输了，一下被罚了9大杯酒，他眼睛眨也不眨地一口气干了9杯，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都大声为他叫好。

晚上，邮局通过肃州转来了一封齐莫曼于12月18日写的信，信中证实甘肃当局已经禁止额济纳河畔的气象站的工作。

前几日，齐莫曼接待了一个由4名中国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他们礼貌而周到地要求检查并记录气象站的活动和观测纪录。调查结束后他们返回肃州，学生马与他们一同前往，以便进行口头和书面解释。齐莫曼当时只剩下15块钱了，但他很快就接到了哈密和北京的援助。他还有11只大箱子的储备，有面粉和大米。他担心如果我们在新疆边境遭遇敌意，那将对额济纳河气象站的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2月1日，蒙古王爷来拜访我们，他这次来拜访我们乘坐的是一辆由一匹黑马拉着的小型俄罗斯敞篷四轮马车，他的卫队由身着整齐灰黄色欧式军服的强壮的土尔扈特青年组成，他们胯下都是清一色雪白骏马，看上去煞是威风，给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黑德在征得刘旅长的同意后打开贴有封条的箱子，取出一支步枪作为回礼赠送给蒙古王爷——他使我们意识到他做梦都想拥有这样一件武器。而且与他做朋友对我们也许有用——由于其地位，他在新疆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作为答谢，他送给我和徐教授每人一张天山熊皮，后来在迪化他又送给我一匹良种蒙古骏马。

为了熟悉哈密的情况，我与徐教授、黄文弼和匡进行了一次旅行。我们的马车碾过厚厚的尘土，不时遇到步行者和骑在牲畜上的人，还有一队队拉着柴火的公牛车和由高大的骆驼组成的小旅队。路边流淌的沟渠水灌溉着柳树、塔形杨树和桑树。

我们首先来到左宗棠祠堂。

在左宗棠生活的时代，他与李鸿章、曾国藩形成了中国的权力三巨头。大约在1880年，他们剿灭了中国内地的太平天国叛乱。平定陕西后，左宗棠又挺进新疆镇压叛乱，将这些广阔的地区重新置于中华帝国的统治之下。因此，为纪念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功，在哈密为他建立了祠堂。“新疆”意即“新的疆域”，即得名于左宗棠镇压新疆叛乱后，以前这一地区一直被称为“西域”。

我们穿过几道头顶雕梁画栋、两边是红漆柱子的门廊，跨过两处庭院之后进入祠堂，房屋中心有一个像舞台一样的小台子，台子上的

壁龛里有一幅高约一英尺的左宗棠画像，画像上他身着黄衣和官帽，留着黑胡子，看上去很刚毅。在他的画像前面放着一盒香，专为祭拜之用。有一块碑上记载着他的所有功勋和荣誉，在另外几块碑上则记载着他的军队将领的名字。

镇子的边缘地带有一座陵墓清真寺，这是一座立方形建筑，上覆无纹釉陶，其前部饰以皮什塔克和壁龛。它的一切都是直线和点的组合，在其上没有发现其他的伊斯兰建筑通常所具有的圆形曲线。在其穹顶之下埋葬着沙·马苏特的祖父和其王室的另外几名成员。

第三场宴会的时候到了，我们受到王爷般的礼遇。这次宴会的举办者是哈密的军官团，参加者和前两次一样，都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们在哈密已经熟悉了新疆奇特的货币制度，其一般的支付手段是独一无二的钱证，名叫“新疆两”，“新疆两”印于迪化。小铜币“大钱”也在流通，其中心中有一方孔。有时还可看到“亚姆鲍斯”，这是一种船形银锭，中间有镇当局的印章。我们那些即将返乡的蒙古人只能带着银元上路，因为“新疆两”在新疆以外不值一钱。我们需要2000块银元，一位来自维尔内的西土耳其斯坦商人阿訇·巴依为我提供了帮助，他几乎不相信在整个哈密能找到2000块银元，但他却想办法东拼西凑地弄到一些。然而，时下一块银元已涨到4新疆两，如果别人知道我们需要银元的话，价格可能就会涨到6新疆两，后来还是玉勒巴斯汗帮忙以平常的价格弄到了我们所需的银元数目。

在哈密期间，没有比胡莫博士更忙的人了，求医问药的人不断来找他。他还有许多需要登门服务的病人，如沙·马苏特的儿子、市长、刘旅长等等。

2月2日晚上我们的蒙古人起程了。他们警惕性高，服务忠诚，我对每个人都表示感谢，希望他们旅途顺利，他们已完成了自己在考察队的任务，现在要去城外自己的营地，2月12日才能正式开始返乡的长途旅行。6月5日我收到拉尔森发自张家口的信时仍没有听到他们返乡的消息。我衷心祝愿他们在穿越戈壁沙漠时不要落入土匪的魔掌。

我们将70匹最好的骆驼送往吐鲁番牧养，以便以后将其重新纳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

次日一群热闹的庆祝新年的家伙走进了我们的院子，队列的前面是两个扮做女人的男子，他俩走在船形的木框子中。他们表演了一通滑稽戏，把“小船”摇得好像行驶在大海上一样。他们的后面是乐队，有人手拿钗钹，有人手拿两块硬木板，时不时敲打出清脆响亮的声音。他们在我们面前组成了一个半圆形，唱了一首歌，末了还请求我们不要见笑。

当天剩余的时间被用作告别回访，当我们被告知将有一支军事护卫队陪同我们一同前往迪化时，我问他们是否还把我们看成是一群土匪，要不为什么还要派这么多士兵陪同我们。我得到的回答是：“不是，根本不是，这是一支仪仗队，只有地位崇高的人才配享有这种殊荣。”

第二十五章　经善鄯和吐鲁番前往迪化

我们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2月4日，院子里乱成了一团——8辆高轮马车正在等待装载，马车之间堆着箱子、盒子、袋子以及所有我们要带走的东西。行李一件件被装上车用绳子捆牢，每个工作人员都尽可能地把马车铺得舒服柔软。胡莫将和我坐一辆车，他尤其清楚如何铺垫车子。一溜黄色蒙古马拴在墙边，蒙古王爷派来与我们一道出发的护卫队也已整装待发，其领队叫老仝。仆人和赶车人急得跑上跑下，信使们穿梭来往，我们的新朋友——汉人、回人、蒙古人给我们送来各种告别礼物，礼物有羊肉、活禽、鸡蛋、糕点、糖果、水果等。

沙·马苏特乘一辆有篷马车于现场最混乱的时候出现了，他被请入俱乐部帐篷喝茶。他听说有一种构造奇特的望远镜，用它可以看穿最高最大的山脉，对此我们给他作了耐心的解释，可他怎么也不相信我们的说法。

沙·马苏特阁下终于告辞离开。马车套好以后我们就坐了上去。明和其他几位仆人被辞退了，就像蒙古人塞拉特、班彻、瑟兰、高里尔、萨尔彻和高姆博一样，他们仍留在哈密。拉尔森、玛斯考尔、冯·玛森巴希、穆伦温格、袁教授、黄文弼、陈、刘、孔将在一周后随同所有重行李一同出发。

为了在汉人旅店不致拥挤，我们决定分两队出发。其他7辆车跟着我的车走出拱形门口时已是下午4点了。队伍通过巴扎——进来时在东门出去时在南门——经过汉城，然后转向西方。在我的旁边玉勒巴斯汗的儿子策马行进，他相貌堂堂，仪表不凡，袁教授和孔也跟随在侧，这样一群人给我们增添了一种送别的气氛。

哈密城很快就消失在我们身后，道路两边都是巨大的柳树和桑树。负重的马车逶迤而行，呈现出一幅生动的图景。马车越过高高的拱形木桥时轰隆作响，桥下是宽阔的灌溉渠。傍晚的景色非常壮观，落日在遥远的地平线放射出红黄色的美丽光芒。

徐炳昶和我的马车上有草垫和白棉织物做成的顶篷以及3个小玻璃窗户——左右两边各一个，后面一个。为我和胡莫赶车的是一路不断高歌的伊布拉希姆·阿拉巴克什，他坐在一个草料袋上策马前进。他不用缰绳，手里只握着一根鞭子，但他的马却似乎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口令。我们的车上垫着干草、毯子、睡袋、毛皮和垫子，感觉很舒服。这些东西一点也不多余，因为路况很糟，车上的人经常被颠得东摇西晃，那感觉就像患了晕船症一样。

我的车走在最前面，后面依次是徐教授和丁，诺林和伯格曼，黑德和里艾伯润兹的车。第五辆车上坐着秦和王，第六辆车上是张和徐教授的仆人王，第七辆车上是里艾伯润兹的仆人和助手查理。第八辆，也是最后一辆车上装的是行李。

说真的，这一支滚滚向前的旅队确实呈现出一幅动人的画面。落日余晖将其笼罩在华丽的色彩之中，蒙古卫士的服装与这种色彩相得益彰。远处卡尔力克塔格山上的紫色雪原渐渐隐去，一轮满月挂在天际，车中洒满银白色的月光。胡莫博士早已鼾声大作了，与此同时，车轮吱呀作响，车轴下面的3只大铜铃发出空洞的叮当声。

队伍走得沉重而缓慢，尘土打着旋飞扬。在一个村子附近纵队停顿了半小时，为的是让卫队和赶车人吃晚饭。

傍晚9点时气温已是零下12摄氏度了，考察队再度置身于沙漠之中，周围一片寂静。我们不时碰上由毛驴、骡子、马和装着棉花的马车组成的小旅队，旅队叮当的铃声在沙漠的夜晚里显得尤为响亮。凌晨3点，队伍开进了头坡村，停在一位蒙古王爷漂亮的府邸前面。我们被请进了一间屋子好生款待，糖果、黄油、面包、鸡蛋、干果和蜂蜜简直都要把桌子压垮了。第一道菜之后便是肉汤、羊肉煮菜、面条、蘑菇肉煮面。休息时已是凌晨6点45分了。

2月5日，我们继续西进，15名蒙古骑兵为我们送行，他们策马飞奔，卷起漫天尘土。大路越过草原，车辙在松软的地面上可深达30厘米。我们碰见一支有200只骆驼的商队，它们驼载着大包的棉花。我们途经的阿斯塔尼村有一个巴扎、一口池塘和一个小瀑布，其附近便是沙漠。沙漠正好伸至三坡村，我们在三坡村的三间破屋的炕上过了一晚，炕几乎占去了屋子一半的空间，炕的前面是一个祭坛状的火炉，炉子中的烟呛得人几乎透不过气。我们自备给养，诺林的厨子张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饭菜。

2月6日，旅队所经之地大部分虽是荒凉的沙漠，但我们好几次都碰到了果园，里面有桃树、杏树、苹果树。在这个地区我们还看到了奇特的地下河“卡里斯”，即坎儿井。“卡里斯”一般深4米，其水流向南面的村庄灌溉农田。“卡里斯”由垂直的井穴与地面相连，井穴之间相隔30米左右，一个个的井穴就构成了一条地下河，因此，看到井穴的开口，就可知道地下河的所在。

我们的队伍在塔兰奇村度过了一夜，该村住着两户汉人，一户准噶尔人和一户维吾尔人。赶车人的领班阿迪尔·阿訇每天晚上都要来到我的住处接受指令，同时向我汇报次日旅行的详细计划。他告诉我说，车夫们的月薪为15新疆两（约合10先令），但他们还能从他们的雇主玉勒巴斯汗那里每天额外得到两斤面粉和10斤柴火的报酬。

第二天，旅队依然行进在路面坚硬、碎石遍地的戈壁上。我们不时经过小小的沟渠，里面散布着稀稀疏疏的草丛。西面的地平线已被尘雾笼罩，北面天山高耸，山顶白雪皑皑。这个地区的自然景观虽然单调，但其壮阔和孤寂却让人印象颇深。旅队进入舒特布拉克村时，这儿正在举行一场婚礼。晚上我们在小村奥尔代克利克附近休息了两个小时。马匹在这里得到了玉米饲料，我们则在一处废墟中简单地吃了晚饭。旅队在两种色彩之中呈现出一幅浪漫的情调——红黄色的篝火照亮了人们的脸部，而周围的沙漠却被银白色月光所淹没了。

旅队在老全村停留时，夜已深了，马匹在此休息了一天。一名信使的突然到来使人一惊，但他只是带来了插图杂志和书籍。

2月9日，我们经过一个名叫托库斯—达万的地区，它的意思是“九个山口”。它的山口有时回旋弯曲，有时直接越过小小的陡崖进入红色的峡谷，路边不时有一堆堆石头。

一碗泉村只有两个汉人小农庄，我们就在此过夜，住的是最简陋的“旅馆”，其条件恶劣的黑屋子的房顶上有一个烟洞，泥墙上也有一个洞，没有门。从此地至善鄯之间的地区被称为“风的沙漠”，因为据说春天的风暴可以掀翻马车和骆驼。

次日早晨，刮起了一场西北风，天空云彩飞渡。风暴在马车周围呼号，马匹和车轮后面卷起遮天尘土。蒙古卫队在前面走得很远。通过两道陡直的山口以后，旅队进入一带荒凉的山脉，最后在车轱辘泉村附近的峡谷停留。

早晨的阳光很刺眼，笼罩在晨光中的谷地显得格外神奇。旅队沿着蜿蜒的路线前进，谷地有时宽仅20米，两边都是50米高的丘陵。出得谷地便是天山山脉下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地。在我们停留的赤克钦村有一个电报站，在这里我们收到一封袁教授发来的电报，他说拉尔森率领的纵队将于2月12日出发。

第二天旅队行程49公里，第三天为53公里。因此，大家在夜里2点30分就起床了，借着灯笼的光线穿好皮袄，但一上马车又很快入睡了。

早晨9点大家才醒来，当时车在东盐汉附近停了一会，汉即湖。湖是没有看到，但却发现了一处圣人墓。墓为中国风格的圆形穹顶结构，建有塔楼，石棺似的墓上盖着白色织物，内墙悬挂着上书汉字的红色的织物条幅，墓前供奉着小羚羊和盘羊角。给我们赶车的伊斯兰教徒，将随身携带的油倾倒在祭坛的灯上点着并虔诚地拜祭。然而，据说大部分的朝觐者都是准噶尔人。

在不甚高的山间做长时间的旅行让人感觉沉闷，这之后旅队进入了一个狭窄有趣的谷地。为了给马喂足饲料，向晚时分我们停止前进。这里寸草不生，我们用一条已劈裂的电报柱做了柴火，在另外一

处地缝中找到了一点雪充做饮水，晚饭是豆汤和茶，大家过得很愉快。

越往前走，峡谷越窄，两辆马车迎面相遇时几乎无法避让。晚上9点，旅队越过了一处海拔1160米的山口，当天我们的高度下降了3800米。走了24小时之后，大家在小村子西盐汊扎营过夜。

2月13日旅队进入一片开阔地，周围全是深色的奇特山峦，整个下午我们就穿行于这些山脉之间。尽管日已西沉，车夫们仍然唱着歌，车轮吱呀吱呀地在满布碎石的地面上欢快地滚动。天色越来越暗，大家开始打盹，有人耷拉着头睡着了，直到次日清晨旅队到达头屯子村时才被叫醒。马匹在那儿休息了两个小时，然后我们继续前进至锅台村。在最后一段行程中，我们所在的高度又下降了500米。

2月15日，天一破晓大家就上路了，村头不远处的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冰，同时一条明渠险恶地挡在前面。马抬了一下腿就滑倒在地，它挣扎了一下又站了起来，车陷至轴，但却幸运地过去了，只是车上的人和东西被狠狠地颠了一下。伊布拉希姆精通自己的行当，但他的同伴过来得却不容易。一辆车被卡得很深，用了8匹马才拖出来。

比尔—布拉克村附近都是红色的沙石山，它的名字是“一泉”的意思。村中有3户回人种植小麦、玉米和瓜。纵队经过了一处麻扎和烽火台废墟，大家很快就注意到一座城市就在不远处。斜阳之中显出果园和高大杨树的轮廓——那是善鄯绿洲。一支运送棉花的大型商队迎面而来，其目的地是归化城。马车和毛驴组成的小旅队时有所见。路逐渐变成了大道，两边都是柳树、杨树和桑树，骑马人和牲畜拉的车从尘土中飞奔而来，处处可见孤零零的农舍。我们的车队轰隆隆进入一个巴扎，我们今晚下榻的旅馆就在这里。阿迪尔·阿訇要求休息一天，因为已经损失了一匹马，同时还需要4匹新马。

善鄯有4道城门，主街道处在南北门之间，城中只有300户人家，其中一大部分是汉人，乡村里几乎全是维吾尔族人，一名厅长或市长和3名军官是住在这里的仅有官员。

左宗棠在新疆恢复和平以后，建立了目前的行政区划。“天山北路”和“天山南路”这样的地理名称已失去意义。据说这个地区是古代善鄯国，这其实是错误的，我曾于1900年发现的楼兰城才是古代善鄯国，但在我发现之前的20年，人们当然不会知道这一情况。现在最好能给这个地方起一个新名称，放弃善鄯这个名字。

胡莫博士在善鄯还未休息好，早上就有一大群病人站在他的“诊所”之前等候，患有肺结核、麻风病、眼疾等其他可怕疾患的人前来求医，他也尽可能地予以帮助。

旅店庭院中鸽子咕咕作声，麻雀啾啾而鸣，长长的车队伴随着这种美妙的声音启动了。一个小时后车队进入沙漠，靠近左侧的一带沙丘被称为库姆—塔格，意思是沙山。右侧分布着一些小绿洲，来自其中的水有时正好流向路旁。

在我的纵队自包头出发以来建立的宿营地中，善鄯是100号营地，在去列莫什的路上，营地数目达到200个。列莫什村风景如画，两边都是灰墙秃树。村里的小旅馆带有回廊，站在其上，可以俯瞰一条小河谷。

2月18日，早晨7点的温度为零下7.2摄氏度，下午两点则升至零上8.4摄氏度。车队卷起厚厚的尘土在低矮的山间行进，最后进入浪漫荒蛮的散吉姆谷地。我们沿谷地向西北方行进，右侧一河水量挺大，水流切割出一条深达25米的河道。浸蚀台地垂直通向岸边的一窄段植被，道路有时就在河道的最边缘，车子行进在上面时我不禁担心松散的泥土能否承受得了车子的重量，车子是否会掉进深沟。一座小桥跨越河道，将前进路线导向对面。沿着一条来自右面的边沟，通往被列考克教授已经极为生动地描述过的巴扎克力克石洞。在我们这一侧，可以看到有简单壁画的石洞和房屋。河边有几处农舍和一个磨坊。风景很壮观，车队两边都是高大的红沙石山。河中瀑布的咆哮声传了过来。跨过一座低矮的桥梁后，到达三吉姆阿吉斯村，村中有一小队驻防军。

2月19日早晨，除了诺林和我以外，所有人都骑马去看巴扎克力

克洞窟。他们中午时分方回，他们对看到的东西津津乐道——在洞窟的许多地方清楚地显示出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曾经工作过的痕迹。一些壁画表面上覆盖着一种起到保护作用的灰泥，到处都可以见到装饰性壁画的残留。

那里的古迹和风光显然给一些考察队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争相阅读列考克的书——虽然所有人都已读过了。

很快，车队再次进入沙漠，而海拔也仅有30米，现在距卢克沁附近的著名凹地越来越近了。卢克沁位于吐鲁番以南，根据斯坦因的说法，其最低处的海拔高度比海平面低980英尺（298米）。然而，此说还需进一步证实。

浑浊的空气中闪现出一座陵墓清真寺，西斜的太阳在尘雾中变得惨淡无光。午夜时分旅队在吐鲁番进入一家旅馆。

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天，徐炳昶和我拜访了市长兼司令黄将军。黄将军曾在喀叶噶尔待过，他知道乔治·玛噶尔尼爵士。他还去过迪化至楚古查克的修路现场。为祝贺我的生日，徐教授在一间汉人旅馆举行了一场丰盛的宴席，市长也应邀出席，晚上甚至还噼里啪啦地放了一通热闹的鞭炮。

在吐鲁番逗留期间，我意外地得到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地理报告，报告人是两名吐鲁番镇居民。第一位是托克塔·阿訇，他在过去18年里每年都要沿着干涸的库鲁克河床去孔雀河畔的提肯力克三四次，目的是从那里贩羊到吐鲁番销售。另一位是我们的房东霍加·阿布都尔。

托克塔·阿訇的说法得到了霍加·阿布都尔的证实，阿布都尔·拉希姆是唯一到过那个地方的人，他曾是我1900年时探险的向导。

托克塔·阿訇说，7年前孔雀河曾经流入库鲁克河，自那以来一直如此。河流的分叉点在库斯力克附近，顺着老河床流动的新河因而流经英盆。那里有一个渡口，因为水太深，只能用船过河。河水东流过

程中水量逐渐减少，原因是河边的支流吸收了许多河水，形成沼泽和小湖泊，河流在敦煌以北3天行程的地方干涸净尽，没有形成一个末端湖泊。新的植被，尤其是芦苇，迅速在库鲁克河岸形成，杨树籽也生根发芽了，甚至鱼也顺水而下游往东方。

你可以想象我听说这一情况后是多么的快乐和满足，因为1900—1901年我在罗布泊及其三角洲逗留期间已预见到这一情况。我曾将塔里木河的支流比作钟摆，而罗布泊是钟摆末端的钟锤，它时而摆向南面，时而摆向北面。由于沙漠非常平坦，因此水对高度的任何变化都很敏感，当现在的湖床与河床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沙子、腐烂动物的尸体以及植被填满时，水便流入北面的盆地，与此同时，在强烈的春夏风暴的吹刮之下，盆地已被越掏越深了。

正如我在1905年所言，很久以前流往楼兰北面的河流现已回归其旧河道了——虽然“钟摆”的“摆动期”长达几乎1600年，但令我满意的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预见变成现实。

然而，我在吐鲁番得到的情况——并非不可想象——也许是纯粹的幻想或者是误解的产物。同我一样，诺林也急不可耐地想要去现场证实一下，自从河流改道以后还没有欧洲人到达过那里。可现在就去察看是不可能的，因为杨增新要求所有人先去迪化。但一旦我们被批准去罗布泊考察，3月1日我就会派诺林沿库鲁克河先调查一番。除了别的事情以外，我还指示他察看已经恢复的河道是否可以通行小船，因为我渴望在以后对该河进行地图测绘，以便再度深入研究这个在我年轻时就花费了很多精力的水文地理问题。

7月中旬，我在斯德哥尔摩很高兴收到了诺林于5月20日所写的报告，其中说：“谈到您打算乘船在那条新河流旅行的问题，我建议您放弃这一计划，除非您能肯定自己可以溯河返回，该河所通过的楼兰北部地区已经变成了由众多小河构成的泽国，乘骆驼不可能接近三角洲地带的主河道，甚至在亚尔当布拉克东面50公里的北面您也难以找到能够承受人畜重量的地面，河流以南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我们的向导说那儿有几处水湾流向南方，骆驼无法通过这些地方。乘船沿河旅

行很容易，但一旦到了终点，再乘船返回却不容易。”

这样，诺林不但证实了情况提供人的说法，而且还发现新河水量充足可以行船，因此我的计划很清楚，那就是在冬季河流、沼泽和湖泊都已结冰的时候实施冰上旅行并对整个地区进行图测。但该计划的实施要视新疆的政治局势而定，因此未来将决定我的计划是否或如何投入实施。然而，由于诺林的调查，问题的主要方面已经清楚，我们完成了一次具有真正意义的地理征服（参看：《罗布泊，游移的湖》）。

吐鲁番的市长和司令的官邸设在“老城”，“老城”仅有300户居民，四道城门，其北部地带几乎无人居住。

2月21日，我们从“老城”的东门进城，然后又从西门出城，当时几位友好的官员曾询问了我们几句，接着车队进入“新城”。“新城”由亚库布·别克建成，住有660户居民，据说吐鲁番人口中只有十分之一是汉人。

车队经过一条很长的巴扎，巴扎的街道上盖有遮阳顶篷。街两边排列着汉人店铺，红色招牌和蓝绿色条幅交相辉映，每家店的屋顶中楣上都写着红漆汉字，不时可看到一束束光线穿过突出的屋顶，在汉字招牌上形成一片片悦人的光斑和色彩。在街道南面的店铺群中偶尔凸起一座有灰色穹顶的清真寺。货栈前坐着店主，有的卖水果，有的售糖果，还有经营烟杂、布匹和各色小物品。真是五方货物杂陈，八方人物汇聚。街上通道狭窄，通往迪化的大道就穿过通道向西延伸。通道中人群摩肩接踵，热闹非凡，有骑马的，有坐车的，有步行的。有骆驼也有驴，有托钵僧也有乞丐。妇女们头戴方巾，或步行，或骑驴，还有的坐在蓝色小马车中。两轮的阿拉巴斯手推车运载着煤炭，尖叫的毛驴背负水桶。一串骆驼款款走来，背驮大捆大捆的棉花。一阵阵喧闹声扑面而来，人的吆喝声和说话声，车子的噪音，叮当的铃声充斥着街道，黄昏就在这个时候不知不觉地降临。卫队兴致勃勃地行进在我的马车前面，为车队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车子滚动时发出的吱呀声和市场上的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车队终于来到一条水渠

边，毛驴身上的水箱被灌满。一群雪白的鹅在水中嬉戏，鸽子在附近起起落落，鸽哨发出各种悦耳的声音。在车队左首的一片坟墓中，兀然突出一座麻扎。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行进，最后一批树木和田野消失在我们身后，周围又是漫漫黄沙了。我们先是在荒丘之间行进，右面是红色的山脉，不多久，车队转向西北，循一条谷地而上，那里有一个小村庄傍临小河。我们的行进路线再度脱离谷地，穿越左面的山丘，山丘主要由沙石构成，经年累月的烈风如锉子般把沙石“雕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落日余晖漫洒其上，犹如默默无闻的千年废墟。最后我们终于到达康康村，东土耳其语称为“肯迪克”，车队就在此过夜。

次日的行进线路也是傍山而行，地上几乎寸草不生。离开托格拉—苏村时太阳已下山，黑夜接着来临，诺林提着电灯步行在前引路。这里的路比较复杂很容易走错。胡莫和伯格曼骑着马在前面先行，后面的人到达克夫尔嘎村时，他们已安排好了简单的住处并准备好了美味的鸡汤。克夫尔嘎村在汉语里是“三口泉”的意思。

通往豁口村的路经过一片泛着红色的多石地带，这里的石灰石中横切着沙石，还有平坦的山脊和谷地。这里是吐鲁番地区和迪化地区的交界地带，两地的边界标识是一块界石。

2月24日，当我们从留宿的黑洞中走出时，周遭壮阔的景色跃入眼帘，但见群山之间镶嵌着一条狭窄的谷地，溪水从中奔涌而出，谷底乱柳摇曳，绿意盎然。一支毛驴商队正在上装，所驮货物都是大捆大捆的棉花，准备前往迪化销售。西北方则横亘着红褐色的高大山脉。

我们坐进马车，又一次枯燥的旅行开始了。车队首先缓慢而沉重地滚过河床的乱石然后趟过溪水，马匹用尽全力将车拉上右岸边的一条小路，在这里又艰难地翻过几处露出地面的岩石，车上的人被颠得左右摆动，大家都紧紧抓住车体以免被碰伤。

接着车队又进入溪水，在茂密的柳树丛中穿行，柳树的枝条抽打

着车顶、轻拂着车窗。刚刚费劲离开溪谷，我们又遇到了一处新的陡坡。这个坡度虽有所减缓，但对马来说仍嫌太陡，马走不出十几步就要停下来缓口气。我们后面的一辆车动不了了，所有的车夫都跑来帮忙，喊声和叫声响成一片。我们渴望赶快到达山口，但路千回百转，一个弯接着一个弯，每个弯的前面又是新的天地。由于坡度很大，车队只能缓慢前进。然而我们最终还是看到了陡峭的山口，这是一条深深的切割峡谷，其宽度仅容一辆车通过。北面是壮丽的雪峰，那是博戈多—奥拉山的南坡。

山口下的路更陡，在这里有3匹马被卸掉马具，只剩下辕马驾车。马的前腿绷直紧贴地面，全身后仰后腿弯曲，有时候几乎是坐在地面上，大家有时担心沉重的行李会将马压垮，但好在一切顺利，我们安全抵达河沟庄。

然而车队还必须越过第二道山口。通往山脊的路虽短，但却非常陡，每辆车需8匹马拉拽。车队在山口的北脚转向西面，然后越过昨天晚上已经看到的那条河。该河将挡在前面的山系“劈”开两个山口。北面山上的美丽雪原闪耀着红色和紫罗兰色，右边是沼泽和冰层，很难跨越。车队在一个名叫达坂的大村庄过夜。

第二天，我们继续在高大的天山山系中西进，在左面还看到一个小湖泊。天黑时伊布拉希姆偏离了道路，差点把我们扔进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危险大坑中。今天的宿营地叫柴窝堡。

次日，车队在一场东南风暴中艰难前进至一个村子。27日早晨向迪化做最后冲刺时暴风雪大作。车马冒险行进，地面一片银白，天空阴郁湿冷。然而，早晨还未结束，雪已变得又湿又粘，雪水顺着马车窗户向下流淌。路经多山地区，车队翻过了好几个高地。黑德和里艾伯润兹下马步行，因为他们马车的一个轮子坏了。

前面不远处停着两辆新的敞篷四轮小马车，旁边站着一小群人。很快我们就认出其中两人为赫姆波尔和沃尔兹，第三个人是希尔莫，他是德国弗斯特公司驻迪化的代表。

我们尽可能坐进敞篷四轮小马车中——这种车走得较快。车队进入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在一幢单层的俄式房子前停住时，下午刚刚开始。这幢房子属于在去年秋天就已经破产的俄—华银行，现在杨增新将它拨给我们使用。我们那些先前抵达迪化的人——冯·考尔、傣特曼、哈斯伦德和学生李前来迎接我们，并立即带我们去吃饭。与我们一同用餐的还有杨增新的翻译塔塔尔·布尔汗及其停车场的主管。我们在迪化逗留期间，布尔汗和俄罗斯人吉米尔金将作为侍者和联络官听候我们的差遣。另外为考察队中方人员服务的两名汉人官员是吴和李。杨增新托布尔汗向我们转达了他的欢迎之情——现有的情况已与1月大不相同了，当时我们刚越过新疆边界，被怀疑图谋不轨。

用餐之后，有多人来访，其中两人为天主教传教士——德国人希尔布伦纳神父和荷兰人费尔德曼神父。这两个人都是活泼而愉快的学者，在迪化期间和他们在一起相处愉快。他们为我介绍了迪化的形势。

在宽阔的庭院中，霍德博士的气象站已开始展开全面工作，观测工作由傣特曼和李负责。霍德本人则前往博戈多—奥拉，在2700米的高度设立了一座高山观测站。

现有，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逐渐会集到了新的大本营，俄—华银行的房屋已明显不够用，因此德国人的领队赫姆波尔就在这条街的不远处另租了一处房屋，我与诺林、胡莫、伯格曼、徐炳昶和丁一起搬往那里居住，每人一屋。

该房也是俄式，收拾得干净而舒适，屋主是一个塔什干的老萨尔特人。房屋临街有一扇大门——大门通常在夜晚关闭。迈进大门就进入了一个长方形庭院。靠左边有数级台阶通向主通道，沿此通道可进入一屋。该屋的左面就是我的工作室与休息室，右面是公共餐厅，内置一长桌，桌上放着瑞典、德国和中国的小国旗。

胡莫博士的屋子紧挨着公共餐厅，看上去更像一个医学实验室，与之相连的是考察团其他成员的屋子。就在这套居室的对面，是低矮的厨房和中国仆人的居所。

直至晚上，我们才将房间收拾好，这到达迪化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就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第二十六章　新疆省主席杨增新

我们就这样来到了迪化，这是权力强大的杨增新政权的首府。考察队成员和我在此度过的整整两个月将对考察队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拉尔森的纵队直到3月8日才到达这里。

我们先进行了一般性的拜访——呈递名片并通报考察队的到达，不久我们就接获通知要我和已经抵达的考察队成员于2月29日中午12点前往杨增新的府上进行晤谈——我们要接受一次彻底的审查。

我们乘坐几辆蓝色敞篷小四轮马车进入白俄区的主街道，街道上泥泞不堪，在我们停留期间，我曾听说有两匹马被淹毙，甚至还听说有孩子被淹死的事情。通过维吾尔族人居住区和汉城墙的大门，我们抵达了门口站着持枪警卫的衙门，这是一个由庭院间隔开的红色建筑群，为统治新疆全省的政治中心，到达会见厅前，我们穿越了两个长方形院子。新疆的统治者杨增新在前厅会见了我们，他的贴身侍卫陪侍在他的两侧，陪同杨增新参加会见的还有部长樊大人和刘大人以及其他几位军官。

我们面前的这位新疆统治者，曾使我们在新疆省的东面品尝到了冷遇的冰凉滋味。只要他愿意，他就一定能阻止我们的计划，从而使考察队被迫掉头东返。他是想看看我们是什么人吗？想看看我们到底是绅士还是土匪吗？

杨增新目光犀利，面色严峻，不动声色地将我们扫视一遍，然后同我们每个人轻轻握手以表示欢迎，其弯腰鞠躬的动作几乎难以觉察。

杨增新生于云南，曾在甘肃担任过许多职务，在权力的阶梯上越爬越高，最后被选为新疆的军事统帅。他镇压了东干、柯尔克孜和蒙古人在阿尔泰和伊犁地区的叛乱，恢复了新疆省的治安。自1911年以

来，他一直任新疆省最高领导。17年来，他以铁腕手段扑灭了所有企图反抗他的权力的叛乱。他促进商业，改善道路，引入汽车，建立电站，兴修工程，不断忙于制订各种改良计划。我们还知道，自从内战爆发以来，他一直使新疆免于冲突。新疆省东部靠近哈密的边境地区一直驻扎有蒙古人和回人组成的重兵，他们的指挥官就是刘旅长。他们的任务就是挡开“基督将军”冯玉祥有可能发起的第一击。

杨增新的控制区域南北2000公里，东西1500公里，面积几乎有300万平方公里。因此，新疆的面积是瑞典的6倍，它的面积相当于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和瑞典各国面积的总和。由于沙漠面积广大，新疆的人口只有大约300万，其民族有维吾尔族人、蒙古人、东干人、柯尔克孜人、塔兰奇人、塔吉克人、多浪人和汉人。然而，根据杨增新自己的说法，新疆有800万人口。

杨增新被视为一个公正的人，他对自己的军队要求非常严格。我听说就在我们到达前不久，杨增新有一次由两名卫兵陪着沿街散步，这时他发现一个身着军服的士兵站在靴店前，手持一根带钩木棍一双接一双地偷靴子。杨增新向卫兵使了个眼色，卫兵立刻上前将小偷当场枪毙。小偷的头被割下来装在一个带格栅的小木笼子里在商店旁挂着示众了好几个星期，以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

对我们的第一番审查结束后，杨增新元帅让我拉着他的手和其他人随他一同赴宴。我们携手走过两间小屋进入餐厅，餐厅是一个长方形的房子，一张长桌子占去大部分空间。杨在桌子一边的中间位入座并邀请我坐在他的对面，徐炳昶教授则坐在我的左边。杨增新的右边坐着他多年的心腹和俄文翻译——来自喀山的塔塔尔·布尔汗。他的左边坐着他最好的朋友刘大人，他也是一位社会名流和教育专员。他的背后则站着一位面色和善的黑髭胖少校——他寸步不离杨增新左右，俨然一位贴身卫士。

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馅饼、饼干、甜食，它们都是用来自白俄的蜜饯饼烘制而成；还有各色香烟和美酒，侍者给我们斟满法国白兰

地和白葡萄酒。

杨增新的前面放着一个厚公文包，里面装满了文件、信和电报，他们全与我的考察队有关。他翻了一下文件，从中拿出一封信交给徐教授，并随口说："这是几个月前北京的一个学生写给考察队一名李姓学生的信，有人认为可疑就交给了我。信中谈到有军队正向新疆东部推进，想必各位都明白对此我不得不谨慎。由于这一原因，我下令在哈密对各位进行详细盘查。"

徐教授看完信后交给我说："这封信里有句话说'恭贺在旅队中有200名士兵与你相伴'。"这听起来是一个并不算糟糕的玩笑。

香槟斟满了杯子。杨增新起身致辞，布尔汗担任翻译。他欢迎我们来到迪化——"诸位到此，对科学、对新疆、对全中国都是福音。各位将揭开我们这个伟大省份的秘密，找到贵金属和煤，同时可提供指导使我们能提高新疆人民的福祉，我将非常荣幸地能在各个方面为诸位的工作提供帮助。"

在答谢词中，我感谢他的盛情款待和对我们的有力支持，我说在北京我们就已经对其在新疆的英明治理有所耳闻，我们从哈密至迪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也已充分证明我们所闻不虚。现在，全世界都躁动不安，中国内战方炽，而他却能在自己的省份维持和平与秩序，从而为整个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对他、对科学、对新疆有所助益，如果对新疆人民的福祉有所帮助，那将是我们的莫大收获。

饭桌上的气氛轻松而愉快。徐教授作为中方人员的代表发表讲话，他简要地回顾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希望自己的祖国现在开始一个新的复兴时期，当然，各省之间首先要团结和睦相处。

接着杨增新又开始谈话，他以令人惊讶的率直谈到了将军之间的战争。我向他呈上张作霖元帅的亲笔信，其时已越一年。他面无表情地读了一遍，之后的谈话对那位元帅并不友好。根据杨增新的看法，张作霖是一个只知为一己谋私利的人物——"他不考虑和平和人民的

幸福，而这正是我在新疆省奋斗的唯一目标”。而就在我这本书写到这里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已成为谋杀者的枪下鬼。

我们知道杨增新是一位有学问和见多识广的人。他已印行自己的回忆录30卷，并且仍在对自己的生活和新疆省的治理进行总结反省，因此他对写书的人抱有极大的敬意。他说他知道我已出了好几本书，其内容不仅涉及新疆地理，而且还关乎其他方面。

显然，杨增新对我们的印象不错，因为在3月4日我们受邀在同一个地点参加了一次名副其实的中国国宴。一道又一道的中国菜令人目不暇接，鲨鱼鳍、竹笋、烤鸭以及所有中国皇家餐桌上应有的珍馐全都一应俱全。

这一次我谈到了我们的计划和期望。我请求他允许诺林在罗布泊进行一次地理考察，同时允许伯格曼和哈斯伦德在大约相同地区实施一次考古调查。杨增新爽快地答应了——“可以，没问题，他们随时可以出发。他们不需要特别通行证，我将责成当地政府好好接待他们。”我又进一步要求在查尔克力克和库车建立永久性气象站，德国人和中国人可以长驻那里进行气象观测。他对此也欣然允诺——“当然可以。我将向那里发出必要的命令，很遗憾没能让你们在哈密建立气象站，因为哈密处在战区。但你可以选择吐鲁番、古城、楚古查克或库尔加取而代之。”

对我们所有的请求他都痛快地答应了，我们现在可以自由行动了。考察队所有中方人员都属于国民党，但他还是允许袁教授、黄文弼和丁按计划进行考察旅行。

杨增新虽然外表严峻，但有时也偶尔开开玩笑。

“你们为什么要劳心费神地骑着骆驼去沙漠中寻找古废墟呢？在我们衙门中您有充分的机会研究考古学。你都看见了，这里的一切都摇摇欲坠，这间屋子的灰泥都大块大块地掉落了。”杨增新对我说。

“您的牙是真牙吗？”他问我，因为他似乎不相信我只比他小3

岁。

我用手指紧紧捏住牙齿摇晃给他看，他笑了，我看到他嘴里仅余几颗牙齿。而且，就这所剩不多的牙齿里的一颗仍然因为疼痛而使他烦恼。我将胡莫博士推荐给了他。然而，两星期后胡莫博士到来时他却拒绝拔掉那颗病牙，而只想吃些止疼药之类的东西。

这一场中国国宴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人们一直坐着。当大家最后起身告辞时，宴会的主人彬彬有礼地陪我们走过两道庭院并向我们鞠躬致意，一直等我们坐上马车时他们才转身离开。

在迪化，到处都在传说杨增新以前从没有像接待我们这样接待过任何欧洲人。显然，在中国内战方酣之际进入中国腹地是一件冒险的事，但我们成功了。

在新疆边境我们遭遇的曾是不信任的眼光，可在迪化的这几天我们受到如此盛情款待。显然，考察队的前景已非常明了。这都要感谢杨增新的敏锐和准确，他显然是一位心理专家和人性的判官，他只消看一眼就能判断出我们远离政治，我们的科学计划和当时的政治风向无关。杨增新对工作人员非常尊敬，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工作者——他晚上睡得很少，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整日忙个不停。

在杨增新生命的最后时期我们与之发生了紧密的接触，他的伟大人格和有力刚毅的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他也许是已经过去的旧时代的最后一位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他富有古代中国人的伟大德行——自豪和爱国。他梦想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有一次他对我说，一旦南方军队进入北京，他将毫不犹豫地承认新秩序。对我们而言他是一位施恩者，他帮助考察队跨越了一道危险的深沟。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将以尊敬和感激之情怀念他。

3月7日，外务部长樊大人和教育部长刘大人为考察队成员举办了一场丰盛的欧式宴会——由于这两人所负责的部门的特殊关系，我们与之接触频繁。宴会餐桌上的食物和饮料极为丰盛，席间谈话不断，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总是试图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我们的敬意。

必须的访问和回访耗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12日晨刘大人和樊大人早早来访，我慌忙披衣迎客。他们以杨增新的名义要求视察我们的气象站，学生李和刘带着他们参观气象站并解释了各种设备的用途。第二天刘与赫姆波尔少校一起前往博戈多—奥拉的高山气象观测点接替霍德博士，同一天伯格曼和哈斯伦德也踏上了前往罗布泊的征程。他们用3辆马车驮载着行李，马儿扬蹄奋鬣，显得非常有气势。他们还将把我们自己的大约30匹骆驼带进吐鲁番，这些都是经过戈壁考验的“老兵”了。4天以前诺林也带着35匹骆驼和他的中国仆人向南移动了。

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被称为“俄罗斯人区”，因为杨增新将该地区和城南端的地方划给了300名在迪化寻求避难的白俄居住。这些人大部分靠做生意、烤面包、洗衣服、缝纫等行当维持生计，大都生活窘迫。前白俄总领事加科夫自革命以后一直留在迪化，他学识渊博，富有同情心。虽然他从杨增新那里领到了退休金，但他的生活很不宽裕，因为他将大部分钱都寄给了在俄罗斯的家人。这里也有几位俄罗斯医生和药剂师。吉米尔金和他的亲戚的经济条件很好，他们住在这座城市里最好的私人宅第中，他一直是刘大人的翻译和商业客户。

一天晚上，布尔汗代表杨增新来见我，他带来一封来自北京的密码电报。杨增新想知道其中的内容，但不巧的是我们忘了带密码本，因而无法将电报翻成明文，但杨增新起码可以证明我们对他无密可保。

3月18日，我再次起了个大早，因为有人报告说杨增新本人正在来我住处的路上，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进入我的院子。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才听到远处传来喇叭声，因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购买饼干、甜食、水果和香槟，并在餐厅摆好桌子。不久，50名身着鲜黄色军服的骑兵占领了街道，这是杨增新的卫队。另一些人骑着马进入院子，其余的则停在门口。震耳的喇叭声在近处的房屋间回荡，一辆蓝色的小马车在台阶前停下，名震四方的杨增新走了出来。我和徐教授趋前迎接。我们簇拥着他进入餐厅，并讲了一番礼节性的话欢迎他。

两小时之后，杨增新起身告辞，我们送他上车。当骑兵队消失在街道尽头时，我的头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希望他这次拜访之后一切平安。

不久，布尔汗来见我，我向他宣传了一番我的计划，即乘飞机飞向那些骆驼无法达到的沙漠。他对此非常感兴趣，并说支持我的计划，但这还需要外事部门的审查。

布尔汗在杨增新那里详细阐述了我的愿望，不久外事专员便要求我和徐教授前往彼处晤谈。外事负责人樊大人的衙门为俄罗斯风格，如其他一样，前有庭院。我们经过一条通道，内挂一鹦鹉，它会说汉语。通道尽头是一间明亮宜人的接待室，我们在接待室的一张绿色桌子前坐下。布尔汗充当翻译，徐教授没有参与谈话。

樊大人口气友好，对我们新疆考察的重要性多有褒词。我向他指出，自己年轻时期在新疆的森林、山脉和沙漠中度过了很多年愉快的时光，现在如果能以实际行动表达我对该省的感激之情，那将是一种荣幸。但这里有的地方我们无法涉足，因此只能考虑用飞机去揭开它的秘密。

樊大人说话时不时鞠躬，其声音柔和悦耳。今天他与杨增新进行了长谈，并得到了杨的指示。几乎一年以前北京的外交部就已向杨增新通报了我这一愿望，同时告诉他，政府已拒绝了我的飞行计划，然而，杨增新可以自行决定此事。但出于政治原因，他拒绝了我的请求。樊大人一再道歉说中国的内部局势首先必须明了，现在只能静观事态的发展。

因此，飞行计划只能暂时搁置起来，但却有一个小小的安慰当作补偿。樊大人已受托以杨增新的名义邀我从本地的资金中提取全部60000块墨西哥银元——这些钱为考察队和气象站所必需。由此看出杨增新对我们怀有极大信任，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可能在北京向杨增新的女婿付出同样的数目。

晚间风暴乍起，房顶上屋子里到处充斥着风的号叫声。次日天

降大雪，泥海般的街道不见了，肮脏的城市又变得一片洁白。外面一阵叫声把我吵醒：“北京陷落了，中国统一了。”两天之后樊大人证实这不过是个谣言而已。

我们得不到可靠的消息，虽然有无线电与外部联系，但天线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出问题。经肃州和兰州也有电报线与迪化相通，但传输缓慢。第二条线路由楚古查克通往塞米巴拉金斯克。俄国一边的情况很好，但中国一边的情况却糟糕极了。路的状况也同样，在迪化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之间汽车和马车暂时都不通，因此我们已很久没有外部消息了。

我一次又一次地收到这位或那位考察队成员的来信。吐鲁番的诺林来信说，3月17日晚9点那儿的温度为零上17.5摄氏度，白天就好像是在热带，进罗布泊之前他写道：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到前面去旅行。在这次旅行中我不知道什么在前面等着我，但肯定是一次不凡的经历，因此我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只管挥鞭纵横驰骋，在前方人迹罕至的大沙漠上留下一片永恒。”

在3月13日收到的肃州来信中，索得鲍姆说学生马已经去兰州向甘肃当局解释额济纳河气象站的目的，他认为不会有什么危险。然而，我们不断为齐莫曼少校担心，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待在气象站了。他不懂任何亚洲语言，但却是一位能干和无所畏惧的人。

拉尔森在一封信中说，说我们自额济纳河派出的隋姓学生已安全抵达目的地，只不过在暴风雪中损失了3匹骆驼而已——不管什么时候收到工作人员平安的消息，我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除了逃离自己祖国的白俄以外，在迪化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欧洲人，他们不是传教士就是商人。三十多年前我就在此地认识了英国传教士里德莱和亨特，这次与他们重逢，真是莫大的快乐。像从前一样，他们住在简陋的房子里教书和传教。里德莱夫人已经作古，我们一起谈论着在甘肃的往事。年轻的德国商人希尔莫先生是弗斯特公司

在这里的代表，他给我们提供了莫大的帮助，从雇佣仆人到购买马匹，从筹备给养到转交欧洲来的邮包，几乎在所有实际事务方面都有他的援手。

迪化邮局的负责人是爱尔兰人麦克劳恩，其住宅是一幢漂亮的石材房子，位于高级汉人官员住宅区的附近，与之一起生活的是他年轻的妻子。这位大不列颠帝国的代表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帮助，我们的进出邮件都由他打理，从无差错。

街对面的俄罗斯总领馆是我们最近的邻居，它的面积很大，由好几幢白色房屋组成，里面有俱乐部、剧院、网球场和花园。在这里可以看到白俄罗斯教堂的绿色尖顶，也可以听到召唤祈祷的钟声。一年前已离开的前总领事曾禁止白俄在其教堂履行对神灵的义务，但杨增新却命令教堂向白俄社群开放，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尊重外国的宗教信条。

后来，在拉尔森和里艾伯润兹的陪同下我拜访过新的总领事加夫洛先生。这两人，加上后来的冯·考尔，他们都要求回家，想得到护照和信息。为了能从新疆进入俄国，必须获得莫斯科的特许。加夫洛先生以最大的诚信解决了这些手续问题。一般来说，我们总能在俄罗斯总领馆感受到善意和宽容精神。

4月5日，我们举办了一场盛大宴会，受邀出席的除杨增新外，还有樊大人、刘大人、蒙古王爷、潘先生和几位欧洲人。胡莫把我们的屋子装扮成了一间很有品味的客厅，在他的房间也放了一张桌子，专门接待以个人身份参加的高贵客人。餐厅的墙上挂着瑞典、德国和中国国旗，屋子的大门上边还飘扬着两面中国彩旗。布尔汗担任所有讲话和谈话的翻译。宴席非常丰盛，杨增新和我们在一起很放松，也很幽默。为杨增新举办的宴会当然也要招待他的50名贴身侍卫，我们在院子里为他们摆上桌子，食品和饮料都是从巴扎定购的。

在复活节的星期天，我在杨增新的私人书房与之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晤谈。书房挺大，有一扇大窗户，房间里有两张摆满书籍和文件的桌子，一个安乐椅，我们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小一些的桌子边。布尔

汗也在场，但充当翻译的是徐教授。我们又一次提到了飞行计划，杨增新平静而入情入理地向我解释了他拒绝我们的政治原因。

就在俄罗斯教堂的钟声宣布复活节到来的时候，丁和陈也出发了，他们将要在天山南麓进行长途旅行。

说实话，迪化的中国宴会花去了太多的时间，但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应酬，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挺重要，因为只有在那种场合人们才能密切接触和相互了解。胡莫博士一般不参加宴会，因为有好多病人要等着他诊治。他的病人中有阿克苏的行政长官，刘大人的弟媳——她得了疟疾，一位患痢疾的官吏。有一天他被召去见杨增新，对方虽和以前一样要保留他的坏牙，但却允许胡莫博士对他的全身进行一次彻底检查，他甚至还问胡莫他能否再保持5年的健康。胡莫博士回答说他还可以健康地活10年。检查完身体之后胡莫受邀参加了一次汽车旅行，这使他有了一个短暂的放松时间，然后杨增新开车将他送回衙门参加宴会。和我们其他人相比，胡莫博士有更好的机会了解中国人的生死，有一次当他刚要离开阿克苏行政长官时，另外一名官员送来急信，问胡莫博士能不能马上赶过去。在那名官员的房间他看到一个仆人四肢伸展、不省人事地躺倒在地板上——这个仆人吞服了许多大麻——当天他被辞退了，他觉得对他太不公平，遂决定要死在主人的房间。这种报复行为在中国并不少见，仆人结束自己的生命一般并不是出于悲愤，而是因为他们的主人会因他的死而丢面子——如果他死在主人房间的话。胡莫给他作了诊断，然后用冷水浇其身子。此法奏效了，那人恢复了知觉，甚至可以站起来走路了。然而，事情结束后他又服用了一次大麻，剂量是前一次的两倍。这一次他运气不好，没能恢复知觉。

4月20日，玛斯考尔和刘从博戈多—奥拉归来，轮到胡莫前去值班了。他的病人都恢复的挺好，可以让他休息一阵子了。同一天袁教授出发前往古城和阿尔泰。南京政府教育部长，也是以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给徐教授发来一封电报，告诉徐教授他已担保额济纳河畔的气象站只会用于科学目的，因此气象站的工作将不会再受到干扰。

徐教授和我于4月25日再度登门拜访杨增新，我通知他5月初我将去欧洲旅行几个月，并交代在此期间考察队工作组织的情况。对我的所有要求他都允准如前，我们将会收到护照、文件和去楚古查克的汽车。他要求我帮他弄两支带弹药的步枪和一架大型望远镜。我告诉他我准备向国际媒体介绍他及其新疆，他谦虚地说自己是一个非常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人，但如果我执意要写，就请不要忘记他的首要和最重要的目标是人民的福祉。

我进行欧洲之旅的原因是必须在柏林和斯德哥尔摩进行几次深入的磋商。考察队的工作我可以很放心地交与徐教授和赫姆波尔少校。由于中国人不同意使用飞机，我就没有理由让所有德国飞行员待在新疆了，他们中的4位将随我去柏林，其余5名都留在气象站做事。因此考察队现有8名瑞典人，5名德国人和10名中国人。

在迪化的最后几天我很忙碌，不仅要为出发作各种准备，而且按照中国的礼节还有好多应酬不能省略，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小插曲。

4月底时雨下得很大，不久雨就变成了雪，大地再度被覆盖。但29日却是一个好天气，我邀请杨增新、樊大人、刘大人以及其他几位帮助过我们的要员参加在公园会见厅举行的告别宴会。俄罗斯总领馆的负责人也在受邀之列，他们帮助我们弄到了跨越边界进入哈萨克斯坦旅行的许可证、护照和推荐信。

说真的，杨增新所建的迪化公园不仅是为了让公众娱乐，而且也是为了他本人的荣誉。公园紧傍一条沿着城西侧流动的小河，周围林木蓊郁，气象不凡。公园中的主建筑受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影响，一楼的大房间直接和阳台相连看似一种由木柱支撑的画廊。纪念堂本身只是一间屋子，边上有一汉式祭坛，上有各种装饰和祭器，和杨增新真人一样大的肖像身着戎装挂在墙上。毫无疑问，这座奇特的建筑的目的旨在让后世记住杨增新的美名和他在新疆的政绩。纪念堂入口前的庭院中有一亭子，里面也赫然立着一座杨增新塑像，金粉度身，灿然若霞。

但见一汪小湖襟带栽林，景色十分优美。在长廊的一端有一小夏

屋，里面置一小桌，但座位却很高。

客人们正在到来，中国人并不特别注意按时赴约。但我们刚一踏上亭子的平台，杨增新的汽车喇叭声就传了过来，那一队着鲜黄军装的骑兵也策马奔入院子，在亭子和主楼之间站成两列。我们急忙下亭迎客。他一边友好地与我们答话，一边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夏屋。我们在这里整整等了一小时，余下的客人才全部到齐。

所有的客人都露面以后，我领着杨增新进入宴会厅，宴会上只有中国菜，所有人整整坐了3张圆桌。有几个人发表了讲话，我的心情很好。

讲话的人通常站着，讲完之后绕着3张桌子与每个与会的人寒暄几句以示尊敬。我讲完话转了一圈后回到我的座位时，发现杨增新正坐在我的椅子上与徐教授谈得热乎，我只好坐在杨增新的贵宾座位上，一会儿他转过头附在我的耳边悄悄说："你问问徐教授我给他说了什么。"

徐教授告诉我，说杨增新请求我在瑞典为他购买10辆适合在新疆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我一回来他就付款，而且我还可以在考察期间无限制地使用这些汽车。

我随后与杨增新和布尔汗详细讨论了这件事，我建议他先买回4辆，他同意了。

5月5日，我驱车前往杨增新的官邸向其告别，卫兵说杨增新正与俄国总领事一起用餐，于是我只好将名片递了进去。然而，当我坐上马车准备返回时，杨增新的汽车开进了院子。他本人和布尔汗从车上下来，示意我过去。杨增新拉着我的手走进官邸，我们一起坐在前屋交谈，内容涉及我的旅行和返回。他又提到了汽车并要求我带两名会讲俄语的瑞典技师来迪化帮他维修汽车，我答应尽量照办。

杨增新累了。15分钟后我起身告辞，他陪我穿过院子走到马车边，再次祝愿我一路平安，最后他说："快快回来。"然后车夫一声鞭

响，马车跑开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杨增新。

接着便是5月6日，我非常希望能够静悄悄地离去，但现在无法如愿。黑德、玛斯考尔、玛森巴希、穆伦温格和我们需要思考许多小的事情。最高当局传来命令，要求我们在公园的亭子前出发，樊大人、刘大人以及其他朋友将在那里为我们送别。我再次听到了不厌其烦的长篇大论。杨增新委托樊大人向我转达他的问候，并附上他的大红名片，我也请樊大人代为转达我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刘大人将在3天之后离开迪化，经由西伯利亚和哈尔滨前往天津，在那里经办他本人和杨增新的事情。他非常周到地将我们的两个人——文物收集人李和仆人张纳入他的随员之中——这两人一直要求回家。我曾想将他们沿大商路经由肃州送回，但由于杨增新不希望他们通过甘肃，这样就剩下西伯利亚一条道可走了。现在，多亏刘大人的包纳精神，他们有了一次绝好的返乡机会。

时间过得很快，两辆汽车已等在台阶前。我起身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然后登车离开花园、离开迪化，经由新疆北部进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前往柏林和斯德哥尔摩。

6月2日我刚到柏林，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就已传遍全球——张作霖被谋杀，北京陷落。南方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胜利，人们终于可以指望中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统一起来了。自然，我也在考虑这些事件将会对新疆和我的考察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6月底，我在斯德哥尔摩接到胡莫博士的来信，这封信在5月27日就已经发出。信中谈到了迪化的局势，说到那时为止一切还都平安无事，信中还说霍德、傣特曼和李已于5月10出发前往查尔克力克去建气象站。5月22日沃尔兹和李带着同样的目的也去了库车。5月11日胡莫前去拜见杨增新，请求杨增新允许他在博戈多—奥拉进行一次植物学考察。杨增新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请他测量一下福寿寺旁边的小湖的水深，看看那儿的山地气候是否对他的健康有好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他就打算夏天在这个“圣山”上待一段时间。其余时间胡莫就在迪化周围进行植物学考察，访问病人也越来越成为他的一种习惯。

徐炳昶教授和赫姆波尔少校是我离开考察队期间的负责人，他们忙于指导几名学生进行气象观测。赫姆波尔曾请求杨增新允许他派一支旅队前往额济纳河气象站取回我们于11月留在那里的15匹骆驼行李，杨增新表示不能同意，这再次说明他不愿与甘肃发生任何联系。在信的末尾，胡莫告诉我一条好消息，他说额济纳河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这样，气象站及其成员齐莫曼、索得鲍姆和学生马终于真正摆脱了危险，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然后，迪化甚至也成了戏剧性事件的舞台。7月2日斯德哥尔摩的外交部接到了北京的瑞典公使馆发给我的一封电报，内称："马福祥将军已被任命为新疆绥靖专员，这很可能意味着杨增新将被撤职。"

我向一位北京的中国朋友咨询，这一事件是否会对考察队在新疆的继续工作产生影响，他说："不必忧虑，杨增新将成为省委会的一员。"

北京的瑞典公使馆8月2日的来信证实了这一令人安慰的消息，信中说中国新闻局已发表公告，指出："杨增新已电告南京政府他已升起了国民党的旗帜，并已根据国民党的原则重组了省政府，他已完全承认南京政府的领导。"

然而，7月7日迪化发生的事变给国民党政府的所有决定迎头一击。7月16日，瑞典和各外国报纸纷纷发表了如下消息："路透社上海电：国民政府已经接报，中国新疆的军事首脑杨增新已在迪化一所俄罗斯学校的发奖仪式上被外务委员的卫队击毙。谋杀者已被逮捕，中国人对此深感震动。人们忧虑中国新疆会发生新的动乱，苏俄在那里的影响已经得到扩展。外务委员及其开枪射击的20名卫队已经政府主席下令枪决。"

迪化只有一所法律学校和一所物理学校，后者设有俄语课程，主要是为了训练电报人员。这两所学校都是汉语授课，法律学校有俄语指导课，杨增新似乎是在俄语考试时被谋杀的，据俄罗斯的报纸报道，那个外务委员正是我们的朋友樊大人，他的全名是樊耀南。迪化的传说是，多年前这位樊大人就被派往迪化任命为外务委员。简直不

可思议，我们曾与杨增新和樊大人一起言欢，他们两人至少从表面上看来都是非常友好的。怎么突然就成了一起流血事件的主角，而且都丧了命！

据俄罗斯的电报，此次谋杀之后，一个临时委员会任命了所谓的“民政长官”作为新疆最高权力的执行者，直到南京政府任命一位新省长为止。迪化没有民政长官，杨增新大权独揽，专断一切。

迪化的事件对新疆的考察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我不得而知，自从6月14日以来我再也没有收到赫姆波尔、胡莫和徐炳昶的信——可能是谋杀事件后信件审查更严格了。

但我还是希望尽早能够听到大本营、气象站以及在野外工作的人一切都好的消息。因为现在——在杨增新死去一个月之后，我又想回到我在亚洲腹地的工作岗位，继续完成那伟大的旅行。

附录：罗布泊，游移的湖

（一）

冬季，雾锁千里；春季，风尘蔽天；夏季，骄阳高挂。春秋候鸟来无数，乱点湖水解旅愁。这便是亚洲最深处的神秘之湖罗布泊，几人曾记？几人曾见？七洋无限远，近山无限高，天山贯北，帕米尔横西，昆仑青藏遮南天。

中国人发现罗布泊已有两千年之久，在地理著述中它以各种名称出现。由于对古文献的错误诠释，中国人很久以来一直认为塔里木河是黄河的源头，只是罗布泊将其吞没，但经过长距离的地下流动，在西藏东北的星宿海再度出现，此后一路东去，成为滔滔黄河。因此，在中国人的想象之中，该湖一直被笼罩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之后。

对欧洲人而言，罗布泊也一直是一个神秘的所在。约两百年前该湖出现在欧洲人绘制的亚洲地图上。1733年，瑞典军官约翰·古斯塔夫·莱纳特中尉带回了一份准噶尔人绘制的中亚地图，该图上名为拉普的罗布泊显得非常真实，而同年德安维勒所绘的地图并不十分准确。除此以外，欧洲人关于罗布泊的知识主要来自中国的记载。甚至1875年斯蒂尔勒的地图集所绘的印度和中亚还在罗布泊的北部，跟古代和近时期的中国地图一模一样。

但没有一个欧洲人到过那里，没有人亲眼看到这个不同凡响的湖泊。马可·波罗在1273年曾沿罗布泊南面的路线旅行过，但他的回忆录中却没有提到这个湖，只是谈到了罗布泊中传来的鬼语声，还说沙漠深处有什么敲鼓的声音——实际是沙暴的呼号声。本尼迪克特·古兹曾于1603—1607年到过罗布泊附近，但他的笔记在他死后被烧掉了。18世纪60年代，乾隆皇帝曾派出过懂测绘的耶稣会士进入新疆，但他们可能只是以天文手段确定在西域所获的新土地的位置，对于这个神秘的湖泊则只字未提。

在所有的中国地图上，塔里木河都是流向正东，沿途在左岸接纳了海都河、孔雀河等支流，最后汇入罗布泊或蒲昌海。

因此，当俄罗斯陆军上校N·M.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其1876—1877年的著名旅行中发现了新的事实时，地理学界都大吃一惊。新的事实是，塔里木河转向东南方，罗布泊处在罗布泊的南边，这比中国地图上的罗布泊更靠南。奥古斯特·皮特曼博士就此写道："这一发现和到达北极或穿越非洲大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理学意义。"

著名的中国探险家巴龙·冯·里奇索芬在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不无敏锐地指出，普尔热瓦尔斯基没有找到古老的罗布泊，而是发现了由于河道的摆动而在后来形成的另外一个湖。里奇索芬假定，塔里木河的一条支流流向东面汇入了那个古老的湖泊，而普尔热瓦尔斯基却忽略了这条支流。因此，他不认为问题已得到了澄清。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答复是，中国地图是不准确的，塔里木河没有支流流向东面，当地人称他发现的湖泊为卡拉—库申，这与古老的罗布泊是一致的。

在罗波洛夫斯基的考察中，中尉科斯洛夫在罗布泊的北部发现了库鲁克河的干河床，他曾在两处越过这条一直伸向东方的沙河。

在1893—1897年的亚洲旅行中，我在科斯洛夫到过的两处地点的上游发现了一部分库鲁克河河道，并且沿着普尔热瓦尔斯基水道的东岸旅行，目的是想彻底搞清（如里奇索芬所言）是否有一条支流流向东面，结果证明这样一条支流并不存在。然而，我却在东面发现了一串湖泊，根据我的判断，这些湖泊是那个古老湖泊的变种。

科斯洛夫发表了一本完整的小册子，试图证明我的解释是错误的。他承认库鲁克河是现在的孔雀河的老河床，但孔雀河也在历史上汇入过卡拉—库申，而卡拉—库申与中国人所讲的那个古老湖泊是相同的，那就是说，罗布泊一直处在罗布泊的南部。

1900年我再次回到那个颇有争议的地区，绘制了一幅库鲁克河下

游的全图。这条干河的河床一般宽100米，深约5米。因此我确信，包括孔雀河在内的整个塔里木河在昔时曾流经过后来成为沙河的河道。

在第二次调查中，我横跨整个罗布泊，直抵卡拉—库申，并于3月28日在沙漠的北部发现了楼兰城的废墟。由于所带饮水不多，我们只能待20个小时，在此期间，在罗布泊的北部发现了大量已经干涸了许多世纪的早期湖盆的遗迹。

由于我觉得古城的发现关系重大——不管在地理方面还是在历史方面——遂于1901年3月初重返沙漠，在一间屋子中出土了150件写在木板和纸上的手稿，许多手稿上有日期。手稿表明该城名叫楼兰，公元260—270年是其兴盛期。

接着，为了用数字确定古湖盆的位置和深度，我从南到北对那片沙漠实施了一次水准线测量。水准线使古湖盆的凹地最清晰地展示出来。整片沙漠几乎是平的，楼兰附近的起始点只比卡拉—库申表面高两米。

因此，我的看法是，在表面上和海面一样平坦的沙漠上，流水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高度变化都是极为敏感的。我发现南面的卡拉—库申湖的平均深度为0.81米，里面充斥着塔里木河带来的泥浆、腐烂的动物、植物，流沙也一步步将湖底垫高，与此同时，强大的东北风暴将北部的沙漠不断卷走，这样，在几百年的演变中，这里的沙漠下沉了。这种作用迟早会使南面的湖泊再次流入北面的盆地，从而也使塔里木河再度流入库鲁克河河道。卡拉—库申肯定会干涸，中国地图上处在沙漠北部的那个湖泊一定会再度水波漫卷。我曾在我的著作《中亚与西藏》第2卷第174页（伦敦，1903年）有如下预测：

我确信在几年的时间里这个湖将出现在中国制图学者以前所标注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是巴龙·冯·里奇索芬以其天才的推理所发现的地方。

在我的著作《中亚之旅的科学成果1899—1902年》第2卷第355页（斯德哥尔摩，1905年）有如下一段话：“……根据我们现有的知

识和在罗布泊所得到的高度比较，本人不揣冒昧地断言，一段时间以后那河——塔里木河和其支流孔雀河肯定会返回库鲁克河……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因为这里，即卡拉—库申将完全被冲积层堵塞，河流被迫返回其北部河床。这样河流的最下游就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虽然各次摆动期的时间会长达1500年，但从地质时期的角度看，1500年只不过比我们的一秒钟稍长一点罢了。”

就在整整30年前，我预见塔里木河和罗布泊在几年后肯定会回归北部的旧河道。

地理学家大概不会看重这个明显具有冒险成分的预言。斯坦因声称仅凭一条水准线还不足以“确定楼兰城就在那个古湖泊的岸上”。至于我提出的塔里木河和孔雀河都曾一度流入那个古湖泊的说法，他认为不仅与他的考古观测不符，而且也与自然史的性质相矛盾，更与中国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公元500年所作的描述不符。

1927年初我们的考察队离开北京，经额济纳河穿越戈壁沙漠到达哈密。对罗布泊问题进行一次新的调研是我的计划中的首要任务。如前所言，我因此而向杨增新发了一封电报，请求他允许我的地理学家诺林在罗布泊的北部实施一次为期3个月的考察旅行。杨增新没有答应——我们必须先到迪化。杨增新并不十分信任我们，因为好战的谣言已在我们之前传开了。因此，新疆的统治者要亲眼看看我们，然后才能考虑我们的要求。

1928年2月19日考察队进入古城吐鲁番，住在霍加·阿布都尔·拉希姆房子里。一天早晨一位名叫托克塔·阿訇的商人来访。和平常一样我问了一切可能的问题，而不仅仅关于生意和道路的问题。除了别的事情以外，他还告诉我他每年都去孔雀河边的提肯力克买羊，然后再在吐鲁番的巴扎贩卖。我问他走哪条路，在何处过夜。当提到英盆时他说：“这里水太深，旅行者和货物都要靠摆渡才能过去。”

“你说什么？”我惊叫一声，“英盆附近是条河！28年前我在那里看到的全是沙漠。”

“是的，”托克塔·阿訇继续说，“但7年前（1921年），孔雀河流入了库鲁克的河床。”

“真的吗？”我惊讶万分，“你是亲眼看到这一变化的吗？”

“当然，”他笑着回答，“我每年好几次经过这条新河，常常费好大劲才将羊弄到渡船上。”

“那河向东流了有多远？”我问。

“噢，流得很远，有人说流到敦煌西北三天行程的地方。除了猎驼人阿布都尔·拉希姆外，没有人到过河的终点。”他说。

时间过去一小时又一小时，以前我从未这样仔细地盘问过一个当地人，甚至在西藏向导的带领下，作为头一个寻找普拉马普特拉河和印度河河源的欧洲人时也没有这样仔细过。托克塔·阿訇的描述清晰而真实，他还说动植物都已出现在以前沉闷的沙漠地带。

天黑了，托克塔·阿訇起身告辞，我请求他次日早晨再来，他答应了。然而，他失约了。我派人去他的住处，他不在家。去巴扎找他，他也不在。他害怕什么？难道他暴露了什么秘密吗？他是不是害怕他提供的情况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看来就是这样。不管怎么样，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带有巨大意义的问题。该问题的地理学意义我再清楚不过了，但这里所展示的是一个两千年后所发生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个浪漫的历史事件已经蛰伏了几个世纪，现在——1928年2月20日，它又重新复苏了，而且正在等待我们的考察队将分散的历史碎片连成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没有获得别的地理发现，而只是解决了罗布泊问题，那也会在中亚的考察史上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考察所花费的巨额费用也得到了可观的回报。罗布泊是一条锁链的锁钥，在吐鲁番所得到的情况使我们终于揭开了这个反复无常的移动的湖泊的最终谜底。

在本书的第25章，我只用了简短篇幅交代1921年以来罗布泊所发生的水文变化。我的目的只是要用出书的方式一劳永逸地宣布，正

是我们的考察队第一个获知罗布湖泊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脉动，而我只是世界上众多的人当中第一个证实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的人。自从1901年以来我就再没到过这里，此次突然发现自己就置身于几年前刚刚发生大变动的罗布泊的附近，而且比其他人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神奇的事件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即使在小说中也显得有点离谱和牵强。

但我什么也不想说，只是一心注视着在本书的瑞典版（斯德哥尔摩，1928年）中发现的一张短笺。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意义我至今仍保持沉默。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首先，我们应有更多的人证实托克塔·阿訇讲的是真话，即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真的重新占据了库鲁克河河道，罗布泊真的再次回到了中国地图上所标示的昔时位置。

真的，我由于激动而无法成眠。我生活和呼吸在历史之中——人类诞生以来的地球史。我思考着这个不同凡响的湖泊，它很快将成为地球上最有名的湖。是我证明它在周期性地游移，单单一个游移期就可能长达1500年。现在一个游移期已经结束了。事实已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不仅活着看到了这一事件，而且是第一个知道这一事实的人。

我回忆着28年前在库鲁克河河床长时间艰难跋涉的情景。那宽阔、深邃、干涸的河道，那河岸上的死树林，都还历历在目！那一个个树干就如同墓地的石碑，灰裂、干枯、脆得就像玻璃。见不到生命的痕迹，更没有一滴水，那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地方，在地球上不会找到第二个。1500多年前一条大河流经此处，其生命之水滋润着楼兰，使之在耶稣前后的数百年中繁华相递。楼兰城城墙巍峨，塔楼耸立，商旅辐辏，市场兴旺，贸易畅达，驻军森然。它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前哨据点，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桥梁。驼队由此而进，成捆成袋的丝绸被运入罗马，装点着罗马帝国上流社会的奢华与糜丽。

这条漫长的商路就沿着罗布泊沿岸向东西方延伸。商人及其仆从，动物和飞鸟，军队和使节一路风尘，行色匆匆，但都要在这个天赐之湖或与之紧密相连的支流或小湖一解渴乏，然后才能继续向前完

成各自的使命。

4世纪之初，北方的蛮族南下将富庶的楼兰劫掠一空，楼兰从此陷入沙海。我于1901年在此发现的几份历史文献都谈到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然而，其他地方的堡垒和村庄也完全消失了，与此同时，罗布泊湖水逐渐干涸，在沙漠的南缘出现了一个新湖，这是塔里木河改变流向在东南面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的河道的结果。人类和动物逃往西部和南部有水的地方，大批的鱼类和软体动物灭绝了，它们干燥的骨头和贝壳在我们脚下沙沙作响，浑如秋天的落叶。死亡与湮灭就像一块巨大的尸布覆盖在楼兰文化的遗迹上。当马可·波罗在稍远的南面正向忽必烈汗的宫廷行进时，楼兰已在瀚海中沉沉睡去了近一千年，这位伟大的威尼斯人根本不晓得以前还有这么个城市。625年之后，我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穿越罗布泊，幸运之星将我引到了那些古老房子。但见无法穿透的寂静笼罩着无法唤醒的古城，伟大的丝绸之路就在这里被切断了1500年。往事越千年，敦煌和楼兰之间的最后一声驼铃早已随风而去，留下的只是默然无语的沙漠。1901年，我冒险从敦煌以西向楼兰推进，有一次走了11天居然滴水未见，最后是野骆驼的脚印把我的驼队从覆灭的边缘拉了回来，顺着它们的脚印我们找到了库鲁克—塔格山脚的盐水泉。

现时楼兰和整个地区复兴的钟声敲响了，这里本来在4世纪初还享受着罗布泊及其支流的滋养。现在水流回到了老河床，随之也带来了鱼和软体动物，还有草原动物、植物、红柳和杨树。用不了多久，春季的风暴就会在茁壮成长的树林奏响古老的歌谣，公元之后最初几世纪的动人景象也会再现。

要不了几年时间人们就会重新沿着回归的河流向东旅行。也许有一天罗布泊会复活——不是那些已在黑暗的坟墓中沉睡了两千年的人的复活，而是楼兰古城的复活，我有责任将其从睡梦中唤醒。渔村和港口迟早会在这些水道旁边出现。虽然30年已过去了，但在1901年漫过我全身的奇特感觉却如在昨日，当时是3月，我信步迈入楼兰一所古老房子的房门，也许是最后一位永远离开这里的中国人走得太匆忙，竟忘了关门，因此几千年来房门一直开着，而我则有幸成为第一

位访客。

我们的地理学家艾里克·诺林博士和我一样内心也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一刻都不想等待就急着要去罗布泊，调查1921年以来罗布泊所出现的新问题。发给杨增新的第二封电报的答复和第一封一样——我们必须先去迪化，我们必须等多疑的主人验明身份后才能别作打算。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趋向新疆首府。没多久就被招往杨增新的衙门。大家身着灰色的时髦猎装在衙门的内院站成一个半圆形——瑞典人、德国人和中国人一共24人。杨增新挺直身子，威风凛凛地走了过来。他身材匀称结实，相貌堂堂，仪表不凡，天庭饱满，目光睿智，鼻梁高耸，三角形的山羊胡子已经花白，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旧世代的人，他是已经灭亡的中华帝国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

这位66岁的铁腕老人18年来一直统治着地球上最大的省份——新疆，其面积是瑞典的6倍，也是这位老人掌握着决定我们命运的最高权力，他可以把我们遣回北京，也可以向我们敞开所有的大门，罗布泊的钥匙就掌握在他的手中。

他一边轻轻颔首，一边向我伸出他那权力无边的手，然后，一个一个地与我的人握手致意。这一过程持续时间很长，因为他那探询的目光要将每个人从头到脚打量一遍。握手结束以后，他表情释然，彬彬有礼地邀请我们进屋，然后牵着我的手走向已摆好的桌子。显然，这次审查结果不错，杨增新已看出我们不是强盗，而是诚实的人。

接着便是延续数小时的盛宴。杨增新端着斟满香槟的酒杯起身致辞。他首先向考察队表示欢迎，称我们是他们的客人和朋友，认为我们的考察将对他、他们的官员和新疆省大有助益。

我起身作答，感谢他对考察队的盛情款待。徐炳昶教授代表他的中国同伴也向杨增新表示感谢。宴会结束以前我请求杨增新批准诺林前往罗布泊北部进行一次考察。

“没问题，”他回答，“不需要护照，我要亲自指示各地认真接待诺

林博士。”

（二）

在前面，我简述了罗布泊近来的历史，从1877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这个游移湖与中国地图所载位置不符到1928年2月20日我在吐鲁番第一个得到该湖已北归其旧河道的消失为止。我还提到了新疆的统治者杨增新允许我们自由出入罗布泊，不受干扰地解决这个议论纷然的问题。

现在对罗布泊的考察又开始了。我命令诺林博士尽快组建他的第一支考察队，经由库鲁克—塔格山中的小村辛吉尔直抵我在1900年曾图测过的河床。自那以来该河床就被称为库鲁克河，意为“干河”，它也被称为库姆河，意为“沙河”。现在，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在1500年后重归这条河道。诺林的主要任务是对已恢复生机的河流进行图测，这一任务绝不是出于民族的或个人的荣誉的考虑。我当然在年轻时测量过这条尚无生机的干河，我是首位在1900—1901年穿越罗布泊的欧洲人，那次我发现了古老的军事殖民地楼兰的废墟，而且提出了楼兰曾经坐落在中国地图上所标注的罗布泊北岸的假说。我发现了西汉军事路线上的烽火台，而且，通过水准测量的途径断定沙漠的北半部存在着一个平坦的凹地。由此我推测该凹地在很久以前是古老的罗布泊的一部分。最后，我在30年前的两本书中预言塔里木和罗布泊将在不久重归北面的旧河道。不管我的预测赖以建立的物理和地理学事实是否正确，我的预言终究发生了。因此，即便我有为瑞典和我的考察队获得荣誉的强烈愿望，人们将会宽容我。诺林博士和我有同感，过不了几天他就要随同旅队前往那里进行春夏旅行了。

4月11日，他离开了辛吉尔，很快就将那里的山脉抛在身后，并在10公里之遥的南方看到生气勃勃的库鲁克河蜿蜒东去，如同沙漠之中的一条蓝色缎带。他沿河东行了220公里，到达楼兰东北约20公里的地方，图测了河道、沿岸湖泊和沼泽地，确定这条大河的大部河道就是我在28年前测量过的那条河道。河宽150米左右，深达数米。每秒流速大约为1米。这样其每秒的流量肯定达到了200立方米。在楼兰

的北面库鲁克河形成了一个内陆三角洲。在该古城东北20公里处还有一条宽150米的支流，水质清冽。诺林没能推进到楼兰，因为该城北部的大部分沙漠都被湖泊和沼泽淹没了。

库鲁克河两岸生长着大片茂盛的芦苇。一片片的红柳丛也展现着勃勃生机，植物的种子顺水而下，越漂越远。我年轻时这里的沙漠寸草不生，荒凉的像月球一样，而今，野猪群在密不透风的芦苇丛中开辟道路，狼群在追猎羚羊和野兔，鸭子和野鹅在湖面上成群戏嬉，鹳群和鹤群在沼泽中觅食。

沙漠重现生机。动植物再次成为这片沉睡了1500多年的沙漠的主宰。那么人类要多久才能重新生活在沙河岸边呢？睡梦中的楼兰什么时候才能重温其繁华旧梦呢？

罗布泊的夏天来得很早，蚋虫和牛虻遮天蔽日，诺林和他的驼队备受折磨。他只得满足于沿河侦察一遍。这样我们的考察队就第一次将人类的足迹印在了新河两岸，诺林暂时没有惊扰罗布泊，而是集中全力在库鲁克—塔格进行地质研究。

1930年2月诺林再度去库鲁克河考察，这次季节更为合适，他得以延长第一次已经开始的考察活动。和前一次一样，这一次他也同样等到了我的老朋友和向导、猎驼人阿布都尔·拉希姆的大力帮助，后者的家成了他的基地和大本营。我托诺林给阿布都尔·拉希姆带去了一件衣物，后来他来信邀我去辛吉尔做客，共同回忆30年前的情景。

来自伦德的年轻天文学家尼尔斯·阿姆博尔特博士参加了诺林的第二次考察。2月19日他们从库鲁克—塔格的库尔班契克泉出发，直趋库鲁克河以南，在其左岸建立了他们的35号营地，这一点成为他们的工作中的第一个顺序站点。阿姆博尔特在此进行了极为精确的天文观测、三角测量和陆地与天文反射系列钟摆观测活动，同时进行的还有地磁观测、三角测量和对陆地与天文反射的确定。最后，在两个气象站同时进行了完整的气象观测活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精确的绝对高度值。在上面所提到最后一项观测活动中，年轻的俄罗斯人伏洛尼科夫给阿姆博尔特博士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这个地区鲜为人知，部分地区根本不为人所知，我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先行者到过那里一次，这次通过阿姆博尔特的各种工作，诺林获得了这一地区的精确的地形——地理学全图，其在坐标网格和垂直线方面的可靠性是以前所无法想象的。诺林和阿姆博尔特联合绘制的库鲁克河和库鲁克—塔格地图超越了整个中亚探险所取得的所有领先成果。其所表现出来的精确度是地球上任何一幅类似的沙漠区地图所无法企及的。

3月5日他们移向英盆，这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军事路线上带有望楼的前哨堡垒。该地成为系列观测的活动中的第一站，所提及的所有观测活动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然后两位瑞典探险家沿着库鲁克河继续前进至东北，他们所处的地方在楼兰东北40公里处。诺林对他目前制作的地图并不满意。我不久前在北京接到了他于1930年9月29发自喀什噶尔的报告，其中总结了他在过去一年中的劳动成果。从上面所提到的最东点，他循着最近冰川期的塔里木湖北岸一线正好进入喀什噶尔东部地带，获得了新疆最近第四纪历史的广泛而极有价值的资料。他的眼光甚至投向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巨大山系天山和昆仑山。我所能披露的是，他总有一天会向我们呈现一幅出人意料的壮丽画卷，使这些山系的形成过程和中亚的地理起源跃然而出。

但在这里我们暂时只关注罗布泊。

根据诺林的观点，在最近的冰川时期，整个塔里木盆地是一个巨大的湖泊或内陆海，就像地中海一样，而罗布泊只是这个巨大的内陆海的最后孑遗。他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发现了塔里木湖的北岸线，非常清晰分明，他已将此记入了自己的地图。湖岸线形成了一个台地状的堤岸。越往东去，史前人类的沉积愈少，楼兰北部和东北部则没有史前沉积物。诺林认为，塔里木湖的北岸在最近的冰川时期处在楼兰的东部和北部，该湖加上其向东部的延伸部分很可能和里海一样大。而在东北部，它则形成了一些长长的海湾，这里的湖水浅，多为沼泽地。

北部湖岸线更西的部分常常被打断，这是最近的冰川时期来自天山的大河造成的结果。从麻扎尔—塔格到喀什噶尔以东的古老海岸线则消失在东南方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中了。年底时诺林忙于向东跟踪塔里木湖的南部海岸线，他打算将该湖的整个海岸线都连接起来。

由于诺林使用了极为精确的高度测量法，可以看出自塔里木湖消失以来地壳已经历了长期的水平变化，因为北岸线由西到东明显下落。如果诺林在楼兰城的北面的湖岸线上标一个零值点的话，那么阿克苏附近的同一条湖岸线的高度值则为300米。继续往西，高度则再次降到250米。

这种地壳运动在西部表现为较为强烈的地壳隆起——或不太强烈的地壳下陷——这一点在东部不太明显，因此塔里木湖水被倒向东面，在盆地的东部形成了一个湖。诺林称之为大罗布泊，根据所发现的地理线索他已绘出了该湖的轮廓。由于在这个新的海床北面几乎没有机械沉积，从而表明冰纪最强烈的融化活动在那个时期已经结束，因为在前一时期巨量的沉积物进入塔里木湖，其东部地带完全塞满了。

现在该湖已进入其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其边缘地带的来水已不足以补充大罗布泊表面的蒸发量了。由于这一原因，湖面越缩越小，变成了一个不断下降的盐湖，两千年已经过去，在此期间该湖几乎变成了一个岛屿三角洲，而其最后接收者则是一个游移不定的淡水湖。然而，诺林推测人类曾定居于大罗布泊岸边，因为他在老湖的北岸和西岸发现了粗糙的碧玉箭头，那些在旧石器时期生活在大罗布泊岸边的人的肯定有充足的饮用水。

多少年以来，塔里木河一直蜿蜒曲折地徘徊于塔里木湖干燥的史前沉积地带，中国人一直到最近也认为塔里木河为黄河的上游，称其为“河”。由于地势平坦而松软，塔里木河不断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从一条河道转移到另一条河道。有时候在这里，有时候在那里，反正每年都要为自己开出新的通道。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变化（除了知道它真的发生了以外，我们什

么也不清楚）发生在4世纪之初，很可能是在公元330年，那次特殊的变化使新疆东部的地图与西汉以来或更早时期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那次变化中，塔里木河及其支流孔雀河离开故河道向东流去——这就是被称为“干河”的库鲁克河，我于1900年对之进行了图测。几百年以来该河一直向东流过楼兰已达地图所说的罗布泊——然后转向东南面，在罗布泊南部的阿斯蒂恩—塔格山北麓形成了一个后被称为卡拉—库申的湖泊，普尔热瓦尔斯基1877年发现此湖，认为它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罗布泊。我在1901年证实卡拉—库申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它肯定会返回北部的旧湖盆。

20年以来，即在1921年，塔里木河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发生了——这是因为这一变化就发生在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注视之下，并且能够进行验证和调查。公元330年的河道变化当然比今天发生的变化重要得多，因为随着那次变化而来的是亚洲腹地一个完整的文化区的凋落和消失，而几百年来支撑这一文化区生存的便是塔里木水系最重要的河流。城市沙化了，变成了一堆堆废墟，交通和商路断绝了，湖泊干涸了，动植物也销声匿迹了。

塔里木河道的最后一次变化和罗布泊位置的移动并没有带来重大的政治和历史后果，因为当其发生时，居住在最下游和卡拉—库申湖畔的只是罗布里克部落的几百户贫苦渔民，他们已迁至南部山脚下最近的绿洲，开始了新的生活。如果湖泊的北移是持久性的，那么南面的植被肯定会灭绝，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鱼类、软体动物和昆虫，而鸟类和四足动物也许能自救。

在地理科学界，这一水文地理变化可能引来很大关注，而且，其对未来政治与贸易的意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根据我在吐鲁番获得的情况，1921年卡拉库姆小镇以南15公里处的塔里木河碰巧脱离故道，沿着一条新的河道流向东面，在前往干涸的库鲁克河河道时与孔雀河交汇。对这一地区实施图测非常困难，部分由于新的变化年年发生，部分由于淹没面积太大，最后也由于当地人拼命地挖掘运河迫使水流回南面，因为那里已经缺水了。

在1930年2月至3月的第二次旅行中，诺林完成了两年前已开始的观测工作。河流在库尔干西南5公里处流入高度为两米左右的浸蚀台地区，水质由于携带大量黏土而变浑，四周都是大片密不透风的芦苇。

继续往南有一片枯萎的死杨树林，和我在1900年看到的情况相同，新杨树还没有长起来。由于四周布满芦苇丛生的沙洲、湖泊和沼泽，人们无法靠近河流。总的来看，新河在库鲁克—塔格山的乱石堆旁向东流，位置处在库鲁克—塔格山和史前沉积区之间，前进不远又分成了几条支流。这些支流忽而合为一股，忽而又分开形成三角洲。流过一些湖泊和沼泽地以后，该河又合为一支，水变得格外清澈。河宽有150米，深达8米，流速为每秒1米。继续东流不远，它又分成了3道河湾，最终消失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之中。

大约在楼兰西北30公里处，该河又合为一处，宽达100米。这里的河水流速非常快，以致黏土色的河流发出咆哮声。然后它又分解成一个湖泊构成的迷宫，此为诺林在罗布地区看到的最大湖泊群。站在东面极目望去，新的湖泊一个连一个犹如蓝色的带子。湖泊中一般都有狭长的芦苇岛。在楼兰的东北方向，1921年以来生成的植被越往远处越稀薄，最后竟至完全消失，这可能是河水还在扩展的缘故。而且，由于地面有大量盐分，水已经碱化了，楼兰东北40公里处有一条支流，水色清澈但味道稍咸。

令诺林大为吃惊的是，他在阿尔特米什—布拉克以南一个新形成的湖岸边发现了马队、驴队和一头牛新踩的脚印，其行进方向是从东向西，诺林的推断是，这些脚印肯定是来自甘肃敦煌的逃亡者留下的。

我的朋友、猎驼人阿布都尔·拉希姆告诉诺林，他曾在1929年沿着库鲁克河进行了一次短期勘察，比诺林向东多走了10公里。他已达最东面的湖泊群，从西南方向绕着它走了一圈，最后正好抵达楼兰废墟。在楼兰的正南方他看到一条很大的支流向东流去。因此诺林认为，目前真正的罗布湖位于楼兰以东的罗布泊中心，他推测那里是凹

地的西部分支。当谈到罗布泊中的凹地时，必须记住这些凹地用肉眼是感觉不到的，只有新聚集起来的水和仪器测量才能揭示它的存在。

诺林在其报告中提到他还不能确定现在水的分布与楼兰还处在繁荣期的第三世纪是否相同。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然而，诺林认为，在1600年以前，山脉和楼兰之间布满了湖泊和沼泽，形成了一道保卫中国军事基地免遭北方的蛮人侵袭的天然屏障。

通过深入和勤奋的调研，诺林为楼兰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篇章。他站在地理学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而我们其他人只是关注这个游移湖在历史时期的变迁。他的目光直接回到冰纪，并且绘出了那个时期塔里木湖的湖岸线，那时塔里木湖占据了整个新疆，而且向东可能达到了卡拉诺尔和苏绿河。在冰纪末期，由于逐渐蒸发，冰层消退，河水下降，一度庞大的湖泊收缩了，进入了我们现有所知道的游移期。如果这种蒸发过程继续延长，新疆的气候越来越干燥，罗布泊将会消失，塔里木河也将经历和车尔臣河、和田河和克里雅河一样的发展过程。

1930年春，考察队的中国成员黄文弼先生在楼兰以东不远处进行了极有价值和勤勉的考察工作，他将获得的资料——一幅解释性的简易地图，两篇关于罗布泊和楼兰的深具学识和洞察力的文章都送给了我。这些成果是对诺林的库鲁克河研究的补充。黄文弼就楼兰的历史意义表达的观点非常有意思。考虑到那时为止，只有两个欧洲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到过楼兰，因此，听听一个博学多识的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黄文弼并没有成功地抵达楼兰。跟诺林的遭遇一样，他也是受阻于新形成的支流和沼泽地。他从卢克沁出发，自阿尔特米什—布拉克前往那里，在南面很远处就能看到古城的两个塔。

然后他沿着东北方向前进，因此，其右侧总是有水——在楼兰的南面和东面布满了湖泊。他循着一条支流继续向前，该河宽30米，深4米，流速很慢。一名猎驼人告诉他该水来自孔雀河，于5年前已到达这里。黄文弼到达一处位于湖岸边的望楼，这无疑是古楼兰城的一部

分。由于楼兰离斯坦因所走的路线很近，也许这座望楼就是斯坦因地图上的某一座。但黄文弼认为斯坦因没有看到这座望楼。他在望楼里面发现了约80片大约公元前80年的刻字木片，两千年前该地被称为头垦。

黄文弼通过迷离的雾霭极目东眺，发现5公里范围之内湖泊纵横，沼泽相通，无法逾越，于是他从头垦转向北面。

黄文弼的向导射杀了一匹来湖边饮水的野驼。对这些四处漫游的沙漠居民和它的生活条件而言，塔里木河下游所发生的水文变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当阿布达尔附近和卡拉—库申边上的“食鱼人”因水的消失而不得不迁往察尔克力克和米兰时，野驼却不会为水犯愁了。我曾看到它们像幽灵一样在沙漠中相距数英里远的植被孤岛之间游荡，它们的蹄印曾将我们引向阿尔特米什—布拉克以东的3口水量稀少的小盐水泉，几世纪以来野驼已熟悉泉水的所在，它们至少一个星期去那儿喝一次水。

现在由于水已回归到北面的旧地，野驼再也不用游荡到很远的地方去解渴了。不管它们处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或这一荒凉山脉东部谷地的任何地方，它们只需直接转向南方，总能抵达某个湖岸或支流的边上。它们也没必要以盐水解渴了。沙漠中突如其来的水是淡的，经过芦苇密布的沼泽或浅湖的过滤又变得非常清透。它们也不再需要寻找牧草了，只要抬起轻盈的脚步趋向南方，大片的芦苇和新鲜的红柳就会出现在眼前。只是楼兰以东的沙漠荒凉依旧，但只要水停留在故道，要不了多久植被就会扩展到最外沿的湖区。

随着1921年以来，罗布泊水文分布所发生的变化，野驼的黄金时代已到来了，但它们的前途仍旧阴云密布。如果塔里木河和孔雀河水继续留在库鲁克河河道，要不了多久人类就会循着水流、植物和动物的痕迹向东转移，沿河建立居住点和农庄。也许已沉睡了1700多年的古楼兰也会重新苏醒，再睹人间烟火。如此野驼的好日子就要结束了，它们必须迁入人迹罕至的沙漠深处寻找新的宁静。

31年前顺着库鲁克河的干河床旅行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给一

个地理学对象的尸体进行医检。而今28年已弹指飞过，我再次派诺林去看这位病人，它仅是处在昏睡状态。在对当时的干河道进行了一番图测后，我表达了如下看法：“我认为库鲁克河是整个塔里木水流的主干，该河所形成的湖泊只处在沙漠的北部。”在历史时期的开始，那些终端湖就重复着同样的变化，自普尔热瓦尔斯基以来也是如此。但自那时以来湖泊一直处在沙漠的南部。如我所料，在这个历史时期以前的某个特定的间歇期，湖泊是呈三角形或新月形的。塔里木河水离开北部故道流向南方后，三角形的北边干涸了，水汇集到了南边的角上。1921年塔里木河再回北道以后，南方的湖泊干涸，而北部的盆地又被水灌满。

处在这些游移期之间的是众多的中间阶段，但恐怕已不可考了。寄生湖和新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在1896年发现的许多湖和水道都属此类，它们是这块变动不居的土地上的匆匆过客。

把我自己1900年对库鲁克河的描述与诺林1928年和1930年对新河的描述进行一番对比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两者之间有一鲜明的共同点，诺林自己在报告中说，新河的河道大部分是我图测过的那条旧河道。我提出了一个假定，指出正如在塔里木河下游一样，在河流的终点河流都流过浅浅的湖泊群。诺林现已发现了几处这样的通道湖群。在我以前曾看过的一个地方，河宽75米，深6米左右，一片死树林将河岸台地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另外一处地方的河宽94.5米，深达6.5米。老河和新河一样也是在库鲁克—塔格南麓的乱石堆中穿行。但我认为，河流在楼兰的西面注入罗布泊的第一湖区，但诺林、阿姆博尔特和黄文弼则确定它继续向东越过楼兰向东北方向流了约40公里。我在从阿尔特米什—布拉克至楼兰的旅行中没有看到河流，但诺林现有报告说那里到处都是湖泊和沼泽。1901年时我似乎清楚地看到罗布泊向东北方向伸出了一个很大的分支，因此我在当年2月在那个地区跨越过一个湖泊的老湖盆的底部。几年以后，斯坦因和亨廷顿也穿越过类似的覆盖着盐层的古湖盆底部，但我穿越的这个湖底在那个历史时期开始以前可能已经没水了。

根据诺林的估计，已恢复生命的库鲁克河在1928年春和1930年

的头几个月里每秒的流量至少为200立方米，这使人有理由怀疑新河不仅接纳了孔雀河，而且也接纳了大部分塔里木河水。因为我在克尔拉附近发现孔雀河的每秒流量为72立方米，这一流量在全年都几乎没有变化，因为巴格拉什充当着一个补充和分配的角色。然而，只有两条河的东南段和南段得到考察以后才能确定最终的答案。

我的考察队的5名成员在1928年越过或循着那个神秘的三角洲的干河道进行了考察，其中考古学家伯格曼和气象学家霍德提供了我急需的全部资料。他们发现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的最下游几乎都已干涸了。在涨水时期，流水顶多在河道中涨涨落落，滞流不定。在更远的阿尔干，1928年以前，1921年以后就没有一滴水了。在塔里木河道的最深处只能找到一些死水潭。由此不难看出，1928年时塔里木河和孔雀河都流进了1900年时还滴水不见的库鲁克河。

对罗布泊现状的探索和图测还未进行。我有理由推断这个湖比1901年的卡拉—库申湖要大得多，因为绿洲的发展和新疆灌溉水的增加并没有减少它的水量。

我已计算过，在世纪之末，流过小渔村玉尔特查勒干进入卡拉—库申湖的平均水量全年为每秒64立方米。我在30年前已形成了如下看法，即如果焉耆库尔附近岸边的湖群和阿伍鲁库尔至阿尔卡库尔之间的湖链突然干涸，前者每秒18立方米的流量和后者每秒19立方米的流量将帮助塔里木河汇入卡拉—库申。这样，终端湖全年每日接到的流量将是每秒101立方米，而不是64立方米，湖水容易将从24亿立方米扩大至3000亿立方米。

1921年以来，卡拉—库申河两条湖链都消失了，现在流向楼兰的水在途中并没有分叉，因此其水量比玉尔特查勒干附近的塔里木河要大得多。不错，新湖群和寄生湖群在东至英盆的新河道旁的出现减少了塔里木河的流量，但无论如何，现在流入罗布泊北部的终端湖的水量都大大超过了1921年以前流入南部湖中的水量。

（三）

最后，我还想就1921年以来发生于塔里木河下游及其最终接收者罗布泊的重大的水文变化的历史意义多说几句。

阿尔伯特·赫尔曼博士早在1910年就清晰而深刻地勾画了几条主要古代交通要道的走向，两千年前丝绸就是沿着这些道路被运至罗马的。在其中亚地图上，他展示了这条伟大的交通要道通过中国本土沿着南山或里奇索芬山脉的北麓西行，直抵敦煌和玉门关，然后在玉门关正南分成两条支线，北线经过哈密、吐鲁番、库车和喀什噶尔。南线的东部也是一条由防卫工事保护的军事路线，斯坦因对此已作过详尽描述。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4世纪之初时，罗布泊位于罗布泊的北部地区，因此上面提到的从敦煌至楼兰的南线走的是罗布泊的北岸。在楼兰附近南线又分成两条，北线顺着库鲁克河直至今天的克尔拉，南线循西南方向直抵和田。

因而，只能说由于罗布泊的北部有水道和罗布泊的存在，才使敦煌往楼兰的路线和库鲁克河沿岸线路能够生存，从而为外来者的入侵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

4世纪初，塔里木河及其支流孔雀河变道移向东南方，造成终端湖游移至罗布泊的南部，由此而造成北部罗布泊附近的水道和湖泊干涸，敦煌、楼兰和库车之间的商路和军事线路因而失去意义，经由此路与西方的交通遂告中断。

现在，如前所述。钟摆的又一次新的巨大摆动将流水和静水都送回了北面的库鲁克河故道和楼兰附近的湖盆。因此这一带又出现了两千年前的环境，敦煌和楼兰之间固有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恢复了。

这种深刻的变化对中华民国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物理和水文地理界，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给政府重开古老的交通线提出了一种手段。正如在汉代一样，现在也可以建设一条通衢大道，从中原经由敦煌、楼兰、库车到达喀什噶尔。然而，昔时的驼队需要4个月，而今的汽车队从东面的北京走到极西的喀什噶尔只需两个星期。通过这种

办法，走完最西部的中国省份和中国本土之间的距离所花的时间将被压缩至目前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新疆将距南京更近。通过组织良好的货物运输，新疆的产品将被送往沿海地区，外国的百货也会被运至新疆，官员和旅行者可以迅捷地走完4000公里的行程。新疆和中原之间的大型运输将完全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该地北部的运输也将经由吐鲁番和哈密通向这条大道。这样，贸易将利用中国境内的道路进行，从而摆脱对西伯利亚铁路的依赖。

也许安德雷·西特罗恩提出的跨越亚洲的汽车旅行设想会刺激这条两千年之久的交通大动脉复苏。在M·乔治斯·马里耶·哈阿德特的领导下，这次包括神父迪尔哈德·德·贾汀在内的伟大汽车探险也许不久就会成行。无疑，他们的经历和观测活动对中国肯定有更大的实际用途，在此谨祝愿这次法国人的冒险活动获得其应得的成功。

在北京，由代表考察队利益的中国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公布了我在塔里木河下游获得的重大发现，并建议在北京或南京与喀什噶尔之间修一条汽车路。我向政府提出的类似建议也收到了有利的反馈，全部由中国学者组成的这一委员会宣布，他们准备支持这一提议。

亚洲的土地起码和美洲的土地有一样多的机会，可以肯定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亚洲的腹地将发生以前连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事情。

1930年12月28日北京